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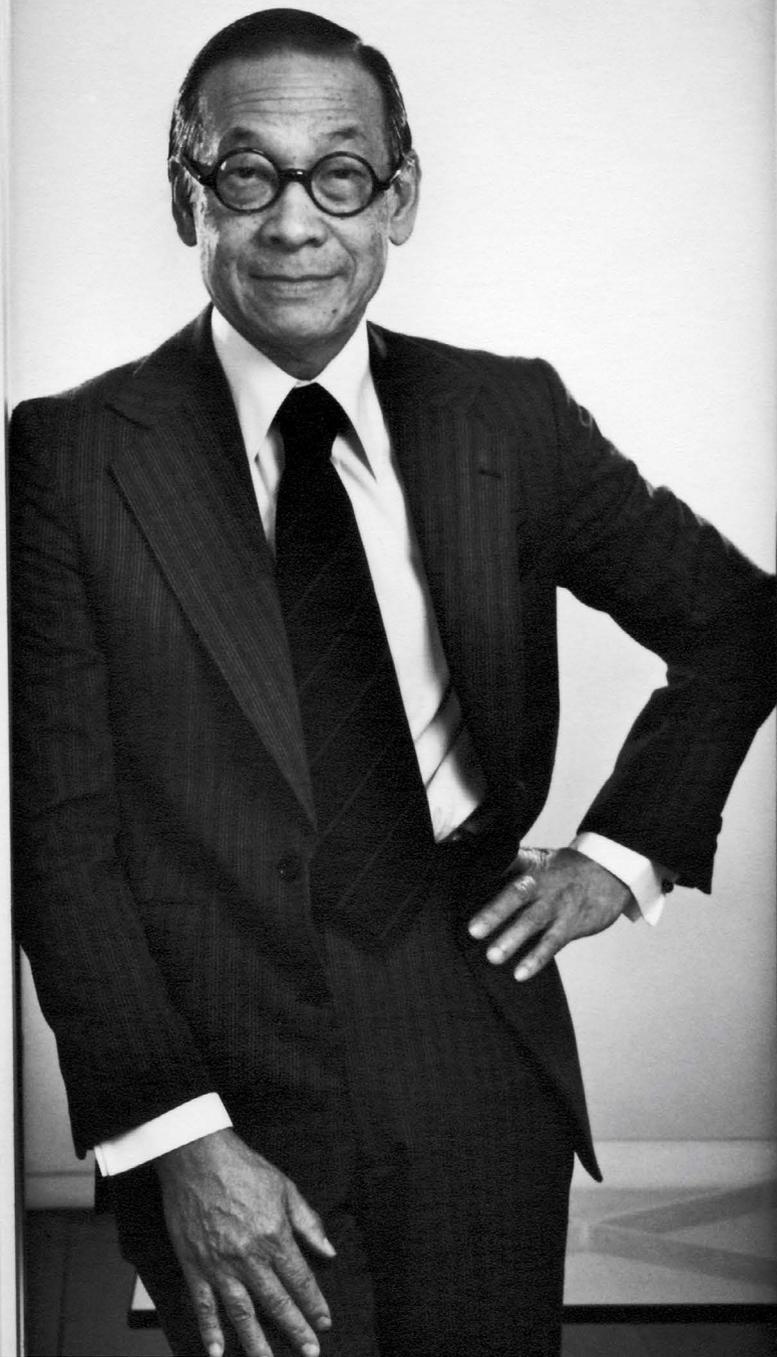
影响世界的人

三联
耳关

生活

2017.4.17
2017年第16期
www.lifeweek.com.cn

周刊



百岁贝聿铭

东方与西方
权力和荣耀

932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编辑出版
国内统一刊号: ISSN1005-3603
CN11-3221/C
邮发代号: 82-20 定价: ¥15元

BOEING
波音



安全第一 Safety First

飞越时代的伙伴

“不要让任何航空业的创新机会与我们擦肩而过。”这是创始人威廉·波音对公司的期许，更是百年来我们坚守不渝的信念，与此一脉相承的还有波音与中国同仁的友谊与合作。

从聘请来自中国的王助担任首位工程师，到今天与中国航空业的全面合作，这飞越时代的伙伴关系历久弥新。百年如梭，传承与创新如同一双有力的翅膀，带着我们不变的承诺，飞向未来。





阿那亚
aranya

人生可以更美

人们说 那里是

海边的乌托邦

春暖花开 诗和远方

我们说 这里是

亲密关系的能量场

家人邻居有爱有光

人们说 去

遇见自然 遇见艺术

遇见内心柔软的自己

我们说 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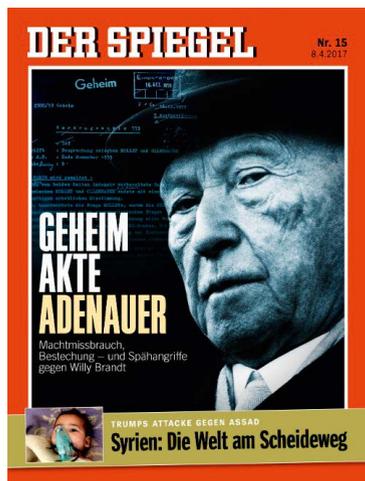
找到舞台 找到生活

找到我心安处的故乡

海边的孤独图书馆

400810998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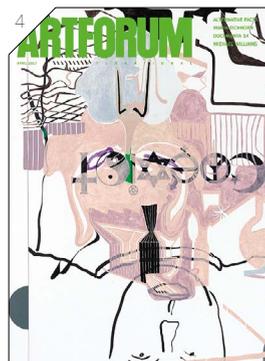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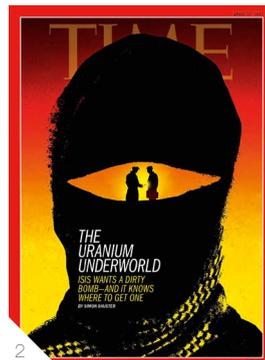




《明镜》(德国) 2017.4.8

站在十字路口的叙利亚

本周，叙利亚政府疑似部署化学武器，引起美国的空袭，伤亡惨重。特朗普在最近的一份声明中表示此举“关乎美国国家安全利益”，这是否意味着西方对中东国家的军事干预将再次掀起一波巨浪？另一方面，阿萨德再次使用化学武器的冷酷行径，也是令很多叙利亚人逃离家园的内在原因。加之俄罗斯的强势介入，混乱的叙利亚局势将成为对全球各国的一次考验。



《科学》(美国) 2017.4

1 尼日利亚的无形危机

经历博科圣地暴乱后，尼日利亚北部的民众正面临绝境。800多万人需人道主义援助，其中510万人严重营养不良。食物、水和卫生设施的缺乏，使难民区成为疾病的滋生地。疟疾和麻疹蔓延，小儿麻痹症再现，儿童死亡率打破历史纪录。联合国请求为危机拨款10亿美元，但仅有小部分得以实现，医务人员只能在资源匮乏、供不应求的情况下进行救援。

《经济人》(英国) 2017.4.8

3 为什么计算机从来都不是个安全的东西？

在互联网渗透到日常生活点滴的当今时代，利用电脑敲诈勒索、黑客雇佣和数字商品销赃的黑市日渐繁荣，甚至可以说，计算机从来就没有安全过。一个普通程序通常有14个不同的安全隐患，这些都可能成为黑客的非法入侵点。应对这个问题，技术手段只是其一，更需要监管、法律与保险多方面的共同努力。

《时代》(美国) 2017.4.17

2 铀黑市的背后：“脏弹”何以蔓延？

“脏弹”的危险正迅速蔓延，一旦核武器落入不法分子手中，许多国家将面临重大问题。4月3日，圣彼得堡的爆炸事件造成至少14人死亡，几十人受伤，俄罗斯深陷“脏弹”危机的恐慌之中。未来几年里，特朗普将在控制核武器方面采取多种措施，如在美国建立全球反核贩运网络。核威胁不仅来自军事和流氓政权，在经济困难的地区更是雪上加霜。

《艺术论坛》(美国) 2017.4

4 双城卡塞尔文献展

今年，五年一度的德国卡塞尔文献展将首次在欧洲两个城市拉开帷幕，卡塞尔之外，另一座承办城市是希腊雅典。总策展人亚当·希姆奇克认为，虽然欧洲各国对希腊的经济危机和难民危机等现状均表示不满，但作为欧洲文明的源头，雅典展场希望呈现出一种“向外繁殖的知识分配”，将历史与政治渗透在展览之中，以重思雅典之于德国乃至整个欧洲的重要性。





instax SHARE

手机照片打印机 SP-2

还不快来加入打印照片的行列?



@富士 instax



富士 instax

关注官方微博微信 了解更多一次成像产品资讯



P32

封面故事

东方与西方 权力和荣耀

百岁贝聿铭

- 36 成为贝聿铭
- 58 “在今天这个时代，他仍然会是一名伟大的建筑师”
- 64 重返中国：另一种现代路径
- 78 寻找贝聿铭：两个世界的源头
- 90 “大卢浮宫”30年，争议与和解
- 102 远与近的贝聿铭
- 106 贝聿铭文献展：在作品之外



P130 梁博：选秀冠军回归

社会

- 时事：抗议声中，“普京模式”陷入慢性衰竭 110
 热点：泸州中学生坠亡后的七天 120
 热点：“浑水”做空者卡森·布洛克 124

经济

- 市场分析：债务危机的山东样本 108

文化

- 人物：梁博：选秀冠军回归 130
 话题：当我们谈论朗诵 134
 话题：《越狱》第五季能否重回巅峰？ 138
 艺术：马库斯·吕佩尔茨：打破绘画的魔咒 142
 思想：同情的害处 152
 书评：人生几何，欲望三角 154

专栏

- 邢海洋：人工智能下的制造业，还转移么？ 18
 袁越：更年期之后再怀孕 146
 张斌：旧塞尔吉奥 新塞尔吉奥 148
 宋晓军：特朗普要玩“先军政治”了？ 150
 朱伟：史铁生：有限中无限的可能性⁽⁵⁾ 156
 朱德庸：大家都有病 158

环球要刊速览	4	声音	23
读者来信	10	生活圆桌	24
天下	12	好东西	28
理财与消费	20	个人问题	160
好消息·坏消息	22		

2017年第16期，总第932期，2017年4月17日出版
 版权所有，未经允许，不得转载本刊文字及图片。
 本刊保留一切法律追究权利。



www.lifeweek.com.cn

主管 / 主办 Published by

主管：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主办：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有限公司 出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有限公司

总编辑 Publisher

路英勇 Lu Yingyong

副总编辑 Deputy Publisher

常绍民 Chang Shaomin

主编 Editor-in-chief

李鸿谷 Li Honggu

副主编 Deputy Editor-in-chief

李菁 Li Jing 李伟 Li Wei

主编助理 Associate Editor-in-chief

吴琪 Wu Qi 曾焱 Zeng Yan

采编中心 Editorial Center

资深主笔 Senior Editor

邢海洋 Xing Haiyang 谢先凯 Xie Xiankai 袁越 Yuan Yue

陈晓 Chen Xiao 蒲实 Pu Shi

主笔 Editor

李三 Li San 钟和晏 Zhong Heyan 薛巍 Xue Wei

陈赛 Chen Sai 葛维樱 Ge Weiyang 贾冬婷 Jia Dongting

徐菁菁 Xu Jingjing 杨璐 Yang Lu 曹玲 Cao Ling

主任记者 Senior Reporter

李翊 Li Yi 李晶晶 Li Jingjing 蔡小川 Cai Xiaochuan 何潇 He Xiao

黑麦 Hei Mai 石鸣 Shi Ming 丘谦 Qiu Lian 吴丽玮 Wu Liwei

俞力莎 Yu Lisha 王丹阳 Wang Danyang 张雷 Zhang Lei 苗千 Miao Qian

记者 Reporter

邱杨 Qiu Yang 付晓英 Fu Xiaoying 孙若茜 Sun Ruoxi 杨丹 Yang Dan

刘敏 Liu Min 张月寒 Zhang Yuehan 张星云 Zhang Xingyun

艾江涛 Ai Jiangtao 宋诗婷 Song Shiting 王海燕 Wang Haiyan

特邀撰稿人 Overseas Feature Writer

鲁伊 Lu Yi 赵潇 Zhao Xiao

摄影记者 Photographer

于楚众 Yu Chuzhong 黄宇 Huang Yu

视觉设计中心 Vision Design Center

视觉总监 Visual Director

邹俊武 Zou Junwu

执行图片总监 Executive Photo Director

陈晓玲 Chen Xiaoling

设计总监 Design Director

王小非 Wang Xiaofei

美术编辑 Art Editor

黄罡 Huang Gang 刘畅 Liu Chang

插图 Illustration Editor

张曦 Zhang Xi

图片编辑 Photo Editor

覃柳 Qin Liu 陈喆 Chen Zhe 韩雅丽 Han Yali

编务总监 Coordination Director

程昆 Cheng Kun

发行中心 Circulation Center

执行总监 Executive Director

雍江 Yong Jiang

副总监 Deputy Director

周旭 Zhou Xu

区域经理 Regional Manager

杨雪梅 Yang Xuemei 潘海艳 Pan Haiyan

发行服务 Circulation Service

李卫红 Li Weihong 刘琳瑶 Liu Linyao 乔龙宁 Qiao Longning

王霄 Wang Xiao 王荻 Wang Di 金宇迪 Jin Yudi 姚贺梅 Yao Hemei

读者服务经理 Reader Service Manager

朱静 Zhu Jing

市场发展中心 Marketing Development Center

副总监 Deputy Director

钦征 Qin Zheng 傅东方 Fu Dongfang

电子阅读 Electronic Reading

刘国强 Liu Guoqiang 辛军 Xin Jun 连子君 Lian Zijun 张莉 Zhang Li

微博微信 Micro-blog WeChat

执行主编 Executive Editor-in-chief

薛芃 Xue Peng

内容编辑 Editor

刘彭媛 Liu Pengyuan 刘凌 Liu Ling

视频 Video

吴冰川 Wu Bingchuan 李倩 Li Qian 孙明楷 Sun Mingkai

活动 Event Department

总监 Director

傅东方 Fu Dongfang

副总监 Deputy Director

连华伟 Lian Huawei

运营 Operational Manager

罗启宏 Luo Qihong 周宇飞 Zhou Yufei 邢宇 Xing Yu

节气刊 Solar Term Department

执行总监 Executive Director

王晶 Wang Jing

设计 Design

袁媛 Yuan Yuan

衍生品创意 Derivatives Creativity

总监 Director

王小峰 Wang Xiaofeng

熊猫茶园事业部 Panda tea garden Department

执行总监 Executive Director

程磊 Cheng Lei

运营部 Operational Manager

殷佳婷 Yin Jiating 常晓红 Chang Xiaohong 白玥 Bai Yue

孙名梓 Sun Mingzi 王瑶 Wang Yao 李晓光 Li Xiaoguang

设计 Design

杨雨然 Yang Yuran

松果生活事业部 Songguo Department

总监 Director

魏一平 Wei Yiping

运营部 Operational Manager

宋洋 Song Yang 李骁楠 Li Xiaonan 赵夫宏 Zhao Fuhong

孙正之 Sun Zhengzhi 张倩娜 Zhang Qianna 陆汉夫 Lu Hanfu

牛家欢 Niu Jiahuan 陈璐 Chen Lu

市场部 Marketing Department

蔡华 Cai Hua 夏青 Xia Qing 李璐 Li Lu 尤帆 You Fan

奚牧凉 Xi Muliang 李加贝 Li Jiabei 陈陌陌 Chen Moyang 韩蕾 Han Lei

行政 Administration

叶秋菊 Ye Qiujie

行政管理中心 Administration Center

行政主任 Office Manager

高媛 Gao Yuan

行政助理 Assistant

刘蓓 Liu Bei

财务总监 Financial Director

郝大超 Hao Dachao

财务主任 Financial Controller

陈晓华 Chen Xiaohua

出纳 Accountant

张宇 Zhang Yu 李明洋 Li Mingyang

法律顾问 Legal Counsel

金桥律师事务所 马眉 Ma Mei

社址：北京市朝阳区霞光里9号B座 邮编：100125

商务推广合作电话：(010) 84681038

联系人：连华伟

E-mail: lianhuawei@lifeweek.com.cn

采编中心热线电话：

(010) 84681030 84681029 (传真)

E-mail: letter@lifeweek.com.cn

读者服务热线电话：

(010) 84050425/51

E-mail: dzfw@lifeweek.com.cn

印刷：北京利丰雅高长城印刷有限公司

电话：(010) 59011318

物流总代理：北京双禾物流有限公司

电话：(010) 61256299

广告许可证号：京东工商广字第0063号

期刊登记证号：ISSN 1005-3603 CN11-3221/C

邮发代号：82-20

定价 Price：¥15.00 \$8.00 港币 20.00

本刊为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南方航空公司、

法国航空公司、美国联合航空公司机上阅读刊物

如何购买

《三联生活周刊》

读者朋友，购买本刊请登录官网商城
shop.lifeweek.com.cn

或到当地邮局办理，本刊代号：82-20

也可直接向本刊读者服务部咨询

电话：010-84050425 84050451

另外，本刊在下列城市经销商的联系电话：

上海：上海汇敦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021) 63769858

成都：四川尚和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028) 86667805

重庆：重庆弘景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23) 86359776

南京：南京星与火文化有限公司 (025) 83327129

杭州：杭州华鸿图书有限公司 (0571) 88256120

广州：南方都市报广州发行部 (020) 87376490

武汉：武汉春秋书店 (027) 85493562

西安：陕西五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029) 82100585

昆明：昆明尚云图书报刊有限公司 (0871) 64122816

沈阳：大友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24) 23934765

哈尔滨：志诚远大书刊公司 (0451) 88341879

青岛：盛世飞龙图书有限公司 (0532) 83840608

济南：山东前沿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0531) 82903395

长春：吉林九歌图书有限公司 (0431) 82752206

大连：大连渤海书店 (0411) 84609410

南昌：江西省邮政报刊零售公司 (0791) 88820509

太原：山西森艺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351) 7065397

贵阳：贵阳尚和图书报刊有限公司 (0851) 5661974

兰州：兰州大漠天马图书有限公司 (0931) 8521090

郑州：河南大河书局有限公司 (0371) 67647337

天津：天津天智书店 (022) 23683854

河北：石家庄远大书店 (0311) 83993043

安徽：合肥皖新书店 (0551) 64252409

新疆：乌鲁木齐市纵横文书刊有限公司 (0991) 5582981

内蒙古：呼和浩特融联书店 (0471) 6263358

深圳：深圳市新宏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0755) 22203426

长沙：湖南国闻书局书报刊配送有限公司 (0731) 82253036

本期广告目录

封二~扉1 · 波音

2~3 · 阿那亚

5 · 富士

19 · 三联全媒体

105 · Dell

128~129 · 山水文旅小镇

147 · 周刊征订

149 · 周刊松果广告

151 · 三联新知广告

159 · 书店广告

封三 · 哥伦比亚

封底 · 哈苏



拍摄二维码直接
下载客户端



新浪微博 @三联生活
周刊或扫描二维码



微信搜索 Lifeweek
或扫描二维码



扫描二维码下载
松果 APP

手机报订阅：移动用户发送短信 SLZK 到 10658000，电信用户发送短信 SLZK 到 10659000。包月 8 元，
周一至周六每日一期。

网络支持



新浪网官方微博：http://weibo.com/lifeweek

腾讯网官方 QQ:800033183



学会选择

“我们需要一种新的方式，来学习选择，并思考其背后所暗含的‘自由意志’的概念。”这话就像对我说的，顿时被击中。人生路漫漫，始终要面对各种选择，但我们往往无从把握。当代社会，可能性越多，选择的难度就越大。是什么驱动或者主导了我们的选择？就我个人而言，很推崇“自由意志”说，也相信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掌控人生。文章讲述的几例人生故事很有意思，尽管都有点极端，我也并非都认同，但我欣赏他们自主选择了自己的人生轨迹，他们在相当大程度上决定了自己的命运。如果我有明确的方向，也很希望能像他们那样在“自由意志”的语境下，最大限度地达成心愿。

北京 青苗子

集资之惑

最近，在家乡一所中学工作的弟弟千里迢迢地来到我家。一进门，他就大嚷：“这次我是来你家避难的！”

老家是个边远省份的小县城。不久前，县政府做出决定：在全县各机关、事业单位的职工中广泛开展集资活动，每人最少5万元，最多10万元，利率待5年期满后兑付日前再定；集资活动坚持“自愿参加”原则，集资款项的用途，是投入县城自来水水源地改造工程。消息传出，当地群众心中一震。确实，老家那个县，自来水水质一直不好，是几十年来困扰当地居民的老大难问题，难道这次县政府要彻底端掉百姓心中的这个梗了？

很快，集资活动的书面文件下发。那只是一张A4纸，上面印着县政府常务会议纪要中涉及本次集资活动的一段话。县委县政府要求，全县每个机关、事业单位的工会主席，手持这张纸，在本单位职工大会上以口头形式传达。不是红头文件，集资显得名不正、言不顺，职工们自然是嘀嘀咕咕，满腹疑虑。很快，县城街头巷尾便有传言，说此次集资款项是否用于自来水改造，或者说有多大比例用于自来水改造，谁也不知道。更为人诟病的是：名义上说，职工如愿意参加集资，欢迎并给予表扬，如不愿意参加，尊重个人意愿，但实际上，各单位的党政领导都会旁敲侧击：想得到提拔重用，必须参加本次集资。于是，土政策频出：没编制的人想要转编，必须参加集资；未入党的人想要入党，必须参加集资；入了党的想要“进步”，必须参加集资；就连一些因私事欲出国出境、需要所在单位审批的人，都纷纷被告知：不参加集资，出国（境）申请暂时不批。

我弟弟是县里某中学的工会主席。县总工会很快通知他，去县总工

会领来了一大沓空白的《集资协议书》。仔细一看协议书，甲方是县自来水公司，乙方是职工个人，下面还印着见证方：县总工会。工会干部们就纳闷了，各级工会凭啥要做这次集资的“操盘手”？有不服气的工会干部立即去资料室查档案，果然找出一份2014年中华全国总工会下发的《关于严禁工会组织参与非法集资活动的通知》（工发电〔2014〕4号），上面明确规定：“各级工会及所属企事业单位不得参与或动员、组织工会会员、职工群众参与包括政府融资平台融资发起的各类融资活动，不得为融资活动提供工会银行账户、工会公章，不得以工会经费或资产为融资活动提供经济担保。”全总的红头文件，白纸黑字，赫然在目。

虽然有红头文件，还是敌不过县里的意志。作为一名小小的校工会主席，我弟弟人微言轻，夹在上级意志和单位职工之间，里外不是人，两头不讨好。经过反复动员、多次劝导，弟弟所在的中学里，一些“有欲有求”的教职工，被迫“自愿”交钱，签了《集资协议书》；而更多的无欲无求的教职工，则印证了那句老话“无欲则刚”，成了一个难以攻破的小堡垒。这样，该校的集资参与率自然难以让县里满意。一边是上级“加紧推进，各个击破”的严格要求，压力山大，一边是教职工们的怨声载道，苦不堪言。我弟弟有苦无处诉，思来想去，只得三十六计走为上计，称病告假，远遁外地以避难。

上海 吴鹏

乡村高利贷

山东冠县“辱母杀人案”就发生在我的老家，被刺死者所在的村庄距离我们村仅几公里。实际上，案件中涉及的高利贷问题在当地已经非常普

遍。除了引发这样的悲剧外，我感觉其更大的一个影响是，存在于中国社会千百年的乡土互助接济文化发生了改变，大家族成员之间，包括关系不错的邻里之间的经济互助行为，正在悄然瓦解。

瓦解的原因，是现在大家都不太愿意无偿借钱给他人了。把钱借给亲人或邻里，一个比较麻烦的事情是不好意思要利息；反之，如果将这些钱放高利贷，那可能就是一笔不小的收益。时间久了，就会出现有意思的事情。比如，亲戚或邻居来借钱，被借钱者说自己没钱，但可以从别人那里拿钱往外借。其实大家都知道，那就是他自己家的钱。之所以这么说，就是为了好意思收利息。反过来，对于生活困难而急需用钱的人家来说，去找亲戚或邻居借钱，也就变成了一件很尴尬的事情，因为要么就直接明说会付利息，要么就得做好别人不借给的准备。

高利贷以及背后所释放出的追逐高利息的意识让人们充分意识到，用钱放债比无息帮助他人是有大利可图的。即便有些人从来不放高利贷，也越来越在意放在银行存定期，也会有利息吧。加之，助人行善、追求精神升华的意识日益淡薄，导致民间互助式的、几乎没有利息的借贷行为慢慢减少。而缺少了这种互助，个人和单个家庭就成了孤零零的个体。遇到困难，除了至亲或许可以伸出援手外，别无他

法。最后只能被迫去借高利贷，反正都要付利息，去借高利贷还不会欠下人情。

乡村社会一向被认为是熟人社会，但市场经济等因素的巨大刺激实际上也让每个村民孤立起来，只顾盘算自己的利益，宗族观念、邻里关系等都慢慢淡薄，个体遇到困难就孤立无援。高利贷在乡村催生的异化利息意识，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催化剂而已。学者熊培云曾写过一篇题为《有不公，为什么没有大动荡？》的文章，认为乡村社会中家庭的观念很重，亲戚之间的相互帮助可以让某一个成员渡过难关。现在，这种互助共济的情况已经没那么普遍了。

新疆塔里木 刘福利

无奈的直销之路

打前年夏天，多年不曾联系的一叔伯伯妹妹非常亲热地给我打电话，接二连三地嘘寒问暖。几番问候之后，话题便扯到了正题，原来她在做直销。直销公司是北京某科技公司，主要生产保健品、化妆品等。

这位叔伯伯妹妹前些年一直跑保险，业务能力非常强，一路做到了地区总代理。就在她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一位做直销的人找到了她。几番接触后，这位妹妹动了心，到了北京实地考察一番后，毅然决然地放弃了保险这份职业，加入到了直销大军。经过两年多的培训和业务拓展，她已做到了

高级经理职位，当然成功的背后她一定付出了很多。

不久之后，她亲自登门来我家，多年不见，我们全家盛情款待了她。饭局间她侃侃而谈，大讲该公司的实力、企业背景、公司的发展潜力、产品的卓越功能，以及直销行业在我国的合法地位、未来发展的广阔前景。说实话，对于直销我了解得还是比较多些，跟传销类似，只不过一个合法，一个不合法而已。碍于情面，我投了8000元钱加入到该直销公司，公司给了我8000块钱的保健品，从此我便成了直销人员。她特热情地动员我要多学习多参加公司的业务技能培训交流会，某个地区的某个城市开个会，无论路途多遥远，必定带我一同前往听课学习。一来二去，我也入了门，跟其他直销人员一样，神经病似的见人就讲，逢人便说。遭遇多次白眼拒绝后，原本火热的激情被现实击得粉碎。为了做直销，自己放下做小吃的生意，没白没黑地四处乱跑，不仅没挣到一分钱，没找到一个下线合伙人，还使原本宽松的逐渐变得捉襟见肘，到后来竟靠借钱度日。

在我不遗余力地做直销期间，结识了几位在其他领域做直销的人员，他们与我一见如故，大谈特谈他们直销公司的福利制度、奖金分配，以及某某人挣到了多少钱、买了怎样豪华气派的汽车、住进多么令人羡慕的别墅里，连哄带骗地想方设法拉我入伙。我深知做直销找不到下家就永远挣不到钱这一定律，铁了心予以回绝。为了生活，头脑过热的我逐渐冷静了下来，重又做起卖小吃的生意，只有在生意不忙的时候才做直销。说句真心话，做直销非常难，不仅耗时耗力浪费大量钱财，且百分之九十九的人不相信不接受，成功的人简直就是凤毛麟角。再说找下线合伙人，一般都是亲戚朋友老熟人，人家一旦相信你跟着你投资做直销，你还要对人家负责，让他们学习听课参加各类培训，掌握一定的专业知识，还必须找到下线才能赚到钱，否则一切为零。赚不到钱，不仅自己良心上过不去，人家背后不是抱怨你就是骂你。唉，当初只怪自己头脑过热盲目地投了资，现在只能无奈地接受了。

天津 农夫

更正：本刊第14期《寻求亲密关系：一些基本概念，一种自我成长》一文中，对采访对象王崇巍的学位叙述有误，应为：获得中科院心理所工业/组织心理学硕士学位和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数量化心理学/判断决策学硕士学位。特此更正。

本期截稿时间：4月10日19时

本栏目欢迎来信，投稿请发信到：letter@lifeweek.com.c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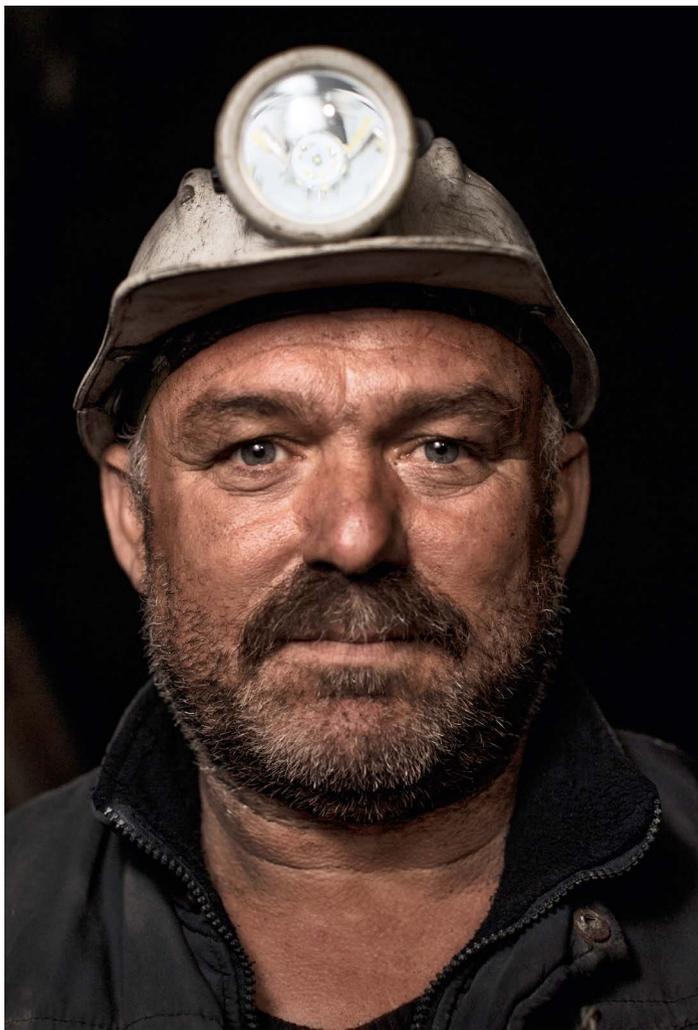
伊拉克 | 回归

4月9日，摩苏尔（Mosul）附近的基督教城镇卡拉哥希（Qaraqosh）居民在被战争中严重毁坏的教堂参加基督受难主日活动。这是自2014年8月当地被“伊斯兰国”武装占领后，居民们第一次在教堂参加礼拜活动



土耳其 | 矿工

(右图) 4月5日, 宗古尔达克省一小煤矿的采矿工人接受肖像拍摄。矿难频发是目前土耳其煤炭行业发展的最大问题, 采煤在土耳其已经成为一种高危职业。在土耳其西北部宗古尔达克省科兹卢地区, 煤矿深度距离地面约有610米, 矿工们通常要通过一个狭窄的隧道进入矿井, 在作业时, 他们的身体几乎无法直立。



罗马尼亚 | 枕头大战

(左页上图) 4月1日, 民众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市中心参加“枕头大战”。4月的第一个周六是一年一度的“国际枕头大战日”, 全球若干城市的“枕头大战”爱好者在这一天用独特的方式来放松心情。

巴西 | 日本屋

(左页下图) 4月9日, 巴西圣保罗街头设立的日本文化海外宣传基地设施日本屋 (Japan House) 举行奠基典礼。日本屋由日本花卉艺术家东信 (Makoto Azuma) 设计, 于4月下旬起的黄金周期间在巴西圣保罗开馆。今年还将依次在英国伦敦和美国洛杉矶开馆。该项目旨在通过向三个海外城市宣传日本文化和艺术, 增加“喜欢日本的粉丝”, 提高日本对国际社会传播信息的能力。





美国 | 牛仔

(左图) 4月1日, 田纳西州谢尔比县孟菲斯举行比尔·皮克特 (Bill Pickett) 邀请赛。据悉, 比尔·皮克特邀请赛的创立者是卢·韦森 (Lu Vason), 他曾经是一个理发师, 并没有作为牛仔的经历。为了纪念史上第一个黑人牛仔影星以及发明了“摔牛”技术的比尔·皮克特, 韦森拿起缰绳为不同种类的牛仔文化建立了一个平台。美国黑人牛仔文化可以追溯到奴隶时期奴隶的后裔身上, 历史学家认为, 很多黑人受到欧洲和本土美国人的影响后, 成为西方牛仔。

法国 | 稻草鱼

(下图) 4月1日, 游人在尼斯街边的巨型稻草鱼装置作品旁合影。这个稻草鱼由法国雕刻家克里斯蒂安·伯格、菲利普·米尼尔、露西尔·格拉斯和法国设计师阿娜依斯·朗香联合制作。



人工智能下的制造业，还转移么？

文 / 邢海洋

一家位于东莞的鞋厂计划将生产转移出去，转移到美国，而不是劳动力成本更低廉的东南亚，这使人一时发蒙。连制鞋这种传统的制造业也无需拼劳动力成本了？其实不是，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东莞台资企业 Dongguan Winwin Industrial 开发出一种注塑设备来制造橡胶状鞋底和鞋帮，两名操作工人取代 50 名流水线上的工人。

中国工人的薪资约为美国一线员工的六分之一，可一项发明革新就将这个巨大的差异拉抹平了。尤其当技术更进一步，机器人完全取代了注塑操作员后，中美两国制造业基于劳动力成本的差异将“归零”。当然东南亚的劳动力优势也“归零”。既然鞋厂能够迁址美国，苹果手机为什么还要在中国生产？其实也和劳动力相关，在方寸手机上安插几十个部件，其难度远超过鞋底鞋帮的注塑，故而只有更精密的“仪器”——人能够胜任。可不远的将来，人工智能机器人就会和人类一样灵活了。

时下机器人的应用场合通常是在流水线上，进行高强度且重复单调的作业，比如汽车制造业中的焊接机器人、组装机器人。机器人是为自动化生产线专门设计的，为了某一类甚至某一种型号的产品设计的，这样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它不能满足小批量个性化的制造需求。工业机器人存在了几十年，可仅能替代人类简单体力劳动的角色一直没有改变。

而人工智能产业机器人就不同了，它可以判断和推理，可与上下游协调，还将自动学习。机器人可以与主人交流，能按照主人的指令去进行生产活动。预计在 2025 年以后，世界上制造业强国将步入第二代产业机器人生产阶段。当然，机器人的进化不会止步，拥有自主学习能力、能够在海量的生产活动中高效率地分析判断乃至做决策的机器人必定取代工厂里的所有蓝领甚至白领员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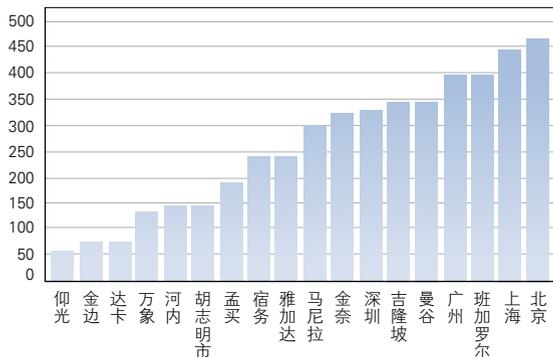
如果说机器人的逐步智能化过程还主要发生在制造业的高墙内，不为外界所感知，而我们身边已经发生了很多微小的改变，人工智能正在由点到面地渗透进来。在澳大利亚，一年前泥瓦匠还拿着 7500 元人民币月薪，平均搬砖 1 块赚得约 1 澳元。一年后的今天，搬砖机器人却每小时可至少搬砖 1000 块，砖工砌墙速度大约是人工的 6 倍。在西雅图，亚马逊推出了没有收银员的便利店。据普华永道研究，接下来几年内，诸如交通运输、工厂、餐饮业等，约三分之一的工作将被机器人替代。

当机器人取代了流水线上的廉价劳动力，不难想象，欠发达国家在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优势将逐步被机器人削减，制造业的天平将向研发和市场端倾斜，而这两个利润最丰厚的部分恰恰位于工业化国家。其实，即使不考虑智能机器人的发展，长达数十年的全球化进程已经改变了全球竞争力的版图。传统理解中，拉丁美洲、东欧和亚洲大部分地区都被看作低成本地区，而美国、西欧和日本则被看作高成本地区。可通过对薪资、劳动生产率、能源成本和币值的比较，去年，波士顿咨询公司发布全球制造业竞争力指数揭示的却是巴西跻身制造业成本最高的经济体之一，墨西哥的制造业成本已经低于中国。即使全球制造业最有优势的印度尼西亚，成本也仅比美国低 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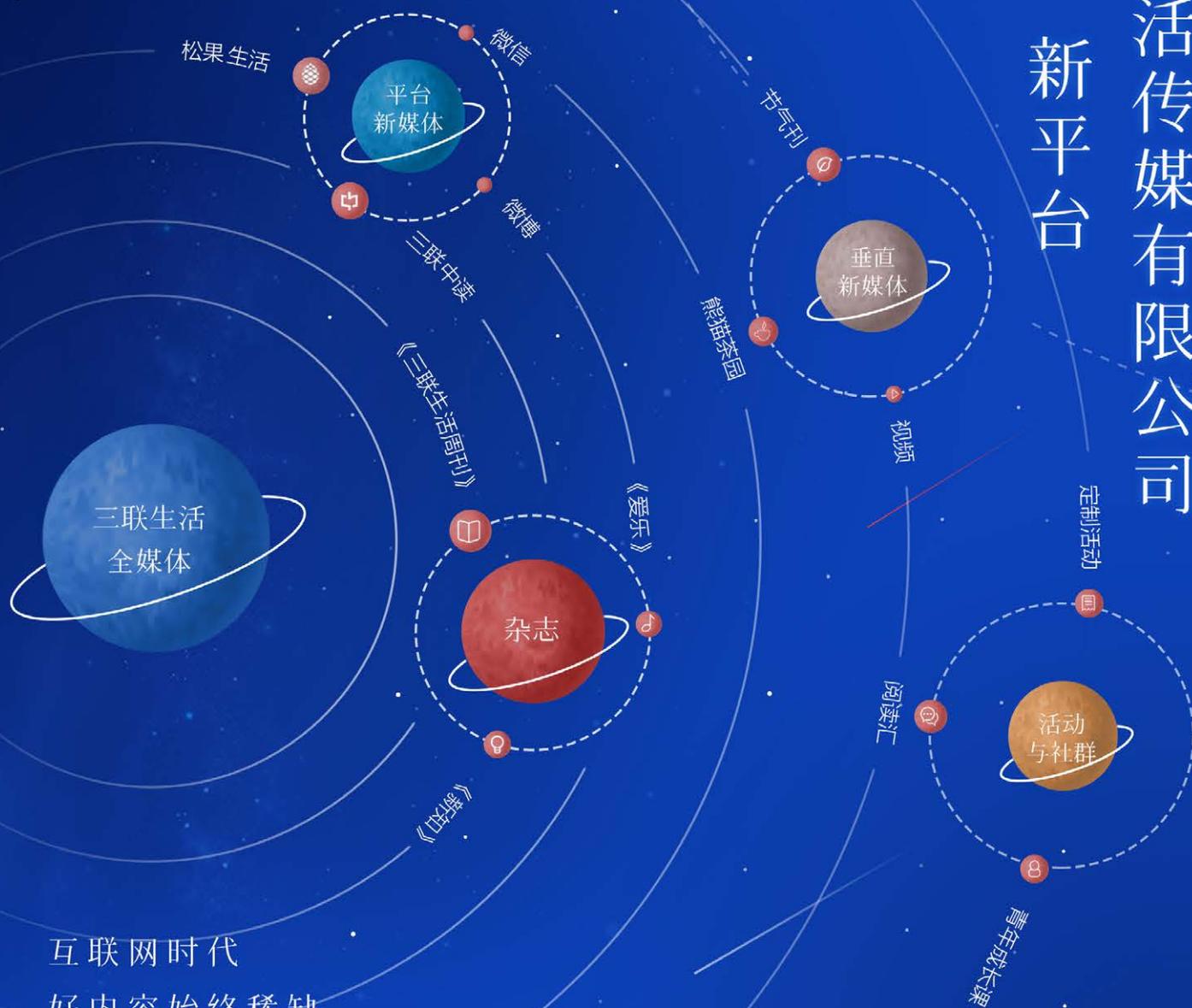
理清了人工智能机器人将主导制造业的思路，我们也就明白了一个道理：哀叹被东南亚抢去了低端制造业是毫无意义的，真正需要做的是在人力上大笔投资。毕竟机器人是人制造的，也是由人来维修的。✍

(单位：美元)

亚洲新兴市场工资水平



三联生活传媒有限公司 全媒体 新平台



互联网时代
好内容始终稀缺

生产知识，也生产知识产品

广告热线: (010) 84681038 传真: (010) 84681396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霞光里9号B座4层 邮编: 100125



栏目插图 | 范薇

雄安大龙头

4月1日雄安新区成立一声枪响，A股、港股和美股中雄安概念股起跑，3天后，在纳斯达克上市的中国汽车物流股价累涨167.55%，成为领跑大龙头。中国汽车物流系天津汽车进口物流公司，保定有大块物流用地。中概股中，英利绿色能源系保定的太阳能公司，东方纸业则是保定的造纸公司，都有不俗涨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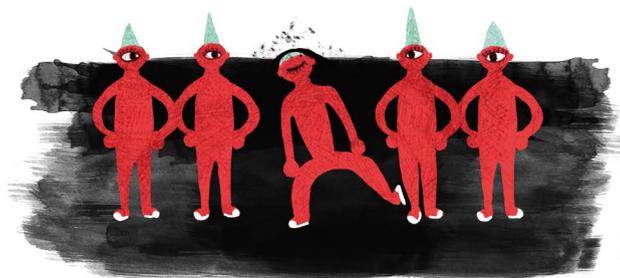
“熊”债市，“安”股市

受雄安新区消息推动，4月5日近40只雄安新区概念股开盘即现一字涨停。商品中黑色系和有色金属均大涨。相比之下，债市高开低走。千年大计下的雄安，“熊”的是债市，“安”的是股市。股市之“安”在于新区设立，从规划到建设，从产业转移到人口迁徙，所有相关的活动都将产生确定的利润。而债市之“熊”也是确定的，新区建设并不能改变央行货币政策偏紧的事实。

无心插柳

A股中很多企业并非雄县、容城和安新本土企业，却无心插柳，红利滚滚。这点华夏幸福最突出，其与雄县政府合作，开发产业园区，面积达181.2平方公里。雏鹰农牧年屠宰生猪100万头及食品加工项目则落户雄县开发区。中广核技收购了位于雄县雄州镇河北中联银杉新材料51%股权。长青集团则为雄县经济开发区集中供热。不过除了华夏幸福的项目占有广阔的土地资源，其他的占地几十亩到300亩不等，均算不得大项目。





与首富只差“100 美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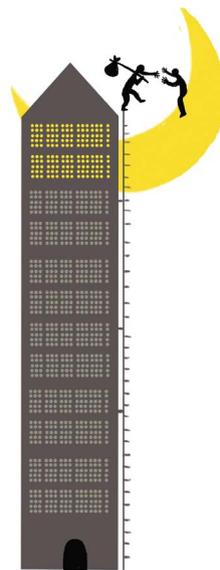
亚马逊股价首次升破 900 美元，只要股价突破 1000 美元，Bezos 的身价就将超过 860 亿美元，超越盖茨，成为新的世界首富。有分析师已经将亚马逊的目标价从 900 美元上调至 1200 美元，原因是亚马逊接下来将在广告业务上挑战谷歌。在电子商务、云计算、视频物联网等消费互联网和企业业务方面，亚马逊拥有最大的潜在市场规模，比其他任何一家公司的业务跑道都多。

劳动力减少是好事？

受女性退出、大学扩招等影响，中国的劳动力参与率在下降，令劳动力储备进一步缩水，迫使工资上涨，拖累经济增长。不过一些人口学家说，日益缩水的劳动力以及日益下降的参与率带来的双重打击会对经济造成短期痛苦，而这将转变成更长期的利益。原因是：年轻人接受高等教育，潜在地导致生产力进一步提高以及工资进一步上涨。日益提高的劳动力流动性也加大了经济效率提高的可能性。

日本的“零破产”

2016 财年中，东京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的近 4000 上市公司中竟没有任何一家宣布破产。上一次“零破产”的纪录还是在 1990 年，当时日本经济处于过热状态，GDP 增速高达 5.5%。除了股市稳定、账外资产增值外，日本央行大规模货币宽松下的超低利率状态，使得亏损企业也能融到资金。不过，失去生命力的公司“僵尸”能够存活，占有资金和劳动力资源，本身就威胁到整体经济的健康发展。



多伦多房价大涨

加拿大第一大城市、北美第四大城市多伦多房价涨势已经超过了曼哈顿、西雅图、旧金山和温哥华。截至今年 3 月，独栋住宅均价同比跳涨 33.4% 至 120 万加元，城中心区的独栋住宅售价高达 160 万加元。温哥华曾是加拿大最热的楼市，自去年 8 月对海外购房者加税和今年 1 月加征空屋闲置税以来，购房者逐渐东移。可该地海外买家只占到 5%，涨价动力很难归咎于海外购房者。面对大涨，各方一头雾水。



八百年前是一家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所谓夫妻相，不只是长期相濡以沫后无意识地互相模仿，还有一种可能，是两口子本来就源于同一祖先。发表于最新一期《公共科学图书馆·遗传学》上的论文追踪调查了124对白人夫妇和他们的755名后裔后发现，那些有北欧、西欧、南欧和德国犹太人血统的人，即便生活在一个种族多元化的社会中，但在长达60年的时间里，连续几代人都依然更倾向于在自己的族裔里选择配偶。这种对同根同源异性的天生偏好，即便在人口地理、社会阶层、国籍、宗教、身高体重和性情等各种择偶因素影响的情况下，依然极其明显，夫妻相像，也就理所当然。

好消息



猫狗一家亲

怀孕了就要把家里的猫狗送掉？举双手欢迎还来不及呢！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的研究小组调查了746名加拿大婴儿后发现，那些家里有宠物的孩子，肠道中两种与降低过敏和肥胖风险相关的微生物的含量显著高出没有宠物陪伴者。此前研究也表明，与狗狗一起长大的孩子患哮喘的风险更低。



世上只有妈妈好

至少在袋鼠的世界里，做个妈宝没什么不好。根据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的研究小组发表于《行为生态学与社会生物学》上的最新研究结果，那些长到可以离开母亲腹袋自由活动年龄时的小袋鼠，两岁前与妈妈单独相处的时间越长，到独自生活时的身体就越强壮，野外生存率也越高。

坏消息



颠簸的航程欢迎你

空中飞人们要做好心理准备了。英国雷丁大学的研究小组在《大气科学进展》杂志上发出警告，气候变化会令气流扰动的发生频率和强度都显著增加，机舱中的乘客遇到飞机上下急剧颠簸的可能性将是此前的两到三倍，而如果正好没系好安全带，意外受伤的风险将因此激增。



睡不好，不得了

随着年龄增长，一合眼到天亮的完整睡眠会变得越来越稀罕，而这可能预示着严重的健康问题。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研究小组在《神经元》杂志上指出，深度睡眠的欠缺会令人到中年后记忆力丧失的风险显著增加，大脑的认知功能长期处于混沌状态，身体也更易疲劳生病。

将人们赶出你的思想，不要让任何外在事物损坏你的孤独，让那些弄臣去寻找同类吧。他人只会削弱你，因为他人逼迫你扮演一种角色。把姿态从你的生活中排除吧，你仅仅属于本质。

——罗马尼亚作家齐奥朗

世上曾有少数人相当真诚和相当顽强地奋斗过，为的是不受因时代的激荡而泛起的污泥浊水以及有毒的泡沫的影响，为的是不同流合污，为的是保持住最内在的自我——保持住自己的本质，而且确有少数人成功了：他们在自己的时代面前拯救了最内在的自我，并为所有的时代树立了榜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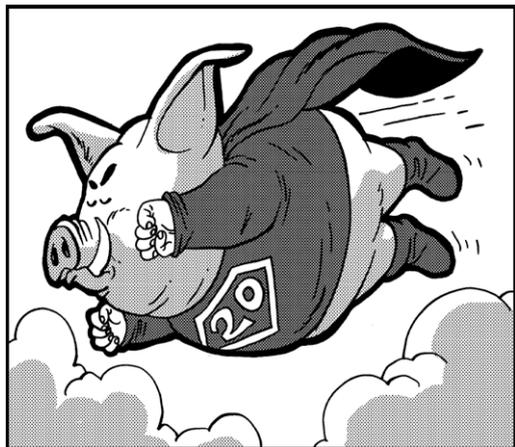
——斯蒂芬·茨威格，《蒙田》

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都有那么多的轮盘、螺丝和操纵杆，因此我们相互之间，就不能只从头一次的印象上，或者只从两三个表面的特征上去下结论呀。我不了解你，你不了解我，我们也不了解我们自己。

——契诃夫

美国人搬家比以往更少，穿越州界的频次是1948至1971年间平均频次的一半。他们持续做一份工作的时间更长了。美国的创业精神也陷入了困境。

——美国经济学家泰勒·考恩在《自满阶级》一书中说



辛纳屈现在似乎是那些不受约束、完全解放了的男性的化身，也许在美国除此之外没有别人能这样，他可以做任何他想做的事情，为所欲为，因为他的财富、他的势力，以及表面上的毫不内疚。

——盖伊·特立斯，《被仰望与被遗忘的》(1966)

+/-

数字

700

万英镑

北京大学称，将在英格兰的牛津郡购买一座19世纪庄园别墅，作为其商学院的海外新校址。房产中介此前把这一庄园别墅的价格定为700万英镑。据悉，庄园约有9个足球场大小。

3.5

吨

西班牙巴斯克分离主义武装埃塔组织正式解除武装，法国警方根据“埃塔”交出的文件，从八处军火库中收缴了将近3.5吨的各式枪支炸药。

3.22

亿

世界卫生组织(WHO)公布的数据称，全球目前有超3.22亿人患有忧郁症。自2005至2015年，忧郁症患者人数增加了至少18%。世界卫生组织于4月7日世界健康日当天启动一项名为“抑郁症：我们来谈谈”的推广活动，致力于为抑郁症患者寻求相关帮助。

爱人与情话

文 孙荪

图 谢驭飞



S小姐把孩子哄睡之后，回到自己的房里。丈夫早已倒头大睡，S小姐轻叹了一口气，关了房间的灯，也躺下了。翻来覆去睡不着，越想着生完孩子后丈夫对她的态度完全改变越觉委屈。从前他歌颂她出得厅堂入得厨房，做完饭打理完家中细务劳累时能喝到他沏的一杯花茶，听到他说一句，老婆，辛苦了。

如今呢，丈夫把她所做的一切都当成理所当然，也不再适时地对她说一些情话，就连什么结婚周年纪念日也丢到火星去了。S小姐也不是没有和丈夫提过，丈夫总是以“都老夫老妻了”搪塞。再提就显得自己小气，S小姐只好作罢。

S小姐静悄悄地翻身起来，生怕打扰熟睡的丈夫。她徐徐踱步来到了书房，在书架上看到王小波写给李银河的《爱你就像爱生命》，想起丈夫也曾和她说过里面的情话：“但愿我和你，是一支唱不完的歌。”“我会不爱你？不爱你？不会。爱你就像爱生命。”那时候的她脸颊发烫，害羞地低下头去。

她打开《从文家书》看了起来，看到那句话，忍不住轻声地读出来：“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这句话最初是在父母的情书上看到的。那是她还读高一的时候吧，在爸妈的房间里打开方形饼干盒却只翻出了爸爸写给妈妈的情书。情书有恋爱时的，也有婚后的，大多都很琐碎。特别是上初中时，因为工作原因

爸爸要去省外学习，除了每天一通电话，爸爸还要每周一次性寄出7封信回家，那时候她负责从邮箱里拿信回家，虽觉妈妈高兴，但她却特别不理解爸爸为啥打过电话后还要寄信回家。到了高中，自己产生了喜欢的情愫，也听到妈妈说起和爸爸的恋爱经历后，再回看那些信件，看到满满的都是爱啊。

S小姐也并非和丈夫没感情，他们从高中相识，大学相爱，毕业后步入婚姻殿堂，结婚生子于她而言要顺利得多。但好像越是顺利，便越没有激情。每每遇见年轻的情侣，她都会感慨一番，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婚后生活只有柴米油盐，再无浪漫情话可言。

但事实上，谁又能否认她与丈夫不是相互爱着彼此的呢？从高中走到如今，依旧惜惜相依不容易，而每次丈夫和别人介绍她时，也总会在名字前加上“爱人”二字。只是那些浪漫啊、风花雪月啊、没用的情话啊，都属于过去年轻时爱玩的小把戏了，好像再也与她无关了。

她想着想着，竟安稳地睡着了。

第二天醒来时，发现自己睡在了床上，起身来到书房，发现昨晚掉在地上的书被放回了原来的位置，凌乱的书桌也变得齐齐整整。她挠挠头，走到饭厅时，发现了丈夫正和5岁的儿子在厨房忙活，她装作什么都不知道，问他在干什么？

他回头对她说：“做饭给你吃啊，辛苦了，我的爱人。”

不要问及我的工作

文 锦衣夜行

图 谢驭飞



忙完了一个项目，他累得想辞职，接连梦里还是老板催活儿，催得想吐。突然想起年假还没休，就写了休假申请。老板说可以，但是必须保持手机通畅。他心里恶狠狠地瞪了一眼领导，又对同事说：“没什么事就不要联系我，紧急的事就更不要联系我。”

接下来的问题，这个年假怎么过。刚刚因为长期出差没时间陪她而分手的他，对于职业，连带爱情的梦想全部破灭。不想找亲朋好友，因为一见到他们就要谈及工作。他想找个陌生人，但陌生人更会谈及这个问题，而且会更加刨根问底。有次在火车上和一人聊天，那人问他是做什么工作的。他假装说是医生，那人就问了好多心血管病之类医学问题，可是他都答不出。后来他只能说自己是整容医生，旁边的一个女的又开始问他好多整容的问题，他还是回答不出，于是说其实我是做变性手术的。有更多人又开始质问他到底变性影不影响上厕所。于是，他又说，自己其实是专门给变性的人做心理咨询的。大家质问他为什么不说实话，他说：“我这个专业范围太狭窄，说了跟你们也没关系。”下了火车，总觉得有人偷偷跟在他后面，到了一个偏僻的地方，那人突然走到他的面前，满脸泪水地说：“老师，我是火车上隔壁铺位的，我有一个好朋友，我想问问，他该不该变性。”他奇怪，那个朋友对你如此重要吗？那人说：“我最好的朋友就是我。”

所以，还是实话实说的好，否则，到了尴尬的境地，伤己又伤人。他想开车去一个没有去过的城市转转。虽然不想谈工作，但还是想有个玩伴儿，

因为新的东西不挤进来，旧的就出不去。在某个购票网站上，发了一个免费搭车的帖子，前提是不要跟我谈工作。真有人联系了他，但是每个人还是都问他：“你是干什么工作的？为什么要免费搭车？”他都说：“你们难道不知道，曾经有一位同志叫雷锋吗？”他把那个前提删了。后来，来了一位大叔，没有问他是干什么的，只是问他为什么要让人免费搭车，他说：“我参加了一个公益组织，到目的地那个组织会给我你搭车的钱。”大叔说他遇到了非法组织，快醒悟吧。后来，又来了一个姑娘，问他：“你要给我多少钱。”他说：“为什么免费搭车还要我给你钱？”那姑娘说：“你心知肚明。”

最后，他的车上是一位大嫂，一路无语，眼里满是忧愁，只是给他剥了个茶鸡蛋，并且在高速服务区给他续了两次水。到了目的地，她要给他相当于火车票的钱。他说，说过是免费的。她说：“我是不能陪你逛了，我孩子生病了，要赶回老家看看，但是没买上火车票才搭车。”他说：“你老家离市区还有几站？”说是还有两小时。于是，他就把她送了回去。

到了她家，她男人请他吃酒饭，一句未发。酒至微醺，来了两个警察，把他带到了派出所。第一句话就是：“你是做什么工作的？”他只得反复解释，还让老板和同事传真各种证件。警察说，她男人怀疑她在外面有相好，所以骗她说孩子病了，没想到他这个相好就跟着来了。他心想，这个大男人自己不出去工作，还疑神疑鬼的，忍不住还是问了：“她男人是做什么工作的？”

司机千奇百怪

文 李黎

图 谢驭飞



我是网约车的坚定用户，装了几个软件用于互相比价，但是我无法比较出哪位司机善于聊天胡扯。

一天带女儿从她外婆家离开，她外婆目送我们上车。司机问我：“周末来看看老人？”我说的是的。沉默，几分钟后他感慨地说：“能做到这样已经不错了，已经非常好了，经常回家看看。”我不爽，不想说话。他继续：“前几天有个朋友在朋友圈里说，就算我们的父母能活到一百岁，去掉吃饭睡觉工作出差办事这些时间，我们跟父母的时间其实不过两三年。我一看，心里不是滋味，我当时就给我爸爸打了个电话，说回家吃饭。回家吃吃饭，听他说说话，说得我不高兴我就忍着，怎么办呢，做儿女的只能这样了……”

这个问题我以前也计算过，父母在郊区，就算我一个月回家一次，一年12次，就算他们还能活50年，那么见到父母的次数也不过几百次而已。司机又感慨：“人真是没意思，一代代人都在重复上一代人的事情，结婚生子，成家立业，没过几天安生日子就老了……”我怀疑他读过《自私的基因》这本书，我则是买了没看。仓促间带着女儿下车，不敢多看一眼这位善于感慨的司机。

相对于一言不发的司机，我喜欢一直啰啰唆唆的司机，包括他说个不停和允许我说个不停的司机。默默坐车，充满了虚伪的商务色彩，不符合日常生活隐秘而欢乐的本性。不过有一次，我

被一个司机吓住了，从头至尾只能赔笑。

这是一个光头大哥，车子路过一家夜总会时他说：“你看你看，那么多小姑娘，开始上班了。”我害羞地笑笑。

他接着说：“我刚刚就送了一个姑娘过来，也不远，她可能上班来不及，加了20块钱。车费才5块钱，她给这么多小费，有钱！下车前我跟她加了个微信，以后她要用车随时可以喊我，反正她有钱。”

我有点尴尬，而光头大哥的“牛×”刚刚开始，他说他在某某夜总会认识一个小姑娘，随时随地喊他去接送，不要钱，有心情两个人就来一下，但是他也不常那么干，年纪大了身体吃不消，不像女的无所谓。经常凌晨去接她，因为那个时候才下班，要么一起吃个消夜要么去她的住处来一下……这番话说得手舞足蹈，翻来覆去。我一直很紧张，我要顺道接老婆和女儿去同学儿子的生日宴会，她们上车后这位大哥千万别绘声绘色了。

好在大哥就是大哥，居然都逗女儿说：“伯伯这个样子你怕不怕？我像不像演员？”我说你不用化妆直接可以演坏人，演黑社会中层，大哥已经不是这种彪悍的样子。光头大哥一阵大笑，结束了愉快的行程。看着车子离开我在想，系统可不可以在打分时更细化一点，多几个选项，如驾驶技术、路况熟悉度、服务态度、交谈能力和趣味性。

光头大哥的趣味性一定是五星级。☑

凌晨麻辣烫

文 程燃

图 谢驭飞



我是一个对吃食不太在意和挂念的人，很长一段时间我对“吃”几乎完全丧失了乐趣。进食的过程变得枯燥和乏味，只是为了获得生命维存所必要的养素和原料，我的舌头也迟钝，对人间的美味显得无动于衷。赵雨玫嘲笑我真该出家去做和尚，兴许和尚们吃得比我更丰盛，起码更用心。她数次看见我利用工作间隙解决一顿午餐，配菜几个月不变。

相较之下，赵雨玫对吃更虔诚更用心也具有耐心，像是在朝圣。她曾说上帝给她这辈子的唯一使命就是品味人间美味。她有自己的一套美食哲学。美食不一定出现在豪华饭店、热闹商街和精美的盘子里，它们出没于陋巷、街市、地摊或者不起眼的小饭馆里。她并不和别人一样乐意晒出每天的吃食，制作好看的照片。她说美食的意义在于味蕾绽放的瞬间，在于落入腹中踏踏实实的满足感，照片拍不出美食的味道。

我承认她对吃的钟情，很难想象一位看起来瘦弱的女人对吃这样的有学问。她邀请我陪她去吃西街边的麻辣烫，说这家的麻辣烫用料新鲜、底味香醇，有店家人的心意在里面。西南小城里麻辣烫到处都是，这是夏日晚风后人们闲下来乐意去的地方。要一个胶椅子，配上几碟特制的凉菜和啤酒，对着大锅里的串串吃食挑选占有然后吞下，当汤汁在口舌里满溢迸发出咸辣的口感时，全身的细胞都仿佛经历了一场雷雨，绵密潮湿但

是舒爽。我听着赵雨玫的描述不由得发笑，她享受地沉浸在吃的乐趣里，嘴角浮出笑意。

其实麻辣烫只是西南城市里最普通的吃食，不精致不讲究，它是火锅的廉价品但绝不粗制滥造，不需要一个房间和那么多的配菜，保留了最精华的锅底，在露天的地方围坐便是一群人的火锅。夏日黄昏的慵懒感包裹着小城市人们心情最柔软的部分，那是一种土生土长伴随着童年的味道，“吃”从没如此抽象过，它根植于人们的内心和体内的直觉。

夜晚的时候赵雨玫拉着我去吃西街的麻辣烫，说一定要我重燃起对“吃”的乐趣。“吃是一件多么重要的乐趣啊！”她对我说。于是我们坐在露天的大锅旁拿起串串，配着啤酒边吃边聊起来。快近凌晨的时候，店家人开始收拾饭桌和配料，街上的人越来越少，只剩几口锅还飘着热气，角落里还有一只猫在玩着毛球。

“你看，美食就是这么治愈人心。”赵雨玫对我说。“好，以后请你多带我吃吃。”我们慵懒地靠在椅子上，抬头望着天空，风吹过来，星星更亮了一些。☑

本栏目投稿邮箱更改为：roundtable@lifeweek.com.cn



家庭帮手机器人

Niryo One 机器人的身体由 3D 打印而成，大脑部分则由 Arduino、Raspberry Pi 和 Robot Operating System 技术提供动力。Niryo 还计划为其建立一整套云服务，以帮助用户日益增长的需求。6 个轴的手臂允许其执行完全由工业机器完成的任务，在物体中钻孔，以及处理家务。其操作界面非常灵活，用户可以编程简单的任务，还可以使用智能手机来控制手臂。

神韵凌然的动物

古驰 Angry Forest 系列首饰融合野狼和秃鹰两种动物元素呈献野性风格。吊坠项链和戒指均由 925 银材质打造，复古钹饰面增添纹理质感，创造神韵凌然的视觉效果。动物元素与饰品的结合在摩登都市感中增添活力。



复刻潜水表

宝珀五十英寻 MIL-SPEC 复刻腕表的黑色表盘覆有 Super-Luminova 夜光涂层的刻度指标。其湿度指示计沿袭了 20 世纪 50 年代 MIL-SPEC 1 的风格，若湿气渗入腕表，表盘上 6 点时标上方的小圆盘就会由白变红警示佩戴者。宝珀自产自动上链 1151 机芯可提供 4 天的动力储存，腕表防水 300 米。



经皮电神经刺激电疗法

iTENS 治疗补丁贴的原理是利用经皮电神经刺激的技术，这种电疗法可以应用于身体各个部位，来缓解肌肉疲劳、疼痛、关节炎等症状。使用凝胶贴纸吸附在身体皮肤上，通过手机 APP 控制设备的运作，可以操作强度、电疗节奏。在精准测量计算之下，其电流在安全范围之内。

智能真空吸尘

这款特斯拉 (Tesla) 真空吸尘车由设计师马库斯·乔森 (Marcus Jonsson) 发明，造型延续传统吸尘器样式而功能上能更好地布局屋内清扫空间，高效进行逐层清扫。中途电量耗光返回充电座充满电之后，它会自动返回到断电处，进行下一步清扫工作。用户可以通过手机 APP 关注清扫的整个进程。



圆底锅电磁炉

普通电磁炉的结构往往使得圆底锅无从适用，而 NUYN - Amphi 电磁炉却可以适应于普通中国家庭常用的圆底炒锅。这款电磁炉由 7 个同心圆组成，内部分布着铜线圈，当放入圆底锅时，同心圆自动下沉并贴合圆形锅底，让热效率达到最大化。



紫外线手机消毒盒

设计师 Hongseok Seo 和 Jo-Young Choo 制作的这款可以为手机消毒的智能盒，运用紫外线瞬间清洁手机并对其进行全方位消毒。只需将要清洗的设备放在药丸型的容器中按下开关，就能得到一个清洁无菌的手机。



挂锁与金属球

蒂芙尼新款 Tiffany HardWear 系列 18K 黄金手链，设计原型来自一条 1971 年的中性手链，多股链结环环相扣中加入可拆卸的挂锁和金属球，体现出纽约城市的工业感。



透明水晶球

Bocci 14 系列吊灯以包含 LED 灯珠的水晶球体为特征，每一件都是独一无二的手工制品。灯光与玻璃中的气泡和稍微不平的表面相互作用，形成舒适温暖的光线。

格纹桌面

Sancal 品牌的 Vichy 长桌及边桌系列，引人注目的格纹桌面是用橡木、梧桐木及美国胡桃木拼接而成的，雾银色烤漆 MDF 的底座造型敦厚而富有趣味。



西西里色彩

Dolce & Gabbana 新品 Mambo 墨镜体现了西西里的丰富色彩，金色镜框包围着渐变色镜片，上面装饰着小颗金色珍珠以及 32 颗钻石切割的彩色施华洛世奇水晶。



手柄凳

金属材质的 Pols Potten 品牌三脚凳，设计灵感来自乡村农场的挤奶凳。为了便于移动，其中一个凳脚上固定了手柄。



方形宝匣

Prada 2017 早秋系列中的 Micro Box 手袋，硬朗的方形结构表面覆盖锦缎织物和鳄鱼皮，搭配金色钉饰和大号锁扣，造型与过去存放贵重物品的宝匣相似。

外缘动储

松绿色表盘的宝齐莱 Manero 外缘动储腕表，双向旋转的外缘上链摆陀为机芯提供约 55 小时的动力储存，由 3 时位置的扇形显示器指示出动能储存的水平。



东方与西方 权力和荣耀

百岁贝聿铭



1984年，贝聿铭（右二）成为法兰西艺术学院外籍院士，偕妻子（右一）出席获封仪式



主笔 / 贾冬婷

“东方是东方，西方是西方，这一对永不相遇。直至天与地并立于上帝伟大的审判席前。”英国作家吉卜林（Joseph Rudyard Kipling）在1889年的感叹，为两个世界的长久对峙奠定了一股感伤基调。东方和西方，既可以看作一种时空意识，也可以视为一种价值体系。在西方现代性的想象中，世界最基本的秩序表现为两组二元对立：时间秩序上的古代与现代、空间秩序上的东方与西方。这两组二元对立最后决出胜负——在古今之争中，现代胜出古代；在东西之争中，西方胜出东方，东方成为遥远的异邦和他者。

吉卜林的论调在今天看来似乎有些悲观了。在全球化背景下，我们渴望从民族和国家的藩篱之中挣脱出来，去寻求一种更丰富、更包容的世界性视野。作为两种既对立又互补的精神因子，东西方的二元性也蕴含了人类精神终极结合的张力——西方理性的、伦理的、实证的、应用的精神正需要东方倾向于内心生活和直觉思维的精神的补充。因此，如何跨越东方和西方之间的这道“玻璃门”，更成为一个人类命运的重要母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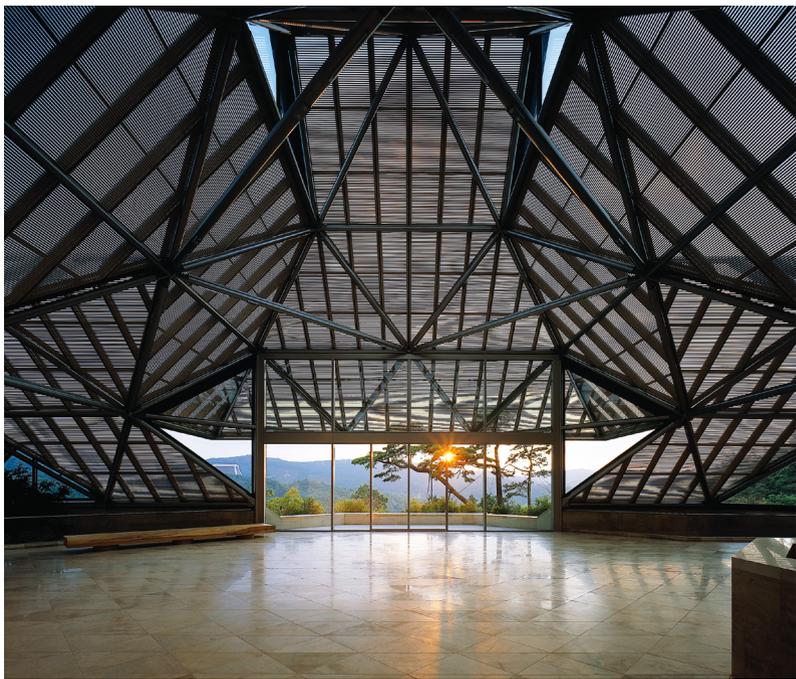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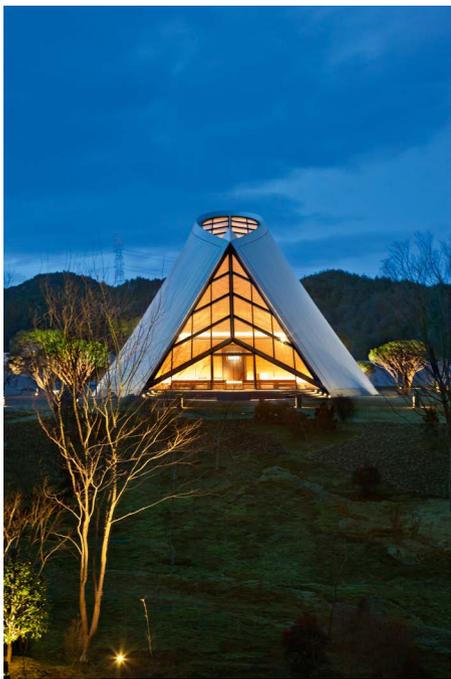
纵观东西文化交流史，完成这种跨越的人寥若晨星。这其中，贝聿铭是一个难得的样本——他从截然不同的文化土壤中汲取了精华，又游刃有余地在两个世界里穿越。前辈大师柯布西耶（Le Corbusier）式的圆形镜框和后面那双神采奕奕的眼睛，永远上扬的嘴角，考究又不至于古板的西装，风度翩翩又有分寸感的态度，都给人一种精妙的平衡感，以至于贝聿铭多年的合作伙伴亨利·考伯（Henry N. Cobb）形容他为“文化意义上的男扮女装者”。某种意义上，贝聿铭是东方和西方、艺术和商业、阴与阳、新与旧等多重矛盾的统一体。

今年4月26日，贝聿铭即将迎来百岁生日。在他的这个世纪里，身为一个华裔美国人，贝聿铭在他的建筑王国里跨文化的成就斐然：1964年击败名气大得多的路易·康（Louis Kahn），被肯尼迪总统的遗孀杰奎琳选为肯尼迪图书馆的建筑师，此后两人成为至交，因为在杰奎琳眼里，和肯尼迪同年的贝聿铭看上去是一位贵族，更是一位有改革精神的年轻绅士，正如其亡夫予世人的印象。1978年，几乎是美国最重要的公共文化建筑——国家美术馆东馆建成，贝聿铭以充满激情的几何结构有力驳斥了现代主义运动已经衰落的论调，1983年更被加冕建筑界的最高

奖项——普利兹克奖。1980年，法国总统密特朗出人意料地邀请贝聿铭主持卢浮宫扩建工程，他的跨文化身份也在一定程度上帮了忙——一方面，他可以带来新世界的灵感和效率，却不会给人招摇过市的美国人的印象；另一方面，他的中国血统仿佛给他注射了预防针，使他得以抵御法国的排外主义。这个1989年建成的玻璃金字塔在争议声中成为巴黎最新的“纪念碑”，也给贝聿铭笼罩上一层无往不胜的光环。更具跨越意义的是，自1979年中美建交之后，贝聿铭就作为中美关系的桥梁性人物，被屡屡邀请重返中国设计标志性建筑，包括1982年建成的香山饭店、1982年香港中银大厦、1985年北京中银大厦、2006年苏州博物馆新馆，还有2009年华盛顿的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在一定意义上完成了文化寻根和重建；而1996年的日本美秀美术馆，2009年的多哈伊斯兰艺术博物馆，则是在更大跨度上对人类文化精髓的探寻。

贝聿铭对文化的跨越当然不只局限在建筑领域。正如尼采所说：“建筑是一种权力的雄辩术。”建筑与我们面对的一些最重要问题息息相关——权力、荣耀、壮观、记忆、身份。尽管不愿担任政治角色，但在贝聿铭的一生中，却屡次站在历史事件的台前。最有戏剧性的一幕是1979年邓小平访美的破冰之旅中，在肯尼迪中心的一次招待晚会上，贝聿铭在其中两幕间担任了报幕员；美方还特意安排邓小平在刚建好的国家美术馆东馆发表演讲，该馆的建筑师正是贝聿铭。而在此之前的一年里，邓小平已经两次邀请贝聿铭来刚刚改革开放的中国，在紫禁城周围留下美国式的现代化印记，而他最终选择了在西北郊的香山建一座低层饭店，并影响了故宫周边的高度限制政策出台。可以说，在贝聿铭身上并存着两个世界，而他也同时被两个世界所需要。

某种意义上，这出于历史的偶然。如果将贝聿铭的一生分为三个阶段，那么，第一个阶段是1917到1935年，他在中国，而且是一个某种意义上无法再现的传统中国：他出生于1917年的广东，封建帝制刚刚崩离析，中国正挣扎着要以还在襁褓中摇摇晃晃的现代制度取而代之。贝聿铭的父亲——银行家贝祖诒带着全家从广东到香港，再到上海，既是寻找避风港，也是占领桥头堡，要在这个东西方文化的对撞点上寻找一条现代中国路径。相对于半西方城市的上海，相邻的苏州则是传统的中国城市，中学时期的贝聿铭会在每年暑假去苏州的祖父



家，学习一整套儒家礼仪。这个阶段直到1935年，贝聿铭去美国求学。两年后，“七七事变”爆发，中国成为一个回不去的故乡。第二个阶段在美国，从他1935年去求学，到1978年以个人名义被邀请回到中国，正值美国现代主义建筑最盛行的时期。他拜在现代主义建筑奠基人之一的格罗皮乌斯(Walter Gropius)门下，又在其漫长的职业生涯中始终如一地捍卫着现代主义，也借此确立声名；第三个阶段从1979年中美建交、中国改革开放至今，贝聿铭游走在中美之间，东方和西方之间，作为寻根者，也作为更广泛意义上的文化跨越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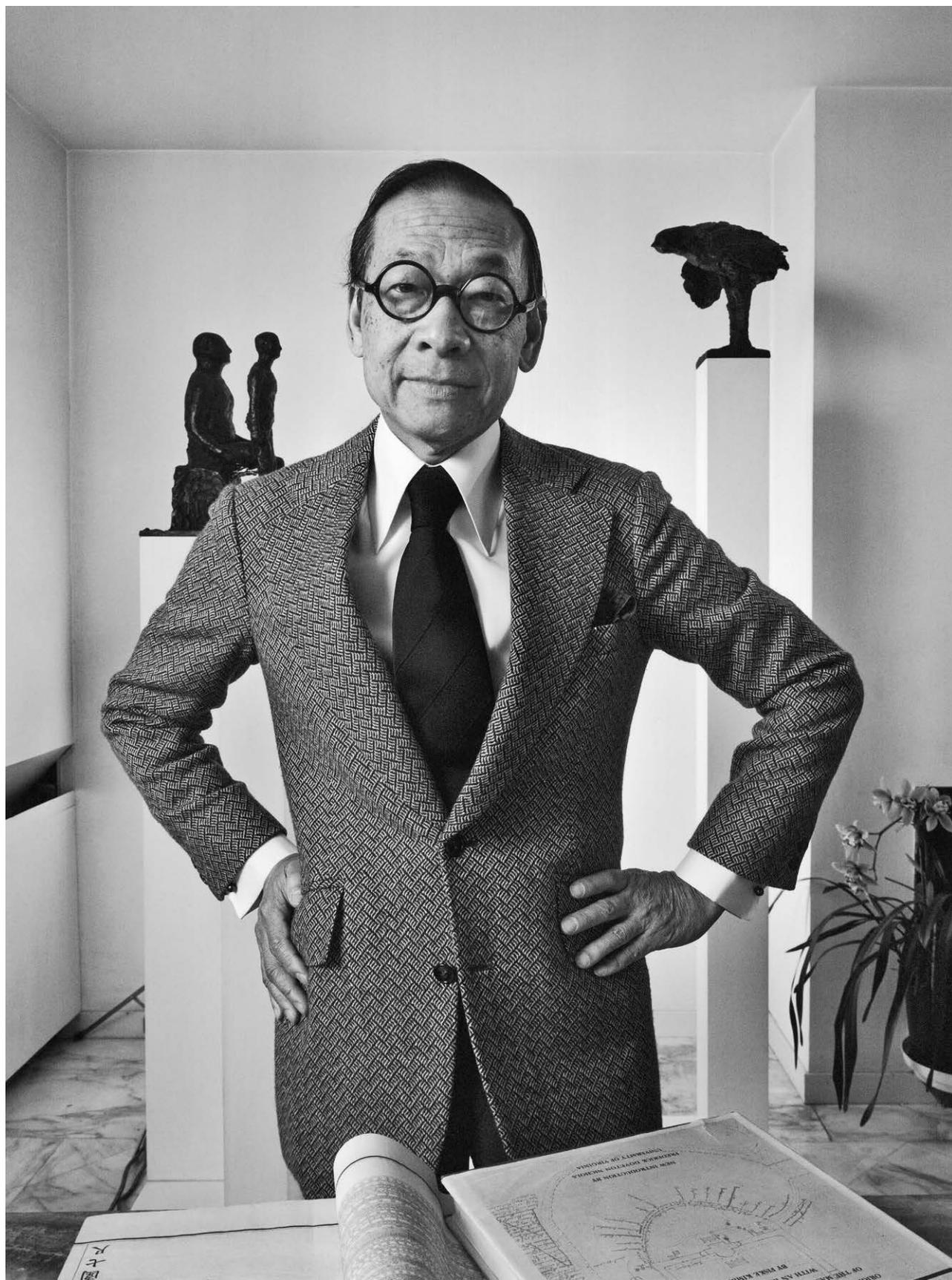
可以说，贝聿铭经历了东西两种文化最好的时期，又恰好躲过了它们的灾难期和衰退期，从两个对立又互补的世界中汲取了精华：中国赋予他儒家的洞察力、根深蒂固的平衡感，以及扎根传统的贵族特有的权威感；而美国使他能够从过去的历史重荷中解放自己，成为现代主义流派的代言人。

在贝聿铭所见证的这个世纪之初，东方和西方曾爆发过相互交流和碰撞的“火柴热”，这场文化的发酵延续至今，我们每个人都被卷入其中，不仅要拥抱文化和制度那些激动人心的转变和多元化，而且要面对传统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的空前裂变和崩塌。

在这个过程中，什么要抛弃，什么要坚守？如何在全球化环境下建立一种既包容又自我的视野？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也是我们去深入观察贝聿铭的原因，正如他对自身跨越者身份的明确意识：

“如果你对人类情感的历史——那也正是建筑史的本质——进行思考，你会注意到，最为硕果累累的想象力的发展总是在两种或两种以上相互对立的思想或情感方式碰到一起时发生。这些思想或情感方式也许扎根于彼此非常对立的土壤，但如果它们真的能碰到一起……那么，一种出人意料的含义丰富的关系就会出现。由于我生命中的对立面逐渐获得一种互补性，我在这些方面感觉到了发展。与此相比，这些年中我在设计建筑方面取得的进步就不再那么新颖、有用、令人振奋。这好比是播种和收割，季节和情绪的循环，光和洞察力的运动，你种下的东西什么时候可以收获，你永远不会搞得很清楚，收获也许是一次性的，也许是重复进行的。你也许会忘记你种下了某种东西——一种经历、一种观念、与某人的关系或一种哲学、一项传统。然后，突然间它就开花了，而且是由截然不同的环境促成的。这样的开花现象能冲破墙壁，甚至突破整个时代。”

左、右图：贝聿铭设计的日本美秀圣堂和美秀美术馆



贝聿铭 (摄于1979年)

成为贝聿铭

文 / 李菁

从 18 岁赴美留学的富家子弟，到后来成为在美国及世界范围内都有话语权的建筑大师，贝聿铭的一生不只是演绎了一个有传奇色彩的成功故事。实际上，回首他的整个职业生涯，不仅仅在历史与现代之间构建桥梁，也在东西方之间构建桥梁。正如一位建筑界同行所说：“贝聿铭的建筑仿佛变幻莫测的现代世界中一条奇妙的丝绸之路。”

纽约的新面孔

1948 年，31 岁的哈佛大学建筑系助教贝聿铭，离开安静的校园，从他居住的波士顿剑桥小镇 (Cambridge) 来到大城市纽约。对这位东方青年而言，这个决定不仅仅意味着自此从安静的学术界投身到一个喧嚣的商业界，也是他人生轨迹就此转变的一个节点。

向贝聿铭伸出橄榄枝的，是作风张扬、嗜抽雪茄的纽约开发商威廉·齐肯多夫 (William Zeckendorf)。齐肯多夫是纽约长岛一位犹太制鞋匠的儿子，虽并不具备哈佛、耶鲁这样名校背景，但天性好斗，敢于冒险。“凭借他对具有战略意义的地皮的非同寻常的第六感”，齐肯多夫熟练地进行了一系列大宗交易，从而攒下了不菲财富。在他的生意鼎盛时期，他投身各种眼花缭乱的经营活动，涉猎过船运，勘探过石油，赞助过百老汇歌剧，还曾收购一座监狱。“二战”后，由政府担保的低息抵押贷款，使中产阶级在经济上有能力实现拥有住房的“美国梦”。嗅觉敏锐的齐肯多夫不会错过这个时机。他预测到，各大城市中心地带一片片破烂的贫民窟将得以重建。在此目标下，他急需为自己的韦伯纳普 (Webb&Knapp) 招揽一批建筑师。

自诩为现代“梅第奇”的齐肯多夫，想网罗一批了不起但还不是那么出名的建筑师。齐肯多夫委托一个朋友去各地物色建筑人才，对方为他开了一份 12 人的名单，当时名不见经传的贝聿铭就在这个名单里。当齐肯多夫问贝聿铭能否见面时，贝聿铭兴奋地“跳了起来”。在他看来，这是了解不动产业

务的极好机会。

1948 年春天，贝聿铭与夫人找到齐肯多夫在纽约的办公室时，看到这位房地产开发商正在挂满停车场照片的杂乱办公室中端坐着，窗帘上满是水渍。贝聿铭后来坦言：“我当时确实有点儿担心我来错地方了。那间办公室实在让人不敢恭维。”

而齐肯多夫则在自传中坦承对这位才华非凡、精明过人的东方年轻人有“相见恨晚”之意。两人的话题轻易就从建筑界跳到了两人共同的嗜好：葡萄酒收藏。贝聿铭的一位传记作者写道：“贝聿铭所体现的是美国所想象的东方美德：高雅、受过完美的教育，举止矜持高贵。”另外，还有一个登不了大雅之堂的理由，齐肯多夫极端迷信，当他知道他与自己的儿子以及贝氏父子都是中国的农历蛇年出生时，便认为这是一个极好的兆头。

虽然齐肯多夫拥有的机会和描述的前景也给贝聿铭很大冲击，但他对于离开哈佛和是否回中国仍在犹豫不决。齐肯多夫说服他：“我们将要做的种种事情将大大区别于、优越于这个国家其他任何人正在做的一切，而你作为一名建筑师无法拒绝这样的挑战。”齐肯多夫当时并不知道，他的这条建议，与贝祖诒给儿子贝聿铭的忠告不谋而合：优秀建筑的精髓不仅在于构思伟大的建筑物，而且要使它们与金融和经济要素有效地联系在一起。

六个月后，贝聿铭终于下定决心，离开哈佛校园这块净土，从此投入一个充满机会与挑战的新世界。后来有人形容，这也是贝聿铭向美国权力中心不断靠近而迈出的第一步。



1

(苏州美术馆 供图)



3



2

(苏州美术馆 供图)



4

1. 少年贝聿铭
2. 贝聿铭的母亲去世后，父亲贝祖诒赴欧洲疗伤时结识第二任太太蒋士云
3. 贝氏全家福（前排左一是贝聿铭）
4. 贝聿铭全家在欧洲度假

新旧之间

实际上，这并不是贝聿铭第一次同自己的旧世界告别，尽管那个环境对他而言既熟悉又舒适，难以割舍——1935年8月13日，18岁的富家子弟贝聿铭从上海登上“柯立芝总统号”，远赴美国留学。在旧金山停留几天后，贝聿铭搭火车前往费城。在此之前，贝聿铭对美国的全部概念皆来自他在上海影院里看到的好莱坞出产的电影。

贝聿铭赴美留学的第一站是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学院。贝聿铭后来并没有解释他当年首选宾大的原因，或许是因为宾大建筑学院当时与中国有一种相对密切的关系，比如梁思成、林徽因、杨廷宝等人都是从宾大毕业的，而他们后来又成为中国第一批建筑教育家。

遗憾的是，贝聿铭并没有对宾大建筑系一见钟情。建筑系在校园里一幢阴暗的维多利亚式的大楼里，学院人情冷淡。最主要的是，当时宾大建筑系的课程忠实地服从于从巴黎艺术学院移植过来的19世纪艺术体系。他们要求学生通过勤奋复制设计图，以及用炭或自己研磨出的中国墨汁制作精巧的透视图，来掌握古典设计的基础知识。这把贝聿铭吓住了。他自认为自己的特长在数理，从来没有想象建筑师还得像一位艺术家那样有精湛的绘画技巧才行。两个星期后，贝聿铭转到麻省理工学院（MIT），放弃建筑学，改学工程。

到了麻省，贝聿铭感觉更自在。“众所周知，贝聿铭来自一个富裕的中国家庭，父亲贝祖诒是一位杰出的国际银行家，他拥有广泛的人脉。例如，当贝聿铭乘坐的船在旧金山停靠时，受到当地一家大银行行长的热情接待；当贝聿铭后来到达波士顿，他在当地上层社会也受到热烈欢迎，因为波士顿几个世纪以来都和中国有很强的商业和艺术联系。”耶鲁大学的建筑史博士珍妮特·亚当斯·斯特朗（Janet Adams Strong）介绍，她曾在贝聿铭事务所工作过18年，任传媒总监。而贝聿铭本人也这样形容：“早在我能说英语之前，我就已经能够打入波士顿的社交圈。”

幸运的是，对贝聿铭恩宠的“波士顿圈”里，还有一位特殊的人物——麻省理工学院院长威廉·爱默生（William Emerson），他也是美国著名文学家爱默生的侄孙。他在贝聿铭所画的图纸中发现了贝聿铭的技能和想象力，他认定贝聿铭可以成为一名

杰出的建筑师。感恩节那天，贝聿铭受邀去爱默生家吃晚餐，爱默生说服贝聿铭应该继续建筑学。贝聿铭向爱默生坦承因绘画技术欠缺、没信心成为建筑师时，爱默生说：“年轻人，别胡说，我还没有碰到不会画画的中国人。”于是，贝聿铭听从他的劝告，放弃工程学，重新开始学建筑学。现在看来，得感谢爱默生让贝聿铭重新回到了原有轨道，否则我们后来就错失了一位影响甚远的建筑大师。

但在当时，来自爱默生个人的认可、鼓舞以及超越一般师生的情谊，并没有完全消除这个年轻的中国学生对自己所接受的建筑学训练的疑虑和迷惘。和当时美国的很多建筑学院一样，麻省理工仍然忠实于学院派风格，其根基是古典作品和规律性。贝聿铭与他年轻的同学们必须忍受用精巧的细节再现必修课程的古典主义比例的单调乏味的工作。但他们也敏感地意识到，外面的世界正在悄悄发生着变化。

此时，德国和荷兰的先锋派们正在摒弃新古典主义的建筑风格，并将它视为一个衰落的帝国。“我不满意古典装饰风格的训练，我的许多同时代人也有同感，于是，我们开始到其他地方寻找灵感。”贝聿铭花大量时间在图书馆，看那些来自欧洲的最新作品，特别是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正在做的作品。贝聿铭后来说，偶然在图书馆找到的柯布西耶的三本巨著对他有如“圣经”，“只有通过它们我才能看到建筑的新思想”。柯布西耶提出了一种极为耸动的理论。他认为，房屋是“居住的机器”，而以往不断发展起来的各种旧风格都将被扔进垃圾堆中。在厌倦了“旧世界”建筑准则的年轻学生来说，柯布西耶具有令人目眩的诱惑力。

1935年，柯布西耶来到波士顿。即便不认同柯布西耶在建筑界发起的“革命宣言”，1935年11月，思想开明的爱默生还是请柯布西耶到麻省理工做了一次演讲。“勒·柯布西耶当时在哈佛和MIT并不是很受欢迎，因为当时这两所学校都还是遵从19世纪的古典建筑教育风格。他的言论只是被当作一种猎奇好玩的东西。柯布西耶在MIT演讲的时候，说的法语，需要翻译成英语，所以除了个别学生外，大多数听众不懂，其中包括贝聿铭。但大家仍然被他先进的观念和他展示的照片所激发。”珍妮特·斯特朗说。即便如此，贝聿铭后来把柯布西耶在麻省理工停留的两天，称为“我建筑教育中最重要的两天”。身着黑衣、戴着镜框眼镜的柯布西耶“傲慢无

礼，满口脏话。但在我看来，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对的。我们需要有人来震撼我们，让我们走出自满自足的状态”。

1938年，贝聿铭到纽约游玩。有一天，他去中央车站接朋友时，遇到一位端庄秀丽的中国姑娘，她叫陆书华，正要去卫斯理学院读书。对陆书华一见倾心的贝聿铭忍不住“献殷勤”，提出开车送她去波士顿，但被矜持的姑娘拒绝了。也许是天意，当天晚上，贝聿铭得知陆书华乘坐的火车因飓风而耽误时，他便开始打电话要求约会，从而成就一段姻缘。

巧的是，陆书华的父亲早年也毕业于麻省理工，是一位出色的工程师。陆书华本来也想像父亲一样进麻省理工读工程，但父亲建议她去附近一个“很好的女校”，于是她进入了宋氏三姐妹以及冰心都读过书的卫斯理学院。陆书华的英文名叫 Eileen Loo，很多书籍在介绍她时根据她的英文名而将之错译成“卢爱玲”。

当麻省理工还在维系旧有的建筑教育思想时，“邻居”哈佛大学却开始全心全意地向新流派敞开胸怀。哈佛大学设计学院院长约瑟夫·哈德纳特大力提倡现代主义，而这场运动的核心人物是格罗皮乌斯（Walter Gropius）。格罗皮乌斯是德国包豪斯学派的先驱，纳粹政府上台后，格罗皮乌斯离开了德国，在伦敦工作了几年后，应邀到美国哈佛大学设计学院任建筑学系主任，从此居留美国。与全心拥抱新思想的哈佛不同，属于传统派的爱默生对格罗皮乌斯不屑一顾。

投身哈佛

1940年，贝聿铭以优异的成绩从麻省理工毕业。身为长子，贝聿铭的第一考虑几乎没有他选，本想马上回国，但是抗战的爆发，父亲贝祖诒被迫将银行搬到了重庆。贝祖诒给儿子写信，建议情况好转时再回来。

为了谋生，贝聿铭开始在波士顿一家工程公司工作，在那里，他做了各种与工程有关的项目，这也为他后来的职业生涯带来不小的影响，成为他后来作为建筑师的一种营养资源。

1942年春天，在陆书华毕业后的第五天，他们举行了结婚典礼；秋天，陆书华进入哈佛大学设计学院攻读景观设计的研究生学位。贝聿铭本来就因为麻省和哈佛的合作项目对哈佛比较熟悉，有了陆

书华这一层，他与哈佛的关系似乎更近了一些。有一天，陆书华的一位教授建议贝聿铭报名格罗皮乌斯亲自教授的研究生设计室工作。第二天一早，贝聿铭就走进了哈佛大学设计学院院长哈德纳特的办公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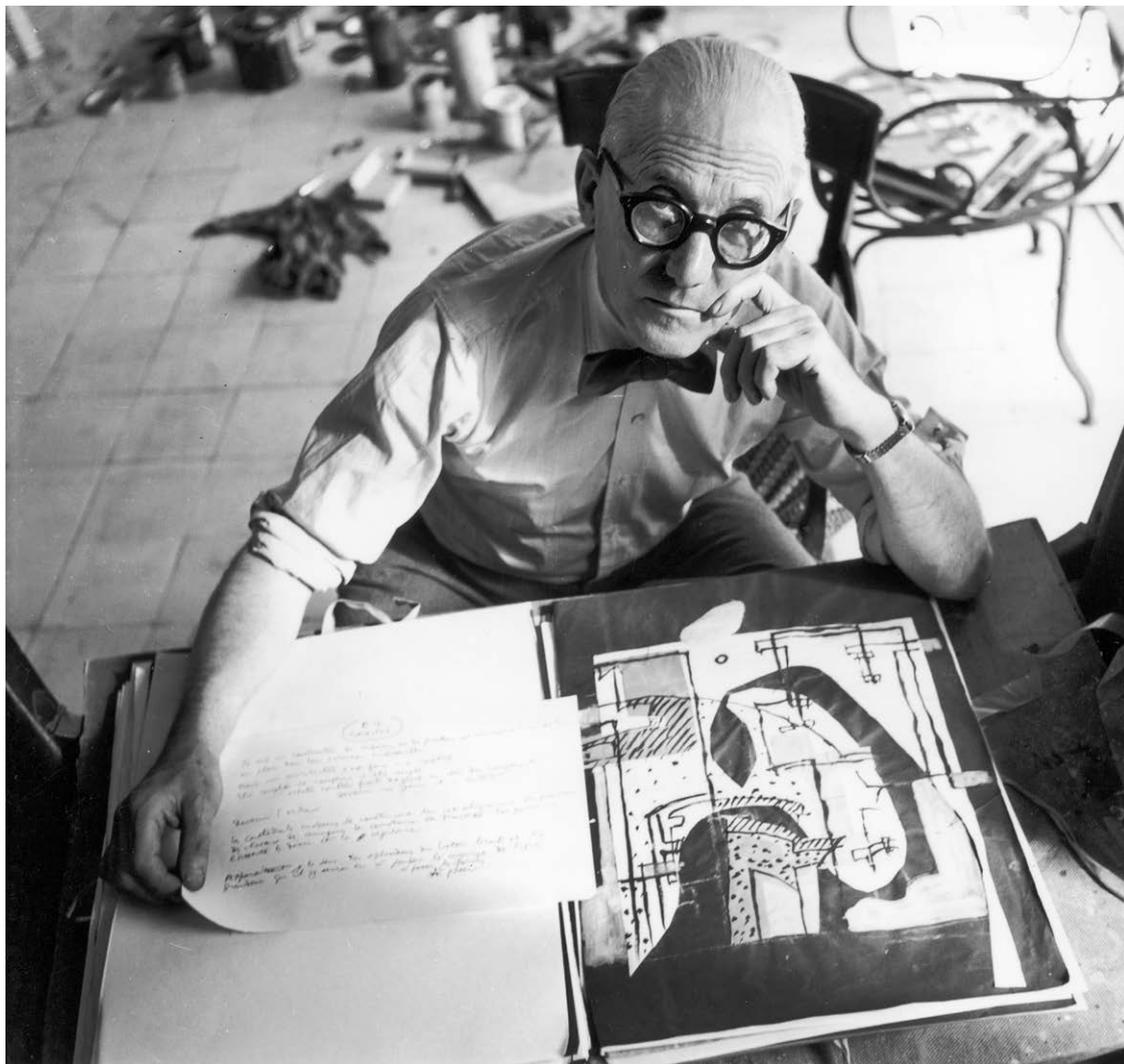
一直钟爱贝聿铭的爱默生院长闻听此讯，气得脸都红了。贝聿铭后来说：“当时他有被背叛的感觉。他坚信古典主义艺术教育的方法，并且由衷地认为，现代主义运动是错误的。”不过后来贝聿铭也发自内心地感激他在麻省理工所受的训练。

1942年12月，贝聿铭正式入学攻读哈佛的研究生学位。“那时正逢‘二战’，班里的大多数年轻人都去为国家服兵役，班级规模变小，课程也没有以往那么正式。贝先生也想为战时尽一份力，所以他就自愿去了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为国防部门工作。”珍妮特·斯特朗说。贝聿铭效力的地方叫“美国国防研究委员会”（NDRC）——“二战”爆发后，爱因斯坦曾经致函罗斯福总统，建议在白宫和从事秘密武器研究的物理学家之间建立一座永久性的联络站，作为回应，罗斯福创立了“国防研究委员会”。

贝聿铭在那里的工作，就是根据情报人员送来的照片，找出炸毁目标的最佳方式，理由是作为一名建筑师，“如果你知道怎么建造，就应该知道怎么毁掉它”。贝聿铭的第一个项目是研究如何轰炸德国和意大利的桥梁结构，再找出炸毁方法。“但在我想出轰炸德国的办法之前，与德国的战争已经结束了。”贝聿铭又被要求研究轰炸日本的办法。那是个完全不同的课题。因为日本的建筑多为纸木结构，在德国使用的高强度炸药用在这里效果不会很好，所以贝聿铭的任务又成了设计燃烧弹。但贝聿铭后来很不愿意提及这一段经历，他只是简略地说：“这是我一生中很悲伤的一章。”

在普林斯顿时，贝聿铭与陆书华有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定中。陆书华不得不中断学业，以照顾家庭。1945年初，贝聿铭和太太回到剑桥，在离哈佛校园很近的地方，租了一套很小的带花园的公寓。他们在小花园里种满了来自中国的四季豆。贝聿铭还自己做了一个长长的木质唱片架，打算用来存放将来有一天能带回祖国的古典音乐唱片。身边的朋友也觉察到“他们想念祖国，有些伤感”。秋天，贝聿铭回到哈佛，继续他的建筑课。

回头看来，年轻的贝聿铭接受建筑教育的时期，也正是建筑思想最激荡的年代；也因为时代背景，



贝聿铭把柯布西耶在麻省理工学院停留的两天称为“我建筑教育中最重要的两天”

他很幸运地遇到了欧洲和美国建筑界的领袖式的人物。第一位就是格罗皮乌斯。“格罗皮乌斯是我去哈佛的真正原因。”贝聿铭多年后回忆说。格罗皮乌斯推崇对于结构绝对“诚实”的表达，反对一切附加装饰。激进的格罗皮乌斯还把艺术史课从核心课程表删除，他还认为建筑学的历史实际上是创造力的桎梏，因为学生往往慑于古希腊、古罗马或者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的建筑精品，被捆绑住了手脚。格罗皮乌斯与另一位比较年轻的包豪斯学院流亡者马塞尔·布罗伊尔（Marcel Breuer）为哈佛建筑系培养了包括贝聿铭在内，一批日后在世界范围内都颇有影响力的建筑师。

尽管贝聿铭被格罗皮乌斯倡导的新观念所吸引，但他还是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并不是赞同他的每一个观点，他尤其不认同的是格罗皮乌斯对“国际风格”（international style）的定义。“这在当时是一个很大的话题。格罗皮乌斯坚信世界按不同的速度工业化。先西方后东方，世界早晚都将被工业化。”这实际上也是柯布西耶曾提及的国际风格将席卷全世界。但贝聿铭对此有所怀疑，他认为这种看法太过僵硬。

有一次贝聿铭打断了格罗皮乌斯的讲课，争论说“国际风格”不应该消融世界各地的不同风俗和特色。“我说‘气候怎么办？历史怎么办？传统又怎



左图：作风高调、喜爱冒险的纽约地产大亨齐肯多夫。贝聿铭为他工作多年

右图：出生于密西西比州的华人黄慧生在贝聿铭事务所工作了近40年

么办？’他说：‘很有意思，你可以自己做一个项目，你得把这点向我证实。”几个月后贝聿铭拿出了他的作品——一张图纸，以及模型，这是他设计的一座两层楼的上海艺术博物馆，上面有好几个凉亭，还有淙淙流过茶园的溪水。贝聿明解释说，西方艺术的公开性很强，建筑要与之相匹配；但是东方艺术的传统是一种偏私人、隐秘的欣赏活动，所以建筑风格也必须有别于西式博物馆。贝聿铭设计的这个作品曾成为当时的热门话题。格罗皮乌斯称它是“我所见过的最精致的学生作品”。在向一本建筑杂志所写的推荐语里，格罗皮乌斯写道：“一位有能力的设计师可以很好地坚持基本的传统特征——即，他认为仍然存在的那些特征——却不会放弃设计方面的进步观念。”这句话，几乎创见性地预言了贝聿铭一生的建筑事业的特性。

1946年，贝聿铭从哈佛毕业，受格罗皮乌斯之邀留下来任助教。实际上，接受助教这个职位也是一个权宜之计，彼时的贝聿铭还在等待着回中国的

时机。如果有一份长期固定的工作，届时就很难脱身。这也是他为什么没有特别教几个孩子中文的原因。“他们总想着以后早晚要回到中国。”1946年出生的贝建中说。眼看着中国又陷入一场内战，贝祖诒再一次写信劝阻了儿子，等到贝聿铭再次踏上中国土地时，已是1974年。

初露头角

“其实接受齐肯多夫的工作邀约非常冒险，因为在那个时候，受尊敬的建筑师从不与开发商一起工作。实际上，美国建筑师学会责难贝聿铭和齐肯多夫合作。在哈佛，贝聿铭的同事认为这是一次职业自杀，认为他背叛了学术界和职业道德标准。但是贝聿铭意识到，随着逐渐庞大的家庭，他没法仅仅依靠助理教授的薪水维持生活，所以他决定搬去纽约，学习真正的房地产和商业——这些事情他在学校都没有学过。贝聿铭还打算带着他新学习的知

识回到中国。”在贝聿铭事务所工作了18年的珍妮特·斯特朗博士还是《贝聿铭全集》的编者之一。

尽管争议颇多，但齐肯多夫是对贝聿铭一生有极大影响的一位人物，他的人生也绝对值得一本厚厚的传记。贝聿铭评价齐肯多夫是“最有想象力的开发商”，他坦言当初为齐肯多夫工作时，只是想学一些房地产开发的经验。“出乎意料的是，我从这个人身上学到了很多。我来美国之后，很少走出学术界，是齐肯多夫把我带入了一个新世界，我很感激他。”

在公司其他同事眼里，贝聿铭是一个从容不迫、引人注目的年轻人。有人开玩笑说，齐肯多夫的体重超过了贝氏一家人的体重总和，但是没有人敢忽视贝的存在。“虽然两人从身材上看相差很多，但他们的气场是相当的，两个人都能感觉出这一点，不必挑明。”与贝聿铭工作了近40年的华人建筑师黄慧生（Kellogg Wong）说。

刚加入事务所时，黄慧生并不清楚贝聿铭的出身，“但从他的穿着，他透着自信的特殊习惯，我能感觉到他出身优渥”。“虽然贝先生和我一样，个头都不算高，但他走进一个房间，他自然地就成为中心，他有这种自信和风度（bearing）。”作为密西西比出生的华人，黄慧生自认从小就有不安全感。“他的出身背景和我不一样，我从小就没见过博物馆，而他就出生和成长在美好的事物中。”

让黄慧生印象深刻的还有，有时候两人一起外出看场地。“十几岁的孩子看到我们都是中国人，就叽里哇拉地学说中文来嘲弄我们。我非常恼火，但贝先生毫不为意，只是微笑。因为他知道他自己是谁。”这个气度黄慧生自认是学不来的。

贝聿铭的能力也为人惊叹。一位与他打过交道的朋友回忆，他们在讨论一个项目时，贝聿铭立即掏出一张描图纸，不到一刻钟就起草了一张设计图，以及立体图，这个草图和最后完成的建筑几乎丝毫不差。如此出众的创造力令人目瞪口呆。

当年让齐肯多夫更加声名大噪的，还有联合国总部项目。当时联合国正在纽约寻找建造总部的土地，在与其他地产商几番谈判失败后，联合国几乎要放弃，考虑选择费城作为总部的落脚点。这时，齐肯多夫决定将他手上的一块地皮贡献出来，供联合国总部使用。尼尔森·洛克菲勒说服了他的父亲——约翰·洛克菲勒支付了850万美元，为联合国买下了这块地。尽管齐肯多夫此后有很多的大手

笔，但他平生最引以为傲的，就是为联合国提供了总部的土地。虽然齐肯多夫少赚了几百万美元，但却获得极高的知名度。此外，他拥有的与这块土地相邻的所有房地产全部身价倍增。

因为齐肯多夫得罪了纽约的一些权贵，他的公司只能在纽约城外寻找商业机会。贝聿铭从中学会了宝贵的一课，没有政府强有力的支持，再好的建筑计划都是无法实施的。所以他后来无论做什么项目，都十分注意获得政府的首肯和支持。

齐肯多夫的名气越来越大，来自其他城市的商业邀约也越来越多。如果齐肯多夫认为这个项目值得考虑，就会让贝聿铭进行实地考察。一旦确定后，齐肯多夫通常会乘坐公司那架DC-3飞机，“一边喝着马提尼一边听着助手对于目的地情况的报告”。他们的飞机在城市的上空长时间地盘旋，以便让齐肯多夫和贝聿铭能够在降落之前好好观察这个城市。

很欣赏贝聿铭的齐肯多夫，每到一处都要很郑重其事地把这个极富教养和个性色彩的中国设计师介绍出去。与张扬高调的齐肯多夫相比，不卑不亢的贝聿铭更让人相处舒服。他从不炫耀性地用设计专业术语，而是用浅显易懂的词语表达他的设计理念。正如《贝聿铭传》作者所言，他有着一种能够将房地产的实用性和设计的高雅性完美结合的天赋。





1

在齐肯多夫的公司里，贝聿铭逐渐搭建了一个以哈佛毕业生为核心的工作小组。此后的10年多时间里，以贝聿铭工作小组为核心的部门已有了75人，每年负责高达5亿多美元的项目。更重要的是，齐肯多夫喜欢独树一帜，每当贝聿铭提出一种想法，他都会问：“以前有人这样做过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他就很高兴地说：“那好，我们就去做一下吧！”这对年轻的贝聿铭来说，无疑是大胆实践的最佳机会。后来，齐肯多夫渐渐成了一个父亲似的存在。贝聿铭的夫人后来说，齐肯多夫给当时“空空如也”的贝聿铭灌注了在学校里学不到的丰富社会知识和经验，也给从小家教严格的贝聿铭带来了他所缺失的情感上的温暖。

自立门户

贝聿铭在齐肯多夫手下，固然设计了不少项目，

很多都盈利不少，但并没有建筑美学上的太大造诣，这也是让贝聿铭有点苦恼的。他也不愿意被永久地固定为“房地产开发商的建筑师”，只会设计房地产项目。

与齐肯多夫一起工作，贝聿铭也见证着很多人像过山车一样大起大伏的命运。50年代中期，当时纽约中央铁路公司新上任的总裁罗伯特·扬意欲重修中央车站。中央车站是纽约市的地标性建筑，闻听此讯，齐肯多夫当然不会放过这一机会，贝聿铭也跃跃欲试。他设计了一个颇有现代风格的双曲面大楼——如果实现这个，需要一个大手笔，需要拆除旧车站，在罗伯特看来，双曲面大楼是他接到的几个改建提案中，最出色的一个。然而，1957年，因为中央铁路公司巨亏丑闻，罗伯特·扬自杀身亡，双曲面大楼也灰飞烟灭。而此时的齐肯多夫也走上疯狂扩张的道路，这让贝聿铭非常不安。

1955年左右，贝聿铭向齐肯多夫表示了的不



2



3

贝聿铭作品：

1/2. 艾弗森博物馆外观和内幕

3. 波士顿考帕列广场上的汉考克大厦

安，流露出想离开的想法。“齐肯多夫是一个传奇的开发商，他总是渴望尝试新想法，做大生意，抓住所有机会。他在房地产行业赚了大钱也赔本不少。齐肯多夫想做些大事情。他喜欢让贝聿铭和贝的专业建筑师团队帮助他实现自己的想法。而且他和贝聿铭非常亲近，两人就像父子关系一样。所以当贝提出离开创立自己的建筑事务所，对他来说是件非常突然的事。”斯特朗评价。齐肯多夫表示理解，但仍挽留他们继续在公司工作，同时表示可以接一些自己的活。

但是这样的处理无法根本性地消弭贝聿铭对职业未来前途的忧虑。虽然贝聿铭在华盛顿、蒙特利尔、费城等地为齐肯多夫完成的大型规划，为他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但像一些低收入住房和商业开发等项目，都有艺术性上的局限。“我知道如果我待在这家公司，我将永远无法得到我真正想要的项目。”事实上，贝聿铭一段时间里确实被美国建筑师协会排除

在外，因为有些成员认为他是“房屋建筑师”（House architect）。因为这些原因，贝聿铭所追求的那些在艺术上有挑战、曝光率高的项目一开始就将齐肯多夫的公司和贝聿铭排除在外。他一直觉得，他和齐肯多夫的关系，使他丧失了设计林肯中心的一部分的机会，而这也是当时最受人追捧的设计项目。

1960年，贝聿铭自立门户开始独立创业。这个新团队聚集了原来齐氏公司设计部门的核心人马，建立了贝聿铭及合伙人建筑师事务所（I.M. Pei & Associates）。而齐肯多夫给贝聿铭和他的合伙人写了一份很动感情，也很伤感的告别信。信中说，12年不长也不短，“在一起，我们创造了历史。我们所经历的划时代的事件，都将被未来世界中当代生活的记录者们重视；在他们的笔下，我们的事业深远地影响了美国建筑史进程，而我们对美好设计所衍生出的生活方式做出的改变，也将被记录在册”。贝聿铭后来说，30年后重读这封信，

依然潸然泪下。就算在 30 年后，他依然感念齐肯多夫“教会了我如何评估一片土地；我看待一个地段的眼光完全地转变了”。齐肯多夫后来像是交了噩运：1965 年，公司破产；1968 年，个人破产，妻子飞机失事遇难；1976 年，在曼哈顿大陪审团判定他没有交纳州所得税六个月之后，齐肯多夫因第六次中风，离开了他曾叱咤一时的世界。

急于寻求突破的贝聿铭很快遇到了一个颇为理想的项目。当时国家大气研究联合大学（UCAR）校长罗伯茨是一位前沿天体物理学家，也是一位极具前瞻性的领导者。他希望在科罗拉多博尔德建立一个新的科研实验室。像齐肯多夫一样，罗伯茨也想启用年轻、名气不那么大但有潜力的建筑师。七所大学建筑学院的院长组成的设计师选拔委员会一致推荐了贝聿铭。

而贝聿铭也十分珍惜这个机会。为了切身感受这一片空间的风格，贝聿铭徒步走遍了整个山坡，甚至在顶上露营，希望能切身感受太阳、风以及这一片无边无垠的开放空间。国家大气研究中心项目于 1967 年竣工，它成型的设计是一座具有未来风格的混凝土建筑，和当时流行的野兽派建筑风格十分合拍，后来伍迪·艾伦在 1973 年拍摄的电影《傻瓜大闹科学城》（*Sleeper*）里还用到了中心的场景。从罗伯茨博士开始，贝聿铭与一连串大名鼎鼎的客户建立了亲密得可以称为合作的工作关系。

珍妮特·斯特朗说：“国家大气中心项目，使贝聿铭第一次有机会探索建筑的艺术。尽管从近处看，还有一些细节显得不甚完美，但他独特的风格和建筑语言仍然熠熠生辉。在接下来的职业生涯中，贝聿铭不断琢磨自己的建筑美学，做出更加自信和流畅的作品。”贝聿铭又一鼓作气，完成了艾佛森美术馆的设计。

1969 年，他因得梅因艺术中心和艾佛森美术馆项目，获得美国建筑师协会（AIA）的国家荣誉奖。这是协会第一次同时颁奖给同一个建筑师的两个博物馆作品。之前对这种建筑类型毫无经验的贝聿铭，创造了美国建筑师协会历史上的新纪录。艾佛森美术馆是贝聿铭后来一系列博物馆项目的开始。艾佛森美术馆建成之后，贝聿铭邀约不断。

贝聿铭的建筑事业实际上也是美国战后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一个缩影。“战后，新建筑的需求特别广泛，因为几十年来没有建造任何建筑。随着美国向和平时期的经济过渡，贝聿铭独立职业生涯的开端

和这次浪潮相一致。他早期的建筑反映了新科技的出现（比如，美国国家大气研究中心和 MIT 地球科学绿色中心）和文化机构的伟大复兴（比如纽约北部的艾弗森美术馆。”珍妮特·斯特朗博士评价。

跻身名流

1963 年 11 月 22 日，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在达拉斯遇刺身亡，举世震惊。一场高规格的葬礼之后，肯尼迪遗孀杰奎琳就不再在公开场合露面，选择一种沉默的方式纪念亡夫。

自从罗斯福总统开始，修建总统图书馆就成了美国政治的一种传统。对 43 岁就当选总统的肯尼迪来说，他曾以为未来属于他的日子还很漫长，如果能连任，8 年的总统任期之后，他也不过 51 岁，他希望退休后能在母校哈佛任教。1963 年 10 月，肯尼迪亲赴哈佛大学选定了一块 2 英亩的场地，计划将它建成一个档案馆、博物馆、教育中心以及他的办公室。没想到，一个月后，他便遇刺身亡。

肯尼迪去世一个月后，杰奎琳把肯尼迪生前最亲密的助手们召集到她在乔治敦的住处，商讨图书馆的具体建设计划。经过热烈的讨论，他们一致认为，未来的图书馆“绝不只是与总统有关的信件和公文贮藏室”，而一定要有教育意义。此外，肯尼迪是一位天性随和不拘小节的总统，他的纪念馆绝对不应该是林肯纪念堂、把林肯的宏伟雕像摆放在门口俯视众生的那种风格。此时的美国人民正对肯尼迪一家怀有强烈的情感，消息一传出，捐款也从四面八方涌来。

在如何选择能够承担这一任务的建筑师时，杰奎琳一时不知所措，她找到肯尼迪生前密友威廉·沃尔顿（William Walton）寻求帮助。身材高大的沃尔顿与肯尼迪是世交，他本人也是一位传奇人物，1944 年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前几小时，作为《时代—生活》的战地记者，他与 82 空降师一起，跳伞到诺曼底前线，并和他的朋友卡帕、海明威一起对随后的战役进行了报道。战后，沃尔顿也成为一位颇有成就的画家，他当时还帮助杰奎琳挑选油画来装饰白宫办公室。沃尔顿不建议杰奎琳对外公开招标，他说：“与其让那些不了解肯尼迪的评判员挑选设计师，还不如亲自选择符合肯尼迪口味的建筑设计师。”

于是，他们采用了一种全新的方法挑选建筑师。1964 年 4 月，肯尼迪家族邀请 18 名世界上最著名

的建筑设计师来波士顿，每人用不记名投票的形式选出候选者。在入围的6名候选者当中，贝聿铭排在第三位，排在他前面的两位是密斯·凡·德·罗（Ludwig Mies Van der Rohe）和路易斯·康（Louis Isadore Kahn），他们都是当代建筑界响当当的人物，而彼时的贝聿铭的影响力显然还不在于一个量级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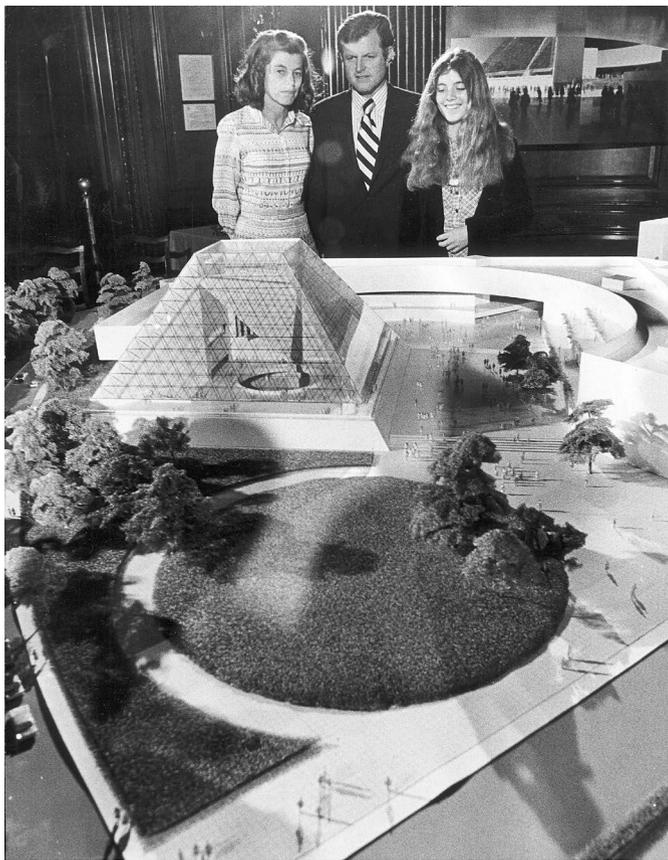
杰奎琳决定亲自去拜访三位候选人的工作室，以加深了解。几周之后，考察团队在肯尼迪夫人的带领下驱车前往贝聿铭在麦迪逊大街的工作室参观。围观者将轿车挤得只能像蜗牛般移动，借助警察的帮助才穿过同样挤满围观人群的公司门厅。

当时贝聿铭仍租住在齐肯多夫的办公室里，工作室并不豪华，不过贝聿铭特意将它粉刷一新，并在不大的接待处摆放了一束美丽的鲜花，以接待杰奎琳。杰奎琳立即注意到了这一点。她发出了一声由衷的赞美之后，问贝聿铭：“你们常放置这么美的花吗？”贝聿铭老老实实“交代”，那是专门为她买的。

“那是一个重要的会面，你知道那时候每个建筑师都想拿下这个项目。”珍妮特·斯特朗说。杰奎琳为世人所知的形象是举止优雅。而贝聿铭见面时精心布置的举动悄无声息地显示了他的诚心。

贝聿铭向肯尼迪夫人展示了自己的一些独立作品。当时贝聿铭并没有太多耀眼的作品，没有大音乐厅、博物馆之类的工程，多是贫民窟改造、低收入住宅等建筑工程。但是杰奎琳对这些项目显示出了相当的兴趣，不停地问各种问题。“贝聿铭坦诚地对肯尼迪夫人说自己并不出名，但最好的作品一定就会是肯尼迪图书馆。年轻的贝聿铭所展现出的意念是一种改变世界的决心，正好符合杰奎琳和大众对肯尼迪的认知。”珍妮特·斯特朗评价说。

在此之前，杰奎琳去芝加哥拜访过密斯·范·德·罗的工作室。当时这位大建筑师抽着雪茄，说话不紧不慢，一副淡然处之的神情，另外，此时的他已年近八旬，杰奎琳对这样一位人选当然持保留态度；在费城，他们又参观了路易斯·康的工作室，这位童年曾被烧伤一半脸的建筑师不修边幅，办公



上图：1973年5月29日，美国前总统约翰·肯尼迪的弟弟、妹妹和女儿（右）参观贝聿铭设计的肯尼迪图书馆模型

下图：1964年12月13日，贝聿铭和杰奎琳·肯尼迪出席新闻发布会，宣布肯尼迪图书馆修建基金已达到1000万美元

室更是乱糟糟的。一比之下，贝聿铭显得更像一个有风度、优雅、有效率、运筹帷幄的建筑师。一位建筑历史学家感慨说：“贝一走进房间，光芒也随之而来。他精力充沛，信心十足，令人为之倾倒。换了你，会选择谁呢？”

1964年夏天，正与家人在意大利度假的贝聿铭得知自己成为一名黑马。消息一出，贝聿铭一下子登上了各大报纸的头版，一夜之间名扬四海。“那时父亲的名字进了报纸上的字谜游戏里，学校的同学们都知道我是谁了。”贝聿铭的幼子贝礼中笑着回忆。

但是准备好好施展一场的贝聿铭却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困扰。先是地址发生变化。剑桥当地社会的成员认为图书馆会引来大批游客，影响当地居民的生活，公开反对最初的计划。迫于压力，图书馆不得不重新选址。到了1968年，肯尼迪的弟弟罗伯特·肯尼迪又遇刺，杰奎琳嫁给了船王奥纳西斯，这使得本来就饱受重创的计划更加偏离了航线。雪上加霜的是，肯尼迪总统遇刺后，迅速筹集的2300万美元不断减少，严重的通胀也造成了余款的缩水。此后10年，能用在项目建设上的钱已经所剩无几了。社会思潮以及人们情绪都发生了很大变化。

1975年，无奈的肯尼迪家族放弃了哈佛大学的场地，把新址选在了波士顿城外一处偏远的填埋区。虽然对这个地址也不是很满意，但贝聿铭还是迅速召集了他最老练的手下，从设计到施工，只用了短短三年就完成了项目。

1979年，在长达15年的建设后，肯尼迪图书馆终于落成。这是一座倚海矗立、黑白分明的现代化建筑。有人在新闻发布会上调侃了一句说：“也许自法老时代以来，还没有哪位建筑师能像贝聿铭这样，和客户持续保持这么长时间的关系。”玩笑背后是一个令人心酸的事实——这项持续了14年的工程，其中有10年都用在寻找建筑用地上。在此过程中，贝聿铭和同事一起为每一个方案做了十几个模型，因为每一个方案都有不同的用地。

从某种意义上讲，肯尼迪图书馆项目成了贝聿铭职业生涯中的最大遗憾，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它使得贝聿铭几乎在一夜之间成为家喻户晓式的人物，将贝聿铭的公司推到了建筑界的顶端。他后来经常说：“那是我们公司真正的开始。”贝聿铭后来回忆说，杰奎琳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你跟我的丈夫有很多相同的地方。”贝聿铭与肯尼迪都来自哈佛，又出生于同一年；杰奎琳形容自己的丈夫很开通，

没有一点成见，她觉得贝聿铭也没成见，两人之间交流得很顺利，“这有点化学反应的意思”。尽管肯尼迪图书馆的最终结果不尽如人意，贝聿铭与肯尼迪夫人的情谊并未因此而终结。1992年，贝聿铭还邀请彼时身份已为船王夫人的杰奎琳·奥纳西斯来北京参加了香山饭店的开幕式。

从巅峰到低谷

肯尼迪图书馆的效应，贝聿铭成了20世纪60年代末期最受欢迎的年轻建筑师之一，大量高级业务找上门来，贝氏事务所的业务一度四面开花，一位设计师回忆：“似乎每星期都有激动人心的事发生，仿佛整个世界都在向我们开放。”

1966年，事务所搬到纽约麦迪逊大街600号的一幢办公楼里，贝聿铭与合作伙伴考伯和弗里德，这三个性格各异的人结成一个团结高效的工作团队。

就在一切朝着令人鼓舞的方向继续前进时，公司却遭受了一次近乎致命的打击。

1973年1月的一个晚上，经过夜间的一场大风暴，位于波士顿考帕列广场上，正在施工的汉考克大厦的立面遭到了严重的损坏。几十块双层落地玻璃脱落，还有好几百扇窗被飞落的碎片打坏。不得已，大厦所有玻璃脱落的部分都被镶上胶合板，引起建筑界的一片哗然，当地的民众则戏谑地称其为“胶合板大厦”。

而汉考克大厦正是贝聿铭事务所设计的。当地媒体幸灾乐祸地将大楼称为“世界上最高的木制楼”，在他们眼里，而这个事故正是野心勃勃、超越常规发展的公司的必然下场。其实事后的调查报告发现，问题的症结在于人造玻璃的缺陷。但不管怎么样，贝氏事务所的声誉当时遭到重创。贝聿铭的一位高级助手后来回忆，那段时间，他们坐出租车时甚至不敢提及自己是在为贝聿铭工作，否则就会遭受一顿嘲弄。自此之后，贝聿铭的事务所门可罗雀。贝聿铭晚年在回忆此事时说：“汉考克事件给我的事务所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因为谁也不会雇用一位被怀疑有失职嫌疑的建筑师。我成了建筑界不受欢迎的人。”

IBM曾于1969年雇用贝聿铭设计该公司的办公大楼。贝聿铭的初稿也得到了IBM高层的认可。然后汉考克大厦风波之后，IBM不再和贝聿铭联系，而悄悄起用了另一位建筑师。汉考克风波也让贝聿



梅隆家族的保罗·梅隆支持贝聿铭设计完成美国国家美术馆

铭与洛克菲勒家族失之交臂。1974年，洛克菲勒家族从四名候选人当中挑选了贝聿铭，来为其在公园大道上的亚洲协会设计一所艺术馆。艺术馆里将收藏洛克菲勒三世捐赠的价值1000万美元的东方艺术珍品。无论从哪个意义上说，贝聿铭都应该是最合适的人选。但是当贝聿铭提交了自己的设计方案后，却并未得到热烈的回应。其身边人怀疑，“洛克菲勒家族显然受到了汉考克大厦的影响”。无奈之下，贝聿铭以一封辞职信的方式体面地结束了双方关系。

20世纪70年代后期，整个美国经济开始衰落，建筑业也跟着萧条。贝聿铭很早就在建筑界里有一个“名声”——如果你要按照预算来来完成工作，那么就不能请贝聿铭。这个大形势下，贝聿铭的日子更加难过。这给贝聿铭的事务所以致命打击，甚至一度到了破产的悬崖边。

汉考克大厦进行了彻底的修整，1976年10月以崭新的面貌矗立在波士顿街头。后来还引发了汉考克公司、玻璃制造商以及贝聿铭事务所之间一系

列错综复杂的诉讼，诉讼纠纷一直持续到1981年，经过冗长的谈判后，当事各方都同意接受和解，承诺“永远不再公开谈论大楼有关问题”。不过后来，波士顿人们也开始接受甚至欣赏起汉考克大厦，还有人将之比喻为“波士顿的艾菲尔铁塔”。

汉考克大厦风波让贝聿铭经历了他人生的最大的一次危机。150人的事务所陷入困境。但是了解贝聿铭的人都知道，他笑容可掬的面容后面是坚强的意志。普林斯顿大学建筑学院前院长罗伯特·盖蒂斯说：“贝可以和他的建筑一样咄咄逼人。”

贝聿铭令身边的朋友印象深刻的，是他有一种处变不惊的超人冷静。他的合伙人伊森·列奥纳多曾经历过这样一件事：1960年5月的一天，贝聿铭和伊森一起到夏威夷出差。到了之后才知道，这一天，智利发生了大地震，而地震引发的海啸以每小时700公里的速度，横扫了西太平洋岛屿。仅仅14个小时，就到达了美国的夏威夷群岛。为了预防不测，他们预订的饭店已经把最下面的三层楼全部搬



肯尼迪图书馆

空。可是这却激起了贝聿铭的好奇心，他告诉伊森：“我得看看这玩意儿。”

凌晨3点钟，贝聿铭和伊森站在家具已经搬走的空荡荡的大厅里。此时，他们已经得知，几个小时前海啸已经撞击大岛的东海岸，造成几个人丧生。这个消息还是没有吓倒贝聿铭。他和伊森两人紧紧抓住“粗得张开双臂都无法抱住的水泥柱子”。海啸如约而至，但并没有想象中壮观，这还令两人有点失望。他们后来才知道，巨浪摧毁了夏威夷岛西岸的防波堤，淹没了大片的土地；不到24小时，又到达了太平洋彼岸的日本列岛。临太平洋沿岸的城市、乡村和一些房屋以及一些还来不及逃离的人们，都被这突如其来的波涛卷入大海。想起这一幕，伊森心有余悸：“我们很幸运，我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和什么东西打交道。”

1970年，贝聿铭夫妇带着小女儿，和朋友索尔古夫妇一起飞到柬埔寨游览吴哥窟。一天早晨，他们醒来时发现旅馆已经人去楼空。原来柬共军队发动突袭，夺取了从旅馆回金边的道路。人们正惊慌失措地忙于撤退。索尔古给法国使馆发电报，后者建议他们向西逃跑。于是贝聿铭一家和朋友丢弃行李，挤到一辆租来的小车里，在热浪和滚滚灰尘中行驶100英里到达泰国边境。索尔古的西方面孔可以提供保护，但对贝聿铭一家人来说就有点危险：一旦他们的护照被没收，他们就会被人误认为是逃亡的柬埔寨人。尽管其他人忐忑不安，但贝聿铭还有闲情逸致在路旁的水果摊停下来尝尝榴莲的味道。后来贝聿铭一家安全抵达曼谷机场，他们在卫生间洗完澡以后接着飞往东京。在那里找裁缝重新做了一套衣服。两天以后他们穿着高雅精致的服装出现在巴黎，除了稍微有点受惊的样子，还是一如既往地从容自若。

这副从容镇静的神情，同样出现在贝聿铭面对自己的职业险情时。肯尼迪夫人拜访时摆放鲜花的习惯一直延续下来，依然准时绽放；事务所里也照样飘荡着咖啡的芳香。他也不愿意解雇事务所150名员工的任何一位。与齐肯多夫共事的经历也让贝聿铭见惯了大风大浪。从他的表情来看，大家看不出任何惊慌不安的迹象。

“幸运的是，贝先生找到了海外市场。”黄慧生说。一个解释是，贝聿铭能跻身新加坡的建筑业是因为新加坡的银行家都认识他父亲。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贝聿铭已在着手建设海外华人金融集团

52层高的总部大楼。“来自地球另一端的项目一个接着一个，那个地方使我们在业务处于低谷时得以生存。”黄慧生说。同时，贝聿铭又在科威特、伊朗等中东地区开展业务。从小就在典型的中国大家庭长大的贝聿铭，对这种权威结构毫不陌生，与王公贵族们打交道，也游刃有余。让人惊讶的是，中东的那些权贵们很喜欢同贝聿铭打交道。在最艰难时刻，海外业务的拓展使贝聿铭事务所以维持生存。

从名流到大师

将贝聿铭从困局里拯救出来，从而也把他职业生涯“稳稳地推到了建筑界的大师”上的，是国家美术馆项目。

保罗·梅隆（Paul Mellon）被称为“美国最富有、最有学识的人物”之一，梅隆家族与卡内基、洛克菲勒家族一样，都是美国最富有的那个小群体。保罗的父亲安德鲁·威廉·梅隆（Andrew Willem Mellon）是一位银行家，曾三次担任过财长。安德鲁·梅隆又是一位艺术爱好者，1932年，他斥资665.4万美元从当时的苏联政府手中购买了21幅世界名画。这笔资金相当于苏联1931年向美国出口商品总额的1/3。80岁那年，梅隆在华盛顿捐赠了一座博物馆。尤为值得称道的是，这位谦逊的富豪并没有把自己的名字放进去，而是取名国家美术馆（National Gallery）。这在后来吸引了更多的人将艺术品捐赠于此。

上世纪60年代，保罗·梅隆决定筹扩建国家美术馆。协助他工作的国家美术馆副馆长卡特·布朗来自罗德岛，著名的布朗大学即来自他们家族。在他们物色的建筑师名单里有4人，其中两位是贝聿铭和路易·康——和肯尼迪图书馆项目一样，贝聿铭又一次与路易·康成为竞争对手。

路易·康不善言辞，言语晦涩，他会以这样的方式阐述自己独特的建筑哲学：“我问砖头喜欢什么，

从小就在典型的中国大家庭长大的贝聿铭，与王公贵族们打交道，也游刃有余。让人惊讶的是，中东的那些权贵们很喜欢同贝聿铭打交道。



1977年6月12日，肯尼迪家族三代人在马萨诸塞州立大学参加肯尼迪图书馆的奠基仪式

砖头说‘我喜欢拱门。’相比之下，贝聿铭显得优雅高效。他的事务所里都是常青藤名校毕业的建筑师，一位同行评价说：“康和贝许多地方很相似，但康是局外人，贝是贵族。”

梅隆与布朗乘私人飞机，亲自去视察贝聿铭的工作，艾弗森博物馆、德梅因艺术中心……飞机每到一个地方，贝聿铭的候选人地位就增强一分。特别是在国家大气研究中心，他们完全被说服了。他们视察了研究室，还在周围的平顶山上野餐。布朗回忆说：“我们急不可待地想进入那些充满赞美诗氛围的建筑，着手我们的研究。这些建筑有着准确无误的比例感和规模感——富于历史意义却又不失和蔼可亲。保罗·梅隆继承了他父亲的简洁风格。他转过身对我说：‘卡特，我很感动。’那时我知道贝就是我们寻找的建筑师。”

梅隆与贝聿铭一见如故，不知是否因为两人背

景相似——父亲都是银行家，父子之间感情若即若离。贝聿铭和梅隆后来也成为终身好友。

1968年，贝聿铭正式接手国家美术馆的扩建项目。他面临的挑战很多，首先这块地的位置比较特殊：在国会大厦脚下，宾夕法尼亚大道和国家广场交汇形成一个梯形场地。附近多是古典风格的重要公共建筑。除了特殊的三角地块外，贝聿铭必须考虑的，还有与西馆的呼应。“可能是因为我中国的一面，我将和谐置于首位，这是一个整体比部分更重要的地方。”

怎么处理这个特殊的地块，贝聿铭苦思冥想了很久而不得。就在他很焦虑的时候，有一次他从华盛顿乘飞机回纽约途中，突然灵光一闪。他用红圆珠笔在一张草图纸上画了一条斜线，连接了线上的两个点，画出一个大的等腰三角形——这就是后来的美术馆——和一个较小的直角三角形——后来的

视觉艺术高级研究中心。贝聿铭这一笔可谓快刀斩乱麻，将复杂的难题简化。而整个设计的主旋律正是图纸上的这些三角形。这条线成为东馆设计的绝妙发端。难怪后来有人形容说，贝聿铭有一种罕见的“把迷宫一般的问题在脑海中重新组织、直奔核心的能力”。

贝聿铭对几何图案的坚持，无论在审美上还是在具体的建设上，都对既有现实是一种挑战。有人曾预言，东馆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丑陋的建筑”，质疑人群中甚至包括在肯尼迪图书馆项目上对他坚信不疑的威廉·沃尔顿。但贝聿铭对自己的设计非常自信，他把东馆扩建比作还戴着牙箍的少女，要看它美丽的面容必须等到脚手架拆掉之后。

项目施工过半，已远远超出预算（国家美术馆最终造价为9440万美元），消息传出后，外界一片哗然。有人嘲讽贝聿铭的费用过高，说聘请贝就是“付钱，付钱，付钱”（贝聿铭的英文姓为Pei，与pay付钱发音相同）。但关键时刻，保罗·梅隆顶住了压力，他还是按贝聿铭的原计划进行建设。布朗回忆：“我们已经没有退路。贝说：‘让我们把这一切做好吧，这是千秋万代的事情。’于是梅隆说服其家族基金会为项目提供超支的几百万美元。”

由于没有以往项目时间上的压力，贝聿铭得以对自己的设计不断斟酌，精益求精。1977年4月26日，贝聿铭60岁生日那天，他的部下送给他一块做成东馆那些混合三角形形状的大蛋糕。从一开始，参与东馆计划的所有人都明白，他们的目标是创造人类历史上最高水准的建筑，不允许有丝毫的折扣。

1978年6月1日，国家美术馆东馆开幕。来剪彩的总统卡特称贝聿铭是“不可多得的杰出建筑师”。贝聿铭设计的精巧之处，在于它与国家美术馆原馆罗马式的建筑发生共鸣，却没有卑躬屈膝地模仿后者。建成后的东馆，在设计上有许多地方若明若暗地隐喻西馆，而手法风格各异，旨趣妙在似与不似之间。另外，贝聿铭与梅隆、美术馆馆长都有一种共识，他们不期望未来的美术馆高高在上，类若神殿使人望而生畏。而东馆很多空间的设计恰恰体现了这一点，它让美术馆摆脱以往的幽暗气质，更加亲民和明朗。开业两个月，就吸引了100万的参观者也说明了这一点。

贝聿铭自己对这个作品也非常满意，他说，国家美术馆项目可以排在自己最重要的建筑设计中的前三位。而这幕后最重要的推手保罗·梅隆更是由



我是豆包儿，
我做的纸艺花比真花还漂亮。

来松果，
和我一起做手工。

松果
一万个生活家



衷地自豪。他说：“我这一辈子，赞助创作了很多艺术品，但杰出的艺术珍品就是这么一个，这就是东馆。它雕塑般的墙体气势恢弘，比例和墙体角度新颖又精准细腻，好似现代建筑当之无愧的主角，矗立在舞台中心。当初是我最后拍板用贝聿铭的，我也永远都会以此为自豪。”

梅隆对贝聿铭的无条件支持，也是完成这个伟大建筑的一个重要因素。“当时贝先生设计了一个极其尖锐的角度（19度）。当时石匠们都强烈反对，说这个设计不可操作，这样石头会碎。保罗·梅隆先生就问贝聿铭：这个锐角很重要吗？贝先生回答：‘是的。’就这样做出了决定。这就是信任。贝先生并没有把这种信任当作理所当然，也没有轻易把他的责任转给客户。”珍妮特·斯特朗说。

有意思的是，东馆建成后，大家发现，游客最喜欢摸的，就是馆外面的那个尖角。开馆几个月后，它就被摸得脏成一片，贝聿铭请当时尚未撤走的建筑承包商清理干净；可几个月后，他们发现墙角又被摸脏了，不但如此，还形成了很清晰的上下两条线——很显然，上面是大人摸的，下面是孩子摸的。馆方就放弃了清洗计划。这也许从另一个侧面表明人们对这个建筑的亲近感。贝聿铭后来说他也说不出当时为什么不顾反对，坚持这个设计，“可能我也感到石材的尖角很诱人吧”。

现在看来，国家美术馆这个项目仿佛就是注定等待贝聿铭的。这个项目万事俱备：地处黄金地段，客户资金充足且富有眼光，时间充裕，让贝聿铭可以毫无局限地进行他对建筑艺术的尝试。一片赞扬声外，也有一些刺耳之声，有人气恼贝聿铭把国家美术馆变成“最时髦的郊区购物城”“一间奢侈的超级中转候机室”。但贝聿铭本人从来不反驳、不争辩。

值得一提的是，国家美术馆东馆项目，是在“现代主义”已经不那么“时髦”的背景下，赢得来自建筑界和普通大众的赞誉和喜爱的。在国家美术馆东馆从设计到建成的过程中，建筑界又发生了一次

“半个世纪以来，在设计、规划和技术方面他建立了丰富的内部专业知识。他总是非常慷慨邀请年轻建筑师，允许他们从头到尾参与整个建筑进程。”

激荡。1966年，路易·康的一位学生发表了一篇反现代主义宣言，“使建筑业受到了半个世纪以来最猛烈的冲击”。就像贝聿铭一代对古典主义装饰风格持反叛立场一样，几十年后，这一批现代主义信奉者和实践者又站在被质疑、被反叛甚至被颠覆的位置上。但“贝聿铭却仍默默地奉行他的有节制的机构现代主义风格，这种美学在达到成熟境界时可以被描述成以精确开工进行设计建造的抒情诗般的几何学”。贝聿铭很少参加建筑界的各种学术讨论会，他总是与这个圈子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

关于国家美术馆东馆项目的意义，正如《贝聿铭传》所说：“有人把贝聿铭贬斥为一次已经枯竭的运动的最后痉挛、向高层板状建筑和大规模混凝土大厦的大倒退。东馆是贝聿铭对这一切的强有力的驳斥。”贝聿铭用这座“充满激情的几何结构”为自己赢得1979年美国建筑师协会金质奖章。此时的贝聿铭已牢牢地树立起一代建筑大师的业界地位。

蓬勃的事务所

在建筑史学家珍妮特·斯特朗看来，贝聿铭建造了20世纪末21世纪初最重要的一些建筑，但他最大的成就还是他创建的公司。“半个世纪以来，在设计、规划和技术方面他建立了丰富的内部专业知识。他总是非常慷慨邀请年轻建筑师，允许他们从头到尾参与整个建筑进程。这在其他很多建筑事务所并不常见。很多人在贝氏建筑事务所一待就是几十年。这些经验丰富的建筑师能够去别的地方，可能拿到更高的薪水，但是他们绝不会有机会在一个如此具有创造力、拥有全世界如此多重要项目的环境中工作。”

珍妮特·斯特朗说，在建筑业，有些规模不大的事务所会接手一些小的项目，然后让个人发挥创造力；但在另外一些层面，是一些大的建筑事务所，更像商业模式运作，有能力接手一些大的建筑项目。“贝氏事务所则兼具两种公司的特点，它把小的工作室的艺术创造力和复杂建筑项目需要的专业知识和合作能力结合起来。”“一走进贝的办公室，就听到了悠扬的古典音乐，也就从开始感觉到了创造性的气氛。然而，其他的建筑师则习惯于在一种更严谨、更直接的氛围中工作，而这里的总体画风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样的气氛也吸引着更多有抱负的建筑师加入进来。虽然贝聿铭不喜欢大家称他为“老板”，

但在大家心里，他的确是一位好老板。

黄慧生是贝聿铭独立出来后招的第一个员工。黄慧生 1928 年出生于密西西比的玫瑰谷，是只会说英语的第二代移民。“当时贝先生毕业于哈佛，考伯也来自哈佛，其他人也大多来自藤校、MIT、哥大、普林斯顿，只有我和哥哥来自佐治亚理工。”提起这一点，黄先生也很自豪。不过他断然否认是因为自己的华人身份，恰恰相反，“贝先生希望打造一个国际化的事务所，他并不希望外人把它看成是一个亚洲人的公司”。

“贝先生是个十分有魅力的人，他有一个招牌式的笑容，无论和国家元首、大公司总裁、团队的建筑师还是合作者交谈，他都魅力非凡，让每个人都觉得自己特别，好像他们是房间里唯一的人；贝聿铭是一个卓越的沟通者。他对人际关系有一种非常敏锐的感受力。从很早开始，贝先生就坚持，要选择客户而不是项目。事实上，他的确也拒绝了一些项目。基于相互尊重和信任的私人关系，总是非常重要。”在贝氏事务所工作了 18 年的珍妮特·斯特朗感受颇深。

“但是建筑是一项非常实际的事业，你必须要有预算，有交工期；贝先生也是一位非常实际的人。特别是许多大项目，你不能浪费时间，你必须同时满足计划期限和预算。”黄慧生说，因为事务所业务的不断增加，贝聿铭通常会将这些项目分到下面来做。在项目进行到关键时刻，他会听取意见。“他很忙，不可能从头到尾盯一个项目，但是他有一种迅速抓住问题本质的能力，快刀斩乱麻，解决问题。贝先生的特别之处是，他在 MIT 学过工程，所以他懂得工程师的语言。他可以同结构工程师交流，影响他们、挑战他们。如果你不懂工程，就会被他们所压制。”黄慧生承认，“贝先生无疑是一位天才，是很有能力的人。跟他一起工作非常有挑战性，你不能仅仅说：‘我喜欢’或‘我不喜欢’，你需要为自己的观点辩护。比如你可以说你不喜欢他在卢浮宫设计的金字塔，他说：‘好，那你会怎么做？’”

在贝聿铭身边工作了 40 余年的黄慧生，对贝聿铭有着深刻的观察。“诚实地讲，他喜欢同能最终有决定权的人打交道。他有时与下属在一起工作，并没有那么耐心。他知道他们不是最终做决定的人，这是浪费时间。创造一个平地而起的项目，并不容易，所以他急于同能够深刻理解问题的人交流：‘告诉我，你的公司是什么样子的？告诉我，谁负责？’贝先



贝聿铭在肯尼迪图书馆内留影

生有一句名言：我想同顶尖的人对话。贝先生对某个领域做得好的人非常欣赏，这个顶尖的人可以是马友友，也可以是医生、理发师、鞋匠、家庭主妇……不管你在哪个领域，只要你做得好，他就非常欣赏你；如果你是马友友，也会赢得他的欣赏。”

“贝先生很少批评人，你知道，中国文化里有很多诅咒的话，但他从来不会说这些话。这是他的教养。一位资深的业内人士向他汇报一件事，等到那个人离开，他不说这很糟糕或什么，他说：毫无价值。这是我听到的最严厉的话。诚实、单纯、低调，这是他的处世哲学。他对我像导师一样。我也觉得自己很幸运与贝先生工作。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他是世界级的建筑师，贝氏事务所也是世界顶尖的设计事务所，在亚洲和欧洲都做了很多项目。很少

故宫周围的城墙非常令人震撼，但如果从高处看下去，紫禁城的气势就消失了。任何过高的建筑，都会使人们居高临下地看着故宫，如果这样，中国一个重要的旅游景点就会被毁掉。

有人像他那样，改变了一个城市的天际线，但他做到了。”

对出身阶层迥异而造成的那种微妙距离，也许只有华人出身的黄慧生能敏感体会到。“我们很少有私人的谈话，即使在外面出差的时间。贝先生有自己的朋友圈。用西方的话说，他属于‘蓝血’阶层——就是出身于富贵家庭。与我的阶层不一样。我们两个人可以做一个很好的对比：他出生在中国一个富裕家庭，而我生在密西西比一个贫穷的华人移民家庭。所以我能感觉到我们之间的距离。他的朋友圈全是艺术家、收藏家……他们了解艺术，知道关于艺术的一切。”

“你问我与他亲近否？不。我过了很久才感觉与贝先生工作自在些。我是亚洲人，虽然我在中国待的时间并不长，但我也受东方文化的影响，比如说尊重长者和权威，不管是家庭里的，还是工作上的。虽然现在这些传统也在慢慢丧失，但还是有。我到了贝聿铭事务所之后，我知道他是我的老板，所以我对他也表现出了那种东方式的尊重，贝先生也能感受到我的态度。这与周围的美国同事不太一样。他们即使知道那是他们的老板，他们也不会像亚洲人那样。”

在黄慧生眼里，贝先生是一个注重隐私的人。“他很少谈及家庭和孩子。不像西方同事，一起喝酒、谈棒球、谈孩子……”黄慧生在很多场合也遇到过贝聿铭的夫人陆书华，“她举止端庄，无论什么时候看见她，她的背总是挺得笔直。我太太以前开玩笑说自己永远挺不了那么直。”

东西之间

随着贝聿铭在美国建筑界的名气越来越大，他的东方背景和家族故事在更广的范围内被传播和熟知。而他与建筑界、文化界、商界乃至政治界主流话语圈或远或近、或疏或密的关系，也使得他的身

上笼罩了几分神秘色彩。有人形容他“对权力的各种微妙关系的敏感程度，可与声呐相媲美”。贝聿铭性格中哪些特质是东方的，哪些又是西方的，这也成了很多对他感兴趣者闲谈的话题之一。

“他们并不会把他看成一位亚洲人，而是一位有天分的、敏感的最顶尖的设计师。但某些时候，他的东方背景也会有影响。当初香港汇丰银行选择建筑师时，也邀请过贝聿铭，但他拒绝了。他知道，当时香港作为英国殖民地，对方倾向的很可能是英国人而不会选一个华人。后来证明果然是。所以种族的确是有影响的。但是澳大利亚在选择首都时，他也被邀请担任评审员，而他做出的评判对于最终的决定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黄慧生说。

贝聿铭曾对他的朋友说过这样一段话：“我很西化，这没错。但这远非事情的全部。我对两个世界的人都很了解，和他们在一起都很自如。但说到底，我和西方人之间还是有一道屏障。虽然没有竹帘那么厚，但这道薄薄的屏障最后还是把我们隔开了……东方人和西方人的差别，比俄罗斯人或者中东人等任何其他种族之间的差别都要深刻，这也许是因为我们的历史太悠久。我们的文明可以追溯到那么遥远的年代，比任何国家的都要遥远……”贝聿铭又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我比你想象的要中国化得多，我猜我没有在你面前表露这一点。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故意这么做的。”

1974年，贝聿铭在时隔近40年后重返大陆；1978年，贝聿铭被邀请回国，对北京城市发展和规划提出些建议。

“那时候刚开始改革开放不久，中国政府想发展旅游业挣外汇，希望建造一些新的酒店。邀请贝先生回国。我是先头部队，提前两三天到了北京。我们否决了好几处选址，因为在那些地方建酒店，会伤害原有的人文景观。有一天，当我行走在景山公园北边时，我意识到尽管在地面上看，故宫周围的城墙非常令人震撼，但如果从高处看下去，紫禁城的气势就消失了。任何过高的建筑，都会使人们居高临下地看着故宫，如果这样，中国一个重要的旅游景点就会被毁掉。于是我在一张纸上画了示意图，让大家站在故宫北门延展的中轴线上，并建议，不要在附近建高层建筑。两三天后我们交换笔记时，贝先生看到了这个想法。而这个条件所限制的视野角度，就是北京现在在故宫附近实行的政策。现在这条线被称为Pei-Cobb-Freed线，或者Pei线，因

我为这家公司工作，所以这么叫也是准确的。”黄慧生说。

“许多重大而复杂的项目找到贝先生，部分是因为他处理人际关系的策略和他的能力能够克服那些最困难的障碍。他从来不会在没有事先做大量研究之前进入一个项目，只有这样他才能理解问题所在，能够从文化、历史、政治、社会方面去评估他们。”珍妮特·斯特朗说。

1990年，73岁的贝聿铭从事务所退休，此后，他在欧洲、亚洲和中东等地接下了一系列小项目，这些项目全由贝聿铭亲力亲为。“从1990年起，我不那么在乎建筑物的造型了。设计一个独特的建筑造型对我不再是件难事。去了解认识我所做的才是很大的挑战，我开始研究各种文明。”他只接手自己感兴趣的项目，追求一条商业信息没有那么浓郁的艺术线路。他退休后的作品分布世界各地，包括卢森堡、德国、英国、日本、中国和卡塔尔。令人惊叹的是，晚年的贝聿铭仍然保持旺盛的创造力。建筑评论家卡特·怀斯曼说：“贝聿铭是一位以工程学为根基的现代主义建筑师，与此同时，他更牢牢地抓住艺术和文化的灵魂。”

贝聿铭被称为“最后一个现代主义大师”，有人评价，在使现代主义成为美国公共机构的官方风

格这方面，贝聿铭所做的贡献超过了任何别的建筑师。但贝聿铭本人似乎对冠在身上的各种标签毫不在意，也很少公开表达他的建筑哲学和建筑观点。他参加建筑师行业的会议的时候，很多建筑师热衷于表达自己的建筑观点和理念，乃至批评同行的东西，贝聿铭几乎总是不置可否，不表达自己的看法。这也引起了一些建筑师同行的不满，说他圆滑世故。但贝聿铭只是说：“我不属于任何流派，也没有投入任何建筑运动，吸引并群聚追随者特别是青年建筑师好让自己成为有品牌的建筑师，那不是我的方向。”

“贝聿铭没有固定的风格，这意味着他不会带着‘这个建筑应该是怎样’或者‘要用怎样的材料’这样预先的想法去开始一个项目。几十年来，他持续某种坚持和纯粹，决不加入类似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或者其他20世纪的‘主义’的流行趋势中。相反，他坚持现代主义的审美和一致的几何逻辑，非常精确。‘几何’是工具，而不是目的。”在珍妮特·斯特朗眼里，贝聿铭并不是那种口若悬河的理论家，而更像是一个有着基本话语的哲学家。或许，贝聿铭把有关自己的一切都交给了他的作品去解释，“他相信他的建筑自己能说话”。☑

（感谢实习记者孙大卫对本文的帮助。参考书目：《贝聿铭全集》《贝聿铭传》《贝聿铭谈贝聿铭》）

最想念的 年货

年货、年味就是乡愁，就是亲情，而亲情永远不过时。

新的一年、新的一个春节即将来临的时候，《三联生活周刊》推出一个充满乡情、亲情，充满年味的文化产品

——《最想念的年货》

1554 1005-3403

生活 三联生活周刊



贝聿铭的儿子贝礼中（左）和贝建中

“在今天这个时代， 他仍然会是一名伟大的建筑师”

文 / 李菁

约定去“贝氏建筑事务所”(Pei Partnership Architect)采访的那天,早春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雪袭击了纽约,正担心采访是否会顺利进行,贝建中和贝礼中却相继如约而至,一边抖落身上的雨雪,一边为眼下的不便表示歉意。谦逊,温和,有礼,这是兄弟俩予人的共同印象。

贝聿铭给三个儿子分别取名定中、建中、礼中,又给唯一的女儿取名“莲”,“父亲给我们取的名字都很中国”,不过几个孩子中,只有外形最酷似父亲的贝建中可以说中文。“父母当年以为我们早晚要回到中国,所以没有特地教我们说中文。”贝建中解释。有趣的是,在熟悉他们的建筑圈里,建中(Chien Chung)和礼中(Li Chung)的大名被提及得不多,反倒是自小父母对他们的昵称Didi(弟弟)和Sandi(三弟)成了广为人知的标签。

贝聿铭的三个儿子都算是“子承父业”,去世的长子贝定中是城市规划师,贝建中与贝礼中都成为建筑师,也在早期参与过父亲的很多大项目,直至1992年兄弟二人创立“贝氏建筑事务所”。事务所迎面的墙上有一幅大照片,贝建中提醒说,这是他们负责的中银苏州分行。从苏州到纽约,演绎了一个家族的故事,也成为近代中国故事的一个缩影。

我的父亲母亲

三联生活周刊: 贝聿铭先生马上要过100岁生日了,请问他的身体状况如何?

贝建中: 他的身体还好,不过毕竟是100岁的老人了;他还可以走路,但走不了太多。我们每周都会去看望父亲,他的状态还好。

三联生活周刊: 贝聿铭先生回忆说,因为他的父亲(贝祖诒)比较忙,他幼年时跟母亲关系更亲近。你们是在什么样的家庭环境下长大的,是西式的,还是传统的所谓“严父慈母”的东方模式?

贝建中: 我们完全是在西方教育下长大的。我的大哥是1944年出生的,我是1946年出生的。我和哥哥、弟弟之间说英文。父母并没有特别教我们说中文,因为他们想早晚回中国,到那时我们自然就会说中文了。我的父亲来自上海、苏州,所以

父亲会说上海话,母亲来自天津,她讲普通话,但有趣的是,他们都说广东话。我到妈妈家那边,听他们说普通话;到爸爸家这边,听他们说广东话,回忆起来很有意思。

贝礼中: 我们虽然是在非常西方的环境中长大的,但是在家庭中,那种人际关系还是非常传统的中国式的。我们非常尊重父母和儒家的思想,这都是非常东方的观念。我们总是经常一起聚餐,即使我们都结婚了,我的母亲也会在周末将大家召集起来,吃饭或是进行其他活动。母亲去世后,我们依然常与父亲聚会。这种亲密感,正是家庭的重要所在。当然,从另一方面讲,我父母都经历多年的美式教育,他们英文都讲得极好,可以说非常好地融入了美国的生活,而这种适应生活环境的能力,也帮助了我父亲的职业生涯。

三联生活周刊: 我知道你们的母亲不但出身优



贝聿铭与夫人陆书华

渥，也同样毕业于哈佛大学。为了贝聿铭先生的事业，她最终放弃了自己的事业。你们的父亲曾经说她是他“最好的顾问”，母亲对父亲的事业、对整个家庭意味着什么？

贝礼中：我非常高兴你问到我母亲的事，我相信父亲对此也会很开心。在很多家庭，女性角色都被丈夫所笼罩。在我们的家庭中，父亲成功的前提就是我母亲的参与。我父亲总是在外忙碌，那时候我们上寄宿学校，母亲与我们很亲，但另一方面，又让孩子们与父亲有一点距离，以让他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工作。母亲也常常将我们聚在一起，夏天，我们会在郊外一起度假。

我的母亲是非常优雅、非常知性的一位女性。她从不惧怕说出自己的想法，这种直率对我父亲是很有帮助的。因为母亲也有建筑的造诣，当年在哈佛学的是景观设计，所以她知道建筑师这个行业有多辛苦。她有极好的品位，也总能将自己的好恶传达给父亲。我确定，她也帮助了父亲早年间的工作，而且给予了父亲极大的信心和支持。我父亲非常相信我母亲的眼光。他们互相尊重，十分恩爱，同时也都很有幽默感。我敢说，他们可以说是天作之合。

在时事、政治这些方面，我母亲要比父亲参与得多。她非常进步，也热心参与公共事务。她认为

自己有责任，也对世事有自己的看法；我的父亲更加内敛，他很少在公开场合表达意见。其实他与我母亲基本上有共同的价值观，但他太出名了，所以必须对自己的言行更小心些，因为必须与许多人打交道。

贝建中：母亲的兴趣与父亲的兴趣相同，她对父亲的职业参与得比较多，父亲也相信她的眼光。从这一点上说，我不觉得母亲被父亲“遮蔽”。

三联生活周刊：对祖父贝祖诒还有印象吗？

贝礼中：有印象，有印象，虽然我们并没有共处很长时间，但我们有非常温暖的牵系。我爷爷那时住在纽约，我们每年都能见到几次。我祖父对待我们就像我父亲对待他的孙辈一样，非常温暖慈爱，他总是笑呵呵的。

我的父亲和我的女儿关系非常好，他在她面前一点也不严厉，她也喜欢他，他们见了面，总是亲啊亲啊……在旁边注视这对爷孙俩真是很美好的事。我的女儿是第三代中最小的，是我唯一的孩子，今年刚19岁。她出生时，我的父亲已经80多了。我当时不知道父亲还有多长时间。我妻子总是陪伴他，而我的妈妈，也和我妻子非常亲近。你难以想象，这么多年我们每周都带女儿去见爷爷。他们关系非常亲，我相信我女儿是孙子辈当中与他最亲的一个。

建筑师之路

三联生活周刊：1952年，贝聿铭先生在纽约郊区卡托纳（Katonah）为小家庭修建了一座私人度假屋，这是他的第一个私人住宅，是一座完全现代主义的建筑。你们对“建筑”的第一个概念是否来源于此？

贝礼中：是的，它的外形非常独特。也可以说是我第一次认识现代建筑和我父亲工作、想法的窗口，因为我们观察了施工的全过程。虽然我不记得我们什么时候决定要做建筑师，但我想这栋建筑一定起了影响。

三联生活周刊：与父亲一样，你也毕业于哈佛大学建筑系。对你来说，成为建筑师是一件很自然的事吗？

贝礼中：不，完全不……但另一方面，当我最终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我的老师们非常鼓励我，因为他们看到我的才能，并鼓励我实现它们。其实我在大学时，有很多机会去教书。当然做一名建筑师最终是我的决定，我并不后悔，这是个神奇的领域。我们的经历比我父亲看起来更困难些，但我热爱它。

三联生活周刊：贝建中先生在哈佛大学原本是学物理的，但后来也像父亲一样成为一名建筑师。这背后有什么故事，是父亲有意识地培养你子承父业吗？

贝建中：这是一个复杂的故事。其实我很喜欢物理和数学，而且早期我也上了很多计算机科学的课。我从那里面学到了不同的思考方式和解决问题的方式，我们叫作“科学方法”，这与其他一些建筑师的思考方式很不一样。当你学习“科学”的时候，它是一种非常缜密的方法论，我想这对成为一名建筑师也是非常必要的，但不是每个人都受过那种训练。

我成为一名建筑师，可能也与东西方不同的教育制度有关。当我在哈佛学习的时候，除了专业之内的课程，还要选其他领域的课。因为我对绘画之类的感兴趣，所以我也选了很多与建筑、艺术有关的课——我妈妈在卫斯理的专业是艺术史，所以我也选了很多艺术史的课。我后来发现，我上了很多与建筑有关的课。也许从某种角度看，我从物理专业到建筑专业，有点奇怪，但从哈佛大学的角度来看，又没有那么奇怪。

三联生活周刊：在你们成长过程中，什么时候意识到父亲是一位“大人物”的？

贝礼中：上世纪60年代，我十四五岁时，当时父亲在费城主持一些建造住房的工程，我看到他设计的建筑，那时就有一种非常自豪的感觉。在高中时，父亲成了报纸上猜词游戏的人物，特别是在肯尼迪图书馆项目完工之后，他的名声更大了起来。当时我还在寄宿学校，突然就发现父亲上了头版，每一张新闻报纸的头版。那时学校里的每个人都知道他是我的父亲，那时我意识到为什么他被如此地尊敬。

三联生活周刊：贝聿铭先生在建筑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对你们是一种压力吗？你们是否介意外界总是拿父亲的成就与你们的工作做比较？

贝建中：压力一定是有的，但压力不是坏事。我们并不是想与父亲竞争。正如刚才说的，优势也可能是劣势。我是乐观主义者，在我看来，做一名成功的建筑师，必须是一位乐观派。我习惯于看“作为贝聿铭的儿子”所带来的正面，而不是它的负面。我想压力是好事，它总是让我们做得好上加好。

贝礼中：这是一种躲不掉的压力，但我学会了如何与它相处。这是一个现实，我并没有感觉父亲的名声对我而言是一个负担。不过我非常小心地不让自己陷入他的名声中。他的成就不是我的成就。有的人会“子以父贵”，但这不是我的人生观。我以为，我们每个人都要为自己在同行中赢得尊重，他的成功激励我，让我做到最好。这的确是我唯一能做的。

三联生活周刊：作为一名建筑师，你们从父亲身上学到了什么？

贝建中：建筑涉及方方面面，这也是我最喜欢它的原因。在事务所里，我们有在某些领域非常专业的人士，但是成为一名领导者，必须要知道一切事情，当然你不必对每个细节都了解得如专业人士一样，但建筑师必须给其他人以指导，包括与他们合作的工程师，比如结构工程师、空调工程师……如果你懂工程，工程师才会尊敬你。你要用足够的知识，去挑战他们，让他们做得更好。

从这个意义上讲，建筑师是最后一个“你必须知道一切”的行业。在西方文化里，我们称之为“文艺复兴人”——就像文艺复兴时期的米开朗琪罗，他既是一个绘画家、建筑师，也是雕塑家、诗人，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似乎了解一切知识。今天是不可能了解“所有事情”的，但建筑师，我会认为是这个时代最后的“文艺复兴式的职业”。在我眼里，父亲就是这样一位了解很多方面知识的建筑师。

贝礼中：父亲的确有一种与众不同的综合能力。

这一部分是由于他的文化背景，一部分是因为他总是对历史、文化和人们都非常感兴趣，他为了理解这些背景，沉浸其中。在他开始设计之前，他必须了解这些背景知识。我也能感受到这些，但我并没有他这样的能力。

父亲设计多哈的伊斯兰艺术博物馆，就是可以解释这种能力的完美案例。除此之外还有法国的卢浮宫、日本的美秀博物馆……这些都要求他必须理解一种不同文化的本质和精髓。所以他旅行，阅读，学习，研究询问专家，向别人寻求意见，然后再去实地勘察。他曾经去阅历许多方面的事情，然后提炼其中的要素。他将建筑看作一种提炼的过程，它应该非常纯洁、清晰，这是他的追求。

这是一种融入各种环境后发现精髓的能力，这对他做公共建筑非常有帮助——父亲职业生涯的大部分设计都是公共建筑。我期望自己也能够做到，但我不认为我有这样的能力。当然，父亲也非常幸运，他职业生涯的大部分客户都是非常棒的人，他们总能给他很大的空间和自由。比如肯尼迪的项目、华盛顿的国家美术馆，还有德国总理科尔、卡塔尔酋长……他们都愿意让父亲可以独立工作，父亲也总能交出很棒的作品。

三联生活周刊：你们会称父亲是天才吗？

贝礼中：是的，我会称他为“天才”。我不轻易用这个词，但我会这么形容他，或者说，他有超凡的能力。我之前提到了融会不同文化的能力，还有以知识分子的方式去观察、阅读和探索。他总是很有好奇心，又很有自制力，同时又很努力。他具有从现象中抽取本质的能力。有很多建筑师能想出奇妙的点子，但是切入核心，将想法提纯，这是特殊的才能，并不是每个建筑师都能做到。他也许是唯一一个。

很多人并不能像我父亲一样欣赏历史的妙处，他们认为新潮时尚才是建筑的核心。这不是我父亲的设计理念。他非常想理解建筑如何成为一个延续的整体的一部分，一个建筑成为永恒的、持续的历史的一部分，才是好作品。我们总是注意永恒的（timeless）、持久的（enduring）、必需的（inevitable），这些是我总会遇到的词语。作品的力量基本却又强大，才是持久的本质。这些词我用过太多次，但它们真的适用于我父亲的作品。

三联生活周刊：与其他著名建筑师相比，贝聿铭先生非常特殊的一点是，即使90岁时也依然非常活跃，还设计了很多作品。是什么让他仍然保持如

此旺盛的创造力？

贝礼中：也许他的能量来自于他的好奇心，只要你对生活好奇，你看到一件事，就想理解它的本源。如果你抱有这样的好奇心，做任何事情，你都会想找到更好的办法。也许是这种特性使父亲更年轻了。你可以从他最近的建筑中看出来。

中国之缘

三联生活周刊：贝礼中先生现在负责旧香港中银大厦的翻新工作。众所周知，你的爷爷贝祖诒曾是中银香港分行的创始人，你父亲设计了香港中银大厦，对你来说，担负这样一个工作是不是有一种特别的使命感？

贝礼中：这项工程到今年秋天差不多能完工，而2017年正是中银香港的100周年纪念。这个项目开始的契机，就是我祖父上世纪50年代主持修建了这栋建筑。这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工作。这使中银对我们而言，不像是客户，更像是老朋友。我们非常感激中银依然选择我们来完成这个项目，这是我们家族的荣耀。我每次告诉父亲关于香港项目的事，他都非常关注它的进展。我曾在80年代帮助他设计如今的香港中国银行大厦，多亏了中国银行的细心维护，这栋建筑至今依然状况极佳。它依然是香港的地标性建筑，也是中国银行在香港的象征。他们对这栋建筑的初心和对我们设计理念的理解，也显示了他们对我们的尊重。我父亲并未对这次的项目提出许多具体的建议，但他展现出的兴趣和信心，和对原本设计理念的了解，让我们知道应该如何改进这栋建筑。

三联生活周刊：贝聿铭先生是在中国出生并长大的，东方文化的影响对他来说是与生俱来的；而对你们而言，你们在美国长大，你们如何获得东方的文化营养？

贝建中：我们当然是典型的在美国长大的华人，但在美国长大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对中国文化不了解。我们家的情形是这样的：我父亲的大家庭在纽约，我母亲的大家庭也在纽约。在中国传统中，家庭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经常聚在一起，我的叔叔、阿姨都会来；另外，我的父亲从大学起就有很多中国朋友，他们经常聚会，吃中餐。我想我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就是从这一点一滴开始的，并不需要刻意去学。我年轻的时候，中国大陆的大门还没有打开。1969年，我在台北生活了3个月，那是我能接近大陆的

最近的地方。当然一代一代继承得越来越少，像我的下一代，他们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就比我少了不少。

贝礼中：我们并非在中国长大，我也不能说中文，我对此也很失望。我和哥哥都有西方的思想，但私底下的交流和家庭的生活方式，都是中国的。我认为这也是我们基因的一部分。当我遇到中国客户时，不会像西方人与中国人那样交流和做生意。我试图交流时更温和，我对客户更尊敬和友好，我试图做到这点。因为我观察过我父亲和人交流的方式，他可以柔中带刚。

三联生活周刊：当你们1992年决定从父亲的事务所“独立”出来、自己成立事务所的时候，父亲给了你们什么建议？

贝建中：之前我们在父亲的事务所工作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来我们决定自己做。我去见他告诉他这个决定，他说：“好吧，如果你决定了，我会尽量帮助你们。”但他并没有说：“这是一个好主意！”或者“不，不，这是一个糟糕的决定！”他只是说会尽力帮助我们。

三联生活周刊：你们的事务所现在发展状况如何？互相之间是如何分工的？

贝建中：我们是一家中型事务所，规模并不算很大。我有我的团队，三弟有三弟的团队。我们的相处原则是这样的：我可以对他个人进行评论、建议，他也可以对我评论、建议，但我不会评价他的团队，他也不会参与我的团队。即使是客户，他们也想明确地知道自己是在同哪一个“贝先生”打交道。如果混在一起，团队糊涂，客户也糊涂。如果说分工，我在医疗建筑上面投入得更多一些。

三联生活周刊：我注意到你们的事务所有很多与中国的合同，你们会把业务有意识地向中国转移吗？

贝建中：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建新建筑的需求非常强烈。但建筑数量太少。他们建了很多标准化的建筑，所以中国建筑师们接受的训练太少。用标准规模，标准的窗，标准的房子……看每个建筑，都差不多。我们当时尽可能给中国带来一些新鲜的东西，但如今，中国新一代建筑师与老建筑师不一样了，中国市场越来越大。我从父亲那里学习到的一件事是，我们应该帮助中国。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到中国。我们希望与中国方面紧密合作，并不仅仅是与我们的客户，还有中国的建筑师们，我们一起工作，也让中国的建筑师们了解我们和西方

建筑师的工作方式。1976年我与父亲一起参与了香山饭店的项目。40年过去了，现在中国的建筑师们越来越优秀。

在我看来，建筑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你希望它能尽量长久。可是中国的建筑物不太一样，它们往往不会“活”很久。比如在我帮助完成规划设计的某个城市，2013年的建筑都会被认为“老”了。这很多是因为设计一幢建筑时，其他因素考虑得不够，过了几年，就暴露出许多不合适的地方，被拆掉重建，这当然是一种浪费。

贝礼中：我们对中国有很大的兴趣，希望能帮助中国发展，这是我们在中国投入如此多的精力的原因。我们接受了西方教育，如今将我们的知识、技术和建筑实力带到那里，促进中国的进步。从90年代中期开始，我们目睹了中国的崛起。中国的建筑水平确实提高了——虽然还没有达到他们期待的那样。虽然我们对有些做法不赞同，但我们很高兴能够在中国工作。

三联生活周刊：外界好奇的一点是，贝家第三代还会继续选择做建筑师吗？如果那样的话，将是一个传奇。

贝建中：连续三代都从事一个职业，这当然是一个很好的故事，但事实上这很难。孩子们都长大了，由他们自己决定自己的职业。

贝礼中：我的女儿刚刚19岁，她还需要学习很多。就像我父亲对我一样，我不对她施加太大的压力，或告诉她应该做什么。我希望她找到自己想做的事情，并热爱它。我希望能为她提供最多的机会，但她又能自主地做出选择。

三联生活周刊：作为一名同行，你怎么评价父亲？

贝建中：在我眼里，在今天这个时代，他仍然会是一名伟大的建筑师，即便他是在70年前接受的关于建筑的训练。对一个建筑师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是眼界。而在我父亲的建筑里，他的眼界是一种超越时代的永恒。有的建筑师设计出来的作品，你一眼就能看出，噢，这是上世纪80年代的，这是2000年的，因为这就是他们在那个年代竭力想做的。建筑不是时尚，今年流行这个，明年流行那个……父亲的建筑风格，也是我们希望能达到的目标，就是这种超越时代的永恒。而创造伟大的经典，这才是一个建筑师的本质。■

（感谢实习记者孙大卫对本次采访提供的帮助）

重返中国：另一种现代路径

主笔 / 贾冬婷



1

“他会用一种贵族气十足的方式谈论他的祖先和苏州的石头园林。如果我是名中国绅士，我也会这样做的。为什么不呢？”贝聿铭的同时代建筑师菲利普·约翰逊曾不无羡慕地说。

1974年，贝聿铭在离开40年后重返中国，他记忆里的家族和园林熟悉又陌生，建造现代中国的命题也变得复杂。从香山饭店到中国银行，再到苏州博物馆，他对历史和现实联系的重建，意味深长。

香山饭店：一次超前实验

1971年4月，中国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问北京。听到这个消息后，贝聿铭在工作室里激动地来回走动。他对在场的人说：“你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两三年后你们就能去中国啦！”

这一天果然很快就来了。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1974年4月，美国建筑师协会就受邀访问中国，贝聿铭身在

其中，这时距离他17岁时离开已经将近40年了。对贝聿铭来说，中国完全是一个新的国家了，他家族曾经的园林也成了公园。那时候，中国正处于意识形态变化的边缘，邓小平在第二年重新登上了政治舞台，开始对西方的事物兼收并蓄，贝聿铭被视为一座桥梁。于是在1978年，副总理谷牧邀请贝聿铭第二次来中国，希望他为城市规划和建设提供咨询，借大兴土木迈入现代化。但贝聿铭有另一层担心，他已经看到，伊朗和埃



1. 香山饭店是贝聿铭探索中国现代建筑语言的第一次实验
2. 香山饭店室内和室外是相通的
3. 香山饭店的顶峰采自云南石林
4. 园林里，窗户即是画框



2



3



(本组照片：蔡小川摄)

4

及等发展中国家盲目进口，把精华和糟粕一起接纳，他不希望古都北京也步其后尘。他对谷牧说出了担心，建议不要在故宫附近建高楼，以保护紫禁城金黄色琉璃瓦屋顶上的开阔远景。他在清华大学做了一场演讲，也提出了类似观点。但是，保护历史遗产并不是致力于现代化的中国的首要企望。尤其是建筑系学生们，他们正摩拳擦掌地想要把西方摩天大楼在中国复制。贝聿铭说：“学生们对我的讲话都感到失望。他们指望我会给他们讲玻璃幕墙、设计样式和高层建筑的最新潮流，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可我却告诉他们不要只看未来，也要看看过去。”

谷牧直接向贝聿铭提出了邀请，希望他“在中国留点纪念”。中国政府一开始的提议是在长安街设计一座高层建筑，贝聿铭谢绝了。他坚持认为，在故宫周边建高层，将是一个错误。“我的良心不允许我这么做。如果你从紫禁城的墙向上望去，你看到的是屋顶金色的琉璃瓦，再往上望就是天空，中间一览无余，那就是使紫禁城别具一格的环境。假如你破坏了那种独树一帜、自成一体的感觉，你就摧毁了这件艺术品。我无法想象如果有一幢高层建筑像希尔顿饭店俯瞰白金汉宫那样居高临下俯视紫禁城……”他想另选一址，以便可以设计一座很传统的建筑，北京的旅游机构——第一服务局提议在他们管理的某一座城郊公园里中建一座低层饭店。离圣诞节还有两天时，他们将贝聿铭和他的儿子贝建中带到北京西北郊的香山，那里给人一种宽广的森林野趣之感，是远离闹市喧嚣的另一个世界。在贝聿铭眼中，这个皇家园林遗址上覆盖着一层薄薄的白雪，凉亭、宝塔分布得错落有致，俨然一幅古代画卷。他不再犹豫：“我们就在这儿建吧。”

贝聿铭把香山当作一个探索“中国现代建筑语言”的实验室，这种建筑应该既不是西方的形式，也不是古代中国的形式，他称之为“第三种风格”。他仔细观察了北京的建筑，发现在几十年苏联影响之后，国际风格已经呈泛滥趋势，随之引发了连锁的民族主义反击，一些西式建筑被硬加上了中式大屋顶。“太荒唐了！就好像穿着西服的人戴上了斗笠。中国建筑已经走上了死胡同。现在有两个方向，一个是盲目仿古，一个是全盘西化，哪一条都走不通。我想探索一下，中国传统究竟是否还扎根于老百姓的生活中。如果是，那么或许中国建筑师就不用靠西方国家而能找到自己的艺术语言。中国历史悠久、文化深厚，中国的建筑应该自然而然地生根于这样的历史文化。”

在随后的行程中，贝聿铭去了很多城市，也重游了贝家曾居住的园林和庭院，重温他过去生活的许多组成部分——飞翔的屋檐、华丽的屏风、画框般的窗户和涓涓的流水，从中发现了一些对多数人生活仍有意义的东西，一些能使本土建筑语言成为可能的东西。“从某些方面说，它们已经在那儿了。这些50年前、100年前建造的东西，至今仍是站得住脚的。当然，1978年后，中国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今天我是否还会用同样的方式去设计香山饭店呢？或许我仍会这么做的。”他将设计前的这些准备工作形容为一种“心灵探索”：“中国建筑与自然的关系非常重要。在西方，窗户就是窗户，要放进阳光和空气。但对中国人来说，窗户是镜框，有时是花瓶形状的，有时是竹子形状的，有时又是扇形。在窗子的一边可能是一些嫩竹，竹的后面是一面白墙，创造了一幅美丽的图画。我的设计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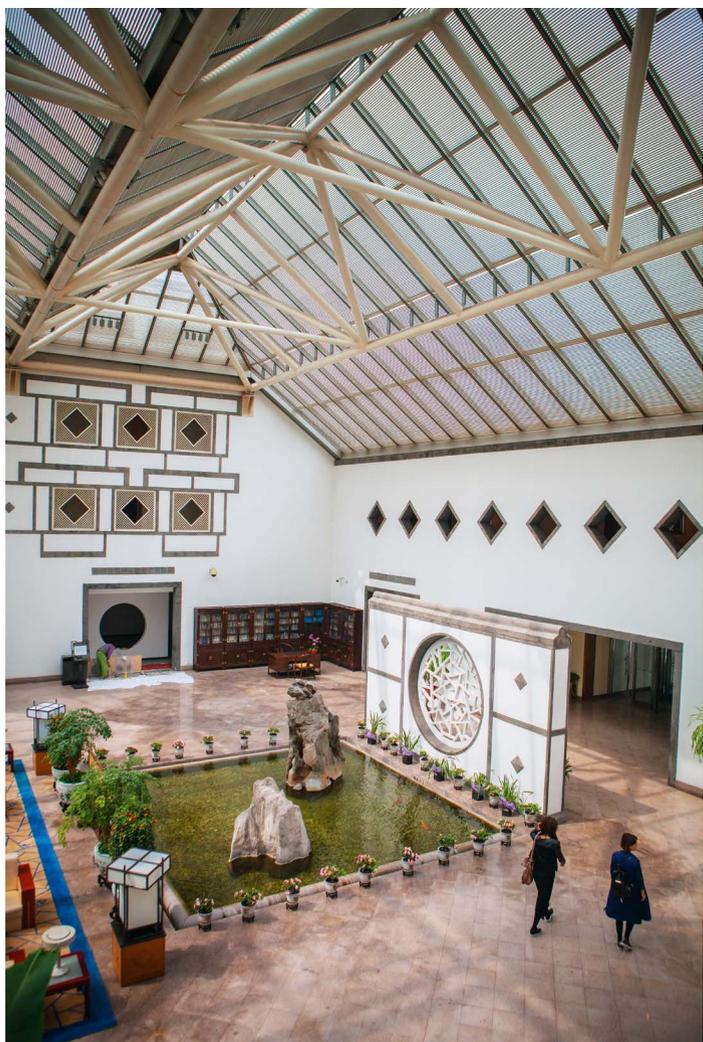
我们在上海见到了曹凯文，他曾在30多年前参与了香山饭店项目。他是美国出生的华裔二代，如今工作生活于纽约和上海之间。1979年，初出茅庐的曹凯文加入贝聿铭事务所，正赶上香山饭店立项，贝聿铭便将这个华裔小伙子拉入项目组中。曹凯文告诉我，贝聿铭当时已经功成名就，大部分项目都是出个想法，让助手们去执行，但香山饭店却不同。他惊讶地看到，贝聿铭常常手握铅笔在设计桌上冥思苦想。“在两三年的时间中，这是他自己的项目。”

贝聿铭的最终设计是一组逐渐展开的园林式建筑，掩映在香山的枫树和松树之间。他用苏州风格的灰瓦白墙，取代了香山皇家园林里使用的大红宫墙和金色琉璃瓦。曹凯文认为，一方面是因为后者源于宫殿和寺院建筑，不是民居，另一方面是灰瓦白墙更容易与现代建筑风格对接。香山饭店在空间上也迥异于西方单体建筑，结合中国园林经典的轴线和收放自如的空间序列，引导游人先进入一个中式四合院感觉的中庭，再经过蜿蜒伸展的走廊，通向几栋不对称的低层客房。从每一间客房里望出去，都可以看到四周环绕的大小小共11座园林景致。贝聿铭对曾任职贝氏建筑事务所的林兵说，香山饭店与其说是设计园林，不如说是对其修整。“那一带原先就有许多古树，我们便将建筑围着它们设计，因此才形成了蜿蜒曲折的建筑形式。我至今仍记得当时的两棵银杏树，一雌一雄，挺拔漂亮。可以说，我主要是用了三件自然宝藏——银杏树、流水渠和云南石——构成了这个园子。”



(蔡小川 摄)

左图：香山饭店采用了苏州园林风格的灰瓦白墙
右图：香山饭店中庭借鉴了四合院空间设计



(蔡小川 摄)

如何在占地面积庞大的香山饭店创造出私家园林般的玲珑感呢？贝聿铭专门请来园林专家陈从周作为设计顾问。陈从周和他一起去了几次苏州，带他感受和了解中国古典文化。陈从周对园林的观点也是难得的折中主义，既不主张复古，又蔑视无凭无据的全新做法。他们共同探讨如何将园林带入现代建筑，比如石头。贝聿铭在飞机上偶然读到一篇游记，提到云南石林饱经风霜的迷宫般的石灰岩柱，觉得正和香山饭店的灰瓦相配，就想要运到北京。不久之后是贝聿铭 65 岁生日，中国政府在人民大会堂为他举行了宴会，他在席间的一个主题就是说服中方同意他穿越大半个中国从石林采石。曹凯文说，作为年轻一辈，他当时不断代表贝先生喝酒，喝到晕倒之时，还听到这个问题的讨论在继续。此后经过一年的谈判，曹凯文被允许在石林外围圈出一块地采石，运回 3200 公里外的北京，但怎么将这些巨

大的石块运上山又是个难题。贝聿铭专门请教了陈从周，采用造园的传统办法，在山上铺上圆木，石头滚圆木上山。工人们将这些石头从石林拔走后，当地废墟里还有一座灰色大理石平台，下面连着一道曲水流觞的曲折水巷，相传诗人们将葡萄酒杯放入水巷，酒杯随着水流飘到水巷尽头大约需要 7 分钟，诗人们必须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作诗一首，才能享用美酒。贝聿铭被这个意象打动，在香山饭店园林里重新复制了一个流水渠。曹凯文说，园林小径中铺设竹子和梅花图案的小鹅卵石，也是他从北京京郊的河床采集来的。附近的村民听说有外国人要来买石头，决定设宴欢迎，特意宰了一头猪。曹凯文对他到达时的那个场面记忆犹新：“地上都是血，旁边躺着一头很大的猪，我还以为要来杀我呢。”

与在美国已经驾轻就熟的施工体系不同，“文革”刚刚结束后的中国没有高质量的施工队伍，也



1. 1979年4月，贝聿铭（右）与陈从周（左一）、吴良镛（右三）等人在香山饭店工地

2. 1979年加入贝聿铭事务所的曹凯文曾参与香山饭店项目

3. 前贝氏建筑事务所亚洲区代表林兵

缺乏严谨的工作态度。曹凯文当时在工地一盯就是几个月，他告诉我，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工人们看不懂施工图，不得不将精确的模型做好运过来，工人们照着模型建。即便这样，实际施工中还常常会出现多达几米的误差。贝聿铭事后回忆说，香山饭店是他经历过的最难的项目之一，是在一个他完全不明白的系统里工作。“我们面对的，不仅仅是‘为什么要用白墙’这样的问题，还有人问：‘为什么我们在中国建楼都要听美国人的？’”

香山饭店终于在1982年如期开幕了。仅仅半年后，贝聿铭就听到了不绝于耳的抱怨声，酒店被交予一个没有多少相关经验的人手中，出现了各种服务问题，很多人住过一次就再也不去了。后来酒店游泳池也被拆除了，改成了保龄球馆。那个泳池设计巧妙，可以经由一个洞从室内游到室外。有些问题在设计之时就有所预见，比如负责设计餐具的特莱茜·特纳，她曾向酒店经理说明正式的西餐厅必须使用25项餐位餐具。她给服务人员示范，怎样把叉放在左边，刀放在右边，折好的餐巾竖在盘

子上；说明什么杯子是喝水用的，什么杯子是喝葡萄酒用的。服务人员越听越觉得不可思议，经理干脆说：“我们只用一双筷子吃饭。我主张再加上25只碟子就可以了，不必用这么多餐具。”

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香山饭店既熟悉又陌生。从山上向下俯瞰，这座建筑灰白色的平屋顶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更重要的是，与之前的预期相比，它又太过素淡，不那么现代。在饭店的落成典礼上，一位官员说香山饭店看上去“很中国”。事后贝聿铭说：“当时正开始‘四个现代化’，政府想要的是西式风格，所以对他的这个评价并不是褒义，但听在我耳里，就是表扬。”

如今，香山饭店已经建成30多年了。作为北京近郊一个市民化公园里的设施，香山饭店是一个普通消费水平的宾馆，很多人选择在这里周末度假。我也在清明小长假前一天来到这里，想着避开游客高峰，但这个时候登山路游人已经增多了。可贵的是，香山饭店的位置在公园一角，周边有一个相对清幽的小环境，将人带入另一个世界。远远看去，白色的饭店一



(蔡小川 摄)

2



(蔡小川 摄)

3

角掩映在连绵起伏的群山中，不禁让我想起贝聿铭当年让曹凯文画的一幅轴测图，将香山饭店方案图放置在一幅古画中，竟然没有丝毫的不协调。如今细看这组老房子确实有很多瑕疵，地砖开始起翘，白色墙面也出现了很多污渍和裂纹。园林里面，流水渠里并没有水，只保留了一个巨大的石迷宫外观。不过，贝聿铭如此大体量的建筑与自然结合的方式，园林里的各种树木、水系、石头组合而成的可游、可居、可观的设计，仍是一座不可逾越的高峰，在如今建筑千篇一律的北方城市里尤其难得。酒店的很多细节还保留着当年的设计，包括每一盏灯、每一套床品、每一件餐具，甚至是酒店标志。可以体会，贝聿铭第一次有机会在中国做设计时的那股心劲，以及不尽如人意之后的失望。而30多年之后，当一直向西方看的中国建筑师回头尝试和本土传统结合，才意识到香山饭店所开创的这条道路的可贵。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香山饭店是一次超前的实验。

香山饭店建成之后至今，贝聿铭再没去过，这是他的一个伤心地。他后来说：“一部建筑作品并没

有在揭幕时彻底完工，揭幕仅仅是开端。由于这个原因，找到合适的客户对我来说至关重要。我希望饭店能有第二次生命，希望它能复苏。”林兵说，几年前曾有朋友提出要出资请贝聿铭重修香山饭店，但最终没有实现。不过，因为贝聿铭在设计香山饭店前后的建议，政府决定限制在故宫周围一定范围内建高楼。贝聿铭一直认为，这才是他对中国最大的贡献。

中银香港：风水漩涡

移交香山饭店之后，贝聿铭搬到香港，他即将在这里为维多利亚港的天际线增添一座塔楼——中国银行香港分行。这又是一项他无法拒绝的项目，无论是出于建筑上的挑战，还是情感上的衡量。

香港和贝聿铭本人一样，是新与旧、东方和西方的结合体，也是地理和文化上连通中国的大门。贝聿铭每次来都如鱼得水，对他来说，香港是会朋友、做西装、品佳肴的地方。更重要的是在这里的一段早年生活经历，1918年，贝聿铭一岁，父亲贝祖诒



1

1~3. 香港中银大厦



2



3

带妻子和两个孩子从军阀割据的广州到香港，创立中国银行香港分行，直到1927年去上海。

一直到1948年，贝祖诒都是中国银行的总经理，直到银行被收归国有。于是贝家迁到美国，他们以为与中银的渊源也就到此为止了。没想到1980年，中国银行的新任总经理到纽约拜访贝祖诒，请求让贝聿铭出山为中国银行香港分行建一座新楼。贝聿铭回忆：“这是非常中国式的礼仪。我父亲当时已重病缠身，他们曾邀请他回国担任终身董事，他告诉他们：‘非常感谢各位邀请，如果早几年，我可能会同意，但现在不行了。’不久之后他便去世了。他告诉我，设计中银大厦与否完全在我，他们应该问我。中银果真这样做，我也欣然同意了。巧的是我父亲曾经在20世

纪20年代开始了旧香港中国银行大厦的建造。”

“这也是贝聿铭给自己的作品添加一幢与众不同的摩天大楼的机会。”1983年加入贝聿铭事务所的司徒佐告诉我。他是香港人，顺理成章加入了中银项目组。香港中银无疑是一个好项目。“贝先生曾经说过，什么是好项目？好的业主，好的地点，好的项目……香港中银地点不错，在中环，可以做到最高，又有中国银行这个好业主，这才能塑造作品出来。”司徒佐说，尽管贝聿铭事务所在建造塔楼方面很出名，但大多数塔楼都是他的合伙人来负

责，是为了维持生计所必需的，而不是作品，更别说是1972年事务所还因波士顿汉考克大楼的玻璃掉落事件遭遇了近乎毁灭性的打击。

当时的香港中环，已经挤满了密密麻麻的四五十层高的摩天大楼。其中的明星，是正在建造中的英国汇丰银行大厦，这座由诺曼·福斯特(Norman Foster)设计的高技术大楼由让人目眩的托臂和管道组成，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也是最昂贵的建筑物之一。新的中国银行香港分行与汇丰银行毗邻，而随着1997年香港即将回归中国，这座新大厦所担负的使命不言而喻，它必须使作为殖民统治标志的汇丰银行相形见绌。

贝聿铭闻到了空气中这股摩拳擦掌的火药味。但对他来说，只有1.3亿美元的预算，与汇丰大厦的10亿美元不可同日而语。中银的这块地皮也并不理想，面积小，环境荒凉，四周还环绕着高架桥。贝聿铭提出的解决方案之一是和政府换地，拿原定场地的一角换一角，整个场由此变成了平行四边形，还可以坐享维多利亚港的景致。第二招，是要求在地势较高的一侧修一条新路，这样从周围的街道便可以进入中银大厦。换地和修路改善了选址，是关键的第一步。这么一来，贝聿铭才信心十足地给出了承诺：“香港是世界的十字路口，我有技术也有办法建筑一幢现代派大楼。”

比汇丰银行更显眼的最直接办法，是建得比它更高。对于中银大厦来说，这是可能的。司徒佐说，之前香港机场在九龙，限制了飞行路线上这批大楼的高度。恰好在中银开始建造时机场启动搬迁，中银基本上是搬迁后的第一幢楼，高度可以超过之前。还有一个条件是采用了一种新的结构体系，使得用钢量大大减少，也保证了在预算范围内实现更创新的造型。后来的叠加四面体造型，是贝聿铭有一次在卡托纳的度假屋中度周末时想出来的。他随手摆弄着四个三角形的小棍，这些棍子一头有逐渐变细的斜角，把四个摞在一起，每一根向上滑动，直到顶端只剩下一根，形成金字塔般的顶点。这就成了设计的雏形。

贝聿铭把图纸和模型给结构工程师莱斯利·罗伯森看，罗伯森从中发现了一种新概念的萌芽，有可能用纵向空间框架取代令传统建筑不堪重负的横向拉结型柱组合。他和贝聿铭合作设计了一个创新性的超级合成桁架，每隔13层，用预制件把大楼进行横向和斜向加固，那些交叉支架将所有的承重都转移到四个巨大的角柱上，建筑内部可以无需支柱，整个结构

框架也显得既轻盈又坚固，就像一个四角凳。司徒佐说，它摒弃了传统的空间焊接，选用混凝土来固定。混凝土就像一大滴胶水，把所有分散的部分粘在一起，而这些部分之间并不用互相连接。这样的体系效率很高，结构钢筋只用到了传统体系的65%。贝聿铭把每隔13层楼对塔楼进行加固的斜构件和横向桁架用红笔圈出，他认为，这样彰显出结构，在美学上能让大楼显得舒适。但是，如此一来，大楼正面就出现了众多巨型“X”，在中国，叠加起来的“X”有不吉利的象征，往往意味着错误或遭殃。中国银行给贝聿铭发来电报，对此表示担忧。

“X”形的相关争论涉及博大精深的风水问题。这在传统中国仿佛建筑的宇宙法则，规定城镇、建筑、墙壁、家具的位置如何才能与穿行于天地之间的缥缈力量保持协调。这一学说在香港尤为盛行，贝聿铭也很难避开。事实上，这成为香港中银面临的最大问题。贝聿铭曾公开否认他相信风水。“我怎么能相信那些东西？尽管如此，风水是我所受教育的一部分，是建筑的一部分。风水的起源是对自然力量的信仰，后来却演变成一种迷信。”贝聿铭回忆说，“在香港，风水是一门大生意，有不少风水师专门负责建筑物的选址、方位和造形等等，他们无处不在，你不去征求他们的意见，就寸步难行。我知道会遇到麻烦，但我知道应该预料什么样的麻烦。”

贝聿铭决定把构成“X”形状中的横向桁架隐藏起来，这样一来，楼身就形成了一连串菱形的图案，他描述为一系列相互交叉的宝石。同时，贝聿铭将大楼比作春笋，他知道，对于中国人来说，雨后春笋正寓意从传统中再生的希望和蒸蒸日上的势头。

中银大厦的封顶典礼精心选择在了1988年8月8日，几乎是最吉利的日子，但并未让争论停歇。中银本身的风水不错，它位于维多利亚港“龙头”的位置，主入口也是很传统的背山面南。但是邻居们觉得不吉利：“中银大厦形成的尖角犹如一把锋利的刀，刀口正对着我，会给我带来厄运。”司徒佐告诉我，风水上有一个概念，就是不能出现小于90度的角。中银形成的切角是45度，就被认为像“刀刃”一样。然后说汇丰大厦上装了两个“大炮”来抵御，其实那是两个擦窗的机器，而且是后装的。但是一把刀一个炮，这故事就讲齐了。另一个不幸的邻居是香港总督府。上一任香港总督在1986年中银大厦建设过程中突然逝世，“刀刃”说就更盛了。继任的总督卫奕信后来邀请贝聿铭夫妇去总督府做客，给

他们看花园里新增的滑稽内容——两棵柳树。卫奕信解释说：“在很多人眼里，总督府代表香港政府。我们就在中银大厦那个尖角和总督府中心位置之间的直线上种上了柳树，算是采取了保护性措施。柳树的形状柔和，对中银的尖利角度起了缓冲作用。就这样，问题解决，皆大欢喜。”

中银北京：续写的家族渊源

在香港中银大厦之后，贝聿铭与中国银行之间的渊源并未切断。1994年，为了北京中国银行总部项目，中国银行又一次找到了贝聿铭，贝聿铭起初有些犹豫，说他已经不接大项目了。直到他们问：“那么您的儿子们呢？”

1989年，贝聿铭的个人声名也登峰造极，这年揭幕的卢浮宫金字塔项目就是一个最显著标志。他时年已经72岁，决定从他创立的事务所隐退，去从事一些更小规模也更得心应手的工作。原来的贝聿铭事务所拆分为三个，其一是保留大部分雇员的贝一考伯—弗里德事务所，其二是贝聿铭两个儿子贝建中和贝礼中独立出来成立的贝氏事务所，其三是贝聿铭本人的小型事务所，只有他和两个秘书。1995年加入贝氏事务所的莫平告诉我，像中国银行总部这样的大型项目，人数最多时团队里有30人，用了七年时间才完成，靠贝聿铭一己之力根本不可能。最终是中国银行和贝聿铭儿子的贝氏事务所以及贝聿铭本人的事务所分别签订了合同，由贝氏事务所承接项目，贝聿铭作为设计顾问把控。

中国银行总部位于西单十字路口，南北向是热闹的商业街，东西向则是北京最重要的城市轴线——长安街，离天安门很近。这一选址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当年贝聿铭本人提出来的高度限制。贝聿铭说，在一定的面积需求下，通常的结果是盖出一幢笨拙且单一的建筑，唯一的解决办法是把建筑物的中心设计成一座拥有大空间的花园，借以将光和景带入内部办公室。问题在于，做一个什么样的花园？

莫平在1998年被派遣到中国，代表贝氏事务所负责中银总部项目的现场建设施工。他告诉我，当时的限高是前面控制在45米之内，后面控制在55米之内，而中国银行要求的建筑面积总共17万平方米。在这样的条件下，他们反推出楼层布局，中间只剩一个小方洞用来采光。把这个方案拿给贝聿铭看，他不满意，说中庭一定要大，这是整个建筑的

主题。莫平回忆：“他即便不满意，也会看着你的眼睛，用那种很客气的句式说，‘如果那样做会怎么样？我是这么想的……’让你感觉不是在命令你，但心甘情愿为他工作。”为了省出更多空间给中庭，贝聿铭建议压低层高，把层高降至3.45米，而普通的办公楼层高标准是4.5米。这样，最终在建筑内部形成一个通透的中庭，一方面给里面办公的人提供充足的采光，另一方面也向城市开放，让行人可以看见进来，甚至可以步行穿越，沿45度角穿过南门和东门，中银大厦的景观也就变成了都市景观。莫平说，他希望夜间也可以有通透的效果，强调过好多次要把里面打亮，“要像灯笼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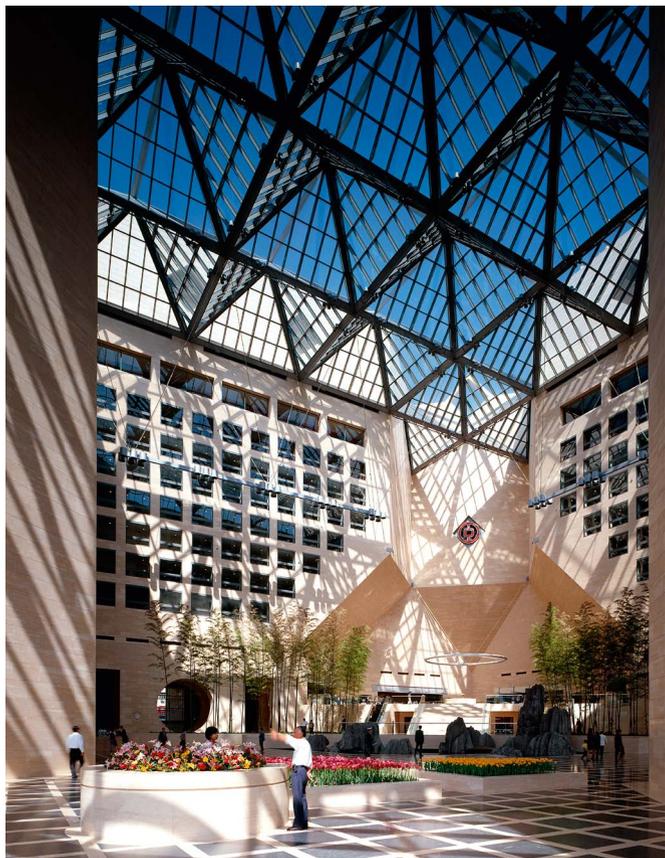
整栋中银大楼都用石材包裹，外立面是意大利米色凝灰石，外部地面则用中国灰色花岗岩铺就，这一切都暗示着整个银行的坚不可摧。面向城市的通透中庭平衡了这种笨重感，让这幢楼变得轻盈起来。同样参与了中银北京项目的司徒佐告诉我，本来作为中国银行总部，这幢楼里是不用安排日常业务的，但中庭里后来却增设了一个营业厅，这也是出自贝聿铭的建议。他认为，通过空间的人气化、透明化和开放化，可以创造充满象征意义的现代银行总部。对银行来说，让什么人都可以来，什么人都可以用，也会增强一种仪式感。

中银大厦的主入口在东南角，长安街和西单大街交界的十字路口，贝聿铭将这个角形容为“关节点”。朝向这个角的玻璃幕墙同样出现了纵向的菱形图样，与中银香港遥相呼应，最下端的入口处却是一个圆形玻璃雨篷。莫平说，这里本来会出现一个尖角，他们吸取了香港的风水教训，有意用来弱化这种尖利，就戴了一个圆的“帽子”。贝聿铭后来说，这个玻璃雨篷的圆，好比人胳膊上的关节。“在这样一个‘关节点’位置上，只有通过一个圆，才能化解‘关节’上的力量。”

尽管在离故宫不远的长安街上，中国银行并没有刻意追求外观上的传统样式。莫平记得，当时北京市要求，长安街建筑必须“穿衣戴帽”。但贝聿铭坚持不盖大屋顶，他说：“中式文化不在外，而在于其内。我们在内部做园林，园林里的竹子是不是中国的？水池是不是中国的？假山是不是中国的？”所以他格外重视在中庭里如何做出一个现代园林。司徒佐说，这里面有中国传统园林里的山水石竹的元素，但完全打破了原来的尺度，看上去是一个很现代的景观。比如挖了一个很大的圆形窗，很高大



(数字摄)



的竹子，还有很有气势的石头。他记得，那组2米到5米高的石头是石林的，毛竹是从浙江安吉选到的，竹子有20多米高，竹叶不大，还有一点弯曲，这样看上去才有中国画里的意境。

贝聿铭后来说，中国银行的设计更是一种义务，是他对国家和父亲尽的义务。“我父亲属于当代中国的第一代银行家，一生都献给了银行业。在他那个时候，人们使用的是算盘，而今人们用的是电脑，一个世纪内的变化发展之大令人无法想象。以建筑来表达传统的延续性是很难的，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在北京的中国银行项目中做到了这一点。”

苏州博物馆：故乡的收稍

贝聿铭总将苏州视作故乡，这里也是贝氏家族的根基所在。他85岁才决定开始做苏州博物馆，并将它亲昵地称之为“我的小女儿”。参与了苏州博物

馆项目的林兵告诉我，在一生这么多项目中，苏博包含了贝聿铭更多的感情。他将对故乡、对自身的中国血统、对中国文化、对几何形体的热爱，都融合在了这幢建筑里。贝聿铭曾说，苏州博物馆是他的一部“自传”。

林兵说，从90年代开始，就有人来找贝聿铭，想要他在苏州做些什么，来来去去苏州也经历了五六任市长了。贝聿铭当时就说：“你们不用找我，你们重要的不是现代的高楼大厦，现在你们需要的是城市的保护方案，而且还必须把运河清理干净。苏州坐落于京杭大运河之上，也是当时的主要交通渠道，但多年以来受到了严重的工业污染。我说，如果他们不改善水质，这个城市就会衰败，他们对此也默认了。要真正改善河道水质其实很难——他们得从长江引水。于是我告诉他们，当苏州的水变干净了，我就会回来。”

把运河清理干净——这个要求在当时其实很高，好像贝聿铭在有意拒绝。但他其实一直在以各

左图：前贝氏建筑事务所建筑师、现莫平建筑事务所合伙人莫平（右）、司徒佐

右图：北京中银大厦中庭



（苏州博物馆供图）

1

种方式参与苏州古城的保护，先派大儿子贝定中去为苏州解决城市问题。已于2003年过世的贝定中是城市规划师，他参与到1996年的“苏州，为新的中国塑造一座古城”项目里，其中也包括对水质的改善。在关于这个项目的一本书的后记里，贝聿铭写道：“在新千年里，最重要的挑战就是，在中国前所未有的爆炸性现代化工业化浪潮里，如何保护中国的历史名城。而这也正是我请定中为老家苏州解决的问题。他和易道（EDAW）公司的同事一起，为苏州最敏感的区域制定了一套规章制度，目标是在保持和强调苏州历史特点的同时，找到古城区的重建和复兴之路。”贝聿铭等了很久，等到苏州有一定经济地位了，水的治理也有很多措施了，才开始做苏州博物馆。这时候，贝聿铭已经85岁，同样采用儿子子公司主持项目、他来做顾问的形式。某种意义上，这并不仅仅是他对自己故土的回报，更显示了他对于历史重要性的坚定信仰。苏州博物馆也是继续他在香山饭店的实验——对于现代建筑和历史传统之间联系的探索，对于中国本土语言的寻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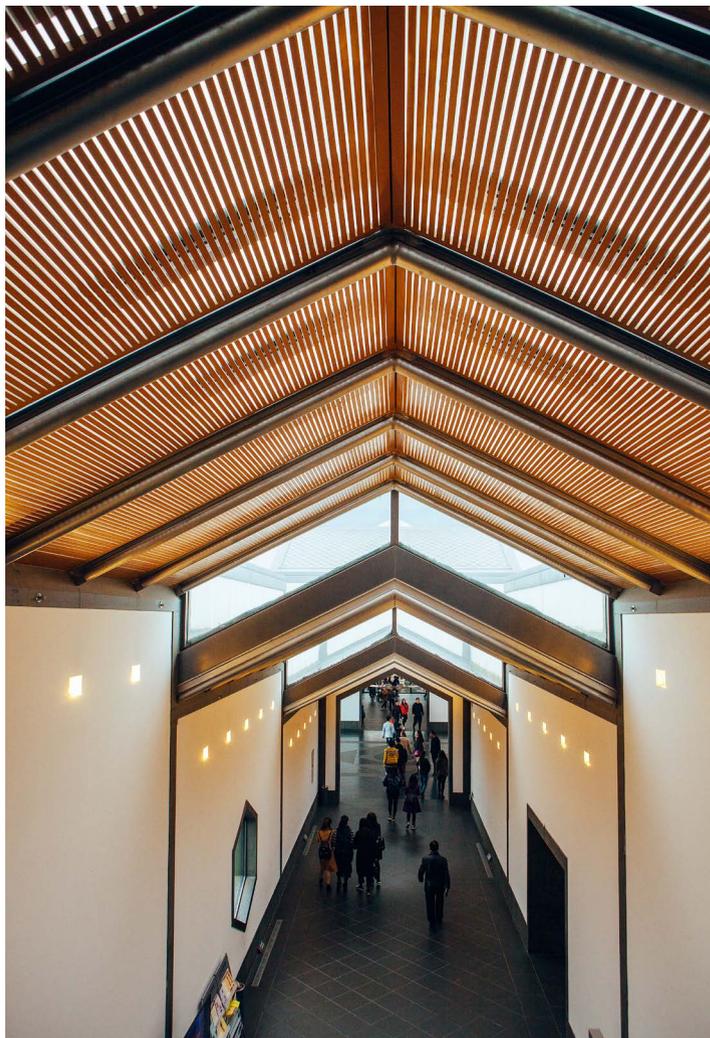
与20多年前设计改革开放后的第一座饭店相比，贝聿铭在苏州博物馆项目上有了更大的自主性。但是，他面临的问题也更复杂。如果说香山饭店是要提醒一心迈向现代化的中国回望传统，那么在传统如盆景一样点缀的现代城市背景下，重建和复兴的含义更模糊。

在贝聿铭眼里，苏州离上海虽然只有八九十公里，不过和上海比起来，还很传统、很保守。很多人还活在明清时那种理想的生活里，那是苏州的黄金时代，直到今天提到当年的大画家大诗人，苏州人还如数家珍。他清楚，与拙政园一墙之隔的苏州博物馆是个文脉主义建筑，当地政府想要的也是建筑文脉。“在这个项目上，我有机会将历史古迹融入21世纪的背景里，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至于用材就毫无悬念了，我选定了灰泥、石材。而颜色则是灰白结合。”尽管如此，贝聿铭想在苏州寻找的，是如何在中国如今林立的摩天大厦和真正的文化根基之间架设桥梁，是对中国传统的升华。从表面看，苏州博物馆更像是一个现代建筑——几何造型，片



(蔡小川 摄)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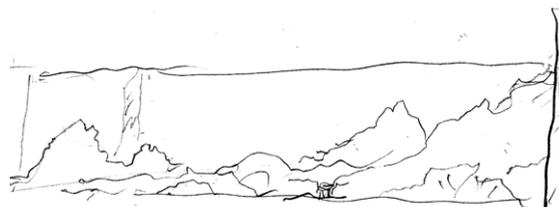
(蔡小川 摄)

3



(蔡小川 摄)

4



5

1. 苏州博物馆看起来更像一座现代园林
2. 苏州博物馆“宋画斋”
3. 苏州博物馆室内
4. 苏州博物馆片石假山
5. 苏州博物馆片石假山手绘图



(燕小川 摄)



(燕小川 摄)

左、右图：苏州博物馆老馆——忠王府园林景观观

状山石，钢结构，都不是传统语汇，而有传统意境。苏州博物馆已经建成10年，关于这座博物馆本身，也关于它所开创的路径，至今仍有争论。

某种意义上，苏州博物馆项目是最接近贝聿铭建筑理想的。他一生坚持现代主义，但在进入这一领域的一开始，就试图要超越早期现代主义的白板理论。在哈佛读书时，他曾打断格罗皮乌斯的讲课，争论说，“国际风格”不应该消融世界各地的不同风俗和特色。这位现代主义建筑的创始人回答说：“好啊，那你证明给我看。”贝聿铭提交了他的“上海艺术博物馆”方案和模型：这是一座两层楼的建筑，有好几个凉亭，还有淙淙流过茶园的溪水。他解释说，他的博物馆不同于西方模式，因为中国艺术在社会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当你想到东方艺术时，你所考虑的是截然不同的事物。那是非常隐秘的——玉石、象牙、陶瓷都是这样的，甚至画卷也不例外。

无论其长短，画卷是从不摊展开的；它们总是束之高阁，只有特殊场合才供人一饱眼福。因此，你不会在一座庞大的希腊式或罗马式复制品中展示这种艺术。因此，观看、展览这种艺术的环境必须区别于我们的西式博物馆。”

林兵说，贝聿铭是从一个馆长的角度入手设计苏博的。“香山饭店对他打击很大，做好了以后就扔在那儿了，管理得一塌糊涂。博物馆也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藏品不佳，没人去看。从这方面说，他很在乎为中国留下一个好的文化建筑，同时也很在乎建筑建完之后的生命延续。”林兵告诉我，贝聿铭请来美国大都会博物馆前亚洲部主任屈志仁（James Watt），还有上海博物馆时任副馆长汪庆正，再加上前苏州博物馆负责文物的馆长，一起商量苏州博物馆应该展什么。讨论的结果是，将明清工艺作为未来展示方向，而且只做文物展陈，不做

历史展陈。以前设在忠王府里的老苏州博物馆的展览，是从远古时代开始谈起，其实跟苏州关系不大，明清才是苏州文化的高峰期，尤以工艺为代表。贝聿铭还提议设立一个当代厅，他说，苏州所有东西都是过去，也要面向未来，通过这样一个平台请大艺术家来做一些跟苏州有关的艺术，同时推动苏州艺术的发展，也能提高博物馆的国际地位。他请来三位国际知名艺术家来做开幕展——徐冰、赵无极、蔡国强。林兵记得，当时连赵无极的画进中国时的通关，都是贝氏事务所帮忙弄的。

如今的苏州博物馆里总是游人如织，既是来看展品，又是来逛园林。或者说，博物馆建筑本身就是其中最大的展品。我们从大门进入前庭，之后是主展馆，连接着一个露台，可以从这里观赏中央的池塘和花园。经由曲曲折折的人行步道，路遇一个八角形茶亭，又可以到达东西两翼的展馆。每一个展馆体量都不大，正适合明清工艺品的展示。而且高低起伏，错落有致，移步换景，与中国传统建筑的体验类似，正如贝聿铭所说：“在中国，大宅子都是用有几进庭院来丈量的。家庭是基本的单位，中国人不爱张扬财富，所以筑以高墙。我们祖上的宅子里，花园是用来游玩之用的，有非常简单的黑或红色的后门，和灰瓦白墙。宅子里是一进又一进的庭院，有把花园建在墙内的传统。”

林兵说，贝聿铭在“苏而新，中而新”方面花了很大功夫。最大的问题是瓦。中国的专家要求他用瓦顶，贝聿铭不同意：“我设计一个现代建筑，要我用瓦顶，不就是穿西装戴花翎帽吗？”林兵说，对于苏州建筑来说，顶很重要，从一定高度俯瞰全是粉墙黛瓦，所以不能像香山饭店那样做一个大平顶，要做斜顶，但他不想用瓦。他一直反对大屋顶，认为大屋顶是中国建筑最大的局限。撇开大屋顶，其实屋顶不是屋顶的概念，而是作为墙面的延伸，所以平整度要好，瓦片显然达不到这个效果。最后采用了青色花岗石材，便于养护，又能组合成贝聿铭签名式的立体几何空间。

贝聿铭说，在中国做建筑，不能想象不做园林。庭园和房间并没有明显的界限，是融为一体的。庭园也不能太大，通常都是按照人性化比例设计的。在他看来，园林的三个主要元素——水、植物和石头，是三件很简单的东西，但这上面却可以有丰富的变化。“苏州的园林是诗人、文人、画家做出来的，他们把做园当成是作画作诗一样。可是现在那样的人才

几乎没有了，我也不是这种人才，可是我还想要试一试。”水位于博物馆的中央，人们可以在不同的季节欣赏水里的植物和游鱼。而因为庭园不大，植物不在于名贵，而在于造景，每一棵树都是他亲自选的。贝聿铭专门设计了一个紫藤园，园林有两株紫藤，代表老的苏州博物馆——忠王府里的文脉传承。林兵告诉我，忠王府里有一棵紫藤，号称由文征明亲手栽种，他们从那里面修剪了十几个枝嫁接在新馆的紫藤树上，最后把剩下的部分都剪掉，只留下嫁接的部分作为主干。林兵记得，他和贝聿铭第二次去苏州就去选了桂花树，因为博物馆开馆那天是中秋节。“贝先生已经想好，请人来这里弹琵琶，水面上漂着荷花，水边一棵桂花树，桂花飘香，明月当空。这是他要的意境，古人很多园林也是这种意境。”

苏博园林的视线焦点，是水池正对面的片石假山。十几块巨大的片石立在与拙政园相隔的白墙前，形如山水画，正所谓“以壁为纸，以石为绘”。林兵说，尽管贝聿铭家族曾拥有的狮子林以石闻名，他也喜欢那种“爷爷挑石，孙子用石”的太湖石寓意，但是，他们做苏博时已经很难找到好的太湖石，也没有了当年叠石的技艺，决定换一种做法。贝聿铭想到了北宋画家米芾的山水画，米芾不求工细，多用水墨点染，自谓“信笔作之”“意似便已”，这也正是贝聿铭的旨趣所在，于是他尝试用一种三维绘画手法重塑米芾画中意象。林兵被派到全国各地找石头，最后在山东的一个石场找到十几块大石头，用钢线切割成片石，再运回苏州。林兵记得，贝聿铭就坐在池塘对面，指挥升降机把一块块石头吊上来又吊下去，不断地调整大小和位置。终于看上去差不多了，但石头又太过光滑，切割处过渡不自然，他们想了个办法，将人工切面敲毛，再用火烧，石片终于呈现出天然野山石的毛糙感和浑厚感。

2006年要离开中国的前一天，贝聿铭对林兵提出，他想在下午4点钟去苏州博物馆，一个人在里面走走看看。而且要观众在的时候，感受一下空间是怎么被人使用的。这个愿望最终没有实现。林兵说，这是他回想起来特别惭愧的事。开馆后，贝聿铭从来没有静静地看过这个他倾注情感的作品，而那也应该是他最后一次机会了。■

（实习记者魏已然、吴扬、裴诗贇对本文亦有贡献。参考资料：《贝聿铭传》，迈克尔·坎内尔著；《贝聿铭全集》，菲利普·朱迪狄欧、珍妮特·亚当斯·斯特朗著；《贝聿铭谈贝聿铭》，波姆著）

寻找贝聿铭：两个世界的源头

主笔 / 贾冬婷 摄影 / 蔡小川

在贝聿铭的身上，一直并存着两个世界。在他获得新世界的同时，还保留了原来的世界。而且越到后来，他越深切地意识到早年的中国经验对他的影响：传统大家族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古典园林中人与自然的共存，都带给他一种内在的东方式思维。

家族：遥远的精神纽带

算起来，贝聿铭是吴中贝氏的第十五代，贝氏家族已经在苏州绵延 500 年了。不过，贝聿铭这一支大多散落在海外，在苏州很难寻访到了。如果说还有什么家族的有形象征，那就是山塘街上的贝氏祠堂。

山塘街一头连接着苏州的西城门阊门，一头连接着名胜虎丘。据说这条街还是白居易在苏州任刺史时修建的，他让人在河道淤塞的虎丘山附近开河筑路，开凿山塘河，河道在阊门与大运河相接，这条河的堤岸就成了山塘街。我们从阊门进入山塘街，一下子就进入了苏州的繁华市井图中。不过，这种现代城市包围下的老字号聚集地毕竟只是一种遗存，在苏州人眼里，山塘街最辉煌的时期在明、清，在乾隆年间的《姑苏繁华图》中。当时，画家徐扬选了苏州的一村、一镇、一城、一街入画，其中的一街就是山塘街，展现出“居货山积，行云流水，列肆招牌，灿若云锦”的景象。曹雪芹在《红楼梦》中，也把阊门和山塘一带称为“最是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如今，商业只集中在靠近阊门的一段，再往西走，店铺渐少，民居增多，河道景观也逐渐显现。山塘街可以说是最有苏州特征的街道，民居前门临街，后门临河，通过一座座石桥与对岸的街道相连，所谓“人家尽枕河”。作家陆文夫曾在山塘河边居住，现在的景观和他当年的描述相差不大：“从船上搭起一张跳板，就可以从后门走进家里。许多人家的后门外都有一个水码头，那水码头也十分奇特，是用长长的条石插进石驳岸，没有栏杆，没有扶手，像悬梯似的下到水面。美丽的苏州姑娘飘飘然在悬梯中上下，洗菜，淘米，捣衣。”沿河走到



苏州艺圃茶室





1

桥头，苏州人称桥堍的地方，出现一处斑驳的石制牌坊，这就是 603 号贝氏祠堂，至今贝氏后人仍将其作为祭祀祖先和家族聚会的场所。

这块牌坊上刻着“节孝”二字，原为七世贝慕庭于清乾隆时期创建的节孝祠，但这里并不是原址。苏州政协文史委秘书处处长夏冰告诉我们，贝节孝祠在上世纪 50 年代变为粮店用房，牌坊也因此保留下来。1998 年昆山的千灯古镇要修复顾炎武故居，到处寻找古建筑材料，正好山塘街这一带当时要修北环路万福桥，这幢房子也要拆除，于是将几进房屋的建材编号移到千灯古镇去了。夏冰在 2007 年参与了贝家祠堂的修复工程，他说，当时因为要扩宽北环路，就将祠堂从原址向东移了 50 米，牌坊还在，后面的建筑则是重建的，由东西两路组成，东路为三进辅房，西路为祠堂和花园。夏冰通过时任贝氏建筑事务所亚洲区代表的林兵询问了贝聿铭的意见，

贝聿铭回复：“一、目前的选址距离高速公路较近，能否更换？二、平面布局偏大，将来祠堂内存放内容为何？能否将规模减小为祠堂一间即可？”两年后祠堂建好，贝聿铭已经不能长途旅行，委托儿子贝建中来寻找“贝家的 DNA”。

祠堂正厅上悬“清河世家”匾额，指明贝氏的源头来自河北清河贝丘，后裔以地为氏。夏冰提醒我们留意祠堂里的兰花，那是为了纪念到苏州的贝氏第一代贝兰堂在明代中叶从浙江金华兰溪迁来的历史，兰溪的山上盛产兰花。对兰花的喜爱也被后世继承，据说，清代到民国的苏州兰花比赛上，贝家总是能拔得头筹，甚至有种兰花还以贝氏命名。夏冰从贝家老照片中看到，贝聿铭的祖父贝理泰也特别喜欢兰花，家里摆满了兰花。祠堂一进门院子里有一口井，寓意那个在贝家世代流传的“刘海戏金蟾”的故事，是说清代时贝家还在阊门外南濠街



2

1. 典型的苏州民居前门临街，后门临河，所谓“人家尽枕河”
2/3. 苏州山塘街贝氏祠堂，2009年修复



3

经营药业的时候，收留了一个叫阿保的陌生人做家仆，后来这个阿保在贝宅水井里吊出了一只三足金蟾，背着它腾空而去，原来他就是仙人刘金蟾。为了报答，刘金蟾为贝家选了一处风水特别好的阴宅，又满足了他们“保佑子孙衣食饱暖、平平安安”的心愿。后来贝家迁居桃花坞后，这个传说找到金蟾的水井，也被移到了新宅的最后一进屋子旁边。

曾经寻访吴中贝氏家族的张一苇告诉我，这个故事并不为贝家所独有，刘金蟾有着现实原型，又在民间传播中逐渐演化，已经是一位家喻户晓的民间财神了。对于世代经营医药生意的贝家来说，选择他作为家族密码并不奇怪。她说，第一代贝兰庭北上到苏州时，正是人口流动活跃的明朝中叶，苏州的吴门医派在当时已经小有名气，于是他在此开始了药材生意。据考证，贝兰庭在阊门外南濠街租下一两间屋子，那里因为靠近城门和码头，是移民的首选落脚地，也便于商贸集散。到了七世贝慕庭这一代，开始置地造屋，收购园林，跨入苏州有名的“戈、毛、毕、贝”四富之列。也是在他的手上，将曾祖母程氏含辛茹苦使吴中贝氏得以绵延的事迹彰显，修建了节孝祠。八世贝模从阊门外迁居至城内桃花坞，此后数代更是分门立户，居住在苏州的各处，形成桃花坞贝、西花桥贝、华阳桥贝等多个分支。

张一苇说，医药是贝家祖业，但从十三世开始，

“新学”渐兴，贝家也开始将触角拓展到其他领域，比如十三世贝润生，也是贝聿铭的叔祖，成为上海有名的颜料大王；而贝聿铭的祖父——十三世贝理泰开始涉足银行业，其子贝祖诒对金融业介入更宽广，而到了十五世贝聿铭，又跨行到建筑业。夏冰说，有趣的是，贝氏发展真应了当初向刘金蟾许下的“子孙衣食饱暖、平平安安”的心愿，后世都很长寿，在各行各业出了很多人才，但并无大富大贵。夏冰参与确定了苏州“名人馆”人选，2500多年历史中总共选出200人，标准严苛，一定要特定时期的特定领域最杰出的人才。按这个标准，贝家入选的只有贝聿铭一人。

这么多年过去，贝聿铭与苏州的贝氏家族只有一种遥远的精神联系了。我们在吉庆街的一处老房子里见到了贝织芸，她属于贝家第十四世，也是如今在苏州的贝氏家族中辈分最大的一位。在2010年初山塘街贝家祠堂的开幕典礼上，贝织芸作为贝氏家族的代表发言。她认为，这是对辈分的尊重和礼遇。“这在60年前是不可想象的。那时候任何的家族活动，女子不仅不能讲话，连门都不能进。女子还不能进入家谱，称呼都用男性的方式，如父辈的姊妹成为‘伯伯’‘叔叔’，母亲的姊妹叫‘舅舅’等。”贝织芸告诉我，87岁的她是十四世中年纪最小的，比十五世贝聿铭还小13岁，虽如此，贝聿铭也要喊她一声“小娘娘”，即小姑妈。这种关系其实离得很远，

她的祖父和贝聿铭的曾祖父是亲弟兄。她说，贝聿铭那一支是“西花桥贝”，全是经商的；他们这一支是“桃花坞贝”，则基本全是读书人。她还记得曾跟父母去给贝聿铭的祖父贝理泰拜年，她叫“二伯父”，印象中他总是很权威，腰板挺直的金融家形象。而很小的时候去祠堂时，她作为女孩子只能站在门外，对当时十几岁的贝聿铭有模糊印象，听说他书读得好。

贝织芸的父亲贝晋眉也是个传奇人物。她说，父亲因为排行老七，人人都尊称“七爷”或“七叔”。他继承了嗣父母在湖州的药业家产，但基本不亲自掌管，一心痴迷于唱昆曲。“来家里请他看身段的，听唱腔的，不计其数。父亲一口京片，音色脆亮，他又吹笛又教唱，家里热闹得像开堂会。父亲还十分讲究衣着，十分要美的。他常穿中式衣服，绸的长衫，软缎的圆口鞋，配上各色丝袜。他对孩子相当威严，但是，如果唱曲的笛声一响，阿爸对我们孩子那就完全不管了。”在贝织芸印象中，父亲和“四伯伯”贝寿同特别投机。“四伯伯也讲究穿着，但与父亲不一样，总是西装、披风、皮鞋咯咯，他不苟言笑，但是喜欢跳舞。”她说，兄弟二人也走上了完全不同的路，贝晋眉成为昆曲大家，后来和人合作创立了苏州昆曲研究所，而贝寿同则是最早用庚子赔款留洋的学生之一，毕业于德国夏洛顿堡工业大学建筑系，回国设计了几处法院和监狱。“不知道贝聿铭后来学建筑，有没有受到他的影响。”

作为贝晋眉最小的孩子，贝织芸并没有从父亲那里继承昆曲的精髓。她说，他们这一代唯一唱得好的是大哥涣智，他在1988年就去世了。贝织芸后来做了中学老师，退休后住在单位老房子里，家里的陈设也简朴。贝聿铭1974年以后回苏州的几次，她都没有见过，他太有名，想见他的人太多了。张一苇说，贝聿铭本人一直与在苏州的家族成员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或许隐藏着复杂的心绪。他曾说：“我可能是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也可能是我。”

园林：人与自然的媒介

直到10岁，贝聿铭才体会到家族的意义。他后来说：“我儿时在香港，从未感受到这一点。我的家庭只是由我的父亲、母亲和兄弟姐妹组成，我们从那里搬迁出去回到苏州后，我意识到了更深的家

庭根源，这不只让我吃惊，也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917年，贝祖诒和孔莲的第二个孩子、也是长子在广州出生，取名“聿铭”，意思是“璀璨的雕刻”。这个颇有预言意味的名字其实是根据族谱的排序，“聿”来自“聿念世德”的道德规范，“铭”则是遵循贝氏世代以“金、木、水、火、土”的偏旁部首来命名的原则。贝祖诒一年后从广州到香港，筹建中国银行香港分行，1927年又调至上海，任上海分行经理。祖父贝理泰坚持让贝聿铭每个夏天去苏州，因为他是长孙，理应更了解家族事物。

幼时贝聿铭对传统中国文化的兴趣源于他的母亲。贝母会吹笛子，会酿酒，会做菜，写一手漂亮的书法，同时还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多年后，他仍认为母亲对自己的生活和职业影响最大。他是长子，只有他才能陪母亲去一座位于山顶的寺庙静养，在那里长时间打坐静思。那是一个小男孩很难适应的地方。“夜晚万籁俱寂，我从未经历过这样的沉寂——连一星半点的声音都没有。然后，天快破晓时，响起一种嘎吱嘎吱的古怪的呻吟声，那是一只只竹笋从泥土中一起向上钻出来时发出的。听辨寂静，这是我母亲给予我的非同寻常的天赋。”

贝聿铭13岁时，母亲因癌症去世了，他伤心极了。像很多传统中国家庭里的父亲一样，贝祖诒是家庭中尊严和规矩的象征，但他不是一个亲密的情感对象。“他不是那种能拍拍儿子肩膀、拥抱女儿的人。”贝聿铭说。悲痛的父亲被银行派到欧洲散心，遇到继母，很快再婚，贝聿铭从此和父亲分开居住。连续三个暑假，他都去苏州的祖父家里，祖父在某种意义上替代了部分父亲的角色。

在贝聿铭眼里，祖父代表了旧中国的最后一代。他是儒家理念的象征，生活丝毫不受西方影响。在患眼疾退休前，贝理泰一直担任上海储蓄银行董事，也是热心苏州地方公益的知名人士。张一苇介绍，贝理泰在1922年起连任苏州总商会会长7年，先后发起募捐巨款开辟了从阊门到虎丘的马路，时称“新马路”，担任过吴县救火会会长，博习医院、振华女子中学董事等。据说，在贝理泰盛年时，在西花桥巷家中吃早餐，光“吃粥小菜”就要放上24碟，几个孙儿围坐在侧，须经他允许才能动箸。他已成年的儿子都怕他，一天晚上，祖元和祖诒看戏回家晚了，他们不敢惊醒父亲，只好在前厅睡了一宿。但像很多祖父一样，他对长孙贝聿铭寄予期望，教他如何



1

1. 狮子林以假山闻名，一度为贝家私家园林

2. 属贝家十四世的贝织芸

3. 贝聿铭的叔祖贝润生扩建狮子林时增加了彩色玻璃装饰



2



3

在郊外山上的祖庙里进行祭祀等等的礼仪。贝聿铭后来说：“在我孩提时代，皇帝不复存在，革命已经发生，但孔子的道德伦理在我早期的教育中还是占了主导地位。儒家思想在中国扎根了2500多年，它并没有从中国消失，未来也会继续存在。但在我的年代，儒家思想所受到的重视逐渐降低，不如我父亲和祖父的世代。这有没有给我带来更多的自由？我想是有的。但从某种意义上说，按中国的传统，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很重要的，就是中文里所谓的‘待人接物’，一个人应该懂得如何得到、如何给予，我很小便接受这种教育。”

贝聿铭在苏州住了几个夏天，结识了直系亲属之外的其他家庭成员，那个古老的世界更使贝聿铭敏于感受。苏州生活的核心在于园林，“一城半庭园”的说法并不算夸张，据统计，最盛时城内的园林有200多处，现存的还有70多处，加以重点保护



上图：苏州作家蒋晖

下图：苏州作家王稼句

的27处。陆文夫说，从宋代的沧浪亭开始，苏州园林的定位就是归隐。“归隐于山林之间又不到山林之间去，是把山野村林搬到城市里来，造一座城市里的山林。当然不是真的，是大自然的缩影。大自然基本的要素是山与水。要把山搬到城里来当然是不可能的，便造假山；把江河搬到家门口当然也是不可能的，便开河挖沟，好在苏州是个水城，深挖一丈便成为池塘。苏州人也很坦真，称苏州园林是‘假山假水城中园’。”而且园林不仅是假山和池水，园中的家具、陈设、雕刻、古玩、字画等，样样都是文化，园林也是听雪之堂、弹琴之处、看戏之所，是一种寻求天人合一的媒介。

与堂兄弟们在狮子林中玩耍的场景是贝聿铭难忘的童年记忆。“整个园林都是供我们玩耍的好地方。假山中的山洞、石桥、池塘和瀑布都会勾起我们的无限幻想。”他后来视园林为重要的灵感来源，“它使我意识到人与自然共存，而不只是自然而己。创意是人类的巧手和自然的共同结晶，这是我从苏州园林中学到的。”

狮子林有一个看似奇趣的名字，其实，它是一座禅宗园林。元至正二年（1342），天如禅师云游到苏州，偶然看上城东北角一处地方，虽处闹市，但林壑清幽，信众们出资为他买下，修建禅林。因天如禅师得法于浙江天目山狮子岩普应国师中峰，取佛经中狮子座之意，又取佛书“狮子吼”一语，故名“狮子林”。而园中各处房舍景致的命名，如指柏轩、问梅阁、冰壶井、玉鉴池，也都各有禅意。作家蒋晖告诉我，狮子林建园时，还有很多宋徽宗造皇家园林“艮岳”时的石头。这些石头大多是采自太湖的天然石灰岩，有的重几万斤，为了把这些石头运到开封，成立了专门运石的“花石纲”，分水陆两路交叉进行。水路用大船，要用泥浆塞满石缝，滚成圆形，沿途铺上大葱，推到船上；陆路用滚木，冬天就在路上浇水结冰，在冰上滑行。有些花石纲来不及运走的太湖石，就为后来的苏州造园

提供了上好的石料。蒋晖说，狮子林是丛林，是山林。狮子林里的假山怪石尤其突出，宋代废园遗址上林立着“状如狻猊不一”的石峰，“长长短短象牙竹，怪怪奇奇狮子峰”，很可能就是花石纲遗物。那些占据了视觉中心的太湖石各有奇名——“含晖”“吐月”“立玉”“昂霄”，而最高的一块形如雄狮，干脆就叫“狮子峰”。

从元代至今，狮子林几乎蕴含了半部江南禅宗史，还有诗歌、园林、绘画交织而成的艺术史。蒋晖认为其中最重要的是明初著名画家倪瓒。在去世前一年，倪瓒绘就一幅《狮子林图》，风格极为写实，几乎可以作为导览图。也正是因为乾隆皇帝被这幅画吸引，南巡时按图索骥，下令修复这座明末被毁的园林，狮子林才得以重生。

1917年，废弃的狮子林被贝聿铭的叔祖——因颜料生意在上海发家的贝润生用9900块银元买下，之后花重金扩建。作家王稼句告诉我，贝润生修复扩建的部分带有豪华的清朝式样，比如画舫，大量运用了水泥和彩色玻璃等新兴建材，给曾经的禅宗园林带来变异的繁复。其实，更大的变异还是园林的归属。旧时这些都是私家园林，养在深闺人不识，只在清明时节对外开园，现在都成了人流如织的公园。在这么多著名园林里，狮子林不是最大的，可能也不是景致最好的，它在拙政园、留园、网师园、环秀山庄之后才被增补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但它一定是最可游的。我们游览指柏轩前的大假山群时深有体会，这里永远有乐此不疲探迷宫的人。刚一进入，只觉得庞大，通道似乎也十分清楚，但走着走着就出现了岔路，被其中一条引导着越走越深，就很难找到来时的路了，听到同伴的声音，甚至看到人在哪里，竟然找不到过去的路，但一下子又山穷水复、柳暗花明了。据说这座假山群分上中下三层，21个山洞，九条曲径，真是个变幻莫测的石头迷宫。

贝聿铭日后不断回味太湖石的采石过程：“这些石头的加工制作尤其有趣，并且反映了我们对时间和家庭关系的理解。园中石头大都是多孔洞的火山岩石，石匠们以它们的可塑性来选择，再小心地将岩石撬开。然后，石匠在湖畔或河边仔细地寻找空地，将石头置于其中，任凭流水冲击，使其经过几代的天然侵蚀，石匠本人或是他的子孙后再收回石头，经过堆叠，终成假山。这种延续性具体地反映了中国文化——父亲播种、儿孙收获。”

他认为太湖石的故事还有深一层的寓意：“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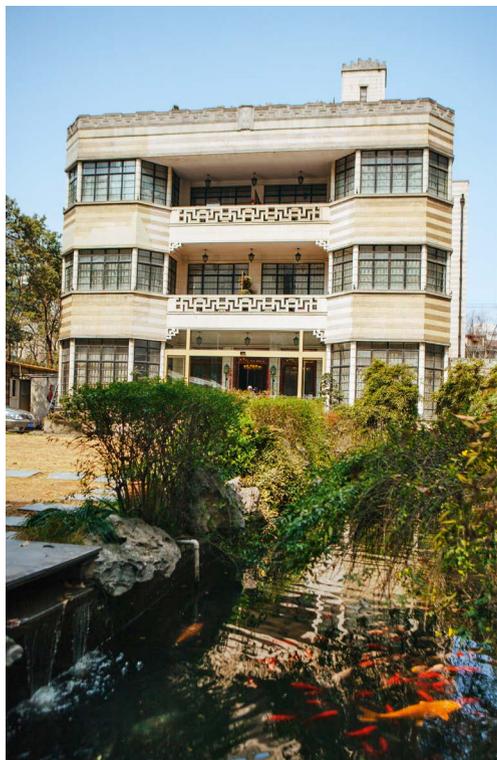
果我停下来想一想，我自己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也符合这种精神，我曾经被放置在许多不同的湖泊和溪流边缘，或者说，经常是被搁在水中央。而我的建筑物和别的任何一位建筑师的一样，总被不断地从流水中拖出，再收回。但愿这些建筑物的形状是经过极其谨慎的挑选的，而且是极为谨慎地放置在那里，可以与周围磨砺它们的激流相应和……”

新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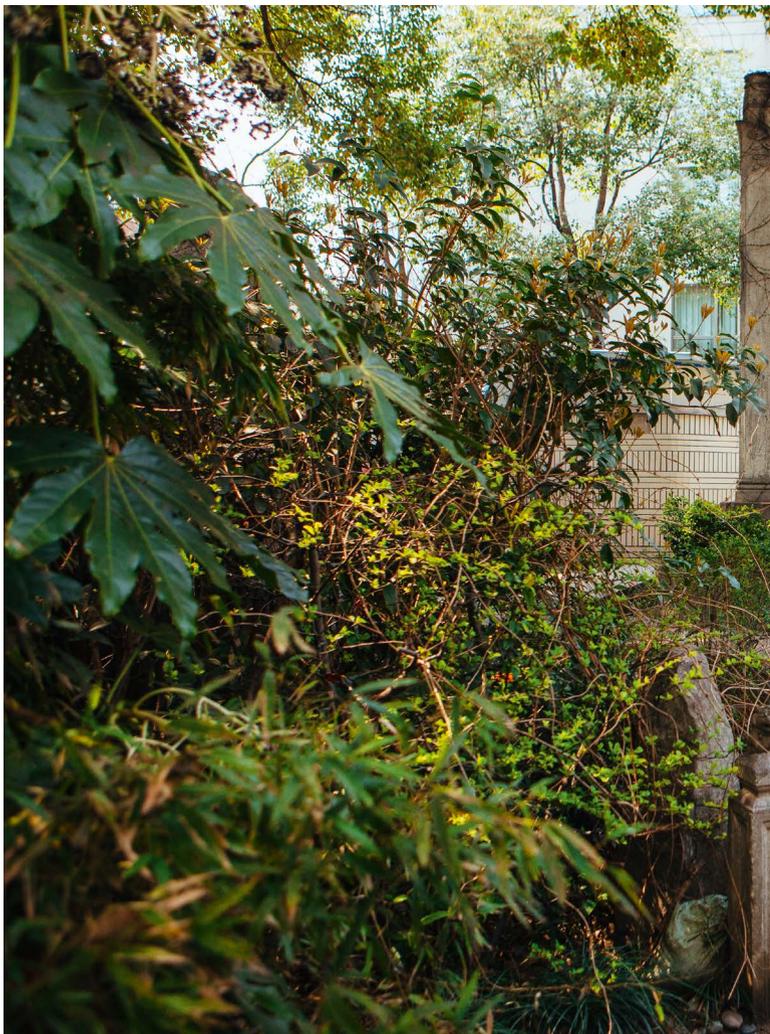
一直到17岁离开中国，贝聿铭少年时代的大部分时间是在上海度过的。那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海，正是黄金时代。自开埠以来，这个曾经的小渔村依托长江出海口的地理优势，一头连接着西方，一头连接着供给橡胶、煤、大豆、石油、面粉、棉花、丝绸、烟草等物品的中国内陆城市，成为一个华洋杂处、东西碰撞的远东第一大城市。

乘坐汽船沿黄浦江蜿蜒而上，映入眼帘的上海标志就是外滩。买卖商品所积累起来的财富需要相应的服务，于是上百家银行在上世纪初应运而生，尤以外滩为聚集地。直到今天，这条江边大道还保留着“万国建筑博览”的原貌，各种气势宏伟的花岗岩建筑鳞次栉比，尤以海关大楼、汇丰银行、和平饭店、中国银行为代表。而23号的中国银行，是外滩众多建筑中唯一一幢由中国人自己设计和建造的大楼，看上去和周围建筑风格一致，又融入了很多中国风格的细节，比如传统建筑式样的方形尖顶，栏杆和窗格处的镂空民族图样，是近代建筑东西结合的一个典范。不过，1927年贝聿铭的父亲贝祖诒从香港来到上海管理中国银行时，这里还只是德国总会旧楼基础上改建的营业楼，新楼从1934年才开始动工。

在上海，贝祖诒加入了一帮具有现代思想的银行家和实业家组成的小集团，这个小集团以宋子文为中心。他们意识到，要使中国摆脱半殖民地的境地，以一个提倡贸易、工业、现代教育和西式礼仪的新式中国逐渐取代旧中国，其中一项要务就是要在外汇领域维护自己的地位。在香港的十年磨炼已经使贝祖诒成为外汇业务专家，1930年中行总处成立国外部，由贝祖诒兼任主任。此后，他在所有的商业港口开办外汇交易业务，并在世界各地开设了18家中国银行分行。住在租界区的贝家当时的生活也是西式的：贝祖诒总是穿着高领西装，梳着分头，



1



2



3



4



1~5. 位于上海南阳路170号
的贝祖诒旧居“贝家花园”



参加俱乐部，打高尔夫球。

贝聿铭在2000年后设计苏州博物馆期间去上海时，曾让林兵带着他寻访以前住过的地方。林兵告诉我，他们去了南京路和石门二路交界的圆弧形转角大楼，那里原来是中银宿舍；又去了后来居住的武康路378号，当时与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陈立夫、国民党“中央财政委员会”主任委员陈果夫、陆军总司令顾祝同等人是一条马路上的近邻。不过，如今再去寻访，这里已经改造成了艺术家、设计师、精品店汇集的时尚街区“武康庭”，以前的大部分花园洋房还在，但贝家那幢被拆除了。还有一处是南阳路170号的“贝家花园”，如今用作一个餐厅和精品酒店。这幢钢混结构的小楼建于1934年，带有特殊的装饰艺术风格。从南入口进入，先是一个花园，其中假山、小桥、池塘、葡萄架等一应俱全，中央一座五角亭尤为特别，据说是寓意五行，而其中属金的一角正对大门。主楼为三层，酒店人员指引我们从一侧“龙梯”向上参观。所谓“龙梯”是入口处雕刻的龙形装饰，楼梯从这里盘旋而上。而旁边一侧还有一部电梯，据说是上海第一部OTIS电梯，现在仍可使用。主副楼之间的门廊照壁上也别有洞天，刻有100个不同的篆体“寿”字。而附近不远处的铜仁路333号也和贝家有关，这里是匈牙利建筑师邬达克在上海的最后一个作品，著名的“绿房子”，一度是贝润生的五女婿吴同文的私宅。

林兵还带贝聿铭去了趟圣约翰中学旧址所在地，陪他在原来的教室坐了一会儿。圣约翰中学如今成为华东政法大学的一个校区，很多老建筑还原样保留着。当时的圣约翰中学是美国圣公会教徒开办的一所昂贵的寄宿学校，致力于用西方式的价值观教导中国上层家庭的孩子，贝聿铭在学校的成績一直名列前茅。贝聿铭后来回忆，他在上海接触了新的建筑、艺术和生活方式，会在周末和朋友们乘车去闹市区，常去大光明电影院看电影，或者去桌球房打桌球。他后来甚至把桌球视为一种灵感来源：“桌球是一种几何游戏，我爱玩，也玩得不错。它其实是一种向量，一种几何的向量，玩桌球可以了解几何，这一点是我



左图：苏州阊门夜景

右图：苏州山塘街市井

后来才体会到的。同时，桌球也是一种策略游戏，其中确实存在一些作为建筑师所需具备的要素。”

在贝聿铭去打桌球和看电影时，附近的国际饭店也越来越高，这让他依稀看到了未来。“人家都说这幢楼要造 24 层，可我就是不相信！你想象一下，周围的楼都只有五层、六层、七层、八层，而这幢要有 24 层。所以每到周末我就会去看它慢慢升高……”如今的国际饭店在南京西路上当然不再那么突出，但在 30 年代，这幢深褐色的“24 层大楼”有“远东第一高楼”之称，非常豪华，有当时最高级的客房 200 多间。贝聿铭自己找到了建筑师的信息，这幢楼同样是邬达克的作品，当时上海流行殖民地古典建筑，邬达克是这方面的大师。从那时起，贝聿铭已经看到西方新建筑风格的萌芽，尤其被它所能达到的高度深深吸引了。

贝聿铭开始想做建筑师。父亲贝祖诒与很多英国银行家有交往，很自然地建议儿子去英国读书。然而，贝聿铭已经被电影里常出现的美国迷住了，对他特别具有诱惑力的是一部表现美国校园生活的《大学幽默》。他遵照父亲的要求参加了牛津大学的考试，但最终选择了美国的宾夕法尼亚大学，开始学习建筑。

回乡

贝聿铭一直喜欢将狮子林说成是自己的“家”，几次“家宴”也都设在狮子林里。可以理解，之前祖父在西花桥巷的家已经变成玉石加工场的一部分，不再是他可以怀旧的所在，狮子林所承载和象征的园林才是他可以寄寓内心的地方。

他也爱读古书。贝聿铭曾对林兵说，他的中国传统文化训练开始于香港。如果让他背一段唐诗，那他只能用广东话，不能用普通话或上海话。但他离开香港时只到 10 岁，中文程度还很浅，到美国之后，才开始大量阅读古典著作。他家里有不少中文藏书，包括唐诗、宋词、元曲和《史记》。贝聿铭觉得，韩愈的《祭十二郎》读来催人泪下，而陶渊明的《归去来辞》和《桃花源记》更是韵味十足。他经常翻阅这些藏书，很多都翻烂了，还让林兵替他多买些线装书。他告诉林兵，如果回到古代，他愿意做宋代人。

无法割舍的还有家乡菜。林兵告诉我，贝聿铭对什么吃的都感兴趣，喜欢大闸蟹，也喜欢红烧肉。他太太是天津人，每个月帮他包一次饺子，他说最好吃的是太太包的饺子。来到苏州，有时候林兵帮他点菜，回忆起很多小时候的味道。林兵说，他经



常讲起的是鸡头米，也叫芡实，8月底上市，因此有一道时令菜叫桂花鸡头米。贝聿铭记得小时候有人在剥鸡头米，那是一种果实有点像鸡头的水生植物，皮很难剥，很难吃到，但吃到嘴里很软糯。

贝聿铭在狮子林宴席菜单上特意指定了这道菜。张一苇告诉我，因为狮子林里不能开火，特意找到了相隔一个弄堂的苏州民俗博物馆，那里有个专为供应民间小吃而设的餐厅，灶头很小，只能由总厨掌勺，其他大厨配合分碟上桌。宴会前一天，贝聿铭来到苏州，还对厨师提出要求，说能不能将苏帮传统菜做成像粤菜那样的清淡，菜里不要勾芡，要吃得出地地道道菜的原味。他勾掉了前菜里的冷盘和水果，将第一道菜换成蟹黄小笼，才定下了菜单。为了照顾大部分客人的分餐习惯，也想了很多办法。比如苏州名菜松鼠鳜鱼，本来是整条上桌，厨师采用200多克的太湖小鳜鱼，做成每人份的，这样每位客人面前都有一份有头有尾的缩小版松鼠鳜鱼。当时设在苏州民俗博物馆的那个餐厅现在已经搬到附近，曾见证了这场家宴的餐厅老板沙佩智告诉我们，贝聿铭有两道菜吃了两份，红烧肉和鸡头米，因为太太不吃荤的和甜的，而这两样正好是他爱的。沙佩智后来将贝聿铭题字的放大复制品挂在新餐厅

的入口照壁处，“天珍海味”，看上去寓意巧妙。据说贝聿铭几天后跟人说起：“哎呀，我前几天有个字写错了，应该是‘山珍海味’啊。”

贝聿铭后来才意识到，苏州园林的经验为他带来了什么：一方面是领悟到人与自然的关系，另一方面是如何将建筑设计得令人振奋。“中国园林就像一个迷宫，置身其中，你很难一眼望尽，永远不能领悟全局。一进园林，你就会被美景吸引而驻足流连——这美景或许是一棵树、一块石头或者一隙光影。你漫步小径，或踱过小桥，沿着蜿蜒曲折的园路，永远步移景异……它关乎尺度，关乎散点透视，也关乎偶然——那种出人意料的欣喜。在设计空间时，建筑师也必须这样做，必须创造惊喜让人们去发现，可以使人向左、向右或向前，鼓励人们去看、去探索。”因此在做苏州博物馆时，贝聿铭清醒地意识到依托和边界在哪里。他指着新馆与拙政园公用的一面隔墙说：“这就是界线。”

我们在苏州遇到贝聿铭的侄子贝念祺，他专门从美国赶来参加“贝聿铭文献展”。他在苏州博物馆开馆后又留下两年，负责开发文创产品，因为贝聿铭认为文创也是博物馆设计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贝念祺在某种程度上也在完成贝聿铭的心愿，想要好好观察一下博物馆怎么被人使用。他告诉我，有一个90多岁的老人，在苏博开幕的第二天去参观，被问起印象时说：“我觉得很舒服。”贝聿铭听到后说，这是最让他满意的评论。“再怎么设计，是为人设计。要是人觉得舒服，我就成功了。”

抛开西方对东方的想象，林兵仍认为贝聿铭是一个中国贵族。在他看来，贵族性其实不仅在于生活的讲究，而是一种精神上的圆融。“他的哲学还是一种东方式的，和生活融合在一起的。他重视商业，也重视艺术，这也是中国人讲究的一种境界，一种平衡感。有人说贝聿铭没有建立理论，也可以说他的理论并不抽象，是和他的建筑结合在一起的。他的建筑是有血有肉的，有单纯性、高傲性，同时也有大众性。”林兵说，如果去美国国家博物馆东馆看，会发现入口处的一面墙，上面刻的贝聿铭名字全被摸黑了，可见他的受欢迎程度。“当时东馆的领导告诉我们，两次清洗这个墙面都洗不掉，因为太多人喜欢摸他的名字，说他是东方建筑师，摸他的名字会带来好运。”

（感谢实习记者魏已然帮助。参考资料：《神秘的东方贵族：贝聿铭和他的家族》，张一苇著；《贝聿铭传》，迈克尔·坎内尔著；《贝聿铭谈贝聿铭》，波姆著）

“大卢浮宫” 30 年，争议与和解

记者 张星云



贝聿铭在法国拿破仑广场建造的
玻璃金字塔。将近 30 年过去了，
现代的玻璃金字塔正在逐渐融入古老
的卢浮宫，并成为其历史的一部分





左图：贝聿铭在卢浮宫金字塔模型前

右图：1989年4月1日，巴黎市民在刚刚建成的玻璃金字塔旁休息



卢浮宫改造项目的整个过程中，贝聿铭做了很多建筑设计以外的事情。面对法国的悠久文化传统、行政体系和社会舆论，他始终知道自己应该站在什么位置——历史与现代、艺术与政治的平衡点。

1989年的贝聿铭根本想不到，如今参观卢浮宫的游客会有这么多，工作人员需要用玻璃罩和金属栅栏把观众阻隔在《蒙娜丽莎》之外，玻璃金字塔入口前会排起那么长的等待队伍，地铁出口的罗姆人女孩会微笑着用签名纸板挡住游客视线趁机行窃，巴黎遭遇了数次恐怖袭击，手持法玛斯自动步枪的巡逻特警穿梭于与金字塔合影的人群之中，卡鲁塞尔地下商业街的商业画廊成了各国艺术家们招摇过市的“镀金”圣地，中国游客越来越多，但依然没有中文语音讲解器。

虽然说当年贝聿铭顶着种种争议完成了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提出的“大卢浮宫”计划，但实际上针对卢浮宫的改造在这近30年来从来没有停止过。

2006年，当年参观卢浮宫的人数已经上升到了830万人。时任卢浮宫馆长亨利·卢瓦雷泰(Henry Loyrette)找到贝聿铭，希望他能设计出一种新方案来解决金字塔下方的人流拥堵问题。此时的贝聿铭已经明确表示不再接大项目，但他还是仔细研究了入口拥堵的原因。“当初没能料想到卢浮宫会这样



的成功，是否是我的一个失误呢？”贝聿铭自问。

于是，2007年贝聿铭再次来到巴黎，在卢浮宫博物馆代表弗朗索瓦丝·马尔杜斯（Françoise Mardrus）的陪同下，再次在卢浮宫进行实地研究，就像20多年前他刚接到卢浮宫改造项目一样。

在接下来的几年中，马尔杜斯每年都会带着卢浮宫的后续改造方案，专程坐飞机去纽约，向贝聿铭做汇报，听取他的意见。于是，为了分流，卡鲁塞尔地下广场开设了新的副入口，单个主咨询台变成了23个服务点，纪念品商店和餐厅从玻璃金字塔

的地下广场搬到了地面室外。

后来，与马尔杜斯对接的人从贝聿铭变成了贝聿铭的儿子，再后来马尔杜斯调任卢浮宫馆史部门负责人。从1989年玻璃金字塔建成至今，将近30年来，这样的联系一直持续，直至今日，卢浮宫所有的改造工程，都遵守着贝聿铭当年的工程原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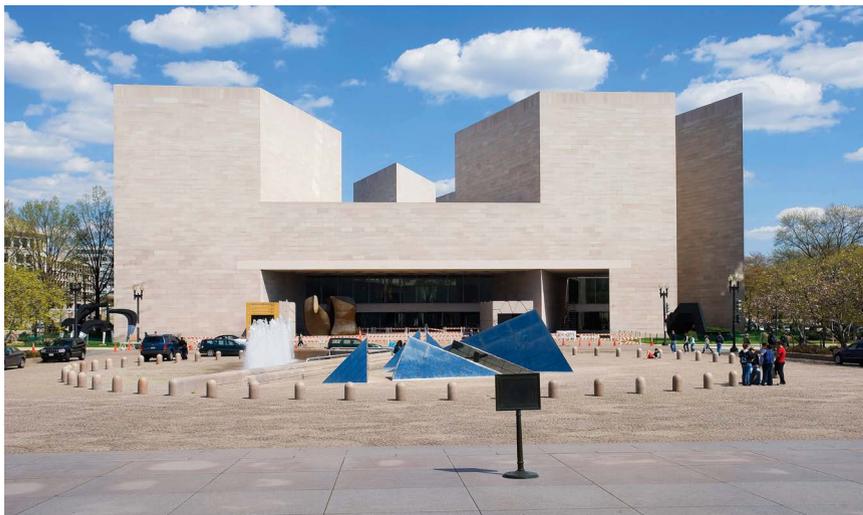
“玻璃金字塔是一个超越时代的建设项目。”马尔杜斯对本刊评价道。

马尔杜斯1988年从文化遗产学院毕业，作为文物保管专家进入卢浮宫工作，当时她还是个28岁



上图：1986年10月31日，卢浮宫玻璃金字塔施工现场

下图：法国总统密特朗因为这座华盛顿国家美术馆而喜欢上了贝聿铭的设计



的姑娘，如今已经 57 岁，成了一位临近退休的卢浮宫老员工。这些年，她被任为卢浮宫与贝聿铭的直接联系人，因为她经历了玻璃金字塔和新卢浮宫的从无到有的整个过程。“我很幸运，当时作为一名年轻的博物馆管理员，竟然有了这么独特的经历。如今看来，也正是这独特的经历，影响了我这辈子的职业生涯轨迹。”

马尔杜斯还记得，贝聿铭曾对她说过，卢浮宫改造工程也是他一生的工程。“随着时间的推移，玻璃金字塔本身，也已经成为卢浮宫历史的一部分。”马尔杜斯说道，“而贝聿铭很清楚一个博物馆是如何发展和变化的，他始终知道自己应该站在什么合适的位置上。”

总统纪念碑

1988 年 3 月，当时的总统密特朗在玻璃金字塔工地里接受一场电视直播采访。此时金字塔建造已经接近尾声，所有的玻璃组件已经安装到了金属架上，建筑总体基本密封，也让金字塔内部不再接触巴黎初春阴雨天气透着的湿冷。密特朗脱下外套，双手合十，神采奕奕地向他身边的两名电视台记者描绘着将来的景色：从卢浮宫的玻璃金字塔望过去，穿过杜勒伊花园和协和广场，穿过香榭丽舍大道和凯旋门，一直可以看到最远端的拉德芳斯新凯旋门。

记者问道：“从卢浮宫到新凯旋门，我们可以理解为，这是一种权力的展示，是您一个人决定的事情？”

“这是一种非常决断的权力方式。”密特朗答道，“这里是法国历史的核心，我们旁边就是腓力二世的塔楼，他正是在这里宣布了法国的统一。另一边曾经是杜勒伊宫，它是从凯瑟琳·德·梅迪奇之后现代卢浮宫的起源。毫不夸张地说，能在这里建造新的作品，对整个法兰西精神都是一种鼓舞。我不敢妄自定义法国美学，不过我觉得自己对卢浮宫确实做了一些贡献。”

这段电视直播采访发生在 1988 年 3 月，密特朗的第一个 7 年任期行将结束，距离当年 5 月份的法国总统大选只有两个月的时间。而卢浮宫改造项目作为密特朗首个任期最主要的政绩之一，尽管始终加快脚步，但此时仍没有完工。当时法国上下没有多少人认为密特朗可以成功连任，在临近大选之前，卢浮宫的工程也屏住了呼吸，甚至财政部从卢浮宫黎塞留馆迁出的计划也因此停滞，所有人都在

等待 5 月份大选结果，再决定是否继续工程。

于是，1988 年成了密特朗总统的关键一年，也是卢浮宫的关键一年。密特朗站在金字塔工地里，接受了这场电视直播采访，以求为自己拉得更多选票。最终他成功了，以 54% 的支持率获得总统连任，当然这是后话。

而在密特朗 1981 年成为总统时，巴黎是一个大兴土木的年代。两位前总统，蓬皮杜建了蓬皮杜艺术中心，德斯坦有奥赛博物馆。如果说每位总统在任期内都为自己竖起了纪念碑，那密特朗则为自己竖起了一片纪念碑林。上任总统几天后，他就叫来了刚被任命的文化部长雅克·朗（Jack Lang），请他尽快列出一个单子，列出所有巴黎市需要建设的宏大规划。这些规划一方面需要具有象征意义，另一方面可以真正回应一种文化和知识上的需求。于是，“大文化都市计划”就此展开，世界博览会、拉维莱特公园、拉德芳斯国际交流中心、音乐城、巴士底歌剧院等一系列文化设施建设项目成立，当然也包括被称为“大卢浮宫”（Grand Louvre）的卢浮宫改造计划。

1981 年 9 月密特朗上任总统后的第一场新闻发布会，便宣布了卢浮宫改造计划，卢浮宫将彻底变成一座博物馆，一直以来位于卢浮宫黎塞留馆的财政部将彻底外迁出去。卢浮宫改造计划的工程极其浩大，最快也需要在至少 7 年之后完工，也就是说，如果密特朗希望卢浮宫改造计划顺利进行，就要有强大的信心认为自己能够在 7 年任期之后的总统大选中竞选连任成功。

为什么是贝聿铭？

1982 年 10 月，密特朗任命埃米尔·比亚西尼（Émile Biasini）负责卢浮宫改造计划负责人。建筑师人选很快提上了议事日程。比亚西尼通过画家赵无极牵线，联系到了贝聿铭，并于 1982 年 11 月在巴黎拉斐尔酒店第一次见到了贝聿铭夫妇。比亚西尼还记得，当他试探性地提出改建卢浮宫项目时，他观察到贝聿铭礼貌微笑之下的惊讶。

连比亚西尼都没有料到，其实在他第一次与贝聿铭接触之前，密特朗总统早就有意让贝聿铭成为卢浮宫改造项目的建筑设计师。70 年代，密特朗作为法国社会党总书记访美期间，就因华盛顿国家美术馆喜欢上了贝聿铭的设计，而那座博物馆使用的小型玻璃金字塔正是后来卢浮宫玻璃金字塔的原型。

贝聿铭此前在巴黎拉德芳斯设计方案竞标中被冷落，很清楚改建卢浮宫非常困难，因此面对如今密特朗的邀请回复道：“我年纪大了，不想再为了一个项目去搞竞标，要么直接把项目交给我，要么就让别人去参与竞标而我放弃。”这是贝聿铭职业生涯后来的习惯，他认为如果几位建筑师进行公平竞争，意味着在评选过程中业主与建筑师应尽量减少接触，但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早期设计和概念设计的脱离，最初的设计也很可能在竞标的过程中被改得面目全非。

法国的法律规定，大型项目建设需要向建筑师进行招标，但为了得到贝聿铭，密特朗收紧并集中了权力。由于并不对卢浮宫古建筑进行重建，而是一次翻修工程，因此密特朗授意由卢浮宫首席建筑师乔治·迪瓦尔领导整个工程，而贝聿铭在法律层面只是一名副手，以此钻了一个法律上的空当，避开招标。

密特朗给予了他绝对的特权，但贝聿铭深知法国政府行政和办事风格，他需要帮手。此外卢浮宫整体改造项目，不仅包括卢浮宫玻璃金字塔，还有金字塔下方的地下空间、博物馆各个展馆的入口、地下商业街、与杜勒伊花园的连接、与地铁出站口的连接、为游客服务的各项基础设施。贝聿铭负责卢浮宫金字塔设计方案外，诸多其他项目的设计需要法方建筑设计师的参与。

他请比亚西尼为他推荐一名法国建筑师，要年轻，也要了解法国的行政体系。于是米歇尔·马卡利（Michel Macary）成了贝聿铭的副手。马卡利后来不仅在工程中起到了全盘协调的作用，同时还设计了地下商场和停车场等部分。这名年轻的法国建筑师就此成长，后来他自己的设计作品法兰西大球场同样成为巴黎的标志之一。

“尽管心情十分激动，但我并没有马上接受这个项目，而是请求密特朗总统给我四个月的时间去仔细探索一下。卢浮宫的历史和法兰西的历史紧密相连。我需要好好地对此进行了解和研究。从12世纪到现在，一个个统治者来来去去，不断拆拆建建，卢浮宫可以说是法国人的纪念碑。”贝聿铭后来在回忆中提道，“我起初以为，向密特朗申请这四个月的时间会遭到拒绝，甚至让他改选他人。因为时间比较急，他确实有不少压力，急于做出一些成就来。”时间对密特朗来说非常紧张，他1981年上台，任期7年，而当时已经1983年了。

于是，1982年到1983年底，贝聿铭多次来到

巴黎，对卢浮宫进行了细致研究。他整天泡在卢浮宫和图书馆里，沉浸在法国历史中，只带着一名向导，在卢浮宫的各个展厅和走廊里低调地考察。当时的卢浮宫馆长米歇尔·拉克洛特（Michel Laclotte）的办公室朝向骑兵凯旋门花园，好几次，他看到贝聿铭“独自一人在那里散步、观察、丈量”。

“对于法国人来说，卢浮宫不仅仅是拥有绝品收藏的博物馆，更是他们历史甚至日常生活的核心。凯瑟琳·德·梅迪奇、亨利二世、亨利四世、路易十六都是法国人耳熟能详的名字，可是我对他们并不熟悉。”贝聿铭决定放下建筑师的身份，以一名景观设计师的角度来观察。

他在寻找古老皇宫与大型博物馆的一种融合方式。那段日子，贝聿铭除了在市內，也去巴黎郊区的沃一勒一维贡特府邸花园和凡尔赛宫后花园溜达，他喜欢安德烈·勒诺特尔（André Le Nôtre）的花园设计。他认为勒诺特尔的作品有着某种“现代性”，后者对空间和几何图形的把握，跳出了当时巴洛克时期的复杂，表达了一种超越一般园林设计的共通性。后来贝聿铭在1989年《大卢浮宫》一书的序言中写道：“给我最大启发的莫过于勒诺特尔。金字塔的律动来自整个建筑的几何性，而这种几何性正是根植于法国文化的。”

实地研究一直在持续，但玻璃金字塔的设计思路一直埋藏于贝聿铭脑子里，并没有向任何人透露。甚至到了1983年6月，考察完毕的贝聿铭在爱丽舍宫向密特朗介绍设计初稿时，也只是向密特朗强调“光线”的重要性，以及必须有“一个透明的玻璃覆盖物”，只字未提金字塔。《费加罗报》（*Le Figaro*）那年7月6日的文章，也只是说会有一个巨大的地下层，用来接待公众，还有一个扶梯通向这个地下层，其余一概不知。

即便如此，听过初稿介绍的密特朗给出的结论是：“必须马上签合同，必须造成既定事实，让大家没有办法找理由后退。”他很清楚，他们必须以最快的速度，否则人们就会对整个新卢浮宫项目产生质疑。当年11月，见到金字塔设计计划的密特朗将其视为自己必须亲手抓的项目，并宣布：“1986年必须完成玻璃金字塔的第一期工程。”

“在权力的运用中，这样的不可回头性是非常重要的，有太多的规划被推迟、减缩或放弃。”当时的文化部长雅克·朗向本刊忆道，“我当过两次文化部长，我充分了解时间的重要性，在开始的时候，必须快速行动。”



1989年3月29日，贝聿铭（左三）与法国总统密特朗（右）等要员一同参加金字塔建成开门仪式

快速行动的第一步，就是将建筑方案提请历史建筑高级委员会通过。

历史古迹最高委员会

在卢浮宫金字塔各个版本的故事里，1984年1月23日举行的历史古迹最高委员会（Commission Supérieure des Monuments Historiques）会议，永远是故事的最高潮。

在后来法国电视台 ARTE 出资，由弗雷德里克·孔潘（Frédéric Compain）指导拍摄的纪录片《卢浮宫：金字塔之战》（*Louvre: la bataille de la pyramide*）中，贝聿铭面对镜头也曾回忆起那次会议，虽然只言片语，但始终保持着微笑。在黑框圆眼镜里，他的眼睛因为微笑眯成了一对半圆形，几句话说完，他会用微笑来填补访谈间隙的空白，一种亚洲人的微笑，礼貌又真诚。

在这场会议中，贝聿铭本人来介绍他的建筑方案和模型。他面对的是一大批保管员出身的专家，和他们所代表的保守意见。

贝聿铭的报告是他和团队几个月来准备的论

据。金字塔将“只是一个巨大的地下层的表面露出部分，这个地下层的设立是根据卢浮宫博物馆的根本需要以及不动原建筑的原则而定的”。金字塔是整个建筑最终的、可看见的部分。“整个建筑是一个被‘埋在地下’的建筑，金字塔就像是他的穹顶。这个地下建筑的建造遵从一种不可反驳的内在逻辑：将卢浮宫两边的楼联成一个高密度的整体，为它提供以前严重缺少的接待、技术管理和学术研究的空间。假如这一严重匮乏的现象不得到解决，卢浮宫渐渐就会沦为一个1908年前的墓穴。”

所以，仅仅收回财政部占用的黎塞留馆空间将无法解决博物馆的“深层需求”，包括仓库、资料中心、餐馆、接待。必须有新的空间。也就是说往下挖，给这个有两个大庭院的长方形建筑群体一个重心，将其转变为一个高密度的建筑，相互之间有着交叉的联系。按贝聿铭的说法，卢浮宫需要一颗“心脏”。而且，“这颗心脏需要光。金字塔最重要的不是它特殊的形态，而是它将光线带入了地下的两层空间。同时，作为主入口，游人可以通过它进入卢浮宫周围的三个馆”。在此，修复中世纪的古城堡和圆楼，以及建一座玻璃金字塔，是“同一种逻辑的

两个极。它们相互补充。回忆它的根，是为了在未来走得更远”。

揣着这样一份完整的报告，1984年1月23日，贝聿铭走进了历史古迹最高委员会安排的会议室。

整个会议十分吵闹，氛围充满了敌意。乔治·布瓦松(Georges Poisson)在其所著的《卢浮宫大纪实》(*La grande histoire du Louvre*)中重现了当时的场景。介绍会全场关灯，67岁的贝聿铭用幻灯片的方式一张一张地介绍他的设计方案。后来雅克·朗分析称：“也许这是一个战术上的失误，因为有些人利用黑暗表达他们的不满，甚至到了没有礼貌的地步。”

黑暗中，委员会成员们不满的声音越来越大，当幻灯片播放完，全场重新亮灯之后，会场炸开了锅。委员们疯狂地批评着贝聿铭的设计，不懂法语的贝聿铭并不知道对方说了什么，但他身旁的女翻译却已经含着泪水哽咽着没有再翻译下去。“我们这里可不是大马士革！”“你为什么要到巴黎来毁掉我们的建筑遗产？”“不可理喻！”委员们把贝聿铭的设计比作“一个巨大的破玩意”。而当贝聿铭告诉委员会金字塔看上去就好像是一个闪亮的钻石一般光芒四射，委员会回答：“不，贝先生。它看上去一定很丑，或者像很便宜的假钻石。”

贝聿铭后来回忆道：“那是一次可怕的会议。好在我懂的法语有限。当时如果我听懂了他们讲些什么，我一定会离开的……他们并不要求我解释方案，而是一个一个地攻击我，而且都是一些名人，是建筑学院、美术学院里最有名、最受人尊敬的人……为我翻译的那位女士很想为我抵挡那些充满羞辱的抨击，委员会当时就想把这个工程置于死地，他们差点就成功了。”

再回到1月23日那天，委员会成员们的讨论和批评还在继续，没有停止，时间就这样一点点过去了。到了下午1点多，委员会成员们一个个起身离开房间，去吃午饭。委员会成员们相互交头接耳：“我们该怎么投票？”到了此时，雅克·朗主管遗产的助理让·皮埃尔·魏斯(Jean Pierre Weiss)才突然意识到，委员会的章程中没有规定对所有项目计划必须进行投票。“我觉得在座的各位对这个设计方案都发表了长时间的意见，大家也都非常诚实地研究了这份报告。”魏斯此时耍了一个小聪明，对委员会成员们表示，需要对贝聿铭介绍的金字塔方案投票，也另外需要对卢浮宫改造的整体方案投票。

最终，在雅克·朗向密特朗递交的报告中，评



左图：玻璃金字塔内部的旋转楼梯给空间带来了变化与动感
右图：从内部空间仰望玻璃金字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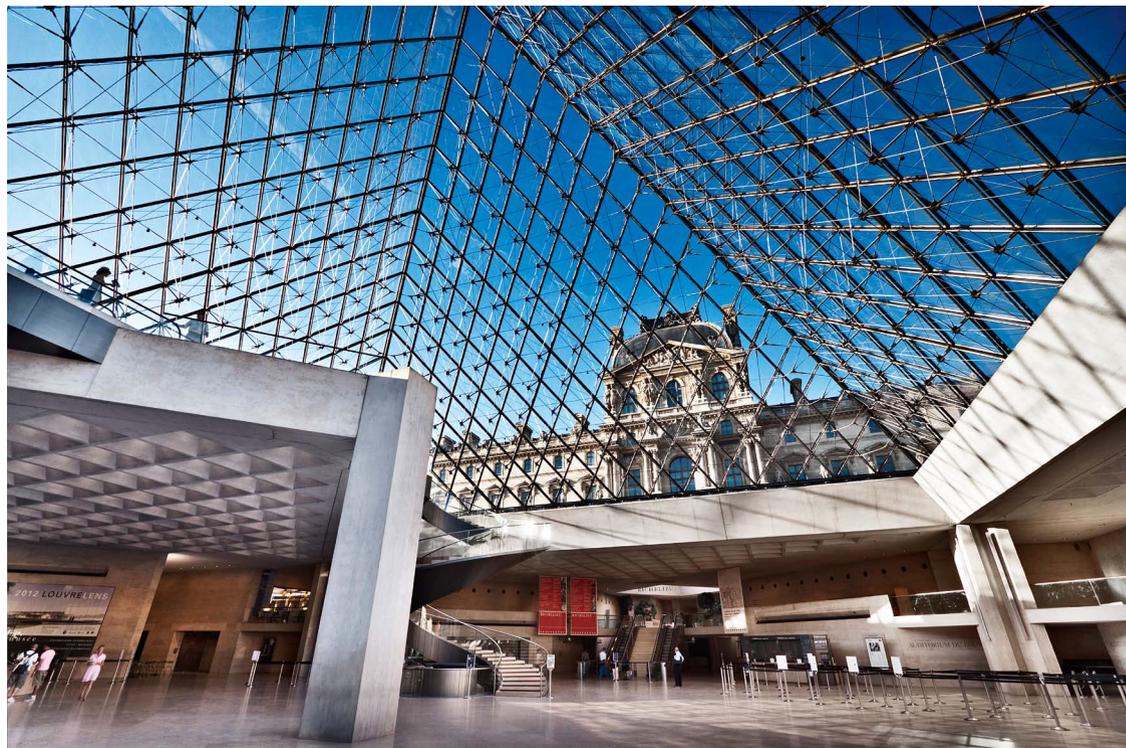
审结果被整理为：委员会一共49名成员，18人无条件赞成，13人坚决反对，大约17人对整体方案同意，只是对金字塔的建造持保留意见。雅克·朗还在报告中安慰密特朗说：“这是一个我们得到的最好结果。因为这个委员会在原则上是反对一切新建筑的，要知道，他们驳回了以往各届政府的所有建筑方案。”

艰难赢得法国历史古迹最高委员会的许可仅仅是第一步。

舆论之战

当天晚上，《法兰西晚报》(*France-Soir*)就提出了质疑，整版文章题为《新卢浮宫已经出现丑闻》。让·杜图尔(Jean Dutourd)在他编者按中以“可怜的法国！”为题。第二天，《法兰西晚报》发表了金字塔模型的首张照片，而在此之前，按理说不允许任何信息泄露，历史古迹最高委员会的会议也都不是公开的。这引发了巨大的争议。

右派报纸《费加罗报》使用的标题皆是《不可理喻》《巨大的错误》《这又不是大商场》。接下来两天，《自由巴黎人》则以《令人惊讶的中国金字塔》为题，让·杜图尔在《法兰西晚报》甚至发表了《呼吁暴动》。



代表法国精英知识分子的媒体《世界报》(*Le Monde*)则以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告知它的读者。在一篇温和的文章中，人们可以读到这样的分析：“整个建筑属于极简主义风格，追求一种最好被人忽视，却又无可置疑的存在。贝聿铭的设计方案明确标明了博物馆的入口，而且解决了至今一直没能解决的通行问题。”但就在这篇文章旁边，还有一篇艺术评论专栏作者安德烈·费尔米热尔(André Fermigier)的评论文章，题为《死人之家》(*La maison des morts*)。“他们将卢浮宫的回廊庭院变成迪斯尼后院。”费尔米热尔强烈抨击贝聿铭设计的地下空间，“这太好玩了，这一细节，再加上金字塔本身具有的象征性，很好地向人暗示，一个博物馆，尤其是卢浮宫，只能是一座死人之家。”

没过多久，费尔米热尔便被一向文风严谨的《世界报》炒了鱿鱼。一年之后，他加入了卢浮宫翻新协会。该协会的创始人和会长米歇尔·居伊(Michel Guy)，在蓬皮杜总统时期曾作为其亲信组织法国文化节日活动，德斯坦总统时期他还曾担任文化部长。而此时他组织起了规模强大的非政府组织卢浮宫翻

新协会，专门呼吁反对卢浮宫改建计划，并出版了合著书籍，名为《巴黎的困惑，新卢浮宫的巨大幻影》(*Paris mystifié, la grande illusion du Grand Louvre*)，为该书作序的是法国著名摄影师亨利·卡蒂埃-布列松(Henri Cartier-Bresson)。新小说派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Marguerite Duras)、娜塔莉·萨洛特(Nathalie Sarraute)以及人类学家米歇尔·雷里斯(Michel Leiris)也加入了卢浮宫翻新协会。

也是在同时，卢浮宫方面进行了回击。《世界报》在1985年2月出版了一份关于新卢浮宫的专刊，其中难得地见到贝聿铭言辞犀利地捍卫自己的设计理念。“人们将此事变成了一个政治事件，说了许多并不确切的事情。这样做不太光明正大。坦率地说，我愿意与任何一个提出其他解决办法的人去比较，但没有人提出来……在美国的话，我会参与辩论，我会回应。但在法国，我不能，因为我是一个被邀请的外国人。但很可能在美国不会有这样一场辩论。我来自中国，一个具有几千年传统文化的国家。它有令人自豪的过去，但那是过去。法国人非常着

恋过去。我经常遇到一些人跟我讲起路易十四，仿佛他们昨天才刚刚见过……假如说我仅仅是个美国人，也许我很难适应。但由于我属于两种对立的的文化，两个极，而法国又在中间，我可以理解。”

这个漫长的辩论过程，使得玻璃金字塔不再仅仅是巴黎人茶余饭后的话题，而成为一场全国性的讨论。当然，这种争议在法国由来已久，从埃菲尔铁塔到蓬皮杜艺术中心，法国公众舆论始终以尖锐而出名。时任卢浮宫馆长米歇尔·拉克洛特很豁达，他认为无论争议多么激烈，都是健康的。“即便法国人民常常对情况不够了解，甚至带有恶意，但舆论对此的关注，证明法国人民对文化感兴趣。”

雅克·希拉克（Jacques Chirac）成为熄灭争论的重要人物，他既是当时的反对党领袖，又是巴黎市长，所以直接与卢浮宫改造有关。

贝聿铭在埃米尔·比亚西尼的陪同下到巴黎市政厅向希拉克介绍了整个方案。“从城市规划角度来看，这一重建方案达到了完美。”听完之后，希拉克并没有明确表态，“无疑，这是一个有意思的解决方案，值得人们认真研究。”希拉克希望得到更多信息。为了验证可行性，他提出，希望能够在卢浮宫广场上放置一个与实体同等比例的模型，采用光缆搭建，而非比亚西尼最早提出的采用激光。

1985年5月1日，一台高达70米的巨大起重机械，将一个同等比例的金字塔光缆结构模型从上空吊下，放置在了卢浮宫的拿破仑庭院中。希拉克来了，而贝聿铭因航班延误没能准时达到模型架设现场。现场所有人都在讨论：“这样怎么能行？”“这样看着还不错。”希拉克没有说一句话，围着工地绕了一圈，然后对等候多时的记者们表示，此时他才意识到它的比例很完美。从那一刻起，反对之声逐渐减少。贝聿铭后来总结道：“金字塔这一仗持续了约18个月，希拉克对实体模型的接受是关键中的关键，是一个转折点。”

论战结束了，设计方案通过了，而接下来的实际施工则是另一场战争。

无色玻璃

玻璃金字塔的建造有着极大的难度。贝聿铭要求玻璃必须是安全系数极高的、完全平面的、完全透明的，以便从金字塔内部仰望卢浮宫外部建筑的时候，没有任何变形，也不会因为玻璃而变色。他尊重法国的手工业传统，将制造工作交给了圣戈班

公司（Saint-Gobain）。这是一家历史悠久的法国企业，最早的作坊在路易十四时期就出现了。但所有专家都知道，完全透明、无色的玻璃是不存在的。贝聿铭也知道这一点，但他不愿意放弃这一想法。“两块玻璃板的叠加尚且是绿色的，金字塔是一个四面体，四块玻璃板叠加时，颜色就变成了像啤酒瓶一样的暗绿色。如果用这种玻璃，和原建筑的蜜色不搭配，整个卢浮宫就会变得面目全非，这样肯定不行。那样一来，我也就会在法国背上千古骂名了。”贝聿铭后来说道。

他是一个固执的人。在圣戈班公司开了一次会之后，法国工程师们以为已经说服了贝聿铭，告诉他那计划是完全的理想化，不可能实现。但是几天之后，贝聿铭手里拿了一块玻璃，向法国工程师们展示。它是完全透明的，由德国人制造，用于喷气式飞机，但只在很小面积使用时才拥有极高耐用性。贝聿铭礼貌地请圣戈班公司的工程师们研究一下这块玻璃是怎么回事。就这样，他与工程师的关系一度变得非常紧张。

贝聿铭很聪明，此时的他，经历过历史古迹最高委员会的汇报会和与媒体的大论战，已经掌握游刃有余地面对法国人的办法。最后的解决方式是，他跑去找密特朗告状。

贝聿铭：“有没有白色玻璃？”密特朗：“什么白色玻璃？透明玻璃吗？有啊，为什么不用呢？”贝聿铭：“圣戈班不肯做。”圣戈班的总裁马上插嘴道：“如果你们要造1000个这样的金字塔，我们给做，但你们就造一个，没门儿。”密特朗只说了一个字：“做！”事情就解决了。

为了制造出令贝聿铭满意的玻璃，圣戈班公司重新启用了—一个古老的作坊，并采用了一种古老的制造手法。1985年5月，这家公司的领导自豪地向媒体宣布，他们的技术人员“找到了一种办法，可以改变玻璃的色彩，去掉一切铁含量，从而获得了一种理想的透明度”。最终圣戈班公司做出了一种几乎完全无色的玻璃，而且可以在大面积使用时十分牢固。

金字塔的石板地面和混凝土天花板也同样讲究，贝聿铭要求使用与他在华盛顿的博物馆一模一样的特殊混凝土。他在这些细节上花费了很多心血，“就好比是在凡尔赛宫铺木地板”。就像对圣戈班公司的态度和方法一样，贝聿铭如法炮制，没有人敢不服从总统的意志，也很少有企业在卢浮宫工程中挣到了钱。

“如今看来，贝聿铭对建设的高要求，尤其是他对建设玻璃金字塔的玻璃材料的高要求，不仅直接地为诸多法国建筑领域的工作者提供了工作机会，其实间接地拉高了当时法国建筑领域的整体技术水平，这种影响作用了几代法国建筑工作者。”弗朗索瓦丝·马尔杜斯对本刊评价道。

在金字塔地面工程大体结束之后，人们在工地上组织了一次烤全羊晚宴，邀请了所有参与的工人们，一晚上吃了30多只羊。当晚酒足饭饱，下意识地，人们感到自己正在创造一段历史。轻松的气氛中，大家甚至开了个玩笑，将羊骨头原地掩埋，埋在了混凝土的地面之下，并期待着引发未来的考古学家们的猜测：难道20世纪末的巴黎，还举行了一场祭祀仪式？

1989年3月29日，在雅克·朗和比亚西尼的陪同下，进入第二总统任期的密特朗为金字塔和正下方的拿破仑大厅剪彩。三人站在一排，走进玻璃金字塔，顺着旋转楼梯缓缓走下，神采奕奕。人们为贝聿铭鼓掌，全世界的媒体都为他的作品叫好。第二天，公众蜂拥而至，以前的争议和羞辱被人遗忘了。

职业生涯的转折点

随后的故事就顺利了很多。同年财政部彻底搬走，黎塞留馆的整改工程正式开始。贝聿铭将不同的设计工作分给不同的合作伙伴，并充满创意地将大量雕塑作品放进了原来财政部的几个主要庭院内，为庭院加盖了玻璃棚。就这样，1993年11月，改建后的黎塞留馆和卡鲁塞尔地下商业街完成，卢浮宫改造工程完工。

一所曾经的皇宫，完完整整地变成了一座博物馆。除了卢浮宫博物馆外，还有卢浮宫学院、装饰艺术博物馆、公共教育部门，以及供人们休息的花园等，卢浮宫成为市中心的一个综合性教育公共空间。

卢浮宫的改造计划不仅是对博物馆的改造，也是城市建设的改造。贝聿铭特别清楚这一点，很好地融入了这一语境之下。他不仅保留了卢浮宫的历史遗址，也突出了卢浮宫身处市中心的交通枢纽功能。巴黎城市的历史核心便是塞纳河畔，身处塞纳河右岸的卢浮宫改造，也符合既现代又尊重文化遗产的巴黎城市建设精神。

“建筑这门艺术是需要时间的，会唤醒各种各

样的想象力，带有一种比较神秘的独特性，很难提前预知，而它是否受欢迎，在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这种神秘的独特性：也就是说，它究竟会以何种方式融入到它所处的环境之中。”雅克·朗说道。

卢浮宫改造是贝聿铭职业生涯的一个转折点。1988年玻璃金字塔项目即将完成的时候，他正忙于离开PCF建筑事务所，并开办了自己的“贝聿铭建筑事务所”。那个阶段，他接下来的几乎所有项目都被视为一次“发现之旅”。

“我在卢浮宫学到了我以为永远学不到的东西。”贝聿铭后来说。而后，他以法国为起点，开启了他的文化之旅。“其实，从1990年开始，我就对造型没有任何兴趣了。创造另类精彩的建筑造型不再是我所寻求的挑战了。最近我对于不同文明产生了兴趣。由于我的背景，我对中国文化和美国历史略知一二，除此之外知之甚少。虽然我走遍世间，但长久以来我对于这些地方其实了解并不多。”他后来去了日本、故乡中国，甚至波斯湾沿岸，他从各个国家中提取该国的历史精髓，用于他的作品之中。

卢浮宫改造也是法国那一特殊时代的产物。曾长期担任法国公共建设工程监理国家代表的杰拉尔·里加杜(Gérard Rigaudeau)对本刊表示，如今法国很难再看到大型公共建筑建设项目了。“对于总统来说，相比于设立计划，为新公共建筑剪彩更有吸引力。蓬皮杜主导建设的蓬皮杜艺术中心由下任总统德斯坦剪彩，德斯坦提议改造的奥赛博物馆是由其下任密特朗主持开幕。密特朗成功连任总统，两届任期加起来14年，才得以使他可以为自己主导的卢浮宫金字塔、密特朗国家图书馆、拉德芳斯大拱门等公共建筑项目剪彩。而如今除了法国整体经济状况不振以外，5年总统任期也使得没有人愿意花如此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建设大型公共设施。”

无论如何，在当年经历了争议、坚持、泪水、信任、权力和和解的玻璃金字塔，早已融入了巴黎。将近30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在巴黎循着游客的人流，踏进景点边的任何一家旅游纪念品店，摆在《蒙娜丽莎》和埃菲尔铁塔明信片旁边的，一定会是卢浮宫玻璃金字塔的明信片。■

(参考资料：《新卢浮宫之战：卢浮宫浴火重生记》，雅克·朗著；《L'Invention du Grand Louvre》，贝聿铭、Émile Biasini等著；《La grande histoire du Louvre》，Georges Poisson著；《贝聿铭全集》，菲利普·朱迪狄欧等编；《Louvre：la bataille de la pyramide》，Frédéric Compain导演）

远与近的贝聿铭

文 / 唐克扬



(苏州美术馆 供图)

贝聿铭（左）参观苏州园林（摄于上世纪80年代）

整个20世纪，“守”“变”的文化困局都使我们繁难不已，对他却似乎不大起作用。

如同对待大多数名人的态度一样，我喜欢从更个人化的角度去揣测他（她）的职业的来由，但是贝聿铭一直离我的世界很远。

虽然我们爱一厢情愿地给他贴上“美籍华人建筑师”的标签，贝不止一次澄清过，由于很小就定居异国，又是在那里接受大学教育，我们更好叫他“美国建筑师”——就算后来他在故乡设计了“中而新，苏而新”的苏州博物馆，里面也有某种意义的掇山理水，他的园林已经不是那个园林了。2007年，当我筹划“活的中国园林”展览时，他更是通过秘书婉拒了我的邀请，和这样一个有“古为今用”嫌疑的建筑讨论脱离了干系。虽然如此，每次走过贝

家昔日的私产狮子林时，依旧，我会情不自禁地想起他和他来处的瓜葛。贝聿铭从这里出走，最终成了在文化领域最成功的海外华人之一；整个20世纪，“守”“变”的文化困局都使我们繁难不已，对他却似乎不大起作用。不管外人如何牵强附会，最终的事实，是这些“剪不断、理还乱”的困局，连同他可能怀有复杂情感的家业，都一同抛在了大洋彼岸，抛在了散落世界的建成项目的身后。

在这个角度而言，贝作为建筑师的故事也算是20世纪中国人的故事，只不过是特殊的一种。

贝的世界很远，但他的建筑却离我很近。这不仅是因为我多次参观过他的多个建成项目——卢浮宫的金字塔、美国国家美术馆东馆……我还下榻过他设计的东海大学校园，在不同的时间流连于香山饭店，要知道那是他在中国的第一个作品……光是他设计的苏州博物馆中，我便策划组织过两个不同的展览。换句话说，我对他的作品体验不仅来

自远距离的“欣赏”，更来自于朝夕之间的“亲炙”。

这还不算完，他于芝加哥的海德公园（Hyde Park）设计的大学公园公寓（University Park Condominium）还曾经是我的家——在其中我居住了2000多个日日夜夜，当然，这种缘分只是系于偶然，但是由此，一般名建筑师乐于交付大众的明信片式印象，就变成了我生活里不可剥离的一段经历。

这两幢巨无霸式的住宅楼是贝聿铭和他早期的重要伙伴——克罗地亚人阿拉多·寇苏达（Araldo Cossutta）合作设计的，中国留学生俗称“大白楼”，当地人更形象地将它称作“烤面包机”（The Toaster），确实，一模一样的这两幢双子板楼，就像从烤面包机里冷不丁弹出来的。它们沿着东西向的55街摆开，把本来就是主要干道的55街的双向道路南北挑开，道路间的区域变成了一块飞地，占满了两个半街区的东西长度，以及街南街北的隙地，它的南北立面各自足足有108个窗户。要知道，海德公园的大街两侧早已排满了一两层的独立式住宅，很多都是19世纪末以来建成的，其中不乏莱特（Frank Lloyd Wright）的罗比住宅（Robie House）这样的名作。在这里，哪怕就是多层建筑，也都还是体量接近传统，层数相对克制的，早在芝加哥就学的很多中国文化名人，比如闻一多、穆旦、杨振宁……或许都熟悉海德公园这种低伏的街景。在这样一种语境中，贝和他的伙伴1961年所建成的这种尺度的建筑是极其不寻常的，直到20世纪末期，除了大学的重要工程，这一地区也罕有能和这样巨无霸式建筑匹敌的建筑物。

就像众所周知的那样，贝聿铭在麻省理工学院毕业后并没有立即投身于我们现在所熟悉的那些“作品”，而是有一段时间专注于“项目”。他和犹太人开发商齐肯多夫（William Zeckendorf）联手，在美国范围内建成了一系列他的早期设计，比如海湾石油公司大楼（1949～1950年）、里高中心（1952～1956年）等等。尤其是在今日的中国建筑学术圈，人们习惯将这些有着较高利润率的开发“项目”称为“商业设计”，“商业设计”心照不宣的反面，是“为了设计而设计”而较能彰显作者意志的“作品”——其实，“商业设计”和作为“纯”设计的“作品”很难说有什么截然的界限，毕竟绝大多数建筑很难脱离商业操作的语境，电影里还可以有“文艺片”或者“小众电影”，但是哪怕是“小众”的建筑，其实功能和“大众建筑”恐怕也难分别。无论如何，作为当时社会地位普遍较低的华人，贝聿

铭的这段早期经历是很难入那些自命主流的白人眼中的，他在那个时期碰到的一些尴尬，成了建筑院校师生后来的励志段子——比如，人们传说，50年代正如日中天的现代主义巨头、德国裔建筑大师密斯·凡·德·罗，有一次和贝在一个社交聚会上碰面，密斯面无表情地说：“我听说过你，你是和齐肯多夫一起的。”（You are with Zeckendorf.）

并不奇怪，很多后半生大放光彩的明星建筑师，还在做路人甲时都有过这种尴尬经历，比如后来造型极尽妖娆的美国国宝级建筑师弗兰克·盖里，就默默无闻地做过很长时间的普通“项目”。但是贝的特殊之处在于，他在务实的同时，并没有完全脱离后来使得他声名鹊起的学术圈子，对于那些令他不利的人事局面和现实困难，他也自始至终保持着一种东方贵族式的风度，以上与其说是被动做出的姿态，毋宁说是一种主动的选择。在那些尚称得上“设计”的建筑师圈子里，贝是最少高谈“观念”的，如果说他还有什么可以识别的个人风格，那就是一种一如既往的简洁品质，是通过扎实的造型能力和结构素养（贝最早是想做一名结构工程师的）所达到的：其中包含着对项目语境的顺适，包含着现代建筑对“绩效”（efficacy），而非仅仅是外表的追求，可能再加上东方人含蓄的美学。或许，我们不能就此说贝无意于建筑学术，看上去，他是顺手挑选了现代主义这样的利器作为最适合他性格的从业方向的，现代主义碰巧和他很“合拍”，而不是倒过来，他绝不只是“顺应”了这种在战后席卷一切的时代潮流。

我没有见过贝聿铭评论过我所住过的大学公园公寓项目，但我第一次在纽约看到基普斯湾（Kips Bay Plaza）双子楼时便觉得似曾相识，同样是齐肯多夫1957年在纽约开发的地产项目，基普斯湾已经为芝加哥的类似设计奠定了基础。具有官方总结性质的《贝聿铭全集》中写道：“基普斯湾的成功，不仅仅在于其有限的预算，更重要的是……它证明了不一定要大笔的钱才能做出好的建筑，低成本项目也可以创新。”它说明了大学公园公寓项目语焉不详的背景，可以看作贝终生的建筑思想的一个超前的注解——面对困难解决困难，但是并不将这种解决方案看作一个救火队员式的单纯技术议题，而是设法赋予它新的建筑品质和兴趣“增长点”。在当时，巨人般的大师密斯·凡·德·罗的玻璃摩天楼统治着纽约的高端项目，但是贝的项目没有那么多钱，他将密斯的玻璃幕墙和另一位现代主义建筑大师

勒·柯布西耶的混凝土结构合二为一，折中的结果是产生了一种混凝土的网格建筑“蜂窝墙”，建筑有着退入墙体 14.5 英寸（37 厘米）的巨大窗框，内凹的光影效果产生了极强的雕塑感，既是建筑内外的视觉效果，也表达着建筑的结构，是防火层、窗框和外立面不可拆分的整体。更重要的是，现浇混凝土比钢结构便宜太多，比起预制混凝土单元现场组装的方案也更为实惠，它在为住宅带来一种新的材料美学的时候，也让室内和室外的逻辑合二为一了——对于“里面”深不可测的纽约而言，这无疑是一项创举。

对于评论这类建筑而言，最直接的也许是我的个人视角——隔着 40 年的距离，它肯定别具意味，但有可能最接近贝聿铭当时的心境。1998 年，我刚刚赴美攻读博士学位，在不长的时间里将海德公园的各类房源搜了个遍。就像少年贝聿铭一样，那时我对美国建筑已经有了初步的了解，但是真正落实到个人趣味的抉择上，东方人和当地人的态度是不太一样的。海德公园的居民们，包括一些租房居住的美国学生，他们的喜好让我略感讶异，那种外观老旧、内部狭窄晦暗的小公寓，居然比贝设计的大学公园公寓更抢手，或许类似于我们今天一些人喜欢“新中式”或是农家小院的感觉——贵的那部分房价，有可能是独处的优越感，以及更丰厚的过去文化的“层次”。然而刚刚脱离中国老旧的学生宿舍，我毫无疑问更喜欢贝的选择，它让我们有可能脱离嘈杂和繁复，用不算太高昂的代价去面对一个新的起点。

毕竟，我在这里住了那么长的时间，此类建筑的好处和坏处都看得更明白了。新的建筑实验在当时的意义首先在于它的经济性，重复的建造单元，加上尽去虚饰的室内空间排布，既表达了密斯直率的技术美学，又实践了柯布西耶提倡的现代居住的“光辉”理想。就后面一点而论，无论是基普斯湾还是大学公园，地面一层号称都是预留给城市生活的，标准框架加混凝土幕墙解放了地面的空间，除了往里退缩的玻璃前厅，还有双子楼之间大片的绿化“庭院”——当基普斯湾的双子楼之间的开放空间需要什么“压阵”时，他选择了一个低成本方案，放弃了昂贵的艺术品，种下 50 棵树苗——在这里苏州园林的记忆是不是又回来了呢？

也许，仅仅是也许——因为很多事情只是在字面意义上有关系，而且你会发现它们之间的差异远远多过相似之处。就好像贝在纽约设计的四季酒店，店方最终选用了中国艺术家展望的“不锈钢太湖石”

做陈设，但这并不意味着酒店就此变成了一座苏州园林。贝对艺术和空间的关系有着很深的素养，但一方面他处理的大多是更具体的建筑问题，另一方面，当他已经习惯了西方人抽象的思维方式之后，浅表层面的，而且指向性过于明确的“文化”在贝那儿已经不大管用了。

这种姿态在卢浮宫金字塔这样的重大抉择上看得也很清楚。他拒绝给自己贴上一名华裔建筑师的标签，甚至也不愿意单纯地取悦他的法国赞助人，最终，贝聿铭是以没有明显的文化“加持”的方案，出人意料地赢得高卢人的。这种单纯和简洁有其长也自有其短，在我所居住了 4 年的大学公园，你会觉得明快的空间也常令人稍感乏味。抛开现代建筑老旧后更明显的“疲态”——它不像那些木构、老砖房……可以把沧桑当作品位——布局上存在的单调使得大学公园公寓的室内略显尴尬。毕竟，两个项目都是在战后重建的背景下兴起的公共住宅，公寓本质上还是一幢巨大的“内廊式住宅”，也就是中国人说的“筒子楼”；为了挤压出销售面积而留下的过道不能不说是有些偏窄，更有甚者，是它过于漫长了，在终日不见阳光的 147 米的走道里，从建筑一头没有变化地走到另一头，会让人有些心惊肉跳。另外一方面，初次在这里的卧室醒来远眺芝加哥市的天际线会让你心旷神怡，但是巨大的玻璃窗正南正北的朝向，加上建筑稍嫌浅短的进深，住久了你就会产生“现代”而空旷的焦虑。

毫无疑问这绝不是贝的主流项目，至多是在尚不能在公共建筑领域大显身手之前的一段插曲。我想表达的是，贝在这一类更日常的项目中更见本色，显露了他以非“中国”的手段呈现得很“中国”的一面，成为西方当代建筑中的一个异数，似乎更是源自以上所述的深层的文化基因，而不是那些表面洋溢的异国情调——相反来自他母国的很多文化人却不得不借重这种情调——很显然，前者是迂回的不动声色的“近”，后一种却是直截了当的和刻意的“远”。

80 年前，初出茅庐的贝聿铭因为认为自己的绘图技巧不够好，放弃了重视“美术”的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10 年前梁思成曾经在那里就读）而转投建筑工程专业。设想，如果个性内敛的他最终没有选择这个专业，而读了当时大多数中国学生都选择的更实用的专业，我们还会有在另一领域大获成功的贝聿铭吗？他的创作果实究竟是妙手偶得再臻圆熟，还是一种经过深思熟虑的“巧合”？我们真的不知道答案。✎



Wu Yifan
吴亦凡



戴尔 XPS

见真境 无边忌



扫码专享戴尔优惠

贝聿铭文献展：在作品之外

文 / 薛芾 摄影 / 蔡小川

在展现卓越的建筑成就之外，“贝聿铭文献展”的点滴细节也流露出一一个作为儿子、父亲和师长的贝聿铭。

像对自己的建筑作品一样，贝聿铭对展览的要求一直也很高，展品、布展、光线甚至到标签内容，他必须事无巨细地把关。此次在他老家的苏州美术馆举办的“贝聿铭文献展”，百岁高寿的贝聿铭已无力再过问更多，策展人林兵的担子也就更重了。

1998年，林兵进入美国贝氏建筑设计事务所工作，跟随贝聿铭工作十余年，参与了苏州博物馆、中国驻美大使馆等重要项目。2011年，他与另一位贝聿铭弟子、建筑师冈本博一起成立了OLI建筑设计事务所，位于乌镇的木心美术馆是他们近年来的代表作品。

这也是建筑师林兵第一次担任策展人。做一个建筑师的回顾展不同于一般艺术展，它无法营造在场感，也不可能带给观众“原来原作如此精美”的震撼。作为文献展，信息量的充实、文献的珍贵性和可读性则成了更重要的标准。

据林兵的回忆，在此之前，贝聿铭并未举办过大规模的展览，只有两个重要的项目完成时举办过小型展览：一个是2006年苏州博物馆建成后在苏博旧址忠王府大殿举办的展览，另一个是在2008年多哈伊斯兰博物馆建成后，为贝聿铭赢来国际声誉的卢浮宫开辟出一个小展厅，用以展示伊斯兰博物馆的建成始末和其他几件重要作品的建筑理念，其中包括建筑手稿、模型、影像资料等。这两个展览与其说是建筑作品展，倒更像是项目结案后的总结汇报，既是给贝聿铭自己的一个总结，也是给公众的一个交代。

苏州美术馆的一楼主展厅是一个开阔的大空间。在这样体量的空间里做文献展，展品很容易被吞噬在其中，变得“渺小”。就像贝聿铭在设计苏州博物馆时主张用小而精的空间来展示中国文物一样，

展览的展陈设计也试图打破展厅的大而空，在单调的空间中加入一些贝氏建筑的经典元素——几何方块，既改变了展览空间，也是向贝聿铭的一次致敬。

展览以时间轴为线索，分为家源、治学、建树、荣誉、祖国、回家六个部分，以图片、影像、文献资料、建筑模型为主，呈现的都是贝聿铭主持设计的经典建筑作品。贝聿铭侄子贝念祺代表贝氏家族回到苏州，参与了展览开幕前后的一些工作，他说这是迄今为止关于伯父近百年人生历程第一次最全面的展览，很多资料都是首次拿出来。

在老苏州生活和贝氏家族族谱的引子之后，进入展览的主体部分。第一组吸引人的重要展品是一组家书，自左至右悬挂在墙上。可惜的是，这些书信都是影印版，原件都收藏在上海档案馆，不予外借展出。1935年，18岁的贝聿铭离开儿时生长的苏州和上海，加入了上世纪30年代的留学潮中。初到美国，贝聿铭每周写一封家书，以解乡愁。他的钢笔字很工整，这得益于母亲从小对书法和艺术方面的教导，自右而左竖排书写在印有宾夕法尼亚大学标志的稿纸上，如今看来，别有趣味，这两种文化的碰撞恰好成就了现在的贝聿铭。家书中都是些生活琐事，有年轻学子远离家乡向父母的小撒娇——第一次小考结束，普通中国学生都难以应付，因为对“考试制度未窥其要”，所以吃了亏；也有取得一点进步时的小炫耀——上星期第一次演讲，“因预备极充分，得连续讲四十分钟之久，颇得教授之嘉许”；也有理性客观的小反思——“自觉咬字尚欠精准，较之西人相去甚远”，而明年又没了英文课，今年得苦学语言了；课业之外，还不忘对家乡兄弟打趣一下，关心一下——“（贝聿）昆弟年幼无知，为人鲁直，易受人玩弄”，现在读了上海中学固然是好，但这个学校的工科比不上青年中学，他必须自己更努力。

这几封写于宾大的家书是贝聿铭美国生活最早的见证。学了一段时间后，宾大以图像讲解古典建筑理论的传统教学方式让他有些失望，他申请转学，去了麻省理工学院（MIT），这些事也在书信中有所提及。在MIT读书期间，贝聿铭遇到了建筑生涯中第一位贵人——前来讲学的现代主义建筑大师勒·柯

布西耶 (Le Corbusier)，虽然交集时间很短，但后来在回忆起这段往事时，他说这是“我建筑教育中最重要的两天”。在此之前，包括《走向新建筑》在内的柯布西耶三本建筑著作成了贝聿铭的“圣经”，他开始接触当时前卫的现代主义建筑风格，从柯布西耶的文字和理论里获取养分。

有趣的是，柯布西耶是建筑界的文字高手，他曾自认为是个作家，在《勒·柯布西耶书信集》中收录了他 4000 封信中的 329 封编撰成书，它们寄向亲人、朋友、委托方、政府官员，大多数都是单方面信件，没有回答，他写信情绪鲜明、神经质、喋喋不休、有点絮叨，留下的这些文字可以勾勒出一个建筑之外更真实、更自我的柯布西耶。在这一点上，贝聿铭可不像他的偶像，文字和手稿并不算多，林兵也一再强调：“贝老的建筑思想和建筑理念都体现在他的作品中，他一直都用作品说话。”而这次展览的叙述方式用了第一人称的视角，各部分之间的衔接和重要作品的简单阐释，都是贝老的原话，作为策展人，林兵并没有加入自己或他人的评论。“我希望这个展览是他在讲述。”

另一份展出的纯文字手稿，已是 40 多年之后的了。1980 年，贝聿铭往返于中美之间，这时的他在做北京香山饭店，由于是第一个正式在中国做的建筑，这个项目的设计和规划投入了当时贝聿铭的几乎全部情感和精力，但他手头仍有其他美国的项目在接洽中。住在北京饭店期间，他用酒店的稿纸写下了对莫顿·梅尔森交响音乐中心的设计构想。音乐中心位于达拉斯，最终在 1989 年建成。在此之前，他已经在达拉斯建完市政厅，虽然从未建过音乐厅，可评选委员会一致看好他。由于演奏厅体量巨大没有窗户，贝聿铭在厅外加了一层石灰石和玻璃结构的弧形外壳，给中规中矩的四方建筑注入了新的活力。因为设计构想是写给自己看的，那份手稿的字迹很潦草，带着很多英文的连笔。

比文字手稿更难读的大概是贝老的建筑草图手稿，寥寥几笔，像是涂鸦，有的甚至很难看出建筑的痕迹。其中一张手稿绘于“5·12”汶川地震之后，大致是一个被击碎的玻璃的形态。贝聿铭想做一个纪念碑，放入当时在进行中的中国驻美大使馆的建筑里，但最终没能实现。贝聿铭的这种手稿不多，且都是画给自己看的，他将这些尚未成熟的想法自己消化干净，展现在人前的总是经过深思熟虑、经得起推敲的结果。林兵向我仔细讲解了苏州博物馆



的建成始末，他指着苏博的建筑图纸和效果图，很是骄傲，效果图与如今建成的苏博几乎没有任何差别，这是贝聿铭的特点，其他作品也是一样，一旦提交的方案都是最成熟的方案。

在展览中，这些看似碎片的文献让观众看到了一个在建筑作品之外的贝聿铭，他是个有点严肃的人，他的生活情趣或许如他的建筑那样，有一种几何式结构的严谨性，如果能读懂这种结构，自然能读懂他的情趣，倘若读不懂，自然难以走进他的世界。不过，文献展万变不离其宗，所有文字、照片、影像都指向他的作品，这才是他的大贡献。就像 1983 年普利兹克建筑奖给他的评语那样：“通过他的敏锐和耐心，他将不同兴趣和领域的人们吸引在一起去创造出和谐的环境。”

上图：2017 年 3 月，苏州美术馆举办的“贝聿铭文献展”现场

下图：贝聿铭的侄子、贝氏建筑事务所顾问贝念骥

债务危机的山东样本

主笔 / 谢九

近期山东爆发债务危机的连锁反应，深刻揭示了中国经济所面临的潜在风险。

山东这一轮债务危机的多米诺骨牌，首先从当地的明星企业齐星集团开始。

齐星集团是一家以铝产品深加工为主业，并涉及电力通讯铁塔、新材料、金融、地产等领域的大型民营企业，年销售收入超过 100 亿元，一度跻身山东制造业 100 强之列。2010 年，集团控股的齐星铁塔公司在深交所上市，但是仅仅 4 年之后，大股东就将控股权对外转让，放弃了旗下唯一的上市平台，这一举动就已经暴露出集团的资金压力。

今年 3 月份，齐星集团的核心子公司邹平铝业突然发布停产通告，称“因集团公司目前总的流动资产不足以支撑所有下属公司全部运行，现要求公司被迫暂停铝业生产半年”，齐星集团的困境开始浮出水面。

按照公开资料显示，截至去年三季度末，齐星集团总资产 176.43 亿元，净资产 66.39 亿元，负债高达 110 亿元左右。在齐星集团 110 多亿元的债务中，其中约有 70 亿元来自银行，其余 40 亿元来自社会融资，而所谓社会融资，换而言之其实就是民间高利贷。作为当地的明星企业，何以会走上高利贷的不归之路，并最终被债务压力击垮？这可能是这一轮山东债务危机中最值得深思之处。

由于国内企业间普遍存在的债务互保模式，齐星集团的债务危机也给山东邹平县当地的企业圈拉响了警报，尤其是当地另外一家明星企业西王集团，对齐星集团及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余额高达 29 亿元，如果齐星集团的债务危机不能得到妥善解决，多米诺骨牌效应将会席卷邹平的企业界。

在齐星集团爆发债务危机之后，山东邹平当地更具知名度的魏桥集团也陷入危机之中，这家连续多年跻身世界 500 强的民营企业，在近期遭遇国际空头的狙击。今年 3 月初，魏桥集团的铝业旗舰、在香港的上市公司中国宏桥遭遇国际机构沽空，Emerson Analytics 发布报告质疑中国宏桥的毛利率过高，显著高于同行。做空机构 Emerson Analytics 称，中国宏桥存在财务业绩异常、发电成本不真实、漏报 81

亿氧化铝成本及隐藏关联方收购事项等。沽空报告认为中国宏桥过去数年隐瞒 216 亿元成本，估计其真正盈利能力低于所公布的一半，认为目标价只值 3.1 港元。这一切和辉山乳业被浑水公司沽空几乎如出一辙。

虽然中国宏桥的股价并没有如辉山乳业一样雪崩，但是沽空报告发布当日，还是导致中国宏桥股价大跌 8%。中国宏桥以及另外一家在香港上市的兄弟公司魏桥纺织不得不紧急停牌，大股东魏桥集团甚至向中国有色金属行业协会递交了紧急报告，将沽空归结于自身的壮大触及了美铝和力拓的商业利益，魏桥集团的求援报告表示：“一旦做空势力实现目的，将直接影响中国 10% 的纺织市场和 20% 的铝业市场，国际市场上的原料定价权将再度落到以美国铝业、力拓为代表的美资企业手中；滨州市纺织、铝业两大产业集群直接涉及 2000 多亿元的国内银行贷款，应对不当，必然会引发区域性的系统金融风险；两大产业集群涉及 30 万人的直接就业，一旦风险蔓延，势必引发剧烈的社会动荡。”

除了齐星集团和魏桥集团之外，山东另外一家明星企业天信集团也陷入破产重整的地步。这家山东东营的企业一度也是中国企业 500 强，但是最近也被债务压力击垮。东营法院发布的公告显示，在天信集团及其关联公司中，有 7 家已进入破产重整程序，负债总额约为 163.35 亿元人民币，其中负债最多的山东天圆铜业有限公司，负债总额高达 104.52 亿元，其次为天信集团，负债总额为 34.46 亿元。

事实上，这并非山东省内第一次爆发债务危机。2014 年，山东邹平的长星集团因为 60 亿元的债务而被破产重整，当时邹平县就被很多银行机构列入金融高风险区。虽然长星破产已经过去了一年多时间，但是余波并未散去，很多银行开始对邹平的企业放贷提高了警惕，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当地企业的融资困难，以这次引爆危机的齐星集团来看，110 多亿元的债务中，40 亿元来自民间高利贷，当地企业的融资生态恶化程度可见一斑。

银行的惜贷固然是造成企业资金链紧张的一个原因，不过山东很多企业最终被债务压垮，更多可能还是自身的原因。在过去几年经济形势向好的大背景下，企业大肆扩张，忽视了基本的风险控制，加之当时货币环境宽松，融资相对容易，在自身的扩张冲动和外部融资的支撑下，很多企业在传统主业之外越走越远。

但随着经济环境恶化，这些疯狂扩张的企业发现其实大部分业务都难以挣钱，甚至陷入巨大的亏损之中，而此时外部融资环境也开始收紧，但是很多已经上马的生产线并不能说停就停，于是开始向民间高利贷寻求支持。如果生产经营能够好转，或许还有一线生机，但是如果企业的利润和现金流不能迅速得到改善，企业就只能通过借新还旧维持下去，直到有一天现金流断裂，企业无力再掩饰自身的债务压力，债务危机终于对外爆发。

尤其是很多地方的明星企业都已经在资本市场上，在资本市场的高度关注下，只要企业出现经营恶化的迹象，就很难掩饰自身的困境，一旦被沽空势力抓住机会，可能就会带来灾难性的连锁反应，此次魏桥集团在被市场发布沽空报告之后，之所以高度紧张地向有关部门求援，很大程度上就是看到了辉山乳业的前车之鉴。

与3年前长星集团破产不同的是，这一次齐星集团的债务危机在各方努力下暂时得到了控制。4月3日，齐星集团、西王集团和邹平县人民政府签署《委托经营三方协议》，西王集团将对经营困难的齐星集团进行为期3个月的全面托管经营。3月31日，齐星集团如期偿付当期贷款及利息，齐星集团的债务危机暂时得以解决。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债务危机已经就此过去。

在当前中国经济大背景下，山东债务危机的爆发并非偶然。2016年以来，我国债券市场就开始进入违约高发期，刚性兑付的神话被彻底打破。根据市场机构的统计数据，2016年全年违约债券共79只，同比增长243%，涉及违约主体34个，违约总金额高达403亿元，同比增长220%，尤其是大量地方性国企和央企也纷纷违约，意味着政府兜底的刚性兑付时代已经彻底过去。

债务危机在最近两年突然抬头，一方面原因在于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之下，去产能成为经济改革的主旋律。大量僵尸企业失去了外部融资环境的支持，加之自身也没有造血功能，因此违约甚至破产的事件此起彼伏。另外，国内货币环境的变化，也在很大程度上加大了企业的融资难度。目前我国货币政策的基调从稳健转为稳健中性，年初以来，央行对一些关键市场的货币利率有所提升，从短期的逆回购，到中期借贷便利（MLF）再到长期的常备借贷便利（SLF），不同期限的利率都有不同程度的提升，虽然还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加息，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企业的融资难度，提升了企业的融资成本。随着未来利率逐步提升，预计一些高负债的企业还将感受到更大的压力，债务风险事件还会越来越多，此次山东爆发的连环债务危机或许只是一个开始。■

大家都来听一点古典音乐



读者服务热线电话：
(010) 84050425 84050451
84681046 84681042 (传真)
E-mail: dzfw@lifeweek.com.cn
《爱乐》杂志网址：
<http://www.lifeweek.com.cn/philharmonic>

《爱乐》2017年第四期要目

古典音乐欣赏入门系列 100

- 诠释马勒：演绎史与录音学
- 南曦、詹湛、张可驹对马勒的音乐诠释及其《吕克特歌曲》的精彩解读

纪念册 科普兰《第三交响曲》的首演

斑狐说乐 时光啊，你这狡黠的家伙

话题 《如何听懂音乐》读后记

只能用完美形容的一张“悲歌”唱片

爱乐笔记 肖邦访谈录

现代音乐 聆听莫里西欧·卡格尔的管风琴作品

指挥家档案 比彻姆及其演绎的舒伯特交响曲

演奏家档案 纳迪亚·布朗热与美国

唱片说明书 共谈埃默森四重奏组版巴托克的六首弦乐四重奏

作品 马斯奈的《黛依丝》

听片购片与收藏 短暂的琴鸟“重生”计划！（下篇）

我的爱乐往事 我的爱乐故事（上）

《爱乐》2017年订阅须知

2017年《爱乐》月刊，每期240页，全年12期，零售单价：20元，全年定价：240元。

2017年《爱乐》邮局发行，邮发代号：82-24，读者可到各地邮局直接订阅，也可汇款至杂志社订阅。欢迎咨询、订阅与作为礼品馈赠他人。或在卓越网订购：www.amazon.cn

邮局汇款：北京市朝阳区霞光里9号B座
邮编：100125
收款人：爱乐

银行汇款：开户行：工行王府井金街支行
户名：三联生活周刊
账号：0200000719004641092

网上支付：www.lifeweek.com.cn



抗议声中“普京模式”陷入慢性衰竭

文 / 刘怡



3月26日，俄罗斯防暴警察在莫斯科特维尔大街逮捕纳瓦尔尼的一名支持者。当天在全俄数十个主要城市，共有15万人走上街头，参加由纳瓦尔尼发起的抗议总理梅德韦杰夫涉嫌贪腐的示威游行

(Epsilon 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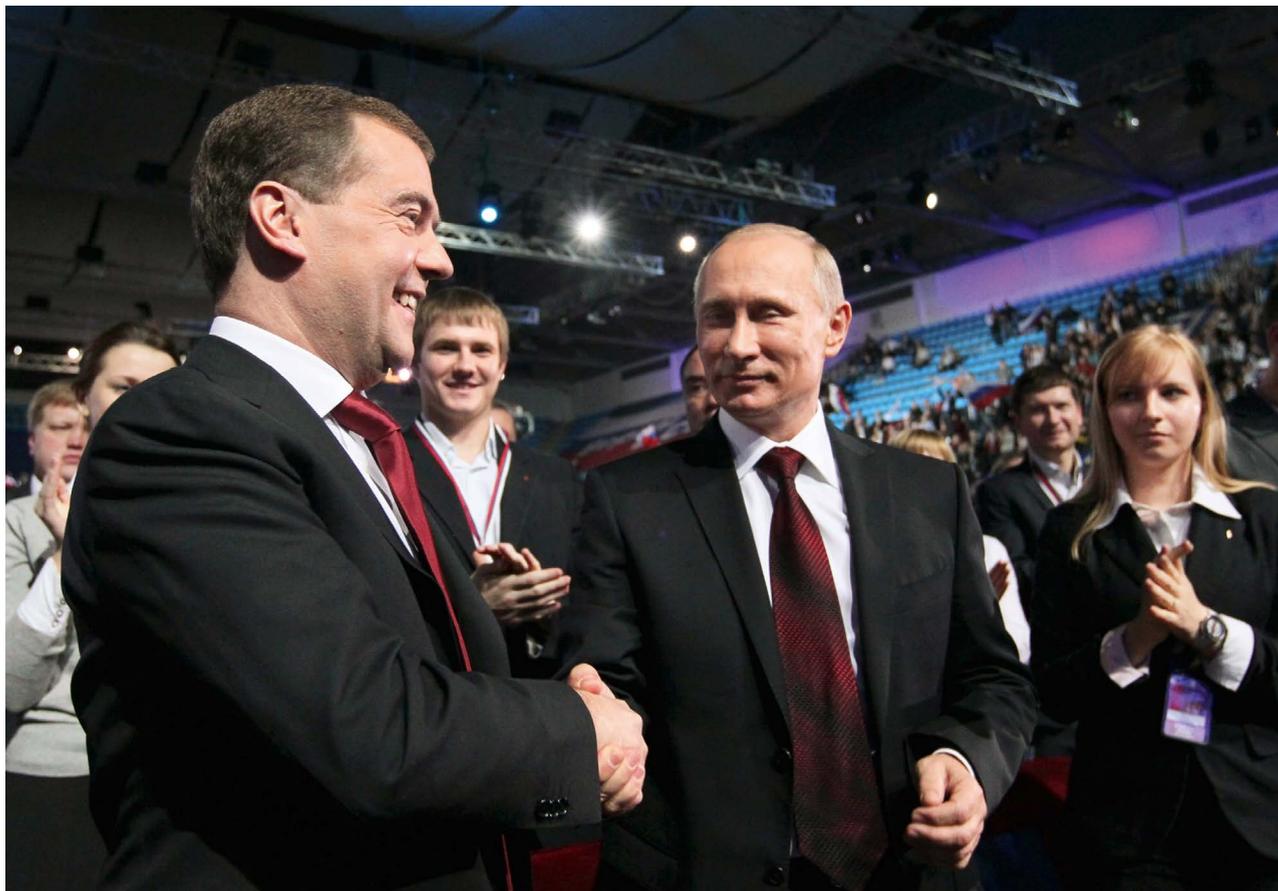
3月27日，俄罗斯反对派领导人纳瓦尔尼被警方押送至特维尔区法院，接受关于被控妨害公共秩序罪的第一次庭审。由他创建的“反腐败基金会”制作的纪录片《季蒙》引发了席卷全国的抗议示威

(MAXIM SHEMETOV 摄)

苏联解体前后出生的那一代年轻人，已不会像他们的父母一般痴迷于对“民主”“市场”等大概概念的激辩，他们所呼吁的完全是基于个体权利的诉求：就业、法制和表达渠道。而治理成本高昂、过早透支了动员能力的“普京模式”正日渐无法满足这一切。

“阿列克谢·纳瓦尔尼是谁？”

2017年3月26日这一天，全世界媒体都在手忙脚乱地检索着和这个陌生名字有关的一切。从圣彼得堡到符拉迪沃斯托克，从莫斯科红场到萨马拉的古比雪夫广场，15万俄罗斯人高举着三色国旗、请愿书和“请季蒙回答我们”（“季蒙”是俄联邦总理季米特里·梅德韦杰夫的呢称）的标语，发起了最近5年全国规模最大的示威游行。事件导火索来自一部在3月2日被上传到视频网站YouTube的纪录片，名为《他不是你们的季蒙》，其中明确指控梅德韦杰夫在过去10年里累计贪污、受贿超过12亿美元。而该片的制作人和脚本撰写者，正是40



2011年11月27日，时任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与联邦总理普京在卢日尼基体育馆举行的“统一俄罗斯”党代表大会上握手致意。此次大会最终确认普京将再度走上前台，代表统俄党角逐2012年总统大选

岁的莫斯科律师和政治活动家、非政府组织“反腐败基金会”的发起人阿列克谢·纳瓦尔尼 (Alexei Navalny)。

尽管曾经作为老牌中左翼政党统一民主党(“亚博卢”集团)和新兴反对派势力进步党的重要成员参加过国家杜马选举，并在2013年的莫斯科市长选举中获得过第二高的27.24%得票率，纳瓦尔尼却从来都不是一位“规矩”的议会政治家，也很难称为自由主义的同路人。作为公开的激进民族主义者，他曾经和声名不佳的“反非法移民运动”(DPNI)结成同盟；2008年南奥塞梯战争期间，他轻蔑地把格鲁吉亚人称为“耗子”，并表示“很希望格军总参谋长被一枚巡航导弹炸死”。与同样被视为政坛反对派的卡西亚诺夫(前总理)、卡斯帕罗夫(国际象棋大师)、雷日科夫(前国家杜马第一副主席)等知名人士相比，纳瓦尔尼甚至不经常依靠

自己的党派进行政治宣传和动员——2013年参加莫斯科市长选举时，他借用的是卡西亚诺夫的人民自由党的推举资格。这位社交网络爱好者通过他开设在LiveJournal网站上的博客发布消息和动员公众，把大型国企漏洞百出的财务报表以及政府高官和商业寡头之间的肮脏往来作为揭发对象。而“季蒙”正是他最新捕获的猎物。

与2011~2012年为抗议杜马选举结果而发生的全国性示威运动相比，此次游行在规模和持续时间上都较为逊色。但在距离2018年总统大选仅剩不到一年之时，单靠一部制作粗糙的纪录片就能召唤起10万人级别的民众，又显得格外意味深长。参与游行的20余岁的年轻人关心的已不是“民主”“自由”之类宏大话题，而是要伸张基于个体权利的诉求：要求政府的运行更加透明，司法机关公正地惩戒违法官员和商业寡头，乌克兰危机以来惨淡的经济状

况能有改善，政府在对外“秀肌肉”的同时也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但这恰恰是过早透支完财政和信用资源的普京难以承诺的——经历了17年的跌宕起伏之后，“普京模式”正在陷入治理成本过高造成的慢性衰竭之中。在1917年革命将满百年纪念之际，俄罗斯这匹灰马依然在疲惫而蹒跚地前行。

谁在“倒普”“倒梅”

出生于1976年的纳瓦尔尼，在苏联解体那一年还没有完成中学学业；1999年岁末普京成为代总理之际，他正在俄联邦财政大学（原国立财政学院）进修证券和股票交易课程。与孜孜不倦地挑战现政权超过10年的亚夫林斯基（前“亚博卢”党主席）、卡西亚诺夫、卡斯帕罗夫等知名政治反对派相比，纳瓦尔尼无疑是个小字辈。但在2011年国家杜马选举以来的历次政治抗议运动中，恰恰是这个小人物发挥了比那些声名在外的前辈更为突出的作用，并且完全不依赖既有的选举制度和动员模式。这是一位互联网政治家，也是一位不以议会和学术机构作为斗争场域的运动型反对派；他的强势崛起，正是俄罗斯政治反对运动的新陈代谢的缩影。

以超级总统制为特征的“普京模式”，兴起于叶利钦时代末期碎片化的权力结构之上；它的每一步改革和集权措施，都伴随着旧有政商权贵的失势，继而创造出一股新的反对势力。对控制国民经济命脉的“银行七寡头”（Semibankirschina）集团的宣战，使昔日的俄罗斯首富霍多尔科夫斯基变身为司法公正和政治自由的鼓吹者，一度与叶利钦过从甚密的别列佐夫斯基更是在其流亡地英国成立了“国际公民自由基金会”，公开宣称致力于推翻普京政权。在普京执政初期一度担任政府要职的卡西亚诺夫、涅姆佐夫（前副总理）、雷日科夫和米洛夫（前能源部副部长），一则不满于能源产业的“再国有化”，二来质疑前安全官员和“圣彼得堡帮”占据权力中心的正当性，在2010年合组人民自由党投入地方和中央议会选举。对垂直化的中央—地方新模式颇感不忿的“新托洛茨基主义者”、国家杜马议员伊利亚·波诺马廖夫鼓吹将更多税收份额留给地方政府支配，并把总统手中的行政大权部分让渡给杜马，代表了联邦主义和议会主义的声音。加上由新生代共产主义者梁赞采夫和拉兹沃扎耶夫组织的极左派社会运动“左翼阵线”，以及素来反对政府的文化政策的嬉

皮士和LGBT平权主义者，以上五种力量，构成了自2000年以来长期挑战克里姆林宫，发起“倒普”“倒梅”运动的主力。

然而只需稍作观察，便可发现上述反对派势力皆存在相当严重的先天缺陷。崛起于经济转轨和私有化进程中的寡头群体，在普通俄国人眼中乃是强盗、骗子、黑手党的同义词；当普京政府以“大棒”对他们发动打击时，几乎获得了所有国民的衷心拥护。霍多尔科夫斯基等人被飞快地剥夺了大部分财富，随后逃亡海外，即使是欧美主流媒体也不屑于为其充当发声平台，更遑论在俄国国内再起风云。卡西亚诺夫和涅姆佐夫的公众形象虽然尚佳，但他们的政府工作经历和1998年那场耻辱性的财政危机具有直接关联，没有人相信这些“无能的好人”能带领俄罗斯穿过内外交困的风口。政界精英出身的前高官在从事基层动员和街头运动时，也显得与底层民众的调性格格不入。至于波诺马廖夫领导的联邦派，他们在叶利钦执政时期实际上已经融入了拥护地方政治强人的新潮流，当普京、梅德韦杰夫作为“圣彼得堡帮”的代表入主克里姆林宫之后，再鼓吹“去强化”“去中央化”的空中楼阁根本成为奢望。至于新老极左翼和青年亚文化群体，他们在俄国历史上任何一个阶段都没有成为过主流，要想登堂入室、成为现实中的政府领导人哪怕在西欧也是希望寥寥。

最重要的是，这五个群体无一例外都是俄罗斯民族主义和强硬安全政策的批判者。他们在1999年反对向车臣动武，在2008年反对南奥塞梯战争，在2014年抵制合并克里米亚，虽能博得欧美舆论的赞赏，在大部分民众眼中却是与叛国无异的劣迹。后苏联时代的俄罗斯虽然缺少整齐划一的意识形态，但在政府的引导和动员下，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已经成为事实上的普遍共识，甚至连东正教会也选择与当局保持一致。反对派的和平主义口号在华盛顿和巴黎或许会收获掌声，但对普通俄国人而言，只

与知名政治反对派相比，纳瓦尔尼无疑是个小字辈。但在2011年国家杜马选举以来的历次政治抗议运动中，恰恰是这个小人物发挥了比那些声名在外的前辈更为突出的作用。

会令他们回忆起 1996 年格罗兹尼的惨败、2004 年在别斯兰学校被极端分子杀害的儿童以及 90 年代在西方冷眼下度过的岁月。俄罗斯人可以容忍暂时的经济困难，却断然不愿放弃自己的骄傲，而这恰恰是所有反对派暴露出的最明显软肋。

小字辈纳瓦尔尼的优势，恰恰在于他有意无意地避过了上述所有陷阱。90 年代时他的年纪还轻，与私有化的“原罪”以及叶利钦政府的拙劣政策毫无关联。他是公开的民族主义者，虽然反对合并克里米亚，但赞成与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保持特殊关系，克里姆林宫不能以“叛国”为理由对他进行攻讦。他所宣扬的政治目标——惩治贪腐、提高政治选举的透明度、给予司法机关更大自主权——至少在表面上并不和政府的公开立场相抵触。在广场运动方面，纳瓦尔尼也有着丰富的经验：在 2011 年 11 月的莫斯科抗议示威、2012 年 3 月的普希金广场集会以及 2013 年夏天的市长选战中，他都曾组织过万人级规模的游行，懂得利用热点话题煽动民意。此次迅速成型的反梅德韦杰夫游行，足以证明纳瓦尔尼的动员实力不俗，影响力甚至扩展到了莫斯科以外。

不仅如此，纳瓦尔尼还是一位擅长利用互联网和新媒体传播其主张的政治“极客”。2013 年 7 月，他一度被法庭指控犯有三项贪污和诈骗罪，判处 5 年有期徒刑（后改判缓刑），在 LiveJournal 网站上的博客也被取缔。但纳瓦尔尼夫妇随后通过其创建的反腐败基金会（FBK）打造了一个新媒体平台“利维坦”，以接收线人爆料、发布调查和暗访结果以及制作纪录片等方式从事抗议活动。2015 年底，FBK 在 YouTube 上发布了 43 分钟长的纪录片《柴卡》，指控俄联邦总检察长尤里·柴卡及其两个儿子名下的企业通过承接政府项目大肆敛财，并动用黑帮打击竞争对手，另有多位政府高官、国家杜马议员以及与政界高层存在裙带关系的商人也成为 FBK 声讨的对象。最近两年，FBK 开始集中调查普京、梅德

韦杰夫两人可能从事的违规商业活动，并通过调阅法律文件、查找新闻线索等方式核实梅德韦杰夫夫妇名下的资产。最终成果便是那部横空出世的《季蒙》，以及随之而来的 15 万人大游行。

“克里斯玛”难为

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副主任、《俄罗斯研究》副主编杨成副教授在其主持的俄罗斯政治生态研究课题阶段性成果报告中提出：所谓“普京主义”（Putinism）或者说“普京模式”，在特征上已经大大有异于欧美研究者和媒体长期渲染的全能主义（Totalitarianism）或威权主义（Authoritarianism），而更近似杂糅有超级总统制、受限制的市场经济和主权民主意识形态的克里斯玛型（Charisma）政体。尽管普京本人通过建立垂直管理模式拥有了毋庸置疑的最高行政权，但他毕竟不可能像斯大林一样，借助稳固的单一意识形态、由唯一执政党掌控的精英遴选体制、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以及听命于个人的暴力机关遂行一人统治。在将“七寡头”打倒在地之后，他依然需要借助新的官僚集团的力量、对普通民众的福利和宣传笼络，乃至受法律保障（尽管也有颇多禁忌）的市场经济机制和政治参与自由，来维持政权运行的稳定。对官僚群体和特殊利益集团而言，普京并不是至高无上的仲裁者，而是资源分配者和协调人，举足轻重、但绝非独一无二。

1999 年普京初登权力中心之际，俄罗斯政局处在一组不平衡的三角关系的影响之下。控制了大部分国民经济、财富分配和宣传机器的“七寡头”，已经不满足于通过代理人左右政局变化，正在尝试直接走上前台、角逐最高权力。主导过经济转轨议程的自由派官僚一来未能阻止寡头集团的崛起，二来在 1998 年金融危机中表现拙劣，已经受到国民的普遍质疑。而以莫斯科市政府为中心的首都官僚集团，已经和国家杜马中的中右翼党派结成同盟，企图左右联邦政府的政策。而出身安全系统的普京“唯二”可以依靠的力量，一是分布在情报系统、军警和司法机关等“强力集团”中的昔日战友，二是政治教父索布恰克留下的“圣彼得堡帮”官僚班底，此外无论是民意还是党派基础皆不牢固。2000 年总统大选中，他甚至只能以独立身份出战，势单力薄。

但普京并不依靠白云苍狗般的政党充当其政治

控制了大部分国民经济、财富分配和宣传机器的“七寡头”，已经不满足于通过代理人左右政局变化，正在尝试直接走上前台、角逐最高权力。

基础。上任伊始，他首先宣布终止对 549 家具有战略意义的国有企业的私有化进程，将铁路、造船、航空航天等战略性经济部门的控制权牢牢掌握在政府手中。接着，以“尤科斯事件”为起点，逐步将“七寡头”名下的能源和金融产业重新收归国有，并由政府高官兼任企业决策者，使政府重新控制了大部分财政和市场资源。在中央—地方关系上，俄罗斯主体被重新划分为 7 个大区，每一地区的代表由总统委任，并有权提名行政长官；如此杜绝了地方利益集团势力坐大、与中央讨价还价的可能性。在 90 年代转轨过程中利益受损最严重的城市平民和军队系统获得了安抚：卢布汇率逐步稳定，使前者可以得到有保证的养老金、失业金和医疗保险，平均收入也恢复了稳步增长的预期；以 5 年为周期的《国家装备大纲》(GPV) 为后者编列了更新武器装备所需的大宗预算，与国际地位直接关联的核力量更是获得了优先拨款。2004 年总统大选中，角逐连任的普京以 71.9% 的得票率胜出，代表了他的惊人民望。

然而即使是普京也需要他的“国王班底”来确保具体的政策实施以及以克里姆林宫为中心的垂直控制体系的运转。由于缺乏苏共式的干部储备体制作为精英迭代的工具，他只能长期借重存在传统关联的“强力集团”和“圣彼得堡帮”，使其势力广泛深入到政治、经济、宣传各部门。政府官员兼任大型战略性国企管理层的现象开始成为常态，例如原总统办公厅副主任、第一副总理伊戈尔·谢钦自 2004 年起即兼任俄罗斯石油公司董事长，原圣彼得堡市政府外事办主任、能源部副部长阿列克谢·米勒在 2001 年兼任了俄罗斯天然气公司 CEO，原第一副总理、总统办公厅主任伊万诺夫兼任了俄罗斯通信公司董事长。多年来与普京私交甚笃的密友们也开始试水商界，接手了一度为“七寡头”所盘踞的矿业和金融部门。曾经为普京指导过副博士学位论文的圣彼得堡国立矿业学院院长弗拉基米尔·利特维年科在 2004 年接手了入狱的霍多尔科夫斯基名下的磷酸盐矿公司 PhosAgro 约 15% 的股权，该公司在伦敦上市后，利特维年科一次性获利达 2.6 亿美元。普京多年的柔道陪练阿尔卡季·罗滕贝格则在 2001 年创建了 SMP 银行，目前已成为坐拥 12.6 亿美元财富的新贵。与发迹于苏联解体后“野蛮生长”时代的“七寡头”不同，罗滕贝格们的财富增值与普京的执政周期高度重合，若无政府的默许绝无实现的

可能。在“七寡头”崩塌的狼藉之上，以普京本人为中心的新精英群体已然成型。

不过从任何一个角度看，借助官僚集团和新贵富豪阶层推行的垂直管理模式，运行成本都高昂到令人咋舌。官僚们并非基于个人情谊或意识形态忠诚维持对普京的支持，除去独占性利益外，他们还希望在自己负责的行业内留出足够大的寻租空间，以持续地积累个人和部门权势。民众和军人对未来的预期被持续增长的进账所抬高，已不是救急式的临时拨款可以满足。为维持政府控制力而新增的一系列利益集团——控制国家杜马的“统一俄罗斯”党领导层，基层动员组织 Nashi 和“青年近卫军”，为打击恐怖主义和城市犯罪而新建的国民近卫军，乃至拉姆赞·卡德罗夫（车臣共和国首脑）这样的边疆豪强——都在不断蚕食中央财政预算。而负担起节节高升的治理成本，实际上只有在经济始终保持高速增长、账面收入不断增加的情况下才能做到。

对产业结构高度单一的俄罗斯来说，“收入增长”和“油价走高”几乎可以画等号。幸运至极的是，2004～2013 年恰逢全球能源市场罕见的“长牛市”，单桶 50 美元以上的油价维持了近 10 年之久，一度使俄罗斯的年均 GDP 增长率突破 8%，失业率降至 7% 以下，人均年收入接近 1 万美元（按国际汇率计算）。支持率空前高涨的普京在用梅德韦杰夫充当了 4 年替手之后，于 2012 年以 63.6% 的得票率第三度当选总统，似乎要将他的克里斯玛型政体万世长存地维持下去。但仅仅两年过后，形势开始急转直下：油价腰斩与乌克兰危机后的国际制裁同时到来，卢布快速贬值近 50%，财政收支由基本持平逆转为年均赤字 200 亿～300 亿美元。从 2013 年底到 2016 年，俄罗斯 GDP 规模缩水近半（以美元计算），外汇储备一度下跌至 3600 亿美元，收入低于贫困线的人口比例升至 13.4%。在 2016 年最后一次白宫记者会上，美国总统奥巴马甚至大着胆子嘲讽俄罗斯“既小且弱，除去石油、天然气和武器以外没有任何吸引人的产品，还缺乏创新”，毫不掩饰羞辱之情。

但对普京而言，最大的考验还不是纸面数字的变迁或者美国人的讥诮，而是财政资源紧张带来的分配压力。垂直管理体制本身的运行成本难以压缩，因介入乌克兰和叙利亚局势带来的军费增长同样无法削减，可以暂时牺牲的便只有民生开支和中小企业。而这种牺牲，马上就在 15 万人的抗议示威中得到了回应——纳瓦尔尼的追随者们当然清楚，梅德



[MAXIM SHEMETOV 摄]

4月5日，在圣彼得堡地铁爆炸案发生之后两天，莫斯科警方对一名携带手提袋前往地铁站的乘客进行严格检查

韦杰夫的贪腐嫌疑并不是在2017年才正式出现。只不过在财力相对宽松、各大集团可以均沾其利的年月里，他们尚能勉强容忍灰色地带的存在；而一旦经济下行，官僚集团又毫无自我牺牲的意愿，不满便立即爆发。在“请季蒙回答我们”的标语之外，甚至有人喊出了更加激进的口号：“普京是个小偷加凶手！”“要一个没有普京的俄罗斯！”而这恰恰呼应了纳瓦尔尼在2012年发表过的一番评论：“‘统一俄罗斯’党里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小偷，另一种则是为小偷文过饰非的骗子。”

在爆炸背后

对纳瓦尔尼的指控，梅德韦杰夫拒绝做出回应。

莫斯科游行之后整整一个星期，他都没有在公开场合现身，其新闻发言人也始终保持沉默。不过到了4月4日，“季蒙”终于在电视上出现，发表了一番义正词严的声明，只是内容依旧和贪腐指控无关：前一天在圣彼得堡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已经整个改变了公众的关注点。

当地时间4月3日下午2点40分，圣彼得堡一列地铁列车在干草广场站（Sennaya Ploshchad）与技术学院站之间的轨道上被一枚事先安放好的炸弹炸毁。BBC援引俄联邦紧急状态部的消息称，嫌疑人将1公斤左右的TNT炸药放置在提包内，随后携提包进入了列车的第三节车厢，在车入隧道后实施引爆。从媒体公布的画面看，3号车厢的门窗以及部分钢板在爆炸的第一时间即遭受严重损坏，但



(ALEXANDER BULEKOV 摄)



列车驾驶员选择了继续前进到下一站、而不是在隧道内紧急停车，从而避免了乘客因恐慌和躲避发生大规模踩踏事件。包括袭击者本人在内，总计有14名乘客在爆炸中遇难，64人不同程度受伤。俄罗斯官方电视台 Russia-24 在4月3日晚些时候报道称，在东面的革命广场地铁站内还发现了第二件爆炸物——1公斤隐藏在灭火器钢罐内，混合有轴承钢珠和螺丝钉等破片杀伤物的TNT炸药。倘若这枚炸弹也在预定时间被引爆，伤亡人数势必进一步扩大。

袭击发生后不久，梅德韦杰夫和普京即先后以政府领导人身份发表声明，将爆炸定性为恐怖袭击事件，并称调查委员会已经依据刑法典第205条对该事件提起刑事立案。但俄联邦安全部门的能力随后就遭到了广泛质疑——4月3日夜間，他们通过

REN 电视台展示了一段地铁站的监控画面，宣称其中一名蓄有胡须、带穆斯林式圆帽的黑衣男子已被锁定为主要嫌疑人。但这名“疑犯”随后自行与警方取得联系，表明了退役军人的身份，很快洗脱了嫌疑。一天后，邻国吉尔吉斯斯坦的情报机关通过新闻网站 MKRU 对外公布：经过他们的追踪比对，已经确认主犯是22岁的吉尔吉斯裔移民、厨师阿克巴尔荣·扎里洛夫（Akbarzhon Jalilov）。此人与中东极端宗教组织存在关联，在2014年曾经前往叙利亚、接受“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军事训练。扎里洛夫的残肢已经在爆炸现场被找到，其DNA信息与吉尔吉斯方面的存档资料完全吻合。俄罗斯调查人员随后根据吉尔吉斯当局提供的情报，逮捕了扎里洛夫的两名疑似同伙，进一步的调查和搜捕也正在进行当中。

自2013年12月伏尔加格勒火车站爆炸案以来，俄罗斯主要城市已有3年多未曾发生过规模如此之大的恐怖袭击事件。而在客流量并不很大的星期一下午，“独狼”袭击者扎里洛夫竟能身背装满爆炸物的提包，通过安装有金属检测仪、安保措施完善的地铁站入口，进入列车实施袭击，足以折射出俄罗斯臃肿迟缓的安全机器存在的漏洞之多。资深商业记者、彭博社专栏作家列昂尼德·波希德基撰文指出：尽管圣彼得堡警政当局和联邦安全局在过去4年里曾累计投入2800万美元进行监控和安保设施的升级，但为地铁系统安装金属检测仪的工程却被发包给了一家资质不足的公司，有关部门也没有为这批新器材配备足够数量的操作人员。换言之，由于腐败和低能，即使俄罗斯安全部门已经建立起一张看似无孔不入的监控网，普通市民的生命安全依旧无法获得充分保障。与此同时，俄罗斯警力与人口之比却高居全球第七，超过英国、法国和美国。

效率低下只是国土安全领域存在的诸多隐患之一。部分是出于战略地理层面的攻势防御考虑，部分是为了聚拢民心。自2008年以来，普京政府陆续出兵南奥塞梯、克里米亚、顿巴斯（乌克兰东部）和叙利亚，在客观上扩大了莫斯科的国际影响力的同时，也使安全部门面临的压力骤然增加。在过去，俄罗斯情报部门只需防备来自高加索地区的极端分子的袭击，而这类风险在几次集中清剿之后已经显著下降。然而在乌克兰战事趋向长期化且克里姆林宫深度卷入叙利亚局势的情况下，多种国籍、不同政治背景和宗教倾向的武装人员都可能把俄罗斯列

上图：4月3日，圣彼得堡地铁发生爆炸，警察和急救人员将一名负重伤的乘客抬出技术学院地铁站，送往附近医院

下图：在4月3日地铁爆炸案中被炸毁的3号车厢。俄罗斯警方随后查明，一名吉尔吉斯裔恐怖分子在列车上引爆了随身携带的1公斤TNT炸药，造成14人死亡、64人受伤

为潜在的攻击目标，而俄安全机关却远未做好防备此类袭击的准备。圣彼得堡爆炸事件的主犯扎里洛夫自2011年起即在俄罗斯境内定居，其间曾多次前往中东与恐怖组织接触，并被吉尔吉斯斯坦情报机关早早盯上，而俄罗斯安全人员对此却浑然不察。类似这样的中亚极端分子在近年来的叙利亚战事中作用已经愈发突出，并且由于原苏联加盟共和国之间的过境和移民便利，他们进入俄罗斯活动的难度要比其他国家低得多。而破绽百出的俄罗斯安保系统，似乎永远要到惨案发生之后才能做出为时已晚的补救。

甚至连大张旗鼓的对外用兵本身，所能发挥的实际作用也未必与普京的初衷相吻合。与苏联时代动辄派出地面部队的威慑行动相比，“普京模式”下的军事布局，吸引眼球的成分已经大过了确实成效。普京本人当然不会认为保住克里米亚的一处港口或者叙利亚沿岸的两个军事基地就能使俄罗斯的现实影响力恢复到上世纪70年代的水平，但他过于迷恋与美国平起平坐的感觉——默克尔称为“平行空间”——以至于不惜为之付出不菲的财政代价。然而一旦事态发展到需要持续投入资源的程度，俄罗斯的短板立即暴露无遗。2015年秋天以来，即使有伊朗这个得力盟友的配合，俄罗斯海空军在叙利亚境内持续作战的时长也从未超过半年，且仅仅承担对地火力支援任务。一俟形势稍有好转，即将大型舰艇和重型战斗机分批撤出，以免增加开支。而当地中海东部的美国舰队在4月7日以59枚巡航导弹袭击叙利亚政府军控制下的汗谢洪空军基地时，留守叙利亚东部的俄军单位一无反应，仅仅发出了几声有气无力的谴责——这也是莫斯科力有不逮的真实写照。

“普京模式”的前路

由于俄罗斯宪法规定总统一职至多只能连任两次，“圣彼得堡帮”大将梅德韦杰夫在2008年代表“统一俄罗斯”党出征总统大选，以71.2%的得票率顺利胜出，他随后任命卸任的前总统普京为内阁总理。欧美媒体在这一时期有过许多过度发挥的联想，例如认为梅氏的治国理念相较普京更为自由、温和，在他治下可能发展出一种与英美民主更接近的政治—经济模式；甚至有人认定梅德韦杰夫可能围绕自己打造一个新的权力中心，与昔日的上司、如今的下属普京做暗中竞争，最终彻底改变俄罗斯的政治

发展轨迹。回头看来，这些揣测都不过是捕风捉影。梅德韦杰夫的4年执政期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曾脱离“普京模式”的既有轨迹；不仅如此，他还主动修改选举法，将总统的单一任期由4年延长到6年，以为普京再度执政并长期领导俄罗斯铺平道路。2012年大选中，普京果然再度出马，以63.6%的得票率获胜，并随即任命梅德韦杰夫为联邦总理。

既然梅德韦杰夫无意变更自己作为“普京模式”追随者的身份属性，则他的行事方式沾染上司空见惯的裙带主义之风也就不足为奇。纳瓦尔尼在《他不是你们的季蒙》中指称：梅德韦杰夫在2000～2008年兼任俄罗斯天然气公司董事长期间，将其大学同学和密友伊利亚·耶利谢夫提拔为公司下属的银行负责人，使后者得以跻身新寡头之列。耶利谢夫随后投桃报李，通过自己名下的慈善基金会在伊万诺沃州买下一处豪华庄园，提供给梅德韦杰夫夫妇作为日常度假之用。该基金会的注册地址与总理夫人斯维特兰娜·梅德韦杰娃成立的一个慈善组织完全相同，甚至共享一份股东名单。与这两家基金会相关的还有一系列由梅德韦杰夫的长期亲信主持的企业和基金会，名下持有两艘豪华游艇、多处葡萄酒庄和农场、至少四幢豪宅以及大量外省地产，还从知名富豪乌斯马诺夫等人处获得数百亿卢布的捐款。作为回报，耶利谢夫负责的俄气银行以极低的利率向乌斯马诺夫等人提供贷款，而总理梅德韦杰夫对此一概批准。讽刺的是，去年5月，当梅德韦杰夫本人在克里米亚被一位老妇问及退休金标准为何迟迟不见提高时，竟一本正经地回答：“（国家）没钱了，但你们要挺住！”

在3月26日声势浩大的游行队伍中，“没钱了，但你们要挺住”这个“金句”被纳瓦尔尼的追随者们制作成漫画和标语，与请愿书和宪法并列在一起。不难看出，游行的直接矛头虽然是指向梅德韦杰夫，背后却包含有对整个“普京模式”的指责和质疑。但示威者的宣言并未过分拔高到“政治体制”或者“民主”等理念的程度，而是直接指向人人关心的民生问题，要求政府落实长期以来关于反腐败、控制通胀水平、提高养老金标准等问题的承诺。这反映了俄罗斯政治参与中潜移默化的代际更替：根据杨成的分析，随着苏联解体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人逐步成为选民的中坚力量，90年代盛行一时的关于“市场”“自由”等大问题的争论已经弱化。构成选民中四成以上比例的年轻人（年龄小于35岁）对政府的考察标准极为现实：无论谁是最高领导人，都必须



4月5日，圣彼得堡民众在战神广场点燃蜡烛，哀悼两天前在地铁爆炸案中遇难的无辜市民

优先解决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并切实保障宪法规定的政治参与权和市场经济秩序。他们在2012年可以因为对普京经济复兴成效的认可而投票给他，在5年后也可以因为一句空洞的“你们要挺住”而打出反对旗号。口无遮拦、缺乏政治经验的纳瓦尔尼未必是他们心目中理想的新领导人，但只要后者敢于说出他们的心声，便可以获得拥护。

普京本人未必没有察觉到这种隐微的变化。2016年8月，“圣彼得堡帮”重要成员、担任总统办公厅主任已有近5年之久的谢尔盖·伊万诺夫突然被解除职务，代之以爱沙尼亚血统的前外交官安东·瓦伊诺；在叶利钦时代短暂担任过总理的谢尔盖·基里延科也被重新起用，出任负责国内事务的总统办公厅第一副主任。与伊万诺夫、谢钦等人相比，长期任职于外事部门的瓦伊诺和基里延科距离

权力中心向来较远，与反对派中的头面人物卡西亚诺夫、涅姆佐夫（已经于2015年遇刺）则素有交谊，公众形象尚佳。在有意角逐2018年总统大选之际，普京突然做出如此意外的人事安排，显然是希望改善核心执政团队在民众心目中的形象，以为“普京模式”能够继续维持创造条件。今年第一季度，俄联邦政府已宣布将一次性发放2000亿卢布（约合30亿美元）的退休金，并积极寻求解除国际制裁，以改善窘迫的经济状况。倘若局势进一步恶化，普京或许也不惮于牺牲其他高级官员，换上一些形象相对较佳的新人作为下一个6年执政期的主要班底。但无论如何，财政资源供给有限与管理成本高昂这对矛盾在目前仍是疲态尽显的“普京模式”的死结。一个纳瓦尔尼远不足以动摇普京的地位，但深刻的变化因素正在红场的抗议人群中累积。▣

泸州中学生坠亡后的七天

记者 刘敏



(刘敏摄)

4月7日，四川泸州太伏中学门口被愤怒的群众挤得水泄不通

2017年4月1日，四川泸县初二男生赵某被发现坠亡在宿舍楼下，从此刻起，“被5名校园恶霸打死抛尸”的传言不胫而走。当官方动用删帖、封路、禁止采访等办法后，却发现人人都是自媒体的当下，舆论的发酵早已越来越难以控制。

不胫而走的流言

从流传的视频看，最早男孩的尸体还在宿舍楼下时，就有人举着手机录：“快点看，太伏中学的娃娃遭打死喽！”

视频里没有看到警察的身影，四川泸州市泸县公安局太伏镇派出所是4月1日6点20分接到的报警电话，而派出所距离学校只有100米，如果视频是真实的，那么刚刚发现坠亡的尸体，“遭（被）打死”这个说法就已经在围观群众中流传了。

太伏镇很小，只有一条主街，小到沿着太伏中学转一圈，派出所、卫生院、邮政、法庭、客运站就全聚齐了。小镇人口不到8万，大部分正在外面

务工。太伏中学是镇上唯一的中学，只有初中部。“娃娃被打死后抛尸”的消息在镇上唯一一条主街道上发酵，不胫而走。

4月1日当天，这还只是小镇上的惊悚新闻。泸州媒体一上午都没听说这起坠楼事件，一位记者告诉我，当天泸州所有本地媒体都去跑自贸区成立的消息了——泸州属于四川自贸试验区的川南临港片区，四川自贸试验区是从2016年8月就开始筹备的大事。1日上午，四川自贸试验区正式挂牌，泸州这里早上9点开始正式企业注册，记者们的焦点都集中在15分钟后第一个取得注册资格的企业身上。

普通人有自己的传播方式。太伏镇离泸州有近1小时车程，但转发微信只要1秒钟。各种手机拍摄的照片、视频，伴随着配上的解说和注释，源源不断地从太伏中学出发，向外传播。

根据百度指数，4月2日，太伏中学的媒体指数还是0，这件事仍然停留在街谈巷议的阶段。男孩的死因被描摹得越细致：是5个小孩深夜进入学校，把他殴打致死，并抛下窗子。这5个孩子里，有几人分别疑似镇长、中学校长、当地派出所所长的孩子。

4月3日，等到本地媒体和自媒体赶到太伏采访时，太伏镇已经被愤怒的人群挤得水泄不通。唯一的主街已经交通瘫痪，聚集中心在太伏中学校门口，两排防暴警察排成人墙，把围观者隔开。去采访的记者记得：“当时大多数人还是站在那里发表不满，有个人带头要往学校里冲，立刻被警察抓起来了。”

在此之前，一条在殡仪馆验尸的视频已经在泸州很多微信群里传开。视频中家人们剪开男孩的黑色T恤，翻过尸体，发现后背有大片红色的痕迹，肩膀等处有瘀青，有人翻看头皮上的血，问：“头是不是打的？”爷爷摸着孙子的后背说：“全是伤，一背都是伤。”旁边的男孩母亲已经瘫软，一遍遍要往儿子那里冲，被人们搀住后不停地号哭。

在这个时候，尽管公安在4月2日已经发布了通告，在不到200字的通告中宣布“赵某损伤符合

高坠伤特征，现有证据排除他人加害死亡”，但这样简短的通告，无法解释早已经沸腾的公众猜测。与此同时，许多其他省份的少年被同学殴打的视频、3月法国警察在巴黎追打民众的视频被冠以泸县的名头流传，还被剪辑成带字幕的短片。微博上@平安泸县的账号只有2000多名“粉丝”，在4月3日中午11点才开始发布关于此事的第一条微博，单单几则截图的公告信息，显然不如微信上图文并茂，有配乐、字幕的消息吸引注意。

微博热评里的最新说法更详细了：

“早在前几天孩子就给母亲打电话说要1万块钱交保护费，要不然星期五就打死他，母亲还报案了的，结果警察没管，然后星期六早上就发现死了，现在学校想压下来，5个人每人赔20万，一共100万元。”

在4月4日，一篇《陆天明：泸县学生死亡案——从刑事案到政治案件》的文章中，更多传闻被落到了纸面上：

“亲属们一检查，发现身上伤痕累累，背上全是被钢筋殴打过的痕迹，四肢全部打断。”

“(官方)反而出动了2000警力，强行驱散群众，并抓捕死者家属。”

“5名凶手每人拿20万，一共100万元，摆平这件事。但是拿钱买命，死者家长不同意。是啊，凭什么你拿钱就能买我孩子的命，我给你100万元，我要你孩子的命，行不行？”

“这个时候，维稳出现了。泸州要搞泸州自贸区，如果泸县出了乱子，不但县委县政府一帮子人都要倒霉，就算是泸州市委市政府也脱不了干系。”

这个文章现在看来错误很多：验尸视频里只有大片暗红色斑块，并没有硬物抽打的伤口；自贸区并不是“要搞”，是早在1日已经挂牌成立，已经板上钉钉；死者家属也没有被捕，在座谈时死者父亲一直要求官方解决好家属们的吃和住。

而著名作家陆天明本人在4月5日发微博对文章辟谣：“我郑重声明，这不是我写的。”

但在4月3日这个上午，泸州当地并没有意识到怎样得体地处理这些传言。学校和县宣传部一开始接待了新华社、《华西都市报》等媒体的记者，安排了跟生活老师、男孩室友等身边人的采访。但采访刚开始不久，泸州市委宣传部的人就闯进来叫停，直接把记者送上了回程的车，禁止在当地的一切采访行为。

4月4日，新华社记者发了一条明显带有记者愤怒情绪的专电。“记者向县委宣传部部长陈佳、县政法委书记李盛春提问，问及网民关心的案发前是否有报案行为、证明不是他杀的证据是什么、是否存在霸凌现象等问题时，两位地方领导一致表示，这是网上谣言，根据法律，当地有理由不予回应。”

自杀还是他杀？

4月7日，男孩坠楼第五天。

太伏中学校门口聚集了一两千人，嗡嗡的谈论声笼罩着人群。防暴警察不见了，每隔5米站着一名交警或戴着红袖箍的人维持秩序。川南已经是初夏的气温，接近正午，阳光越发炽热，人群里常常突然间形成一个小圈子，内外的人全都举起手机，高高低低地冲着一个个中心录像。中心的人愤慨地高声宣讲，持续几分钟后，这样的圈子散掉，很快在下一个地方形成。

“要是当官家的娃儿，早就出结果了！”

“我自己的娃儿在这学校，我都不知道不安全不安全！”

“到现在都不把凶手叫出来，连个说法都没得！”

宣讲的都是本地人，大多是学校孩子的家长，旁边一路挤进来用手机做直播的年轻人，要分辨半天才知道该把镜头对准谁。初一、四、七是太伏镇的赶集日，当天农历十一正值赶集，以水田为主的太伏镇要过一周才开始插秧，也还没到农忙的时候。因为坠楼事件放了两天假后，学生们回来上学，家长送完孩子就聚集在门口不走了，“人越多，给政府的压力越大”。

男孩的母亲游某此前带着花圈来过校门口，她站在塑料板凳上，一边哭泣，一边拿着喇叭痛斥学校的场景也被围观者全部录下。这条街很多人都知道游某，她过去在派出所旁边开小超市，2012年，她与男孩父亲离婚，不久又复婚，2014年，夫妻再次离婚。男孩父亲一直在外地打工，游某去了泸州市区给电器店打工，男孩至此变成了真正的留守儿童，他每个周末回到12公里外的村里的爷爷奶奶家，由两位老人照顾。

很多围观者通过各种人际关系，也对这一家人略知一二。对一个小镇来说，很多居民彼此都不是完全的陌生人。但站在校门口的学生家长，正在与

互联网上几千公里之外的人说着同样的话,比如“当官的孩子打死了人”,哪怕他们生活中更多常识会让这个判断不那么站得住脚。

一位从太伏中学毕业、妹妹正在太伏中学读书的人告诉我,在太伏镇,“政府官员的孩子、有钱人家的孩子,只要有点钱都会送出去读书了,去附近兆雅镇的泸县四中初中部,或者去泸州二中、泸县二中、泸州七中的初中部,城区还有天立中学、淡思学校、梁才学校、泸州七中佳德学校这些。”她的妹妹也是留守儿童,但被父母送到老师家寄住,太伏中学很多老师都在自己办寄宿,一个学生包吃包住,每学期5000块钱。“老师能帮辅导作业,晚上下了自习还有加餐,管得很严。”最后是那些家境不富裕的农村学生会留在学校住宿,一个房间8个人,每学期住宿费只要几百块,平时吃食堂的大锅饭。“真正的镇长、校长家孩子,怎么可能住在学校的宿舍里呢?”

公安方面毫无细节的通告,和民众的言之凿凿的判断,成了一个罗生门的叙述。这在男孩的乡下爷爷家里更加明显。

车子一进照南山村,就有路人指挥停到远处,“不要堵上路”。一下车才发现,村里已经来了很多外地车,每台车上下来的人自发聚集在一起,有小100号人正在浩浩荡荡往男孩的家里走。照南山村是一个标准的山清水秀的小村子,梯田里蓄着水,泛着新绿,家家都是两三层的小楼。男孩家的两层小楼贴着亮色的瓷砖,院子里扫得很干净,一进门,客厅里已经有十几个人坐着了。

这些人并不是赵家的亲戚,都是从各地赶过来的网友,新来的这一批发现了卧室的位置,直接推门一拥而进,举起手机,围住床上的男孩爷爷。

“节哀啊爷爷。”“保重好自己的身体。”寒暄之后,人们迫不及待地问爷爷:“有没有听说过保护费的事?”

爷爷虚弱地摆摆手:“我没有,娃儿从来没说过。”

“他不敢说。”大家交头接耳,有人一不小心按错了屏幕,刚刚发出的微信语音又在房间内响了一遍。“有没有人要保护费?”“我没有,娃儿从来没说过。”

“爷爷你说嘛,我们这些都给你撑腰。”

爷爷还是摆手:“真的没有,实事求是,你就是切了我的头,也是没有这回事。”

“气神经了。”有大姐一边录像,一边当着爷爷的面跟同伴说,“你看他说话都不太正常了。”

在此前的视频和流出的座谈会录音中,这位69岁的爷爷一直表现得很冷静。两代单传的孙子是自己一手带大的,验尸时他摸索孩子的身体查看细节。在座谈会上,他批评校方在自己赶到学校时,拦着不让看尸体,没照顾到家属的情绪。“你们做领导的)要跟这个劳动人民做会儿思想工作。”他认为所有人都没有把这件事处理好,他说:“花言巧语我说不出来,要让大家通情达理地对不对嘛?闹,也是不对头,但是你们用武力手段,也是不对头。我也认为大家都有错,如果你们把人(孩子的阿姨)扭到了,必须要给她医好,我就是这个说法。”

但是在面对嘈杂的陌生人时,他选择不再说话,人群发现问不到什么,又涌出了卧室。两个一直在值守的“120”医生进来量血压。出门后我问其中一位医生赵家的近况。“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医生拒绝回答任何问题。

院子外,来自各个地区的人们在大树下七嘴八舌地讨论,内容和校门口差不多:“娃儿死得好造孽哦!”他们没有从爷爷口中得到自己想要的答案,由此认为,这是爷爷和其他家属被警方控制了,他们什么都不敢说。

有位重庆合川来的小伙子已经是第二次过来了。他骂了一通后,听说刚刚两个穿深色制服的人只是“120”的医生,他愣了几秒,还是大骂了一声“太腐败了!”发现我是外地口音,临走时小伙子特意叮嘱我:“你是从外面来的,一定要让更多人知道,光我们扩散实在太少了。”

7天后的通告

事件的发酵,在4月7日戛然而止。

男孩身亡后,家属一直不同意尸检,因此大量围绕致死原因的揣测无法直接核实。直到6日中午12点,家属终于同意尸检,最终检查结果是:死者身体上的损伤符合外轻内重、暴力巨大的损伤特点,损伤均为高坠伤;无其他暴力加害形成的损伤;无死后伤。

也就是说,那些尸体上红色的片状瘀血,是死者死后形成的尸斑,而非“打得全身是伤”,骨折和脱臼,是高空坠落的结果。

7日当天,正是男孩的“头七”,四川泸州市委

市政府召开媒体见面会，通报了死者坠楼的具体情况，用 4103 字的通告正文详细介绍了这起坠楼事件的前因后果。其中主要内容可大体归结如下：

14 岁的男孩自从父母离异后，学习成绩迅速下降，平时都是爷爷奶奶跟学校沟通。3 月 27 日晚自习后，他和好朋友们翻围墙出去买东西被管理员发现，这导致爷爷奶奶次日被叫到学校来。翻墙一事惹怒了在外打工的父亲，男孩每周 100 元的生活费缩减到 90 元，而且原本要出去租房的计划也彻底泡了汤。

他很怕自己的父亲，知道这次的事儿早晚逃不了一顿揍。从 28 日起，男孩心情低落，开始发烧。直到 31 日，马上就要放清明假回家了，他的病一直没好，反倒开始加重。就在 31 日半夜，他还在睡梦中惊醒坐起，嘴里大声说“有人要打我”“有一两百个人要打我”，表情惊惧。

不知最早的“被打死抛尸”，是不是就从这里转述中得来。然而男孩再没有跟朋友们有过详细的沟通。凌晨 2 点，生活老师最后一次见到他时，他还病恹恹地躺在床上。到了第二天一早室友起床时，发现到处都找不到这个男孩。再次看见他，他已经躺在楼下的水泥地上，坠楼身亡了。

男孩去世前曾与一名同学有过打架记录，但那次他占了优势，事后他又带着十来个同学前去约架没有打成，最后二人和解——他没有被校霸欺凌的历史。

宿舍楼熄灯之后大门紧锁，不能随便出入，小宿舍之间不能锁门，隔音很差——这排除了半夜有人跑到男孩宿舍打人的可能。

尸体上骇人的伤痕，外行人确实容易看成“遍体鳞伤”，但尸检和很多公开发言的法医都断定，这只是死者去世后正常出现的尸斑——被打死的可能性也排除了。

突然间跑出，又突然间被官方藏匿的 5 个校霸，现在证明是子虚乌有。而为什么为了这点小事就跳楼的心理变化，也只有男孩自己才知道了。

详细通告出来后，事件的热度迅速冷却下来。4 月 5 日、6 日，还是网上关于太伏中学事件传播最热的两天。从百度指数上看，事发后的媒体指数在 4 月 3 日是 3558，4 日是 13369，在随后两天指数暴增到 55670 和 88541。但是到了 7 日当天，指数迅速拦腰缩减到了 46058，等到通告公布的次日，4 月 8 日则只剩有 14590 了。

就在 31 日半夜，他还在睡梦中惊醒坐起，嘴里大声说“有人要打我”“有一两百个人要打我”，表情惊惧。

事件的终止

公告发布后，太伏镇中学的校门口终于安静下来。

7 日当天，除了官方的通告，还有《环球时报》《新京报》等媒体发布了自己撰写的报道。《新京报》记者告诉我，自己是受泸州当地宣传部邀请前来采访，真正接触到死者的老师和同学后他发现，这些师生们都很朴实单纯。而这些师生早就知道事情的真相，但直到事发后第六天，才第一次有机会向媒体讲述原本就很简单的原委。

4 月 8 日，男孩的母亲游某在微信朋友圈发了一条长文：

各位关心关注我的亲人们：

我是赵×的妈妈，当得知儿子死亡消息的时候，我心情非常激动，非常难过。我只是想要一个儿子死亡的真相，从而让很多过激的视频和图片被别有用心和不怀好意之人利用，一度把我推到了网络谣言的风口浪尖之上。我不知道他们是啥子目的，但作为一个母亲来说，我的儿子在校园死亡，我只是想知道儿子死亡的真正原因。我在此声明，我从未接到过儿子被收保护费的电话，更没有得到所谓的 5 个校霸一家 20 万元的赔偿消息，更没有参与造谣和传谣。现在省公安厅下来进行了尸检，我已请了律师和相关专业的第三方法医见证人，我相信尸检的结果是公平公正的。

在这些天以来，县委和政府各级领导对我非常关心，也给于（予）了很多帮助，在此表示非常感谢。

希望真正关心我的朋友们，不要轻信谣言，更别误传谣言，不要被有心之徒再次利用。谢谢大家！

男孩家人始终没有接受任何媒体的采访，不同记者向母亲游某发送的微信好友申请、手机致电都没得到回应。一场持续了 7 天的喧闹，最终以急速的冷却收场。■

（感谢实习生吴扬对本文的贡献）

“浑水”做空者卡森·布洛克

实习记者 刘周岩 孙大卫



浑水调查公司创始人卡森·布洛克

就像是资本市场上的“职业打假人”，他一出手，被做空的公司面对的将是几十数百亿市值的蒸发乃至破产。凭着对中国的了解，他也专门盯上了那些有问题的中国上市公司。“相比于收到的这些死亡威胁，我更担心那些没有收到的威胁。”卡森·布洛克接受本刊采访时说。

辉山背后的做空者

3月24日至今，辉山乳业的股价暴跌及一系列连锁事件使其引发了远超自身乳品知名度的来自资本市场和公众的广泛关注，也使做空辉山的美国浑水调查公司（Muddy Waters）及其创始人卡森·布洛克（Carson Block）再次置身于风口浪尖。

24日一天之内，在香港交易所挂牌的辉山乳业股价暴跌达85%，创港交所史上最大跌幅，市值一日

蒸发约320亿港元。如此幅度的暴跌震惊了市场，随之而来的，便是传言四起，如几十亿资金被挪用作房地产投资、审计过程中发现大量单据造假等，董事失联、辽宁省金融办介入等一系列事件陆续发生。

辉山自身固然问题缠身，然而也有许多势力在有意地做空辉山，卡森·布洛克和他的浑水调查公司就是其中最主要的力量之一。

今年40岁的美国人卡森·布洛克曾在中国生活过若干年，能讲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不过和其他大多数“中国通”不同的是，他的中国敌人可要远多于中国朋友。“你、你的妻子和你的父亲，准备好接受我们的子弹了吗？”“一颗击中脑部的子弹并不会是太痛苦的死亡方式。”这都是他曾经接到过的死亡威胁，毕竟他自2010年以来从事的是一项专门断有权势之人财路的生意——做空那些有问题的在海外上市的中国公司。“不过相比于收到的这些死亡威胁，我更担心那些没有收到的威胁。毕竟，想让我出事的绝不止

发给我邮件的这些人。”卡森·布洛克告诉本刊记者。

浑水公司发布的调查报告被视作是辉山此次崩塌的关键推动因素。2016年12月，浑水首次发布了针对辉山乳业的做空报告，指出公司在各类数据上造假、董事长杨凯窃取上亿资产、公司面临巨大债务压力处于违约边缘，结论称辉山的实际价值为零。随后辉山和浑水之间展开了数轮较量，辉山对浑水的报告予以驳斥，而浑水则拿出更多证据发布了第二份报告，进一步揭露辉山的造假和欺诈行为。虽然触发辉山3月24日股价暴跌的其他外部因素现在还不完全明了，但浑水的报告显然对于影响投资者判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辉山陷入泥沼之时，浑水已经利用这次做空赚取了大量利益。卡森·布洛克毫不讳言做空是为了自己牟利。浑水发布的报告都会明示：“您应该认识到使用浑水公司研究报告的风险……浑水公司及其客户和雇员，在出版这个报告之时，已经对所述股票采取了做空策略，并将从股票下跌中获利。”卡森·布洛克首先寻找有漏洞的公司并进行调查，确认公司有问题后，通过融券业务向券商借来一定数量的该公司股票，高位卖出股票后，发布负面报告，使得核心投资人对该公司撤资造成股价下跌，此时再低位买回股票归还以赚取价差，这就是他的基本盈利方式。

仅在2010至2011年，就有多家公司被卡森·布洛克做空，其中东方纸业因财务造假股价暴跌，绿诺科技因虚构客户等原因最终退市，中国高速频道因夸大营收最终退市，多元环球水务因财务造假停牌，嘉汉林业因虚报收入与资产宣告破产。此外傅氏科威威、新东方、网秦、奇峰国际等企业也曾被浑水做空。“浑水”这个名字正来源于中国成语“浑水摸鱼”，卡森·布洛克自称针对的就是这些利用中国商业环境与国外资本市场间信息不对称而浑水摸鱼、欺诈造假的在海外上市的中国公司。

上世纪90年代末到上海研究A股公司，2005到2010年之间在中国做律师、创业，这些特殊的经历，对中国商业、法律的钻研，使得卡森·布洛克比其他外国人更能看清中国的“浑水”。而美国人的身份、法学和金融的背景以及一个是此中老手的父亲，又让他知道如何与海外投资人打交道。看起来，没有什么人比他更适合创办浑水调查公司了。不过，浑水的创办却源自一次意外收获。

意外的收获

2010年1月的一天，一辆白色面包车出现在河

北保定徐水县。冬日的河北刮着大风，这里又刚刚有过一场暴雪，眼前的一切都是白茫茫的。华北平原的景象对于车里的两个人是陌生的，毕竟这是两个常居在上海的美国人，33岁的卡森·布洛克和他的同伴肖恩·里根(Sean Regan)。布洛克当时恐怕不会意识到，这一次的河北之旅正是改变他人生轨迹的节点。

面包车行进的这条狭窄而颠簸的双车道，正是通往东方纸业刚刚改造后的工厂。而这个工厂，据东方纸业透露给投资者的信息，可以极大地提升企业的造纸产能。卡森·布洛克已经在中国做了几年生意，这次是受父亲的指令来调查东方纸业。他的父亲威廉·布洛克(William Block)在美国有一家自己的公司WAB Capital，主业是为对冲基金等大型投资机构推荐股票。他专门研究小型公司(5000万美元到3亿美元)，发现有投资潜力的公司然后向投资人推荐。因为他总是撰写正面的研究报告，以致有人挖苦他实际上是从这些小型公司收钱，然后替他们做宣传。老布洛克这次想推荐一家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东方纸业，想到儿子既然在中国，不如让他顺便去实地考察一番。布洛克叫上了自己的朋友、南加州大学的校友肖恩，同样在中国做生意的肖恩正好是制造业的内行，擅长于供应链管理和质量监督。

出行前夜，两人先查阅了东方纸业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登记的文件，发现了不少蹊跷之处。这家在纽交所上市、市值1.5亿美元的纸业公司，存货周转率竟然比竞争对手高了一倍，也就是说，同一时间内，东方纸业存货流动的速度，比对手快了一倍。它们的生产额奇高，只有几个反复出现的大客户。还有一串可疑的供应商，其中至少一个就是东方纸业老板自己家的。这一切都显得不同寻常。

带着疑惑而来的二人处处留心。刚刚接近工厂门口，两人就有发现：这里的道路似乎太新了一点，没有什么磨损。布洛克通过计算发现，东方纸业每天至少要装卸一两百卡车的原料，才能和其报表上的生产量相符。然而每天行驶一两百辆卡车的道路不太可能像他们看到的这样新。进到工厂，他们看到的情况进一步使人觉得公司经营状况存疑：机械老化、工人稀少、维护状况堪忧。库存原料的状况更是令他们印证了自己的想法：所谓库存原料，只是一堆被随意堆积、潮湿发霉的废纸，而在东方纸业提交给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一份文件中，这些原料被描述为“价值470万美元、对公司下一步发展至关重要的珍贵原料”。肖恩当时爬上这堆废纸对卡森喊道：“如果这堆东西值470万美元，那这个世界要比我想象的富裕多了！”

带他们参观的老板刘振勇，对于自己的生产数据，更是一问三不知。“我被震惊了。”卡森·布洛克回忆道，“当时我就想，这家公司毫无价值。肯定没错。”

回去的路上，两人犯了愁。这回的研究对于布洛克而言，算是赔了，他父亲原本为东方纸业写报告、做宣传的计划看来不能实行了，而且他和肖恩还为这趟旅行花了几万元人民币。他们本以为在新一轮审计之后，东方纸业会被揪出来，结果东方纸业居然毫发无损。于是他们想，不如发布一份针对东方纸业的负面报告，从中做空得利，也许能把调查的差旅费赚回来。不过两人谁也不确定结果如何。

回到上海后，他们又做了一番调查，写出了30页的报告，以“浑水公司”的名义发给了几十位认识的投资圈内人士。这是2010年6月28日中国时间凌晨1点15分。当周，东方纸业的股票跌了一半以上。这份报告，就是浑水公司在中国打响的第一战。卡森回想时承认：“当时我完全不知道我在干吗。”发布的时机、方式等都不甚恰当，做空投入也实在太少，最后仅获利4000美元左右。“我没想到人们真的在意我们的报告。”然而市场反应却十分强烈，东方纸业从每股8.5美元，第二天即下跌至每股5美元以下。此后的几个月浑水与东方纸业不断来回交锋，接连发布声明和报告，东方纸业的股价来回起伏，最终还是跌落谷底，一蹶不振。此前东方纸业每股超过8美元，到了2017年3月，只剩每股1美元多一点。

这次的风波，不仅收获了名声，也引来了大麻烦。这一点远远超过了他们两人的想象。许多人发来邮件威胁布洛克，甚至按图索骥找到了他父亲的地址，提出要去WAB Capital给他父亲点颜色瞧瞧。他和肖恩·里根在上海街上提心吊胆，随时提防着身边的黑色轿车，担心从车上下来找他们麻烦的黑社会。谈话也开始用设计好的暗语。布洛克甚至换了个老式的大哥大，以备紧急时防身。肖恩·里根完全被吓到了，他本来只是一位想在昆山建工厂的投资者，完全没有想到一份30页的唱衰报告能导致如此的结果。他退出了和布洛克的合作。

卡森·布洛克则看到了其中的商机，决定继续做空其他有问题的中国公司。但是他本人自2010年就离开了上海，此后再也没有进入过中国内地，而是远程操控着对中国公司的调查行动。他辗转香港地区与美国，从不透露自己的具体行踪。“我很想念上海，也好奇内地最近的变化，但出于对安全的顾虑，使得回上海看看只能是个无法实现的念头。”他感慨道。

律师、商人、中国通

CNBC曾披露，高中时卡森·布洛克的GPA成绩一度只有1.4，他最为出名的就是组织派对的能力。为了防范大规模高中生饮酒行为的出现，警察常常得守在他父亲在洛杉矶的房子门口。这样的少年生活看起来颇为叛逆，不过对美国高中生来讲也不稀奇。布洛克承认，他高中肯定算不上好学生，但他的阅读量很大，非常喜欢科学书籍。

布洛克初期的人脉和机会，和他的家庭息息相关。做股票研究的父亲带他进入了商业的世界。从高中开始，他暑假就去父亲的公司打工。他早就认定，自己未来要去华尔街工作。当未来他在不同职业之间频繁跳转时，父亲仍是坚实的后盾，不仅能为他提供建议，而且也总可以让他在缓冲期先来帮自己做一些项目研究。

高中毕业后，布洛克进入了父亲的母校南加州大学，和父亲一样就读于商学院。必修的通识课他上得马马虎虎，不过金融专业的高阶课程，他常常能拿到很高的成绩。他解释称：“我一直对学校的条条框框保持敌意，不喜欢莫名其妙的规章制度。”值得一提的是，他在大学期间出于兴趣辅修了中文。

1998年从南加大毕业之后，布洛克来上海待了半年。那时候他想研究中国的A股，看看能否有所作为。但是几个月下来，他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市场还不够成熟。于是他回到美国，继续为他父亲工作，之后也帮一家对冲基金做了些亚洲投资的咨询工作。到了2002年，他决定去芝加哥肯特法学院进修(Chicago-Kent College of Law)。但他的初衷依然是成为企业家，读法学院，了解商业的法律背景知识是他的目的。不过令他意外的是，法学院的学习令他非常开心。“我本来只是想学习合同法、公司法等和商业相关的法律知识，但是当我学到刑法和侵权法时，也很喜欢。我在法学院时真正学会了批判性思维。”他这样说道。2005年获得J.D.学位毕业后，他得到了美国的众达国际律所(Jones Day)的工作机会，并主动选择外派到上海。实际上，1998年大学毕业到2005年定居上海之间，每年他一有机会就会回中国看看。他一直认为，中国市场隐藏着重大的机遇。

然而，他的律师生涯也不长。2005年夏天入职后，2006年末他再次离职。与此同时，他在努力和朋友罗伯特·柯林斯(Robert Collins)编撰一本书，《傻瓜丛书：在中国做生意》(Doing Business in China

for Dummies)。他在这本书上下了很大心力，其中很多内容都是他的法律知识和在中国生活经历的结晶。“我最大的错误就是把这本书放到傻瓜系列里，其实这是一本很严肃的书，其中涵括了我自己的经历和许多非常实用的做法。”他对这本指导外国人如何在中国做生意的书非常自豪。从律所退出后，他依然在上海兼职教授法律课程。直到现在他也经常受邀到各个大学讲演商业伦理、中国股票欺诈等内容。

《在中国做生意》的第十七章是“在中国控制风险”，其中提到了各种尽职调查（due diligence）的方法。所谓尽职调查，是指进行交易前，对交易相关人或公司进行的调查，从而评估交易的风险。这一章中还提及了各类在中国弄虚作假的商业行为，可见早在2007年，卡森·布洛克对于中国公司的作弊状况已经有一定认识了，这成为他日后创办浑水调查公司的知识基础。

布洛克也身体力行，在中国创办了自己的公司。他看到当时中国几乎还没有私人仓储服务，而这一模式在美国已经相当完善，于是在上海创办了名为Love Box的高端私人仓储服务公司。他的创业并不太成功，即使是在上海，私人仓储仍然没能流行起来，公司数次面临财务危机，最终在2012年被转手卖给了其他人。不过这段经历对他进一步了解中国，成为一个商业领域的“中国通”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之前做法律工作的时候，我接触到的中国人实际是非常精英化的一群人，自己开始做生意，才真正和各种各样的中国人开始接触，他们有着非常不同的行为模式。”布洛克回忆道。在我们整个以英文进行的采访过程中，凡是提及中国政府部门，他都还会脱口而出它们的中文名称，比如“工商局”。和这些政府部门打交道是他创业的重要收获。对于中国式“关系”与“猫腻”的艺术，他也是这时开始入门的。

从1998到2010年，卡森·布洛克的人生轨迹貌似凌乱无序，但实际上都在为他创建浑水积累经验。

树大招风

从东方纸业的第一战之后，卡森·布洛克的调查与做空便愈发专业，一度被称为“中概股狙击手”。“我的性格是律师型的，而律师的特点是找问题、找风险。”他如此解释自己在发现问题时的敏锐。浑水公司的调查手段也不拘一格，除了基本的查阅公开资料、调查关联方等常见手段，浑水还经常采用暗访、假扮客户联系业务等方式对公司的问题进行“侦破”。

调查中国高速频道时，浑水派人在几十辆公交车上实际观察广告播放情况，发现司机都喜欢播放自带的DVD节目，高速频道对终端控制力很弱。调查多元环球水务时，浑水在办公地点发现员工毫无工作状态，形同“成人托管所”，推测公司经营一定有问题。调查辉山时，浑水使用无人机拍摄在建的牧场情况，发现工程进度堪忧。有了这些直观的判断之后，浑水再在办公室内进行数据的比较、核实，坐实问题。卡森·布洛克认为，监管机构和大的会计事务所不能及时发现这些问题公司的欺诈，就是因为它们只进行办公室的研究，而不去实地调研。

不过，浑水的调查也受到了不止来自被做空公司的阻力。2012年之后，卡森·布洛克做空中国公司的频率明显降低，转而将视野转向了一些其他国家的公司。他告诉本刊记者，他在那之后挑选做空对象时会相当小心，有一次他看到本来计划做空的公司被重要媒体做了负面报道，认为这是其背后没有权力后台或是权力后台已经崩塌的象征，才敢继续。“我不想和某些重要部门相对抗。”

在美国、中国香港等资本市场，由于没有对做空的政策限制，浑水这类做空机构十分常见，苹果、微软、IBM等著名公司都被人尝试做空过。不过做空者也不是总能成功，没有漏洞、经营良好的公司即便被“误伤”，股价往往也能很快回升。做空失败的机构要蒙受经济上的损失，如果是以造谣等形式恶意做空，还要承担严重的法律后果。做空机构与上市公司之间，形成了一种动态平衡。

“我认为我的行为对市场是有利的，可以帮助投资者淘汰那些造假的公司。”卡森·布洛克如此评价自己在做的事。不过他也坦言，从做空中获取利益才是自己的首要目的，自己的本意不是要成为行侠仗义的忍者或是劫富济贫的罗宾汉。

不过这份利益得来并不轻松。卡森·布洛克曾经和自己的妻子开玩笑说：“我收到的死亡威胁就是我业绩的证明。”当记者试图联系他的朋友和他在南加州上学时的同学和教授时，得到的回答是，接受采访是一件“太危险”的事。卡森·布洛克也在通过拓展业务的方式分散风险。一方面是扩展国际市场，做空其他国家公司，另一方面是成立对冲基金，以更多元化的方式进行投资。据卡森·布洛克向本刊透露，未来两个月内，浑水还会陆续发布针对其他数家公司的做空报告。其中，至少也会有一家中国公司。■

（本文参考了CNBC、Institutional Investor此前对卡森·布洛克的报道）

特色小镇的公司路径

中国式的新型休闲生活小镇，会开出怎样的花？



山水文园集团董事长李轍

李轍每个月都要去巡视几次他的“小镇”，他所打造的山水文旅小镇，计划将游乐、度假、抗衰老、居住以及宜居所需的一切配套全部融入一个5平方公里“小镇”里，并将当地的文化、历史，与现代生活需求相融。

作为山水文园集团的董事长，李轍的小镇理想，将在浙江海盐得以施展。他雄心勃勃地计划给当地创造10万个就业岗位，每年吸引1200万游客，促进400亿元的经济增量。目前，海盐的山水主题小镇项目进展顺利。

他的构想，去年又获得了重庆当地的认可，成功落址了第二个项目。此后，一些地方政府均流露了浓厚的兴趣。这得益于他在北京打造的一个类似于美国“戴维营”的高端度假项目，这个名为金海湖国际旅游度假区的项目，因为是汪峰向章子怡求婚之所而被公众熟知，更因为他引入了与迪士尼齐名的美国六旗主题乐园作为他打造“欢乐之城”的先锋。

美国六旗以“全球最多丧心病狂的过山车”闻名于世。引进这一主题乐园，借助巨大IP效应，山水主题小镇希望将本土文化与现代休闲、娱乐、文化融合，以文创产业为支撑，把主题旅游度假、主题公园和都市室内游乐综合体进行集合，打造全新的欢乐生活小镇，接驳全域旅游城镇网络。

按照李轍的判断，现在是一个需求更加多样的时代、一个供给更加优质内容的时代、一个主体更加多

元的时代。新兴中产阶级的兴趣和情感表达，看待时间和生活方式的变化所带来的生活习惯的变化，以及面向未来的价值消费的倾向，使人们对生活空间的需求不再局限于户型、地段，新的生活模式正在建立，休闲的需求被无限放大。这让新形态的消费城市正在崛起。

刚刚结束的博鳌亚洲论坛中，一场名为“城市的个性”的分论坛颇受关注。青岛市副市长董晓莉、韩国仁川市长刘正福（Jeong-bok）、摩拜单车联合创始人王晓峰和山水文园集团执行董事兼CEO张晓梅参与了讨论。他们基本得出的结论是，未来特色小镇所孕育的特质，将构成城市的个性。张晓梅说：“原来谈城市都讲建筑、容量、人口、GDP，开发商比拼的是拿地、规模和融资等。现在要将城市放置于千年文明史中观察，关注小镇里人的生活体验，最后培养形成小镇的独特特质，从城市的个性和现代生活的变化中导出生活方式。”

去年，住建部等三部委发布《关于开展特色小镇培育工作的通知》，计划用三年时间培育1000个特色小镇，带动全国小城镇建设。特色小镇的行政区划属性原则上为建制镇，优先选择全国重点镇。从已公布的第一批127个特色小镇来看，基本都是各省“尖子生”。比如毛衫畅销全国的濮院镇，以六安瓜片为核心的茶产业集群专业镇的独山镇，拥有足够资本力量的朱家角镇等，这些小镇，要么是有难得的自然禀赋，要么是有突出的产业优势。

浙江省早在2015年便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要规划建设一批特色小镇，并且不限于行政区划意义上的“镇”。按照官方描述，它是一个面积在3平方公里左右，“相对独立于市区，具有明确产业定位、文化内涵、旅游资源和一定社区功能的平台”。

谁能成为特色小镇，取决于自身的产业基础与特色，这是市场而非基于城镇行政级别的选择。在浙江，海宁的皮革、义乌的小商品、嵊州的领带等，这种在县镇级行政区划包含下自由生长的“块状经济”，以民营经济的高密度聚集而产生的特色小镇很多，类似于山水主题小镇这样主打生活方式的“块状经济区域”，尚无完整的案例。但浙江在尝试以一种更为顺应市场的方式进行行政资源配置，将特色小镇的创建方向，除了茶叶、丝绸等历史经典产业，更是要在信息经济、健康、旅游、时尚、金融、高端装备制造等万亿元级潜力产业上发力。



与迪士尼齐名的美国六旗，以“丧心病狂”的过山车闻名

山水文园集团的外方合作伙伴也都知道“踩在点上”了。在六旗集团国际总裁约翰·奥德姆看来，主题乐园作为城市交往的场所，是一个不错的开始，但仅仅是一个乐园，是没有办法构成生活区域的。

奥德姆认为，中国的旅游和休闲产业存在巨大机会。这种机会表现为：在中国，集体至上灌溉了时间就是金钱的观念，人们活得太匆忙。现在，中国消费者走过了“以时间换取收入”的阶段，正在进入“以收入换取闲暇”的阶段，新一代的消费者开始懂得辨识自身的需求，与闲暇相关的休闲服务将会迅猛地迎合。同时，长期以来，休闲产业所能提供的服务与功能，与经济的快速增长不匹配。

选择在浙江海盐实现企业版特色小镇，是李辙深思熟虑后的决定。海盐地处整个长三角的中心，半径100公里的区域内有6个机场，能够满足未来大型国际级游乐场对于交通及人口等方面的要求。周边有效消费人群超过4亿，区域内GDP总值超6万亿元。浙江本身又是中国经济最发达地区，人均GDP已达到1.2万美元，符合发达国家休闲产业成为经济核心驱动力的一切特征。

这些数据和调研结果让奥德姆兴奋不已。“当人均GDP达到1.2万美元时，超越商业范畴的广义服务业形态开始出现，一个以休闲为基础的新社会正在显露雏形。休闲服务将从标准化和集中化转向个性化服务，这为休闲产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开辟了更加广阔的空间。目前美国人已有1/3的时间、2/3的收入、1/3

的土地面积用于休闲，创造了全国超过一半的就业。”

消费崛起的背后是人们的闲暇时间越来越多。进入农业社会，人们的闲暇时间大概是17%；进入工业化社会以后，闲暇时间大概是23%。进入知识社会之后，人们的闲暇时间也越来越增多。现在，学者估计人们的闲暇时间达到50%。如何消磨闲暇时间，成了全世界商人都在琢磨的问题。

“在消费升级时代，物质型、娱乐型、体验型的消费形态已满足不了消费者需求，人们开始对文化、艺术、历史等精神消费充满期许。而文化是城市意象与记忆的来源，可以用来把艺术、食物、时装、音乐、旅游等，产业化地结合起来，为特色小镇的独特竞争力提供基础。”李辙说。

破纪录的过山车、适合全家的游乐设施，以及世界级水平的表演，是山水主题小镇的核心娱乐元素。同时，融合中国元素，以文创产业上下游支撑为精神内涵，结合本土文化，因地制宜地打造六旗小镇的五大产业板块——体验式商业集群、高端酒店会展集群、文化创意产业集群、国际健康产业集群、度假森林小镇，再辅之教育和医疗配套，打造全业态生活方式。

不再沿袭“城市效率优先”的传统原则去打造新的“巨无霸”，而是秉持一种“愉悦生活”的观念，着力于生态、人文、经济、生活等各个要素均衡配置，让人们在此交往。这是李辙的思路。“我们的小镇绝不仅仅是一座庞大的建筑群，而是一个能够留下一生美好回忆的地方。”他说。（文/赵凡）



(黄宇摄)

歌手梁博

梁博：选秀冠军回归

记者 / 宋诗婷

时隔五年，曾经的选秀冠军梁博又抱着吉他出现在真人秀节目。这一次，他不是爱音乐的少年，而是“灵魂歌手”。

灵魂歌手

“灵魂歌手”会成为爆款，少城时代 CEO 冯轲对此深信不疑。

一年前，当音乐真人秀节目“歌手”还叫“灵魂歌手”时，湖南卫视的节目负责人就找过少城时代，想邀请其旗下歌手梁博参赛。“当时节目规定，只能翻唱。梁博是一个不做翻唱的歌手。”公司心动，歌手不妥协，只能作罢。

一年后，“灵魂歌手”改名“歌手”，没了海外版权“红宝书”的限制，节目调整了规则，原创歌曲的限令解除。

“让自己的原创歌曲在一个非常不错的平台展示，抛开胜负观念，你愿意吗？”冯轲说服了梁博，尽管后者曾笃定，不再参加任何竞技类音乐节目。

“我只发了‘灵魂歌手’一首歌给他们。”在与导演组沟通表演曲目时，冯轲用信息限制的方法博弈，“歌曲的功效不一样，如果说后来的返场歌曲《男孩》是家常菜，《灵魂歌手》就是一道山珍海味，它表达的思想又与这档节目极为贴切，以这首歌开嗓是最好的。”

节目组也认为，《灵魂歌手》是最好的选择，优势在于歌曲本身与梁博、与“歌手”节目之间的

互文性。

“灵魂歌手开唱瞬间，能击碎万颗心……”

“他经历过的事，他深爱过的人，他选择走的路，不是愤怒，不是疯了……”

“电视里的节目，让人看得想哭，我的那些朋友，争先恐后，争着去做奴隶……”

这是一首现场演出效果远好于音频的歌。《灵魂歌手》难唱，难度与技巧无关，与歌手的心态有关。“灵魂”是个被用滥的词，没有绝对的气场，歌手的演唱很容易流于庸俗和煽情。

梁博清楚这一点，他也知道，自己的优势正在于此。“这不是一首没有自信的人可以唱好的歌，哪怕你对自己有一点点怀疑，你都没法唱。我写这首歌时，是真的非常认真，非常坚定地描述我自己和像我一样的人。我有绝对的自信说，我就是灵魂歌手。”

梁博带着这份自信开唱。时隔五年，再次登上被广泛关注的真人秀舞台，他依然是黑色T恤，小平头，怀抱一把吉他。但与五年前不同的是，他身后有了一整支乐队，属于他自己的乐队。

正如冯轲所料，演出现场气势如虹，“爆了”。乐评人@耳帝的分析也符合梁博的判断：“他很纯粹，所以敢用‘灵魂歌手’这样一个如今已被戏谑化的一个词，在歌中反复呐喊，你起初会不以为然，但你会被他的严肃与真诚给震慑。”

冯轲对结果并不满意。梁博赢得了所有参赛歌手的认同，拿到内投第一名。观众的反馈却不如预期，仅排名第六位。这直接导致梁博踢馆失败，无法继续留在“歌手”的舞台上。

在返场演出中，梁博演唱了又一首原创歌曲《男孩》。舞台上，他自弹自唱，这首以自身经历创作的失恋情歌忧伤中又带些洒脱，和《灵魂歌手》相比，这道“家常菜”更受观众欢迎，节目一结束，《男孩》就迅速登上了几大歌曲排行榜。

“这是我意料之中的事。”梁博说，如果按他的意愿，他更想把《男孩》作为踢馆歌曲。“《灵魂歌手》大家是被我的精神气场打动，被态度打动。而《男孩》更通俗，它与老百姓之间更容易产生共鸣，不管别人知不知道我是谁，都会觉得这首歌好听。你要有带引号的雅，也要有带引号的俗，这就是《灵魂歌手》和《男孩》的区别。”

在与梁博的交谈中，“老百姓”是经常从他口中冒出来的词，这是我之前没有想到的。他并非如舞台上展现的那样冷漠，恰恰相反，他对歌曲流行

度的追求甚至有些迫切。

在“歌手”舞台上，梁博只唱了三首歌，旅程很短，但利用充分。在最后一场突围赛中，他选了一首乍听起来更没有竞争力的歌曲《日落大道》，这是他第二张专辑里的歌，描述的是当时在美国录制专辑时的心境。这首歌人声并不凸显，以编曲和配器出彩，胜在整体意境。

梁博曾在很多场合说过，要让大家知道，音乐不只有演唱，它是一个整体的视听享受。在这个明知自己留不下的舞台上，他选择重申自己的理念。

消失的冠军

“这五六年间，可能很多人不知道我在干什么，我无所谓，但我站在舞台上的时候，大家知道我在干什么，这就足够了。”2012年，梁博参加了浙江卫视的王牌节目“中国好声音”，他一路从盲选杀入决赛，并最终夺冠。

因“歌手”再次受到关注后，梁博早年参加“中国好声音”的视频也再次被翻出。在那场决定命运的盲选中，他穿着印着图案的绿色T恤，配一条深色牛仔裤，背着木吉他，用最常见的摇滚唱腔，演唱了一首郑钧的《长安长安》。

这不算是一次成功的亮相，两分半钟的演唱只吸引了一位导师转身。除那英外，刘欢、庾澄庆和杨坤都觉得，这是一把太普通的摇滚嗓，在“好声音”的舞台上并不特别。

但随着比赛的深入，梁博的个人风格越来越鲜明。和强调展现技巧的歌手相比，梁博更像是用本能在唱歌，他的演唱与造型一样简单干脆。这种特质在与黄勇合唱《北京北京》时最为凸显。黄勇以煽动力极强的方式演绎，整首歌都是高潮。但梁博选择渐进的方式呈现，他闭上眼睛，从低沉到高亢，把半首《北京北京》唱出了更多层次。

当时，坐在电视机前的冯轲正是被梁博的整体气质吸引。“第一感觉是，非常高分的嗓音条件，太能唱了，每首歌都不输给原唱。”冯轲觉得，这种条件的创作型歌手可遇不可求，创作型歌手很多，但不是每个人都是自己作品的最好诠释者，但梁博的声音和演唱技巧让他具备天然优势，他就是自己作品的最佳载体。“更重要的是，他那么年轻已经自成体系，从他的穿着和唱腔就能看出，他是那种很古典的、追求质感的摇滚音乐人，一点也不躁，不花哨。”

与梁博交谈后再回看他在“好声音”上的表现，

我发现，他很早就开始有意识地打造属于自己的性格符号。比赛中，他只穿白色衬衫和黑色T恤、西服，场场都背着把吉他，他几乎不笑，话也少得可怜。“私下怎么穿都无所谓，舞台上我有我特定的风格。”梁博说。

对于要做怎样的音乐，他也早就想清楚了。在“好声音”的决赛上，梁博演唱了最后一首歌曲《我爱你中国》。音乐停下来，他难得一见地举起右手主动发言：“我想……只说一句话：我会好好努力，有机会真的想让大家听到我自己写的歌。谢谢。”

这感言像是结语，也是预言。“好声音”比赛结束后，选手们都忙着经营自己，有人马不停蹄地巡演和商演，有人趁热打铁出了单曲，亚军吴莫愁更是一连接下几个大品牌代言，成为当时最具商业价值的“90后”明星。梁博却做了一个看似最不合时宜的选择。比赛一结束，他就从大众视线中消失，并以学业为由，回绝了绝大部分商业演出，连“好声音”巡演也甚少参加。他从不觉得自己进了娱乐圈，只说“不懂规则，怕给别人添麻烦”。

麻烦还是无法避免。离开不是一个“任性”就能说得通的选择，背后还牵扯商业利益。毕竟，“好声音”和灿星公司捧红了他，在他最具市场号召力时选择退出，“好声音”和灿星要承担商业上的损失。

五年前的梁博比今天固执。“我不想再唱别人的歌了，巡演肯定还要唱别人的东西，我得有自己的作品。”梁博说，这和淡泊名利，和叛逆都没关系，他只想再出现时，是唱着自己写的歌。

“除了写歌，我对自己的发展每一天都在做规划。”先考研，再找机会去美国制作第一张专辑，这是“好声音”结束后，梁博最想做的两件事。

“就是等，除了等，没别的。”梁博说，比赛结束后的七个月是他最低谷的一段日子。想做专辑却找不到钱和机会，公司、歌迷和媒体都给了他太多压力。

也是这段时间，冯轲和少城时代成了梁博音乐上的伙伴。“那时我和小博经常聊天，发现我们喜欢

“我不想再唱别人的歌了，巡演肯定还要唱别人的东西，我得有自己的作品。”梁博说，这和淡泊名利，和叛逆都没关系，他只想再出现时，是唱着自己写的歌。

的东西都对得上，很投缘，就想帮助他。”冯轲费了些功夫协调各方利益，最后，公司出钱，把他和乐队送到了美国。2014年，梁博才带着自己的同名专辑重新出现在公众视野中。

“边缘、自信、独立、不妥协”

见梁博那天，公司为他安排了10家媒体的访问，一下午被占得满满的。因为有视频采访，梁博要先化好妆。有几缕头发立不起来，他和造型师纠结了好半天。

这次采访打破了很多我从媒体上得来的对他的固有印象，注重形象就是其中之一。他拒绝了摄影师到楼梯上拍照的要求，并反复提醒摄影师和宣传，“拍完的照片发给我看一看”。

他把自己的形象也视作音乐的一部分。在“好声音”舞台上三次登场，黑色西服、黑色T恤、黑色衬衫，他保持了一贯的冷酷形象。这大概是从他喜欢的前辈那里学来的。崔健永远戴着红五星帽子，汪峰永远架着黑框眼镜。“个人符号鲜明的都是什么都管，老汪、老崔他们，比我管得多了。”

除了形象管理，梁博严格把控与音乐有关的每个环节，包括专辑封面设计、宣传和发行。“我是我自己的音乐总监。”梁博说，这也是他与少城时代合作的基础——在音乐上有绝对的自由。

2013年，梁博22岁，打定主意要到美国录制第一张专辑，这无形中为公司增加了一笔开销。冯轲理解年轻人的迫切，渴望接近偶像，亲近摇滚文化，想与最顶尖的音乐人合作。公司满足了他的愿望，为他请来曾与迈克尔·杰克逊合作的音乐制作人迈克尔·比尔登，亲自操刀专辑制作。

梁博为这张专辑筹备了很久。去美国录制专辑之前，他手里有30多首备选歌曲，但到美国后，他又一首一首划掉了。“我和他说，留着，以后还可以用，但他说不用了就跟放到碎纸机里一样，再也不会让这些歌出现了。”冯轲说，梁博有超出年龄的判断力和果决，后来出现在专辑中的很多歌都是他在美国重新写的。

这类在音乐上的勤奋，梁博不愿意多聊。此前有媒体报道他每天练琴八小时，他很快站出来澄清。“他是真的勤奋，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基本都在排练和写歌、录歌。年轻人，大概不希望自己看起来太沉重，想轻松一些。”冯轲分析梁博的避重就轻。

在梁博的首张同名专辑里，我们听不到期待中

的愤怒和批判，每首歌都很淡，旋律和歌词之间尽是单纯天真和少年迷茫。梁博在放任自己的单纯和少年感，他清楚，什么年纪就该唱什么样的歌，至于年龄和阅历所能带来的音乐品位上的提升，他愿意等待。

他对自己的创作力有评估，就像他也同样了解自己的音乐表现力。之前，很多人觉得，梁博喜欢汪峰的歌，尤其喜欢他“鲍家街43号”和其他较早期创作的歌曲。事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我更认同汪峰现在的音乐和他现在在做的事。但以我的阅历和年龄，唱他早期的歌可以唱得很好。《春天里》我唱不了，会觉得尴尬，没有那份阅历，也不懂40岁男人的心声。”

“我就好好利用自己的青春，而那些因年龄而欠缺的我迟早会有。”这是我在听梁博解释自己的音乐品位时感受到的自信。

2016年，梁博的第二张专辑《迷藏》上线。这是一张视觉专辑，也是他自己的创意。和同名专辑一样，《迷藏》也是采取现场同期录音的制作方式。专辑录制之前，梁博和乐队在Live House麻雀瓦舍的楼上彩排了很久，最终又花五天时间录制了八首歌。他请团队拍摄了录制专辑的过程，视频中呈现的就是一个完整的演出现场，乐队、配器、梁博的演唱状态都一一呈现在观众面前。

这张专辑在编曲和传唱度上明显比第一张专辑高明，这大概就是梁博口中“跟长个儿一样的，拦也拦不住的成长”。

相较于技术流的词曲创作，梁博更愿意和我们聊歌曲的传唱度。从第一张同名专辑开始，听众和网友就对梁博的歌词创作颇有诟病。有人觉得太直白，不够高级。这些批评，梁博都知道，他不同意，也不反对，但按他自己的追求，现在的歌词创作并非太直白，而是还不够直白。

“第一张专辑的歌词太抽象了，第二张专辑好很多。《男孩》从传播上来说，最简单，最朗朗上口，我觉得这是一种进步。”梁博说。

我们很自然地聊到了音乐启蒙。梁博的音乐启蒙很接地气，是《新白娘子传奇》和《西游记》，他至今觉得，剧中的音乐是经典。“所以你看，哪有什么低俗和高雅之分。”

梁博很少去KTV，但几乎每次去都会点成龙的歌唱。一个专业音乐人喜欢成龙的歌，多数人是羞于说出口的，梁博却毫不扭捏。“成龙大哥除了是演员，他在我心里也是特别优秀的歌手，有些豪气的歌，只有他能唱出那种气魄，能打动人。”梁博评价成龙

唱《醉拳》，逻辑与自己唱《灵魂歌手》一样，演唱者和歌曲之间的互文性提升了歌曲本身的价值。

听中国的还是欧美的，梁博心里也没有鄙视链。“能感动我的都喜欢，二人转也喜欢。我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咱们中国音乐的旋律是挺朗朗上口的，其实老外也喜欢听。但我们在编曲等一些音乐技法上确实是落后的，扬长避短就行了，不要盲目创新。你还是要保证做中国人能感动的词、曲、唱，不能洋到你自已听了都尴尬。但在配器上，可以借鉴很多西方的东西，这一点毛病没有。但你不能借鉴着借鉴着，老外觉得不像外国歌，中国人觉得不像中国歌。大家听完后觉得，挺牛，太专业了。听懂了吗？没听懂。那你这歌白写了。”

2014年，梁博接受《南都娱乐周刊》采访时讲过一个关于中英文交流的段子。他英语不好，但在做第一张专辑时，常常需要和老外交流。发邮件时，他常会在开头写上一句：“不好意思，这是我在网上自己翻译的，你要注意错别字。”时间长了，老外就都习惯了他用软件翻译的英语。

这是梁博与老外交流的方式，也是他欣赏和理解欧美音乐的方式，带着绝对的自信参与，不谄媚，不迎合，为我所用就好。

在“歌手”之前，少城时代对梁博的打造基本都是投入，商业回报微乎其微。梁博的商演依然很少，对于演出，他最低限度的要求是，带着吉他，绝不假唱。这样的标准，很多国内商演依然无法实现。音乐节和电视台的演出，梁博就更挑剔，要带乐队，对各种硬件设备都有明确需求。“你去问问，音乐节什么的、音响圈、各种商演圈我都出名了，要求太多。”梁博说，他不会降低标准，与其低就，不如提升自己的能力，总有一天，自己有资本让所有环节都符合自己的要求。

而摆在老板冯轲面前的事就更现实，如何实现梁博的商业价值，这一直是让公司头疼的事。

“中国好声音”之后，梁博消失了。但“歌手”之后，几十首原创歌曲在手的梁博准备乘胜追击。“可能会做一些朋友们想不到的事。大家觉得我又去拼命地做音乐了，但其实，接下来我会大量地上娱乐节目。”梁博说，他不拒绝任何尝试，只是他有一张时间表，与大家的时间节点对不上。

“边缘、自信、独立、不妥协。”梁博唱完《日落大道》时，观战的歌手李健评价他。这话有出处，李健自己信奉一个准则：“任何行业，做人都需要一个边缘姿态。”显然，梁博契合了他的标准。■



(宁雁飞摄)



左图：2016年9月25日，著名配音演员乔榛在成都的大型交响诗歌晚会“花重锦官城”上表演

右图：央视“朗读者”节目现场。图为嘉宾张梓琳

当我们谈论朗诵

文 / 驳静

董卿主持的“朗读者”引起的热议略平静下来后，我们和四个朗诵圈内人谈了谈，到底什么是朗诵。

朗诵的时代感

著名文化学者杨浪是朗诵发烧友，有一天深夜，他在朋友圈发布了一个自己的朗诵作品，内容是活跃于上世纪70年代的诗人食指写的《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没想到引起了不少共鸣。

中央电视台主持人董浩就是其中之一。他听完杨浪的朗诵，激动之下，一连给杨浪发去20条微信语音，每条都说满了60秒。除了表达自己对朗诵的看法，董浩激动的另一个原因是，他觉得这可能是

一个可以谈论“如何澄清朗诵艺术”的对象。

那段时间，恰逢董卿和她策划主持的“朗读者”在社交媒体引发了大量讨论。在这些声音当中，董浩和杨浪都发现，人们对朗诵其实有不少误解。二人一商量，觉得不如把远在上海的配音艺术家乔榛请到北京，三人进行一场圆桌会谈。这场发生在与朗诵关系十分密切的三个人之间的会谈，一口气进行了四个小时。

杨浪自称朗诵爱好者，进行过不少尝试，自己读高兴了，就把音频放到社交平台上。他在喜马拉雅FM发布过自己朗读的莎士比亚作品，被人评论说是“这个时代的莎士比亚”。他觉得对方说到了朗诵今天面对的最大痛处，即旧时代感过于强烈。因为许多人对朗诵的印象，仍然停留在上个世纪，参考的朗诵要点，依然是“摆开架势，字正腔圆”。



这也是许多年轻人其实无法对朗诵产生真正兴趣的原因之一。毕竟，大家从小就遵语文老师嘱“朗读并背诵”过大量课文，对长大后的许多人来说，它成了跟微积分一样，等闲在生活里用不着一回的科目。

发生在中小学课堂里的合诵齐读，被董浩称为“有口无心”。杨浪也反对集体朗诵，认为这几乎是对文本的一种亵渎。显然，在朗诵这个世界里，集体性与个性常常发生鲜明的二元对立。

而真正的朗诵，董浩认为相较于相声、评书等这些语言表达艺术，它“接近人类心灵最柔软的地方，对人的影响，是最直接的”。这是艺术属性中的独特性，跟集体朗诵的节奏单一一对照，很容易就能理解人们对朗诵长期误解的根源。

倘若能够见识一场真正高水平的朗诵，其实对它的误解很容易就能消逝。

以前听人朗诵，总是很困惑，感到自己正站在一个橱窗前，里头阵列“豪迈”“抒情”或“忧伤”这些形容词，对方越朗诵，就越像有售货员在耳旁拼命游说，“快选一种情感进入”，但究竟是哪种？是令人疑惑的。

然而，当听到乔榛坐在我们对面，朗诵起一首最常见的《雨巷》，才第一次意识到，传说中的“朗诵艺术”，可能是真的。他的《雨巷》里，写着情绪，而且这种情绪会变得特别具体，伸手可触，好比为盲人从普通书切换到了盲文书，世界瞬间言之有物了。

所以董浩把乔榛尊称作“真正的艺术家”。乔榛1965年从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毕业，之后的职业生涯中，曾为上千部译制片配音。《魂断蓝桥》中的罗伊和《哈利·波特》中的邓布利多，是老少两代人最熟悉的角色之一。

1982年，日本电影《寅次郎的故事》进入中国，乔榛接下了主角的配音工作。这部曾在日本拍了28年共计48部的系列电影，算得上日本电影史的一个奇迹。男主角寅次郎，是个举止粗鲁却不失可爱的小人物，这是当年40岁的乔榛从业十几年后，头一回演绎一个喜剧人物，以往他大都为风度翩翩或一身正气的角色配音。

这让乔榛感到不小的挑战。他回忆说，那阵子他揣摩角色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他试图在生活中也像寅次郎一样，思维直线条，做事毛躁。“我想开玩笑开玩笑，想发脾气发脾气，周围朋友都感觉到，我怎么变了个人似的。”

这种体会角色的表演方式，也被乔榛运用到朗诵里。所以他提倡的是那种“无我”的朗诵，不要有太多的自我意识，但“要对作者的创作内涵有深刻的领悟”。

朗诵鄙视链

年轻一代不热衷朗诵是一回事，另一方面，朗诵其实又挺无处不在的。

在工作单位的某些晚会上，或者一些婚礼上，总有一个节目叫“诗朗诵”。听来听去，翻牌率最高的篇目，是李白的《将进酒》。这些人表演得投入吗？当然，他们格外沉醉其中，特别是到了最后一句“呼儿将出唤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你还得预备好听一声嘶吼。可听着觉得愉悦吗？似乎并不尽然。

中国传媒大学播音艺术学院教授柴芦径说，从技术层面看，这几首诗词的确非常适合朗诵，因为它们当中含元音音节的字数比较多，特别是“a”以及由“a”组成的双元音。开口度大，发这些音的时



中国传媒大学播音艺术学院教授柴芦径

候就特别容易听上去有张力。

试着朗读这句“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果然能感受到大开口度的口腔之力。柴芦径又往这个类别里又添加了苏轼的《江城子·密州出猎》这一例子。试了试“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听听，“狂”“黄”和“苍”，也都是典型的“a”组成的“ang”复合元音。

朗诵爱好者偏爱这几首，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它们都气势磅礴，极富家国情怀。而那些情绪绵长、情感微妙的作品，就相对没那么受欢迎。但有例外，比如舒婷的《致橡树》和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这两首诗的文本本身，其实并不十分适合朗诵，“但是它们有名啊，有名很重要，所以这两首被表演得也很多”。

柴芦径担任过许多朗诵大赛的评委，尤其在初选环节，见到过无数人演绎过这几首作品。所以也听到过各种类型的嘶吼和大喊大叫，这些都挺“让耳朵受伤”的。乔榛把那种嘶吼式表演称作“朗诵里的烟火气”，在他看来，有些朗诵表演者，的确拥有很好的声音条件和技巧，假若参加比赛，还是那种一定能进决赛的。“但真正的朗诵艺术，还须得心

怀澄澈，不能只表现自己的技巧，而是要投入创作。”

柴芦径还见识过大量的“拖长音”。它和嘶吼一起，共同组成了许多人的朗诵两板斧。

但这还不是最叫人无法忍受的。挂在朗诵鄙视链末端的，是一种叫“朝鲜播音员式”的播报方式，这甚至成了他们朗诵爱好者最喜欢表演的一个笑话。

不过，董浩说其实他年轻时主持节目也一度是这种范儿，后来他觉得，“这可能是一种时代审美”。新中国成立后，国家专门派人前往苏联学习播音。苏联式的播音，很长时间内是唯一的广播方式，也的确在民众聚会等场合代表着一种集体情绪，发挥了政治作用，几乎到了“声音即真理”的地步。

如今，配乐是朗诵的标配。倘若朗诵发生在舞台上，又有灯光兼舞台布景。从某种程度上说，朗诵只是一种语言表达形式，但已带有浓重的表演属性。尽管世界各地都有朗读风气，但还很少有国家像中国这样，以朗诵代之朗读以后，成为一个单独的表演类别。

比如法国特有的高中哲学课堂，也时常有朗读方式，但也仅限于照章读，哲学文本并没有太多情绪表达空间。作者读书签售也很常见，这是欧美国家的出版社作图书推广的常规方式。如果是单人在台上朗读某一文本，其实又是属于戏剧的表演形态了。这些与中国的朗诵作为一项传统舞台表演项目仍有非常大的区别。倘若从“表演”属性去寻找对照体，在西方，只有演讲可与朗诵享有某种共同点。

倘若追溯历史，当众的语言表达，同出古希腊一脉。无论东西方，它都是一项有力的政治工具。在柴芦径看来，只不过是因东西方的文化政治传承，造就了如今西方人擅用演讲而东方偏爱朗诵的两个不同走向。演讲语言直白，而朗诵文学性强而且隐晦，社会功效也发生了改变。

朗诵的“弹幕时代”

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艺术学院的第一任院长张颂，早年在他的《朗读学》一书中，将朗读解释为“把文字作品转化为有声语言的创作活动”。这句话其实很接近于今天我们对“朗诵”的理解。

在传媒大学所有的专业里，播音系历来以难考著称，其艺考报名人数和计划招生名额比基本维持在90：1上下。尽管这其中“成名吸引力”因素

的存在，朗诵爱好者这个群体的涉及面，仍然比我们想象中要广。

除此之外，某些高校接受朗诵特长生，也成了朗诵风靡于学生群体的原因之一。例如，清华大学2017年的特殊类型招生计划中，“电视播音主持”就与声乐、舞蹈等一起，同列为六大可凭此获得高考减分优惠的艺术类别。

柴芦径说，虽然嗓音先天条件会影响一部分朗诵效果，但一首好的朗诵作品里，起到最重要作用的，仍然是对作品的表达。具体表演为技巧与表演时的对象感，这些都是可以通过后天培养的。这意味着，朗诵是一项门槛相对低的有效进取方式，少年人不得不将其作为正经事。也因此，各类朗诵培训班十分红火，是培训市场上不容小觑的一支队伍。学生们未必真正喜欢朗诵，借此取得高考优势却是个具体而现实的驱动力。

有趣的是，中年人对朗诵的追捧反而显得不那么功利。

微信时代的代表之一是“为你读诗”。从2013年6月创办至今，这一微信公共号的关注量两年内就达到了200万，在喜马拉雅FM和荔枝FM等声音内容平台创业的成功案例背景之下来看，“诗朗诵”

这个娱乐性几乎为零的名词，正在代表一部分人的审美。

实际上，该公号的创办者潘杰克本身就是朗诵爱好者。他最初做这个，是发现一大批同龄人都挺热衷于写点儿诗，他们会聚集起来，朗读自己的作品，民间诗会大都由此而来。这些诗会，往往从最初的朗读自己的作品，演变到朗诵经典。

柴芦径分析说，朗诵爱好者中非常大的比例落在中老年人群上。他们曾经是文学青年，喜欢写写文章，然后读出来分享给朋友。没有其他文艺特长，却有表达情感的精神需求，朗诵几乎是门槛最低的载体。

大部分中年人的朗诵，如同在诗这个主体上发表“弹幕”，既疏解情绪，又寻找认同。

再去看看“朗读者”这个节目产生共情的观众群体，也体现了相对明显的年龄趋势。一个电视节目，其传播热度，甚至一度被上升到文化复兴的高度。但其实就像潘杰克所说，他自己并不太关心“为你读诗”推送的阅读量，而那些在他的平台上读诗的不知名人士，享受读诗过程本身带来的愉悦和满足感，也对外界的评论并不在意。这种“发声即正义”，可以说十分接近当下弹幕时代的娱乐属性了。☑

《读书》2017年第四期目录

孙璐璐 欧盟：二十一世纪的神圣罗马帝国？

王悦 罗马帝国成因的是是非非

卢周来 一位“走上歧路”的经济学家

汤莹 “不打不相识”：翦伯赞与顾颉刚的学术交往

品书录

谣谚入史看《汉书》(陈其泰)·从故事到故事(张剑)·二十世纪中文世界的《动物农场》(刘训练 孟静)

孙郁 世情与远思

周宪 小说修辞如何关乎伦理？

卜键 库页的伤逝

才让 从文本出发，正当其时

邢承吉 重溯美利坚的观念世界：一七七六至一七八七

康宁 格兰维尔与技艺理性的发端

短长书

特朗普与中国电影(丁亚平)·田野调查中做“有心人”(杨善华)·离家最近的“天堂书库”(陈定家)

陶东风 “美学化”背后的尼采

刘晓艺 被塑造的后瞻性

李伟华 人类学的突围

段志强 “世界屋脊”与“中央之国”

唐小兵 民国政治的真谛

周志文 依然斗是中华

读书平台

《孙子兵法》没有“军事威慑”思想吗？(王珏)

读书短札

小品闲说 北窗读记(刘涛)



生活需要读书，
《读书》丰富生活

读者服务热线电话：(010)84050425, 84050451
读者服务部 E-mail: dzfw@lifeweek.com.cn
邮购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霞光里9号B座《读书》邮购部
邮政编码：100125 国内代号：2-275



《越狱》第五季能否重回巅峰？

文 / 悦涵

这是一部关于“逃离”的剧。主角总是困在某个地方，监狱，或者人生。

“迈克尔”复活

《越狱》第五季回归了。在中国，这部剧象征了很多人的青春。于是新季当米帅的身影刚一出现在屏幕上，弹幕立即传上诸多泪水涟涟的感慨。

《越狱》的基本故事框架是年轻有为的建筑师迈克尔·斯科菲尔德（温特沃思·米勒扮演）因哥哥林肯（多米尼克·珀塞尔扮演）入狱而陷入深深的绝望。于是，他放弃了自己拥有的一切，想出一个完美的越狱计划，故意被捕入狱，来到林肯所在的监狱。之后，整个第一季都围绕迈克尔如何利用自己的学识和身边的人，打通重重关卡，救哥哥出狱。而在狱中这一段艰难的准备过程中，不同的人 and 事又接连卷入他们的核心计划，雪球越滚越大。

第一季迄今为止被认为是《越狱》最精彩的一季，其惊艳程度也确实为接下来几季的超越埋下了难度。

第二季叙述了成功越狱的一伙人的逃亡生活。这时，在第一季已经形成一个团队的“越狱帮”开始四下分散，各自经历不同的故事线，凸显美国社会各个层面的矛盾。最终，一切谜团直指来自最上层的阴谋。

第三季主要场景重回监狱。迈克尔为了帮第一季中结识的爱人萨拉顶罪，进入了巴拿马最凶险的监狱，这里专门关押一些重刑犯。这时，林肯的儿子 LJ 和莎拉又在狱外被人绑架。对方以此要挟迈克尔找到监狱里的澳大利亚人并将其救出。于是，狱里狱外的林肯和迈克尔兄弟又开始实施新一轮的越狱计划。

第四季重回“逃亡”模式。迈克尔和林肯必须偷到与公司有关的情报，用这些情报换取自由。彼时，《越狱》早已经历了从第一季的盛大辉煌到之后几季每况愈下的口碑。第四季被普遍评论为“草草收尾”。

最终，编剧草草交上迈克尔罹患脑瘤死去、妻儿面临险境的结局。结尾处出现迈克尔的坟墓让所有人为主角的死去而惋惜，也为这部剧的终结而心疼。

《截稿日》杂志评价，《越狱》这部剧的精髓，一直是“狱”。主角总是困在某个地方，这种被困，可以是物质上的监狱，也可以是进退两难的人生状态。然后同伴们会花一整季的时间，去“越”。这种模式其实在前四季已经用不同方式、从不同角度讲述过，新季除非有什么新的点子，否则，终会让人觉得创意乏力。

主创保罗·舒尔灵（Paul Scheuring）在一次采访中这样解释：“首先，我们得让迈克尔的‘复活’在观众可接受范围之内，同时，又要让这个‘复活’成为整季的谜团。”执行制片沃恩·威尔默特（Vaun Wilmott）补充说：“新季中，各个角色必须从他们各自不同的生活状态重新回来。而他们之间，经历了剧中的6年，其实已经各有距离非常远的人生路线。在这种结构之下，我们利用过去几季《越狱》遗留下来的线索、符号，给观众制造出新的惊喜。”

话说回来，这次“回归”的初始其实在于主演温特沃思·米勒（Wentworth Miller）。一次采访时，米勒介绍，最初他和林肯的扮演者多米尼克·珀塞尔（Dominic Purcell）不约而同产生“回归”这个想法。正巧，那时福克斯公司内部已召开过相似主题的会议。最终，在该剧主创保罗·舒尔灵确定了如何让迈克尔复活的大方向后，“回归”正式启动。“如何在不破坏过去四季塑造的‘迈克尔’的形象下复活？如何在不违和的、尊重现有神话的基础上继续讲这个故事？”米勒说，这是他们在初始阶段集中考虑的一个问题。

擅长于“闭合写作”的保罗·舒尔灵，在《越狱》第二季接受采访时曾称，《越狱》的每一季对他来说都是一个独立的故事。他每一季的写作，都是从一整季的眼光全盘考虑。因此，这次第五季也将用9集的迷你剧形式，为等了8年的观众重新叙述一个相对独立的故事。舒尔灵目前已确认，第五季将是《越狱》的真正最后一季，此后不会再有新的故事，“一

次性的、相当于9小时电影的作品”。

和很多美剧一样，主创会在剧中加入对当前局势或热点事件的探讨。因此一直有一种说法，“看美剧就是在看新闻”。《越狱》第五季开篇就加入了对中东局势的探讨，并干脆让曾经“越狱帮”的一员C-Note——洛克蒙·邓巴（Rockmond Dunbar）皈依了伊斯兰教。第五季的整个故事背景，也似乎被搬到了内战混乱的也门。现实中，也门是特朗普“禁穆令”涉及的7个国家之一。舒尔灵在一次采访中说，第五季加入了很多积极、正面的伊斯兰教形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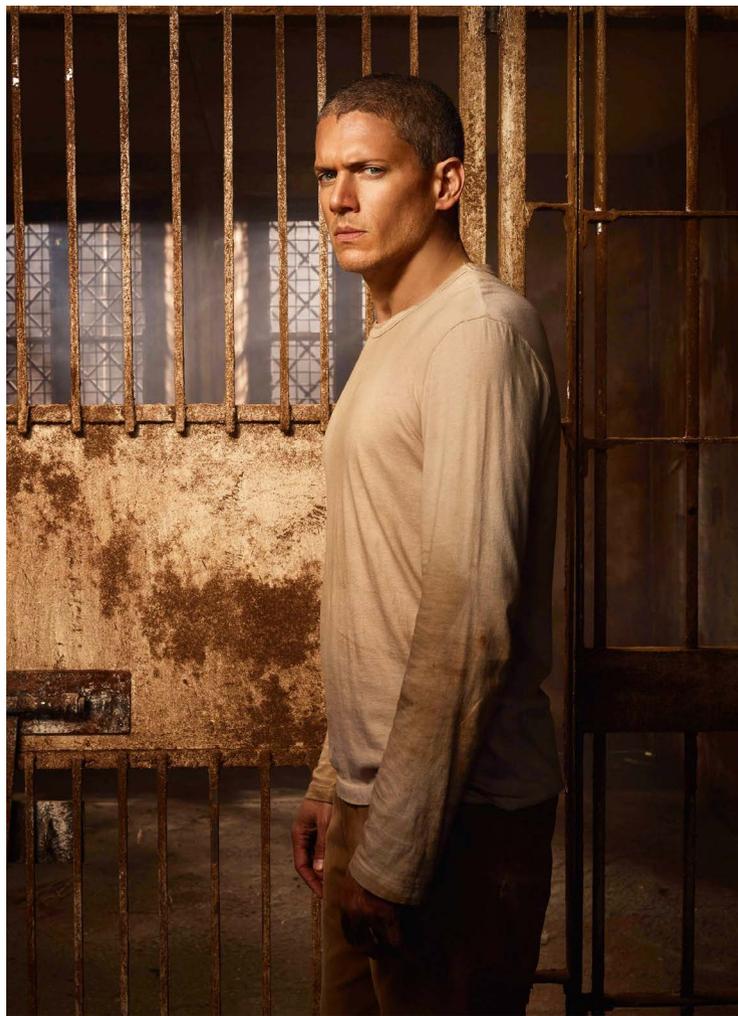
2005年，《越狱》在美国播出第一集时，被认为是非常“反传统”的一部剧。可是12年过去，美剧领域已经有了更多反传统的题材、反传统的手法。当观众在屏幕上看到努力健身过的主演和熟悉的片头曲，似乎能感觉到，在2009年《越狱》辉煌落幕之后，这些人，无论是主演还是主创，都暗暗在期待“找回过去的巅峰”。

“这是一部关于‘逃离’的剧。”剧中“T-Bag”的扮演者罗伯特·克耐普（Robert Knepper）在采访中说，“也许，这也是现实中的我们如今最需要的一件事。”

米帅八年之痒

《越狱》系列最大的赢家被公认为是主演温特沃思·米勒，在剧中饰演主角迈克尔·斯科菲尔德，被中国观众爱称为“米帅”。参演《越狱》时他33岁，在此之前事业发展似乎一直不太顺利。《越狱》前他只在电视剧《吸血鬼猎人巴菲》《急诊室的故事》、电影《罗密欧与朱丽叶》中饰演过一些配角。2001年的电视剧《恐龙帝国》里他开始担当重要角色，但似乎也未给观众留下什么深刻印象。

直至《越狱》，他终于找到了一个让自己突破重围的机会。剧中的迈克尔·斯科菲尔德是一个名校毕业、前途无可限量的建筑师，这和米勒本身普林斯顿大学毕业的背景本就有着几分贴合。再加上日后



上、下：《越狱》第五季剧照

“当我一遍又一遍重新反思这个角色，我认为他的精髓始终是：家庭、忠诚和牺牲。……时隔12年，我们都是真正的‘大人’了。”

爆出米勒本人年少时忧郁的气质、英国文学专业滋养出的细腻感受，使迈克尔这个角色在剧中的陨落、为家人的牺牲，格外让人心疼。美国《娱乐周刊》评价说：“他那柔和的嗓音、奔跑时潇洒的姿态，都让人过目难忘。……那副棱角分明的帅气脸庞，那份智商过高、意志坚忍、心思缜密的刻画，都将冷静的行动与炙热的期盼交织上演，恰似冰与火的咬合，让人爱恨纠葛欲罢不能。”

在新季中，迈克尔并没有死，而是在也门的一所监狱，度过了8年黑暗的日子。这似乎和现实中米勒本人的经历也有重合。当年，《越狱》正火的时候，无论是“粉丝”还是业内人士，都对米勒有一种超高期待，《越狱》积攒的人气使很多人认为他可以跻身好莱坞一线明星之列——相似的情况已发生在卷福身上。

可是，更多关注为米勒带来的却似乎是更多困扰。2007年，米勒被拍到与美国一位同性恋演员的照片，从而被怀疑性向，不过当时他明确表示自己不是同性恋。2010年，《越狱》第四季结束，他又被拍到一张身体发福的照片，在社交媒体上被人恶意放了一张他从前照片的今昔对比图，图说是“看来他越狱之后去的第一处地方是麦当劳”。这件“网络霸凌”事件让米勒本人极度受伤。他之后在一次公开演讲中坦言自己患有抑郁症，这么多年一直与之斗争，15岁时就曾试图自杀。《越狱》结束以后，他因为抑郁，才转而寻求美食的慰藉。

2013年，他在一封致俄罗斯圣彼得堡国际电影节的公开信中正式承认出柜。这一举动被一些人指责“虚伪”，因为2007年他曾明确否认自己是同性恋。

当有些人，占据着一些所有人都以为他（她）能成功的必要条件，如果这个人在一定时间内没有成功，他（她）的压力和挫败感都是双重的。饱受看好的“金童”米勒经历了多番挣扎，也让《越狱》外的观众看到，成功真是一件没有那么容易的事。

当然，这8年来，米勒也不是什么作品也没有，

他主演了电影《生化危机4：来生》，为妮可·基德曼主演的电影《斯托克》创作了剧本，出演电影《阁楼》《闪电侠》《明日传奇》……但似乎，没有一部作品让他重回一线明星的版图，也再没有一个角色，如迈克尔·斯科菲尔德那样让人铭记。米勒曾在一次采访中说他“放下迈克尔”了，如今第五季重回，无论戏里戏外，都不免让人有“找回”的期望。“扮演43、44岁的他，和扮演33、34岁时的他当然是非常不同的。”米勒说，“不过，当我一遍又一遍重新反思这个角色，我认为他的精髓始终是：家庭、忠诚和牺牲。……时隔12年，我们都是真正的‘大人’了。这种成熟，是真正的成熟。对我来说这次‘回归’让我最高兴的是能够重新和多米尼克（林肯的扮演者）合作。我们之间似乎有一种难得的默契。重回这部剧，在这里我们可以用自己的心灵、灵魂、时间重新浇筑一个共同的项目，这对于我来说是意义非凡的。”

“T-Bag”努力求变

“T-Bag”这个角色，在美剧著名变态人物中，一直以来是无法让人忘怀的。“在《越狱》中，他多次突破多个最高戒备监狱，在逃亡的过程中一路谋杀，甚至在沙漠中为了生存不惜食人肉，这个角色做了这么多恶行，却仍能引起观众某种程度上的关怀、‘同感’甚至喜爱，这是一件非常奇异的事。”《好莱坞报道》如此评价。英国的《Metro》报则认为，何以有一个人物可以如此令人毛骨悚然又同时分外讨喜。

去年，本刊采访T-Bag的扮演者罗伯特·克耐普时，他曾说他很害怕一些经典作品的“回归”。于是，当保罗·舒尔灵找到他谈《越狱》的“回归”时，他的第一反应其实是犹豫的，可后来，仔细沟通后，他发现“第五季将是一部全新的作品，有很大变化和很多进步”，并且“他们为这个角色写了很多很精彩的东西”，才使他真正决定走入这场“回归”。

“在历史上，当你创作一个故事——无论是电视、电影还是小说，只要你创造的那个虚拟世界足够具体，你就会拥有一个含蓄的弦外之音，就会成功创造一种主题。这个虚拟世界就会具有丰富的角色、丰富的故事。”他在接受“数字间谍”网站采访时说。在《越狱》前四季的众多血腥镜头中，“T-Bag”被砍手那段，无疑是整个四季最令人难忘的场面。

罗伯特·克耐普回忆这段拍摄时说：“拍摄完后，我自己也立刻爱上了这一段的表演。我的角色在树林里奔跑，充满雾的夜晚，手中擎着他自己的手。他那充满折磨、令人痛苦的哀号响彻整个森林……”

“缺手”元素曾是“T-Bag”角色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加重他变态感、恐怖感的不可忽略的元素。他在第一季最后一集失去了自己的手，第二季开端用一种极端残忍的方式胁迫一个兽医在没有任何麻药的情况下将手缝合。这个片段曾一度让很多观众瞬间钦佩 T-Bag 的勇气。然而之后，画面一转，他却毫不犹豫地为他缝手的兽医杀害。

在刚刚开播的第五季，“T-Bag”却迅速获得了一个高科技的活动金属手，更灵活自如，甚至比之前的好手更强大。多了手的“T-Bag”会失去这个角色的原味吗？这个答案，只能在接下来播出的剧集中，由观众自己去体味了。然而，编剧保罗·舒尔灵的原话是，“T-Bag”这个角色在第五季将展现出比以往四季更多的人性。

他的“邪恶”在第五季中似乎有所改变。“他会与自己内心的恶魔搏斗。”罗伯特·克耐普说。“改变”，也是克耐普在接受众多采访时非常坚持的一个观点。他认为，《越狱》回归，必须呈现一些新的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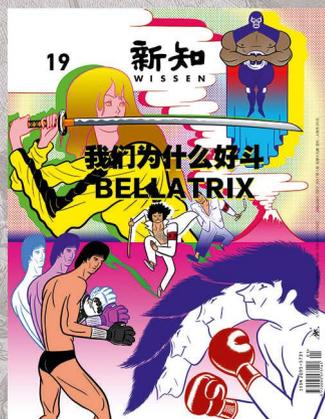
西给观众，如果一再重复过去，则这个“回归”就是没有意义的，也是他所厌恶的一种业内模式。拍摄第五季之前，罗伯特·克耐普完成了一部新的电影作品《约会游戏杀手》，根据美国历史上真实事件改编，主角是一个 70 年代的连环杀手。出乎很多人意料的是，罗伯特·克耐普在这部电影里并不是扮演那个杀手，而是扮演一个追捕杀手的好人。

“这对于我来说是一种很有意思的转换。”克耐普说，“从曾经的变态杀手变为如今追捕杀手的那个人。这种视角的转换给我一种新旧并存的视角，去审视我曾经扮演的‘T-Bag’。我突然意识到，天哪，我可以将这种融合反观的视角融入‘T-Bag’这个角色的重新塑造中。”在最初的关于“T-Bag”的采访中，克耐普总将他称之为“禽兽”（animal），这两年来，他却很少这样形容。“他开始思考了。”克耐普这样形容第五季里的“T-Bag”。

“8 年之后回归，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我们——无论是主演还是主创，都成长了。”保罗·舒尔灵在一次采访时说，“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都经历了起伏和收获。我们有受伤，有瘀青，有成长。这些，在回归时都会成为演员们塑造角色最珍贵的宝库。”

《新知》2017 年第 1 期上市

(总第 19 期)



读者服务热线电话

(010) 84050425 84050451

读者服务部 E-mail: dzfw@lifeweek.com.cn

新浪微博 @ 新知

微信公众号: 新知 WISSEN

关心一些恒久的事情——理性进步,智识生活的乐趣,美
Wir müssen wissen. Wir werden wissen.

[新知 2017 年第 1 期要目]

Entrée

大众的反叛
幼稚社会
5 种改变我们世界的语言策略
噩梦世界与善良天使

Main

树欲静,风不止——如何学习面对冲突
战争与药品
昆汀电影中的“混蛋”进化史
摔角:从罗马狂欢到美国大梦
街头霸王:手指与虚拟空间中的格斗传说

中国网络仙侠与玄幻文学的异国观众

Fusion

葡桥简明邵氏武侠电影技术词典
侠客的江湖
《箭士柳白猿》中的制度、拳理与气势
九匹骏马:堂·吉珂德和他的世界
那些年,我们所不知道的《高文爵士和绿骑士》

坚甲重铠:防护与生存之道
中东三大民族的军事传统

酷刑为何是恶的?——关于酷刑的道德哲学分析

Dessert

与中国擦肩而过的认知:在早期欧洲汉学中发现巴米扬
因父之名:电影中的菲德尔与拉丁美洲
戏中戏,镜中人——记米德国际纪录片电影节的一次放映
“匣子”、“格子”和“框子”
影像报道:大质量恒星的挽歌
1 BOOK 140 短评

《新知》2017 年订阅须知

《新知》双月刊,每期 160 页,全年 6 期,零售单价 20 元,全年定价 120 元。

2015 年珍藏礼盒,合订本已上市。

2016 年刊开始征订!

读者可到三联生活网订网: www.lifeweek.com.cn, 全年订阅包邮,并可成为《新知》读者俱乐部会员。

或在卓越网、京东商城等订网: www.amazon.cn / www.JD.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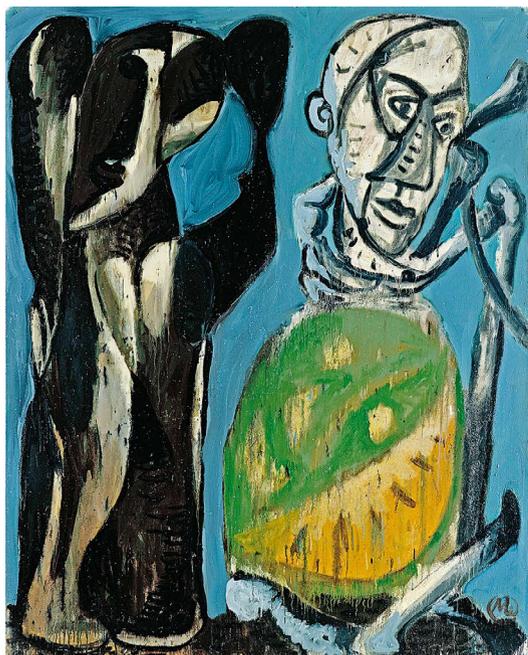




1



2



3



4

马库斯·吕佩尔茨作品：

1. 《尤利西斯·三》，130 厘米 × 162 厘米，综合材料，2011
2. 《头盔·二》，235 厘米 × 190 厘米，布面油画，1970
3. 《空间幽灵：无神论者》，200 厘米 × 162 厘米，布面油画，1987
4. 《穿西装的男人·二》，250 厘米 × 187 厘米，布面油画，1976

马库斯·吕佩尔茨：打破绘画的魔咒

文 / 薛卉

时隔两年，德国新表现主义代表人物马库斯·吕佩尔茨再次来到中国举办展览。对于他和新表现主义而言，战争是会凝固的，生发于德国的情绪和“表现”本身是永恒的。

76岁的吕佩尔茨，现在仍然坚持每天晨练。做足俯卧撑之后，就是他与自己作品对话的时间了。在画室中，他如人们印象中的艺术家一样，蓬头垢面，不拘小节，身上、鞋上沾满了各色颜料。在这一点上，他是一个传统的“画家”，他的一切作业工具包括画笔、颜料、画布，数十年如一日，即使在技术不断革新、新媒体不断介入艺术的今日，吕佩尔茨依旧秉持着原始、纯粹的绘画方式，这也是他一直以来对“绘画性”的坚守。

3月27日，“从酒神赞歌到阿卡迪亚：马库斯·吕佩尔茨作品展”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开幕。人前的吕佩尔茨换了一身装扮——黑色风衣、礼帽、皮鞋，银色袖扣、手表、手杖，无不精致考究。这是他作为一位德国老派绅士的坚守。

展出的104件作品包括88件架上绘画和16件雕塑，时间跨度从20世纪60年代至今，梳理了他50余年的艺术历程。

从酒神赞歌到阿卡迪亚

马库斯·吕佩尔茨生于1941年，是德国新表现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他与巴塞利兹（Georg Baselitz）、伊门多夫（Jörg Immendorff）、彭克（A.R. Penck）、基弗（Anselm Kiefer）等人共同催生的“新表现主义”，成为欧洲本土最有力的艺术力量。

在这些人中，安塞尔·基弗的名头最响，其作品中的独有历史神秘感和宗教性成为他的标签。这种特质在吕佩尔茨的作品中也很突出，而且看起来

更外露、更张扬，吕佩尔茨更多关注绘画本身，他讲究笔触的趣味、色彩的律动，不拒绝具象，站在他的作品面前，情绪很容易随之波动起伏，或恐惧，或慌张躁动，这种画面强烈的情绪带动力正是以挪威画家蒙克（Edvard Munch）为代表的欧洲表现主义的精髓所在，吕佩尔茨延承了下来。

1962年，吕佩尔茨开始“酒神赞歌”（Dithyrambe）系列的创作，年仅21岁的他首次提出“酒神颂歌绘画”的概念。他是个狂热的尼采追随者，在《悲剧的诞生》中，尼采把狄俄尼索斯的精神看作是古希腊文化的支柱，吕佩尔茨的“酒神赞歌”即脱胎于此。

展览便是从这里开始的，带着一个青年的激情和狂热——“你不需要理解或读懂一个艺术家，爱他，或恨他，就足够了。”此时的作品带有浓重的超现实主义烙印，放大物体的细节，描绘局部，借助视觉上的张力来传达艺术家自身的个性。1989年，吕佩尔茨曾经说：“酒神的赞美诗完全是我个人的、非科学性的对抽象的贡献。抽象不是理性的分析和精简，而是对无意义对象的创造，一种简单的存在……”

很快，“头盔”成为他第一个经典的符号。1969至1977年，吕佩尔茨开始认真钻研德国的历史，一方面是对美国抽象表现主义思潮的回击，另一方面也是对自己“狂热式绘画”的进一步发展。头盔，船桨，军服、军帽、徽章、棋子、巨大鹿角，这些充满各种隐喻和象征的“德国式图案”将他的创作引向对“二战”时期纳粹德国的反思。吕佩尔茨生于东德，1963年搬到西柏林，“在穿越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识形态之后，显然不会再对任何一种宏大的乌托邦之梦抱有幻想”。因而，他对战争的解读不是史诗性的，而是更加情绪化的批判，悲怆的痛感始终萦绕在“德国主题”系列中。

进入八九十年代，吕佩尔茨的创作主题再次转变，一边回归希腊神话的题材，一边开始与古典经典对话，他在几位令他尊敬的大师的作品中获取灵感，如柯罗和普桑——“如果我遵循着柯罗和普桑，这意味着我的作品从画面到内容本身都会有一个全



德国新表现主义代表人物马库斯·吕佩尔茨

新的节奏。”

向大师致敬，是很多艺术家都会使用的母题。是图式的挪用还是精神的转译，成为“向大师致敬”难以突破的瓶颈。近年来的“阿卡迪亚”系列是直接指向普桑《阿卡迪亚牧羊人》的致敬。“阿卡迪亚”是古代传说中一片世外桃源式的乐土，吕佩尔茨笔下的“阿卡迪亚”则少了几分田园般的诗意，头盔、贝壳依旧混杂其中，古典雕塑、电影、广告图像也并置在画面里，对西方现代文明的反思成为更深一层的主旨。

在吕佩尔茨 50 余年的艺术创作中，不只有绘画和雕塑，他还写诗，用钢琴进行即兴爵士乐弹奏。他是传统艺术形式的捍卫者，他在展览开幕时说道：“我们这一代艺术家开始做艺术时，想砸碎一切旧东西，另起炉灶。后来我们发现，我们丢失了绘画。现在我像是在追寻逝去的‘绘画’，我要回到那个图像还残存的时代。”把绘画找回来，是吕佩尔茨一直在做的事，也是德国新表现主义声明的使命之一。

绘画的回归

自 19 世纪 80 年代以来，艺术发展的进程中潜藏着两条逻辑：一条是革命论，说好听是新浪汹涌追逐旧浪。立体主义、未来主义、达达艺术、超现实主义、后绘画性抽象等等流派走马灯似的上演，不断抛弃传统，奔向理想的未来，而且追逐者跑得越来越快，一种新风格还没站稳脚跟，又被后来者扑倒。到了 20 世纪 60 年代，艺术界的热闹与混乱史所未有。当“新”成为绝对价值，这样的局面也可以料见。另一条是媒介的批判论，最清晰的阐释者是克莱门特·格林伯格 (Clement Greenberg)，他认为艺术要坚守自己媒介的纯粹性，比如绘画，即是一块色彩覆盖的画布，其价值也仅限于此，任何文学性的叙事都会误导绘画的价值。在这条逻辑的终点，就出现了红色的画布、蓝色的画布、带有一道刀痕的画布等等极纯粹之物。在这两条逻辑的夹击下，绘画顺理成章地会献祭自己，革了自己的命。60 年代最走红的艺

术家愿意到画廊外面去包扎大地，在街上散发传单，或者亲身上阵以行为当作品，就是不愿拿着调色板坐在画架前，绘画一度被认为已经死亡了。

可以想象新表现主义的出现带给人们的震惊，绘画死而复生了，而且看上去依然情绪饱满、力量充沛。这意味着艺术界局面的改变？在一条单一路径的终点展开了一个多元主义的大格局。

1981年1月15日，英国伦敦皇家艺术学院举办了一场“绘画中的新精神”展览，组织者说：“在这个普遍放弃绘画的年头，是该重新考虑绘画作用了。绘画依然是一个表达人对世界感受的工具，它的潜力、它的可能性依然很大，因此我们不妨回到绘画，而且是回到有形象的绘画。”展览挑选了38位画家参展，主要来自美国、英国、意大利和德国，竟然也把已经过世的毕加索给拉了进来，其中德国中青年画家的作品最多，这跟联邦德国与柏林市政府对展览的资助有些关系。巴塞利茨（Georg Baselitz）、吕佩尔茨等人就在这个展览上一炮而红。这一年吕佩尔茨40岁。

当时人们支持绘画的回归，无非有两种立论：其一，人类作画的冲动与生俱来，拖动画笔，领着颜料在画布上游动，这种愉悦绝不能遭到完全抹杀。其二，人类表达自己的幻想，传述远古的神话，乃至一瞬间绽放的情绪都会自然流淌在画布上，丰富的本性绝不能被纯粹性的要求扼杀。两种说法都很有道理，却有些画蛇添足的意味。

不要寻找国际化的艺术语言

吕佩尔茨有一个鲜明的观点：绘画的国际化是绘画的魔咒，不要寻找国际化的艺术语言及标准。在这次中国行中，他也一再强调，绘画是未知的，在绘画中不断发现绘画本身，并且植根于本土的文化去发掘真正需要呈现的“绘画”。德国这片土地，成为吕佩尔茨和新表现主义最好的灵感来源。

此时，绘画的回归为什么发生在德国？大抵可归于这两种解释：一种是在70年代的经济低迷之后，80年代无论美国、欧洲还是日本，涌现出不少豪商巨贾，他们想要在客厅里展现自己的品位与财富，不会满足于收藏一段行为艺术的录像，而倾向于实实在在的颜料与画布。另一种牵扯到文化政治。1945年之后德国一分为二，联邦德国跟着美国走，流行抽象表现主义、极少主义、概念艺术；民主德

国跟着苏联老大哥走，流行的是现实主义的调子。这时候德国人的心情十分矛盾，一方面，他们对民族主义心有余悸，希特勒打着这个旗号排斥所有国际性的现代艺术，并酿造了一场人类劫难，让他们无法正视这段历史，连“民族”都成了敏感词；另一方面，他们自然不甘于做文化殖民地，无法容忍对他国艺术的全盘接受。新表现主义是德国艺术试图从困局中走出来一条曲径。

20世纪70年代，吕佩尔茨经常画钢盔题材，色彩灰暗，但却有纪念碑似的肃穆感；1980年，他创作了关于法西斯的5件作品；1992年，他又画了战争四组画，背景虽然是海湾战争，但其意愿的深处仍旧是对“二战”的惨痛回忆。

表现主义本来就是一种带有强烈德国印迹的语言，它通过现实形象的扭曲变化来传达个人的精神与情感体验。历史上可追溯到文艺复兴时期德国的丢勒（Albrecht Dürer）和格吕内瓦尔德（Matthias Grunewald）。20世纪，作为一个有凝聚力的艺术运动也是在德国兴起。1905年，桥社（Die Brücke）在德累斯顿成立，他们颂扬个人意志，和吕佩尔茨一样，他们也信奉尼采，根源上来自现代生活中焦躁不安的情绪。凯尔希纳（Ernst Ludwig Kirchner）《柏林街景》中穿着时髦衣裳的阴森人像直让人倒吸凉气。那时候的画家都希望创造民族艺术，因此复兴了木刻版画技法。1910年，青骑士社（Der Blaue Reiter）成立，这是第二个表现主义团体，康定斯基（Wassily Kandinsky）、保罗·克利（Paul Klee）都是青骑士社的成员，他们说艺术应该捕捉宇宙的能量，带来生命的启示，一句句的呓语背后也是对工业化社会精神沉沦的不满。“一战”之后，一批德国艺术家都被纳入到新客观社（Neue Sachlichkeit）的名下，其中最为中国人熟知的是凯瑟·珂勒惠支（Kathe Kollwitz），他们基本都经历过战争，因此透过灾难的滤镜看透人性的底层，要揭示“绝对之真实”。

在德国艺术家的血液里，表现主义从来都不是艺术风格，它一直躺在人类本性的某个角落，只是在恰当的人手里转换成了绘画与雕塑。

即使绘画不回归，宽泛意义上的表现主义也会一直存在下去。而吕佩尔茨和新表现主义的一众艺术家们，恰好既做到了让绘画回归，又深深打上了德国化的烙印，这便是他们之于当时美国“艺术霸主”地位的抗衡，以民族性打破了国际化的魔咒。■

（本文图片由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提供）

更年期之后再怀孕

文 / 袁越

徐静蕾在她 39 岁的时候冷冻了自己的卵子，为的是“保证自己在生育权上拥有尽可能大的选择余地”。确实，女性在更年期之后就不会再排卵了，如果到那时候再想怀孕生子，唯一的办法就是用别人捐献的卵子做试管婴儿。

但是，不是所有人都有徐静蕾这样的财力和行动力。更多的情况是，职业女性一直忙于自己的事业，等到终于决定要生孩子时却发现自己已经开始进入更年期了，后悔已然来不及了。

徐静蕾自己曾经说过，（冻卵子）是世界上唯一的后悔药，事实真的如此吗？总部位于希腊首都雅典的“创世纪雅典诊所”（Genesis Athens Clinic）不信邪，采用一种自创的疗法让两名处于更年期的妇女怀了孕，而且用的是自己的卵子，2017 年 4 月 1 日出版的《新科学家》杂志报道了这家医疗机构所做的尝试。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更年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大部分妇女从出现更年期症状开始，到彻底绝经为止，往往需要经过 5 ~ 10 年的时间。这期间体内荷尔蒙水平会发生很大变化，导致经期非常不稳定，经常几个月才来一次，但这并不等于不会怀孕，处于更年期早期的妇女还是会排卵的，此时如果正好遇到精子的话仍然是可以怀孕的，所以不想怀孕的更年期妇女还是要有避孕措施。只不过这时排出来的卵子质量较差，流产率非常高。据统计，35 ~ 39 岁年龄段的妇女在

怀孕头 12 周内会有 20% 的概率发生自然流产，所以说，要想生孩子，要么趁早，要么学徐静蕾。

如果一名大龄妇女已经好几年没来月经了，那说明她已经处于更年期的晚期了，再怀孕的可能性非常小。“创世纪雅典诊所”就接待过这样一位荷兰妇女，她接受治疗时虽然才 39 岁，但之前已经有 4 年没有来过月经了，身体的其他方面也表现出更年期的征兆。接受治疗时她很快就来了月经，并在没有打促排卵针的情况下进行了体外受精并成功怀孕，可惜 3 个月后就自然流产了。不过医生相信她还有能力再次怀孕，希望她不要放弃，再试一次。

这个方法听上去很神奇，但操作起来却并不难。简单来说，医生们先抽出妇女自己的血液，分离出富含血小板的血浆，然后再用针头注射器将其注入妇女的子宫和卵巢当中，希望此法能修复破损的子宫壁，减轻更年期症状。

截至目前，这家诊所已经给 27 位年龄在 34 到 51 岁之间的更年期妇女尝试过该疗法，其中有 11 人进行了体外受精，最终两人成功怀孕。虽然那位荷兰妇女流产了，但另一位 40 岁的德国妇女成功了。后者因为一直无法怀孕，在此之前已经尝试过 6 次体外人工受精，均告失败。医生认为她已经进入更年期，再也排不出健康卵子了。没想到在雅典诊所接受治疗时，她在促排卵药物的刺激下成功排出了 3 颗卵子，医生用其中最健康的一颗卵子进行了体外受精，胚胎植入子宫后一切正常，终于让她怀上了一个女孩。

这个方法为什么会有如此神奇的功效呢？答案尚在摸索之中。雅典诊所的医生们相信富含血小板的血浆能让卵巢中本已失效的卵母干细胞重新焕发青春，但丹麦哥本哈根大学医学院的一位科学家则相信原因在于那根针头，他相信刺入卵巢的针头导致了卵巢的轻度损伤，从而改变了卵巢组织中的血管走向，使得原本被藏起来的卵泡首次获得了充足的血液供应，并因此而被激活了。

当然了，这个方法目前仅有一个半成功案例，大部分更年期妇女恐怕一时还指望不上。“创世纪雅典诊所”正在招募更多的志愿者，希望做一次严格的临床试验，看看到底是否真的有效。☑



“创世纪雅典诊所”的工作人员在实验室工作

喧嚣时代 给灵魂一个栖息之地

阅读之美



生活周刊

每周一出版 全年52期 多样便捷的订阅方式
邮发代号:82-20 拨打11185上门收订
零售单价:15元 零售年价:780元 订阅单价:10元 订阅年价:520元,全年净省260元
读者服务电话:010-84050425/84050451 读者服务邮箱:dzfv@lifeweek.com.cn

绘画:阿梗

旧塞尔吉奥 新塞尔吉奥

文 / 张斌



4月9日，2017年美国高尔夫球大师赛上，塞尔吉奥拿下首个大满贯冠军

在奥古斯塔，欢呼声很自然伴随在塞尔吉奥·加西亚左右，战至第九洞，与罗斯并列第一，甚至有些小小的欢腾。看好塞尔吉奥的人们，心跳缓缓加速，莫非好事将近吗？就像年初这位西班牙球手宣布的婚讯。但此后九洞乃至加洞赛，那个一心成就大师赛冠军的新塞尔吉奥与那人们十几年来早已熟悉的“大师赛不良症患者”的旧塞尔吉奥相杀不止，好在夺冠功成，让“圣婴”终成“圣徒”。37岁，新塞尔吉奥降临人间。

曾有人如此描述塞尔吉奥·加西亚：“他是整个职业高尔夫球界最不会隐藏失败绝望表情的，每一根灰白的短发都记录了主人的岁月风霜，可以淡忘，但绝难摆脱。”15岁，尚未成年，塞尔吉奥便开始征战欧洲赛场，一年后便成为欧洲业余巡回赛最年轻的冠军得主。1998年，奥古斯塔盛邀18岁的塞尔吉奥参赛，与伍兹并肩出赛。一晃18载，30个职业巡回赛冠军在握，比赛奖金数千万美元落袋，丰厚的广告合同也不缺，与高尔夫名宿之女约会，即将迎娶心上人，塞尔吉奥绝对不该是世俗眼光中的失败者，此前唯一的刺痛便是大师赛冠军的空白，无此功名，难成霸业啊。

塞尔吉奥平日里爱看恐怖片，自黑“一向以来的傻家伙”，夺冠尽情洒泪后，他玩笑道：“还是那个傻

家伙，其实什么也没有变化，但努力争取大师赛冠军可不是一部恐怖片，那是一部好剧，终于有了欢喜的大结局。”18年间，关键时刻，人们看过太多塞尔吉奥的沉痛挫败，每遇大师赛的比洞虐心战，败走的一定是他，以至于在不少逗趣的短视频中，亲朋好友都会借机调侃一句——“难道又是第二（个）吗？”大师赛“千年老二”的绰号是跑不了的。

深深的怀疑萦绕在塞尔吉奥脑海里，与挫败感从容相伴是件多么不容易的事情。塞尔吉奥做到了，唯有自己先放松下来，才有机会翻阅那面堵在前进路上的高墙。有机会到塞尔吉奥的个人官网上逛逛，你能看到一段小视频，朋友邀请塞尔吉奥挥杆击球，去击打放在树上鸟窝里的目标。这可太挑战击球本领了，三击不中，也很自然的，三位朋友逐一跳了出来。第一位——“塞尔吉奥，太糟糕！”第二位——“难道又是第二吗？”第三位——居然拿塞尔吉奥钟爱的巴萨污损了一番。最终，塞尔吉奥击中目标，击球前，身边人提醒——“这可是最后一颗球了。”塞尔吉奥诡异地向着镜头答道：“难道不是第二吗？”

第10洞和第11洞后，不少人心里开始默念着——“再见。塞尔吉奥！”这一次，塞尔吉奥挺到了最后，他自认从来没有在这样一个周日的下午，可以保持如此安静的心情，因为十几年的球场起伏终于让他在近日才想清楚，即使大师赛冠军始终不来，人生还要继续的，那并非灾难。就在想通了的第一年，冠军竟然翩然而至，以最起伏跌宕的方式，让新与旧的塞尔吉奥战到最后一刻。

两岁时，小塞尔吉奥从父亲的手中第一次接过了球杆。父亲曾经是职业球手，退役后打理自家的高尔夫球具商店，执着的梦想就是让儿子成为巨星，家中兄弟姐妹常常一道比试球技，最大的赢家一直都是小塞尔吉奥，奖品常年不变——冰镇可乐和冰淇淋。迈上职业旅途后，无论是夺冠还是沉寂，始终陪伴在身边的只有亲人，团队也长期稳定。在奥古斯塔，夺冠一刻，年已花甲的父亲也泪奔不止，颤抖地对着身边的人说：“我对他最大期许其实就是一个大师赛的冠军啊！”据说，塞尔吉奥始终牢记的是另外一句话——高尔夫球是明智的，它从来不会特别关照任何人的。■



手作

演出

艺术

亲子

美酒

旅行

松果是一个舞台，这里有：
城中最好的文化活动
最富营养的生活知识
最迷人的生活家
最有态度的生活方式

松果生活

与一万个生活家，一起创造美好生活！



扫描关注松果微信



扫描下载松果 APP

特朗普要玩“先军政治”了？

文 / 宋晓军

4月6日特朗普下令向叙利亚中部沙伊拉特空军基地发射了59枚“战斧”巡航导弹后，一些朋友问我：这是不是意味着特朗普政府今后要玩“先军政治”了？对此我给出了“不一定”的回答。我之所以这样回答有两个理由：一是此次打击的政治意义大于军事意义；二是“先军政治”目前还缺乏财政支持。

先说第一个理由。首先在袭击发生后，美国国防部官员称此次袭击是“一次性的”。从纯军事上说，这种规模的巡航导弹“一次性的”打击，无法阻止叙政府军通过军事打击行动切断伊德利卜南部和霍姆斯北部的反政府武装的联系（“化武疑云”发生地在两者之间）。当然，对特朗普用巡航导弹“一次性的”打击动机提出异议的还有两位美国知名保守派学者，一位是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卡甘（Robert Kagan），另一位是曾在小布什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担任过国防战略与需求中心主任的胡佛研究所研究员沙克（Kori Schake）。

前者4月7日在《华盛顿邮报》上撰写的题为《清理奥巴马的叙利亚烂摊子需要的不仅是导弹打击》一文中认为，针对伊朗在叙的7000作战人员和其支持的约2万名志愿军（含8000名黎巴嫩真主党作战人员），“一次性的”巡航导弹打击是不够的，必须要有接下来军事打击的计划。后者在《外交政策》网站上撰写的题为《特朗普对叙利亚大胆的攻击是一个危险

的误判？》一文中认为，“一次性的”巡航导弹打击不仅会让俄罗斯和伊朗加紧在叙的军事行动，而且也向地区盟友传达了模糊的信息。

再说第二个理由。在特朗普下令对叙进行巡航导弹打击的前一天，据《星条旗报》记者霍顿（Alex Horton）报道，美四大军种的一把手正在众院军事委员会请求参院于4月28日临时性的“持续决议”（CR）到期前，通过2017财年的常规性国防拨款法案。四大军种一把手都表示，目前面临影响行动、训练和采购的预算缺口。

简单说，由于国会一直没有通过奥巴马提交的2017财年国防预算，因此目前美军的预算一直是靠4月28日到期、参照2016财年拨款标准的“持续决议”来维持。而这正是特朗普3月16日向国会提请在2017财年追加300亿美元国防预算提案的原因。但问题并非如此简单。根据4月3日国会预算办公室（CBO）和税收联合委员会（JCT）向国会提交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若按特朗普的追加提案，2017财年的基础国防预算将为5490亿美元，已超过了在2011年国会已立法的“预算控制法案”（BCA）所规定的上限。而修改BCA则要参院有60票赞成。根据多家媒体分析，在共和党占52票的参院将会面临一场艰难博弈，不排除再次以通过一个新的“持续决议”而告终。

最后我想说的是：特朗普用59枚巡航导弹打击叙利亚的行为，不仅是一次低成本、低风险，对叙利亚所谓“使用化武”的象征性惩罚，而且也是一次对他在2013年连发7条推文反对奥巴马打击叙利亚表现的一次“政治洗地”。因此，特朗普此次对叙利亚的打击政治意义大于军事意义。其次，虽然特朗普启用了大批军事将领，并提交了在2017财年、2018财年大幅增加国防开支的提案和预算大纲，但从媒体的分析看前景并不乐观。事实上，就在2013财年特朗普及现任共和党众院领袖瑞安和参院领袖麦康奈尔高调反对奥巴马政府因“化武问题”打击叙利亚时，由于共和党在国会的掣肘，美军在当年的预算有176天是按“持续决议”支出的。在目前两党“互撕”激烈的背景下，民主党会让特朗普政府那么轻易地拿到钱吗？



4月7日，美军“波特号”驱逐舰发射“战斧”巡航导弹打击叙利亚空军基地，以回应叙利亚两天前疑似发生的化学武器袭击事件



《三联生活周刊十年》 《三联生活周刊廿年》
《有关品质》
《生命八卦》

限时 **8.5折**

典藏特惠

慢享20年的文字与时光

1995-2015年，
三联生活周刊20年的成长历程，
我们先后四辑出版这套精选文从，
包括经典栏目作品集及主创个人作品集。

扫码直接购买



微信



淘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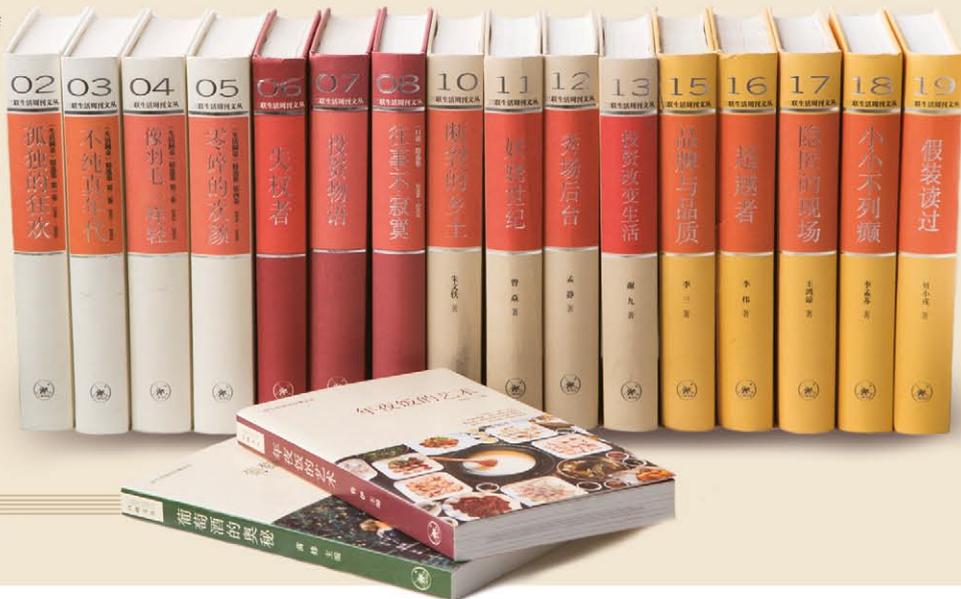
淘宝店铺搜索“三联生活周刊 lifeweek”

微信关注“三联生活周刊”公众号，进入微店

《三联生活周刊》精选文从
与《葡萄酒的奥秘》、
《年夜饭的艺术》

单本 **6.5折**

2本及以上 **4.5折**



十年	孤独的狂欢	不纯真年代	像羽毛一样轻	零碎的欢颜	失权者	投资物语	往事不寂寞	有关品质	断裂的乡土	妖娆世纪	秀场后台	投资改变生活	生命八卦	品牌与品质	超越者	隐匿的现场	小小不列颠	假装读过	葡萄酒的奥秘	年夜饭的艺术
10元	8元	8元	8元	8元	8元	8元	8元	8元	8元	8元	8元	8元	8元	8元	8元	8元	8元	8元	8元	8元

如需购买整套文从产品，欢迎致电读者服务中心：010-84050451/84050425，或登录官网商城：<http://shop.lifeweek.com.c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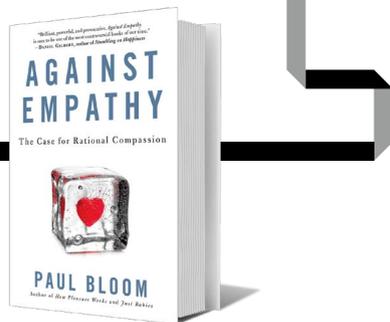
同情的害处

主笔 / 薛巍

我们觉得一个人有同情心总归是好事，而耶鲁大学的心理学家保罗·布鲁姆列举了同情心的许多罪状：它过于狭隘、短视，甚至会引发暴力行为。



耶鲁大学心理学家保罗·布鲁姆与他的著作《反对同情》



病态的利他主义者

许多人认为，今天世界上的许多麻烦是源于人们缺乏同情心，如果富人同情穷人，世界就会变得更平等、更公正。如果大家都学会换位思考，世界就太平多了。奥巴马曾在演讲中说：“我们每个人必须留心美国小说中一个伟大人物阿提克斯·芬奇的建议，他说，直到你从另一个人的立场考虑事情，直到你爬进他的皮肤、在里面走一圈，你才能真正

地理解他。”

200多年前，亚当·斯密就很重视同情，如今在西方，呼唤同情又成了潮流。英国哲学家朱利安·巴吉尼说：“提倡爱心是上个世纪的事情了。世界现在需要的、太缺的是同情。同情被广泛标榜为有效管理、好政府、更好的医疗、改善福利、提高学校教育、出色的育儿乃至和平的关键。耶鲁大学的心理学家保罗·布鲁姆在亚马逊网站上找到了1500本书名中带有同情一词的书。最近加入这一行列的是英国电视制片人、“艺述英国”前任主席彼得·巴泽尔杰特，他写了一本很动感情的书叫《同情本能》。

显然现在到了强烈抵制这类论调的时候了，布鲁姆挺身而出要挡住这股浪潮，他写了本书叫《反对同情》。他在该书的序言中承认，这本书本来应该叫《反对同情的误用》或者《同情不是一切》。对于为何他选择了如今这个更大胆的书名，他做了理性的自我辩护，但肯定炒作的意图更强。

布鲁姆承认同情有其优点。它可以是快感之源，有同情心才能欣赏艺术和小说，它也是亲密关系一个很有价值的方面。它有时会激发我们去做好事，“但从整体上说，它是一个低劣的道德指南。它会造成愚蠢的判断，经常会激发冷漠和残酷的行为。它会带来非理性、不公平的政治决定，它会腐蚀一些重要的人际关系，比如医患关系，使我们成为更差的朋友、父母、丈夫或妻子……反对同情不等于说我们应该自私、不道德，而是说如果我们想做好人，想关心他人，想让世界更美好，没有同情会更好”。

布鲁姆知道，反对同情会是一个很激进的提法。“如果你反对同情，人们会感到震惊，因为同情被视为绝对的善。就像你永远都不会过于有钱、过瘦，你也永远不会过于有同情心。”但他用许多事例证明，同情是有缺陷的。2012年，美国康涅狄格州纽敦镇一个小学发生枪击案，20个孩子和6个成年人遇害。公众非常有同情心，往这个相对富裕的社区送了几百万美元，仓库里塞满了人们捐赠的玩具。同一年，在芝加哥有更多孩子被谋杀，但没多少人为他们流泪。纽敦镇的枪击案利用了人们的同情心，劫持了人们的利他主义冲动，把它们从更有需要的事业上

转移了过来。

2010年，全世界的人都牵挂着33名被困在井下69天的智利矿工。全世界每天死于车祸的人大约是他们的100倍，但这些车祸几乎都没有被报道。我们很容易就会同情智利的矿工，因为我们通过新闻熟知了他们的幕后故事、他们的名字、他们的妻子的名字。了解这些事实会扭曲我们对资源和注意力的公平分配。

在个人关系方面，同情的危险不那么显而易见，却十分明确。比如，如果医生和护士太同情他们的病人，他们就无法正常工作。同情心太强会导致所谓极端的共生，使人成为病态的利他主义者。这种人需要别人快乐，他自己才快乐得起来，别人向他求助时他很难拒绝，他总是担心别人的事情。这听上去心地很好，但对他自己和他人都没有好处。这种人往往会过度保护他人、侵扰他人。

布鲁姆说，同情带有道德偏见，我们更有可能同情长得漂亮的人，更有可能同情跟自己类似的人——与自己长得更像，或者有着相同的种族或者国籍背景。曼联队的球迷更有可能支持其他曼联队球迷，而不是支持曼城队的球迷。英国人更有可能同情英国人而非外国人。白人更有可能同情白人。

另外，同情是狭窄的，它把我们跟特定的个人联系起来，但对统计数字不敏感。如特蕾莎修女所说，如果我看着人群，我永远都不会行动；但如果我看到一个人，我就会行动。“一旦我们把同情丢在一边，我们的公共政策就会更公平、更道德。我们会明白，死一百个人比死一个人更糟糕，哪怕我们知道那一个人的名字。我们会承认，遥远的某个人的生命跟邻居的生命的价值一样。没有同情，我们能更好地明白给孩子打疫苗的重要性，能去应对气候变化。这些行为会为了抽象的、未来的利益而让此时此地的人付出成本，所以应对这样的问题需要凌驾于同情之上，同情更支持个人当下的舒适和福利。”

偏爱和兼爱

有人认为，同情对道德来说是必须的。布鲁姆

回应说，道德有许多源头。许多错误的行为，如乱丢垃圾或者逃税，并没有明确的受害者供人去同情。他还说，有研究显示，最有同情心的人不一定是最道德的，同情心不那么强的人不一定就有攻击性。

布鲁姆分析说，同情心之所以能让我们更有爱心，是因为同情心能把我们自私的动机推及他人。比如你会把他人的痛苦体验为自己的痛苦，这样你就会去帮助他，因为这样能解除你自己的痛苦。你不让他人受苦，是因为不想让自己受苦，你关心他人是因为你关心自己。但自私不一定能解释得了同情带来的善行。当同情心使我们感到痛苦时，我们的反应通常是逃走。乔纳森·格洛弗说过，有一个妇女住在纳粹德国的死亡集中营附近，她从家里就能看到那些暴行，像犯人被击毙。她写了一封愤怒的信：“人们经常不情愿地目睹这些暴行。我感到恶心，这种景象需要我的神经有巨大的承受力，长此以往我会无法承受。我要求停止这些非人道的行为，或者转移到人们看不见的地方去做。”目睹犯人的遭遇让她感到痛苦，但并没有激发她去拯救他们，只要她看不到她就满足了。对于这种感受，许多人都不会感到陌生。人们经常会走到马路对面去，以免遇到讨钱的人。不是他们不在意（如果他们不在意的话，他们走过去就是了），而是乞丐的困难会让他们烦恼，他们宁愿不碰上。通常，逃离更容易。史蒂夫·平克说，有一个叫“救救孩子”的组织在杂志上登广告，放了一张贫困孩子的照片，旁边的文字说：“每天五分钱你就能救助胡安·拉莫斯。或者你把这一页翻过去。”大多数人就真的会把这一页翻过去。

巴吉尼反对扔掉同情心。他说：“我不太相信没有同情会更好。布鲁姆是一个功利主义者，他说我们不需要同情心的推动，只要知道怎样做会对所有人的福利最有好处，我们的理性就能找到实现它的方式。但除非我们关心他人，不然很难看出这种了解为什么能够激发我们去行动。布鲁姆说，道德应该是客观、公平的，要平等待人。但对自己的家人、自己心爱的人跟其他人不加分别，这是违反人性的。”

人生几何，欲望三角

文 / 维舟



法国作家勒内·基拉尔与他的著作《欲望几何学》



乡绅阿隆索·吉哈纳痴迷于游侠小说，尤其崇拜小说中十全十美的骑士阿马迪斯，为此化名堂吉诃德，效仿阿马迪斯，开始了自己的骑士冒险。在这个耳熟能详的文学人物身上，法国学者勒内·基拉尔却看到了不同寻常的东西。他指出，堂吉诃德有了阿马迪斯，便抛弃了自我，他不再自主选择自己的欲望对象，而由阿马迪斯“替”他选择，换言之，他欲望着阿马迪斯的欲望。

按传统的理解，人的欲望都是自生自发的，从主体(人)到客体(具体欲望)只需一根直线予以图解。基拉尔则认为，人永远不是自身欲望的根源，在社会与文化的作用下，个人欲望不是一种主动、本能、自然的产物，欲望永远源自“介体”——也就是“他者”。这个“他者”成为欲望者与欲望对象间的中介，对欲望对象的追求也就蜕变成了对“他者”的模仿。

到最后，与其说人们欲望的是客体，毋宁说人们欲望的是介体。所以，堂吉诃德作为欲望主体、骑士理想作为欲望客体，凌驾其上的阿马迪斯正是这个“楷模”“他者”或“欲望介体”。从这个意义上，表现三方关系的图形该是一个三角形。

从古希腊戏剧、中世纪骑士传奇，到但丁、塞万提斯、莎士比亚、拉辛、斯丹达尔、福楼拜、陀思妥耶夫斯基、普鲁斯特、马尔罗、加缪等人的文学作品，基拉尔不断辨识出这个致命的三角形。比如在《红与黑》里，于连仰慕拿破仑，“一个默默无闻又没有财产的中尉，靠他的剑成了世界的主人”，拿破仑作为介体，使于连对将军的地位与权势产生了强烈的欲望。又比如在《追忆逝水年华》里，马塞尔心心念念着贵族的世界，而“盖尔芒特家那边”就成了介体，他艳羡盖尔芒特家族成员的出身、财产、优雅的风度，不断神化盖尔芒特家的地位和魅力，并亦步亦趋地进行效仿，直到进入盖尔芒特家的社交圈，大失所望，嗒然若丧。基拉尔有意将此类小说视为一个辩证整体，指出派生三角欲望的个人史与集体史，一定会走向空无、幻灭与死亡。

基拉尔是著名哲学家、人类学家、文学批评家。他的学术生涯约略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欲望结构研究、社会暴力研究、基督教研究，代表作包括《浪漫的谎言与小说的真实》(1961)、《暴力和神圣》(1972)等。《欲望几何学》由“基拉尔学派”成员编选，甄选了基拉尔的七篇论文，集中于“欲望模仿”主题，自中世纪传奇故事中的典雅爱情，直到当代小说的情色描写，试图通过文学大师的作品勾勒西方世界的欲望史。而那个“地狱般的三角”，解释了人与人之间持久的竞争，揭示了人际关系中永久的暴力，也描摹了人们内心世界的满目疮痍。

基拉尔的“欲望模仿论”指出：人的本质是空无、没有自我，因此人的自由只有两种模式，神的模式和人的模式，前者是宗教的模式，后者则是“他者”的模式。当现代社会宣布“上帝死了”，“他者”便接替了上帝的位置，接受主体的崇拜。斯丹达尔曾经说：“现代人为什么不幸？因为我们虚荣。”换

言之，虚荣是现代最强烈的欲望。人只欲求他人所欲求的东西，所谓“最聪明的广告不对我们说某某产品质量精良，而是告诉我们‘他者’都跃跃欲试”。睿智的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早在19世纪就意识到，正在到来的社会是一个平等的社会，但是“平等产生的欲望与平等所能提供的满足欲望的手段之间的对立，使人们感到痛苦和疲惫”。在普遍的竞争、攀比、羡慕、嫉妒、仇恨中，无论是爱情、地位、财富，还是其他个人成就，都被毒化，人们只对他人的欲望垂涎。更可怕的是，这种欲望模仿还具有极强的传染性质，每个人都活在他者的目光之下。

《欲望几何学》的第一篇文章论及中世纪法国最早的骑士传奇《伊万》，揭穿“典雅爱情”的本质乃“一种声望竞争”。淑女们倾心于声名鹊起的骑士，这些骑士就像当今的歌星和球星。当大家同场观技，全场人的欲望便汇聚到一点，嫁给优胜者，对于女人来说，自然会感觉遂了心愿。然而，当骑士刀枪入库、与妻子卿卿我我，一旦听不到观众雷鸣般的掌声，女人的爱情怕是要从源头上枯竭。依照骑士的逻辑，女人应该爱上杀死她男人的凶手，因为女人永远对胜利者一往情深。基拉尔指出了这种声望竞争背后的暴力和荒谬。

基拉尔“欲望模仿说”的精微深刻，在《拉辛——诗人与荣耀》一篇里曲尽其妙。黑格尔曾经提出“主奴辩证法”，基拉尔则在精神分析领域将力量关系的不对等和相互转换做了绝佳的演绎。比如在拉辛的名剧《安德罗玛克》里，安德罗玛克是特洛伊英雄赫克托尔的妻子，庇吕斯是希腊英雄阿喀琉斯儿子，特洛伊沦陷后，安德罗玛克沦为庇吕斯的奴隶，但是庇吕斯偏偏对她一见钟情，反过来百般讨好。而安德罗玛克对新主人则无比冷漠、毫不动情。“尽管就武力而言，庇吕斯是赢家，然而安德罗玛克仅凭对他冷若冰霜这一条，周身便闪耀出更崇高的光辉。安德罗玛克是她主人的主人，庇吕斯则是他奴隶的奴隶。”基拉尔指出，“冷漠”作为绊脚石，尤其增加了欲望的传播机会，并由此衍生出主人与奴隶两种不同的处境和地位。“冷漠的人似乎具备了人人都想探究其奥秘的那种闪光的控制力。他仿佛处

在一个封闭的天地中，满足于自身的存在，悠哉悠哉不受任何干扰。”正是这种神秘和不可捉摸，给冷漠者披上了神性的外衣，把他/她放置在主人的位置。

所谓主奴辩证法，是说人际关系中力量的不平衡，往往有一方必须忍受屈辱，就是说其欲望永远得不到满足，而另一方经常受到关注，被过度的厌倦所折磨，甚至从情人被贬抑的欲望中也找不到可以维持荣耀的东西。《安德罗玛克》的四个人物分别处于三个相同的结构里：俄罗斯忒斯追求赫尔弥俄涅，赫尔弥俄涅不爱他；赫尔弥俄涅追求庇吕斯，庇吕斯不爱她；庇吕斯追求安德罗玛克，安德罗玛克不爱他。欲望的受害者无不期盼尽早结束痛苦，俄罗斯忒斯确实想放弃赫尔弥俄涅，而赫尔弥俄涅也确实想放弃庇吕斯，庇吕斯也确实想放弃安德罗玛克。每个人都真心实意想绕开欲望，因为只有绕开欲望，才能使欲望得到满足。“在决心弃欲与任性纵欲这二者之间，我们以为有天壤之别，其实不然。”

大凡欲望，皆为人之弱点。将欲望等同于介体，由此衍生模仿、攀比、嫉妒、竞争、投降各种荒诞剧，是现代人的普遍现象，可以称之为“本体病”。临终前的堂吉诃德高呼：“我是阿马迪斯·德·高拉和他绵延不绝的子孙的死敌……今天靠着仁慈的上帝，我付出了代价，吸取了教训，我痛恨他们。”一旦人物像堂吉诃德一样否定介体，人物便从奴隶地位解脱出来，这也是人们从“本体病”的枷锁中解脱出来的唯一途径。可叹的是，堂吉诃德与临刑前醒悟的于连一样，还只是“少数幸福者”，绝大多数人深陷“欲望模仿”的痛苦之中。最极端的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不再有无嫉妒的爱情、无嫉妒的友谊、无厌恶的向往。“人们互相诅咒、互相唾骂，可是不一会儿，就有人匍匐在敌人脚下，搂住敌人的双腿。怀着崇敬的仇恨、跪在泥沼中甚至鲜血里的敬仰，就是中介造成的冲突的最后形式。”当代社会里更普遍的，则是大众在暴力与色情的文化中膜拜介体，变成无能的窥视者，去窥视他人虚假的激情。■

史铁生：有限中无限的可能性（5）

文 / 朱伟

《务虚笔记》从1991年开始动笔，1995年才写完，写得很累。陈希米说，铁生的肾就是写这部长篇小说累坏的。

我感觉是，时间思考交出答卷后（他那个典型句式——“我生于一九五一年，但在我，一九五一年却在一九五五年之后才发生。奶奶说我出生那天天下着大雪，我却不得不用一九五六年的雪去理解一九五一年。然后，一九五八年，我上了学，开始理解了一点儿太阳、月亮和星星的关系，而一九五七年呢，却是一九六四年时才给了我突出印象”），《务虚笔记》是他给出的一个空间思考。思考的缘由，就来自“姻缘”——一个男孩七岁时问他母亲，什么是结婚。他问希米：“七岁那年，你在哪儿？”希米说：“又过了三年我才出生。”他又问：“那么，那时你的父母在哪儿？”她说：“很可能那时，我的父母还不相识。”

《务虚笔记》出版后，王安忆曾写过一篇文章，说铁生这部长篇，是要“渡”此岸于彼岸。王安忆认为，彼岸是性爱，此岸是残疾人C，叙述者“我”的任务，就是将C渡往彼岸。为什么呢？因为“C走向性爱，不能用外部的行为方式”。也就是说，“只能以思辨排除障碍”。因此王安忆认为，小说中以字母代表的人物，“无一不承担着思辨的角色，分工负责为C掘进道路”。他们“怀揣着哲学课题，都是用以证明与反证C的命题的”。安忆是从第二章《残疾与爱情》的具体情境引发这判断的。其实，性爱是不必“渡”的，生即欲。我感觉，铁生是要在这欲的层层叠叠空间里，探究生之含义。

这部小说一共22章，前两章“写作之夜”和“残疾与爱情”是交代，真正开端其实是第三章的“死亡序幕”——以0的神秘死亡形成悬念空间。这是一道门，“我”叙述的人物关系是，F（匆忙赶来的医生）、0（自杀的女教师）、神秘男人（0深夜在这位寄宿者的房内被画家发现，铁生故意不给他符号）、画家Z（0的丈夫）。这道门只交代0七年前逃离前夫满怀爱情投奔画家的过程，七年后她被画家发现后毫不申辩，几天后镇静地自

杀。她是否越轨？但她的遗言是，她今生今世只爱画家。

故事于是从“我”叙述画家Z开始。第四章“童年之门”，“我”通过Z叙述的开端是，他九岁时到一所美丽小楼里去找一个女孩。楼里有很多房间，其中“有一万本书与一只猫”的书房。他推开一道道门，最后看到一个瓷瓶里插着一根白色的大鸟的羽毛，于是一辈子都摆脱不了那个下午（发生了什么是悬念）。Z进小楼要找女孩0，被女孩家人“怎么把外面的野孩子带了进来？”的责怪给阻隔了。铁生写人生际遇，就像一间被阻隔的房间，“推开这个门而不是那个门，会走进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Z九岁时要找的0，被阻隔了，然后少女0就会遇上青年WR而陷入热恋，在那书房里做爱。WR后因其父海外的身份，考分优越却不被大学录取，被流放，0与他又阻隔了。等他从远方归来，他们已像在“这个世界的隔壁”——铁生小说中的说法是，“两个‘昨天’，站在一道‘今天’的高墙两边，互相能够看见，但是没有门可以相通”。此时，WR的志向已不是承袭爱情而是追求权力，他与一个显赫人物的女儿结了婚。0随后经历了草率结婚、离婚后才走向已经成为画家的Z，都是事过境迁。那个Z九岁去寻找的，当然不是这后来走进他画室的，0只是符号。但他从她身上，却找到了过去。

这部小说，有意思就在一个个“隔壁”的组合。铁生要通过叙述者“我”叙述残疾人C，残疾人C思考爱与性，是从七岁那个“结婚是什么”的原点开始，然后九岁走进那座楼房（楼房是他小说中固定的幻想承载）。楼房里的女孩，在“我”的感觉里，是N，这N就引出另一个故事。N其实是“我”的仰慕对象，拥有“一万本书”的是她父亲，她父亲是个作家。N从女演员成为导演后，要拍恋人彼此丢失后的寻找，她丢失的恋人其实是医生F。一切都是印象的组织。F是因父母的反对而丢失了N，阻隔来自N父亲当时的身份——“如果他立刻宣布与N结婚，他父母的心脏就可能立刻停止跳动。”N因此说他，“你的骨头，没有一点儿男人”。N与0，作为符号是重叠的。这楼里的女孩应该是0？但在我感觉中是N，叙述故意含混。比如她们面对F/WR的婚礼时，情景几乎一样。0最后在古园相遇F，N也在古园里闪电般爱上过WR。



史铁生长篇小说《务虚笔记》



(王文澜摄)

史铁生与陈希米（摄于1991年）

0与Z、WR，0与N，N与F的基础组合再扩展，诗人L是F的好友。诗人十岁时想追求这楼房里的女孩是T，他先到楼边油盐店买油为借口，再以长跑的形式向T示爱。但L的示爱也没能成功，他给T写信，赶上了“文革”，T将信交给了革委会，她与L就被隔断了。随后以长跑方式向T示爱的，是Z的同母异父弟弟HJ。这当然是另一个T，另一个故事。不同故事，铁生要说的是不同的可能性，他的想象力在这个空间里充分舒展。比如结尾，L与恋人的再见，如果那夜L留宿，就等同于留宿在Z家的那个男人了。

我能想象，整整四年，1000多个“写作之夜”，铁生在夜潮汹涌中一支支抽烟的情景。我感觉，他是要将一个个、一根根印象的点、线自然联结，变二维为三维空间。除了这些符号关系，还有N或T的父母、Z的叔叔与葵林里那个成了“叛徒”的女人。他把这一对对人的命途组合在一起，这真是了不起的结构——如一个折纸，里面折叠着许多个彼此映证的元。铁生真是殚精竭虑，可惜读者却往往无法理解这其中的苦心——一般人都懒于随他思索，思索毕竟太累了。

在这苦苦组织的空间里，铁生想要表达什么？首先，无疑，他要强调生构成的欲，是生命的原动力，爱欲无法分离。他认为，性是爱的仪式，无论符号

0还是N，都会强调“让我自己给你”，这就是仪式的意义。仪式意味着什么？N说，爱情是“你自己的心魂，是你自己的处境，是生命的一种希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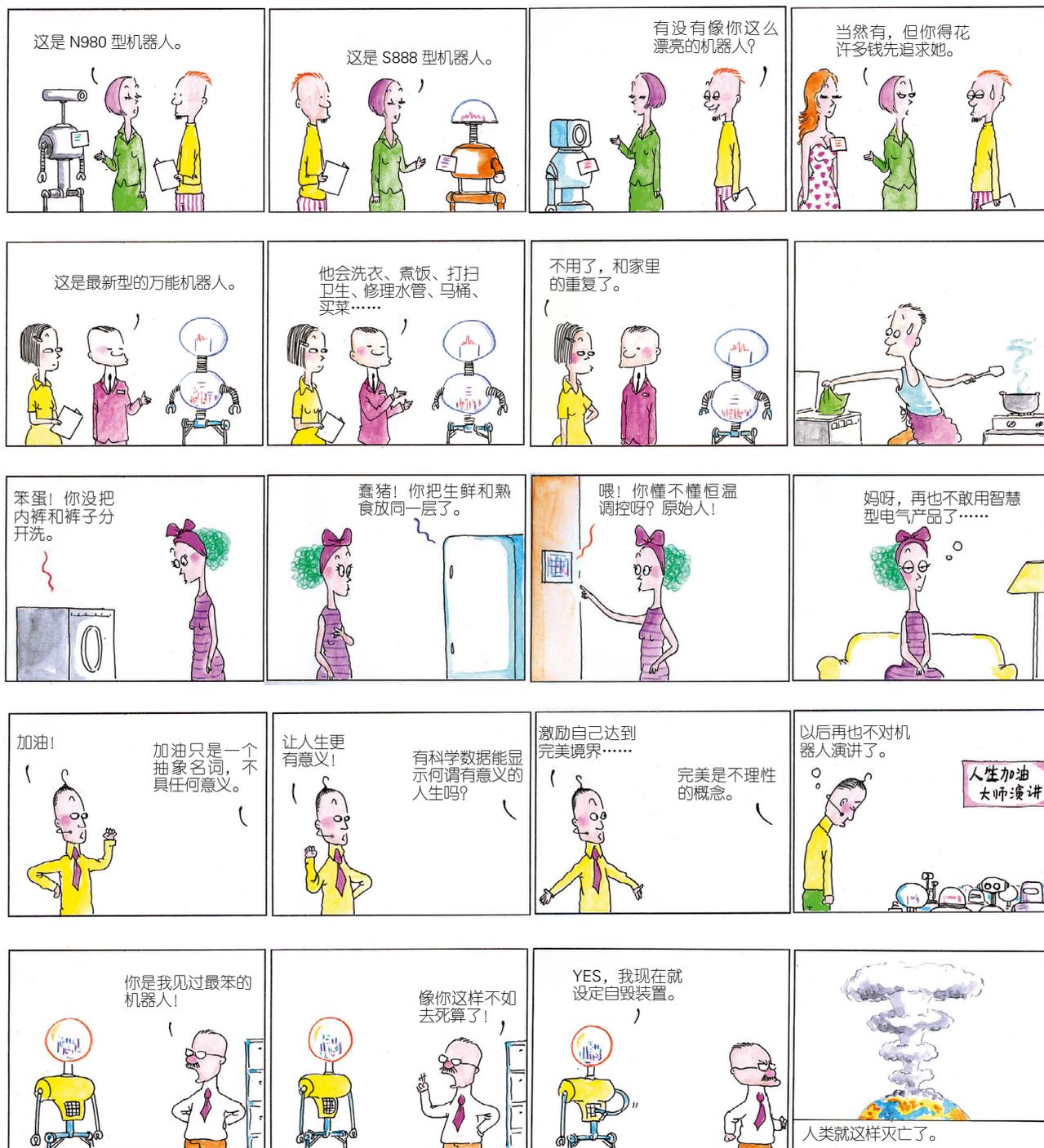
然后，在铁生的构思里，每一对恋人终被隔断，隔断有各种原因，都是心灵差距所致。也就是说，差距是永恒的，融合因此只能构成一个个段落，是它在不断寻找。段落是铁生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他认为，每人其实都只在一个时间段，在大空间里做小数点后的事。因此，一切都是在“我”的前提下，才成了问题。他将一个个段落组合在一起，都是无奈。

再然后，为什么从0之死开始？N在胶片复原的影像中窥见了F，F也就死了。“不知死，安知生？”是铁生更重要的观念——人本从虚无中来，人生本是“务”虚，“务”虚必然无奈。既然际遇构成片段，0之死，那个留宿男人是谁，她对Z失望的具体原因，都是无所谓的猜测。正如她与WR、与她前夫都构成了片段一样，她的离去，不过是走进另一片段，“无极之维”的另一维度而已。在铁生思维中，生命是没有止息的，Z对女孩0的寻找从九岁始，0之死是否也就构成寻找的新一轮开端呢？我这样来体会，这“务虚”——朝朝暮暮、烦恼烦恼之轮回，三岛由纪夫用四部曲来构思《丰饶的海》，就显得累赘了。☑（待续）

大家都有病



朱德庸





旧日风云 (二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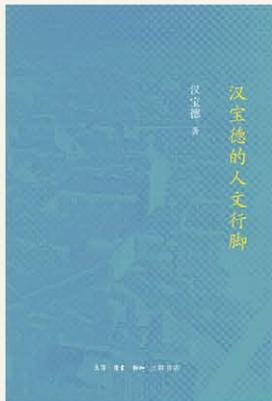
许礼平 著 定价：58.00元

陈恭尹曾谓“世间何日不风云”，许礼平将这“风云”讲成故事。有深藏功与名的香江潜龙潘静安，“乐夫天命”的傅抱石，结缘中国艺术的苏立文，身负传奇故事的神医柯麟；这里还有“同画异幅”的真相，圆明园《寒食帖》流传经过，当今拍卖市场乱象……内容有趣而颇多掌故。

汉宝德的人文行脚

汉宝德 著 定价：29.00元

这是作为建筑人的作者，在生活中对人文现象的关注，内容分为建筑、文化与环境。在建筑上，作者主张现代主义的理性加上乡土主义的感性；在文化上，他是创新的支持者，但在内心里却以历史与传统为重；对于环境，作者主张开发应遵循生态的原则。



拉比的猫 (全两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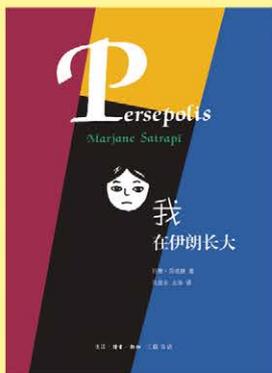
[法]尤安·史法 绘/著 张怡 译 定价：120.00元

在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平静的小镇上，犹太拉比史法家的猫吃掉了一只鸚鵡，并因此拥有了说话及思考的能力。以这只会说话会思考的猫的角度，作者理性、深刻又不失幽默地讲到了古老的犹太传统和与之相关的许多小故事，也探讨了爱情、理性与信仰等对人类来说永富魅力的话题。

我在伊朗长大

[伊朗]玛赞·莎塔碧 著 马爱农、左涛 译 定价：59.00元

本书是作者从10岁到24岁，即1980年至1994年间的生活记录。这期间，伊朗在伊斯兰革命之后建立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随后与邻国伊拉克打了八年战争，大量戴着天堂钥匙的年轻男孩被送到战场上。本书透过作者个人成长史来观察伊朗这个国家和它的文化，别有一番启示。



碳时代：文明与毁灭

[美]埃里克·罗斯顿 著 吴妍仪 译 定价：42.00元

整个地球文明就是一个碳基文明。碳并非地球制造的元素，碳是历经数十亿年宇宙恒星的生生灭灭，才终于诞生的化学元素。然而，这造就我们文明的元素，却也威胁着我们的生存。地球经过40亿年才形成的碳循环方式和速度，被几百年来的人类工业化进程所破坏，等待我们的可能是一场毁灭性的灾难……

字里书外

刘涛 著 定价：49.00元

纵贯整个中国书法发展历史，写书家、书事、流派、风格流变。那些今人或熟悉或不熟悉的书家、作品跃然纸上，字里行间透露着个人与时代的气质。



纠结小姐买房记

文 / 李晓姣（深圳） 图 / 陈曦



纠结小姐每天都有很多事要纠结。从早晨起床开始纠结今天用哪个色号的唇膏，到发现快迟到了纠结扣全勤奖和打的哪个更划算。坐进办公室里开始纠结先做哪项工作，最后纠结成淘宝上的两双鞋子。好在午餐单位有食堂供应，总算不必纠结去哪家饭店就餐，晚饭可就不一样了，是吃饭还是节食，是独自就餐还是约三五好友，餐后回家看电视还是和朋友逛街。这样的纠结一直持续到纠结小姐躺在床上，纠结某女星老公出轨了为什么不离婚，自己该支持还是反对，最终抱着手机沉沉睡去。

最近纠结小姐突然转变了画风，每天都用同一个色号的唇膏，发型也维持简单的马尾，下班后不等同事招呼就一个人急匆匆地离去，晚餐常常是在电脑前就着麦片啃面包。原来，纠结小姐有了一件大事要做。纠结小姐做房产中介的朋友透露业内行情最近房价有所下跌，因为新政策即将出台，这样下跌的趋势还会维持几个月，过了这个风口，房价又会呼呼往上涨，如果要买房，现在绝对是不可错过的良机。

纠结小姐首先瞄准的是公司对面的学区房，第一次看房，就看到一家性价比极高的房子，朝向、户型都满意，可买房毕竟不是买白菜，买个包都要货比三家，怎么能只听了一家中介的一面之词，看了一次房，就出手呢。纠结小姐背着好友又联系了其他几家中介。接下来的半个月，纠结小姐每天下班后都奔波在看房的路上。然而就如同买衣服看到一件心仪的，后面再逛多少家都觉得还是第一件最好看，纠结小姐看遍了周边的学区房，始终没有哪一户比第一次看到的那户更满意。纠结小姐拿出电话正要联系朋友，却收到朋友的信息，那套房已经成交了。纠结小姐捶胸跺足悔不当初。

学区房还没看出个眉目，另一个中介又推荐她买公寓房。“你一个女孩子，年纪轻轻，买房首先考虑的肯定不是自己住啊，应该考虑投资才对。趁现在房价跌，入手公寓房，租金都相当可观，将来市场好的时候还可以转手抛售再挣一笔。这样有了第一桶金，

就可以越买越大。其实炒房有什么难呢，谁不是从第一套房开始的。”

中介们分成两派，一派主张纯投资，一派主张以自住为首选，兼顾投资。纠结小姐的朋友圈每天也被这些新加的中介疯狂刷屏。“再不买就晚了”“现在租房就是掏钱替别人买房”“多犹豫一天我敢保证你会后悔”“今天不买，明天后悔”……看得纠结小姐心潮澎湃，寝食难安。看房的范围从城东跑到城西，类型从学区房到公寓，户型从一居室到复式两居，贷款额也从100万到200万之间来回纠结。

纠结小姐一咬牙，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先报个班学习一下房产投资的相关知识再做决定！正好一家中介公司最近正在给客户推出这样的服务，纠结小姐从此每天下班都要赶中介公司的接送班车去上课，然后再去看房，连面包都顾不上啃了，回家累到恨不得澡都不洗就直接睡觉。

日子在奔忙中如流水般逝去，纠结小姐迟迟没拿定主意，朋友又打来电话催促：“那房子你到底还买不买，我跟你说，最近房价可是有回升的趋势，错过机会就不知道再等多少年了。”纠结小姐急忙跟其他中介一一联络，房价果真在上涨，纠结小姐一时乱了阵脚。此时，朋友又建议纠结小姐转换思路，投资城郊的小别墅。“开车进城也就一两小时，现在很多人白天进城上班，晚上出城回家，这样的生活方式会成为主流，等房价一涨你连城郊的房子都买不起了。”

最终还是房价拯救了纠结小姐，新政策一出台，两三个月间，房价便如雨后春笋般节节拔高，如今便是连城郊的房子也买不起了。纠结小姐松了口气，嘲笑起自己来：本来嘛，一个姑娘家，急什么买房的事呢，搞得这段时间生活质量严重下降。还好没买，不然未来20年生活质量都要下降。纠结小姐从包里掏出小镜子，对着两个大黑眼圈，开始纠结，该买哪个牌子的精华霜好呢？

OutDry Extreme
ECO SHELL

高效轻盈防雨 环保夹克



生产过程不使用
全氟有机化合物PFCs
(产品可能含有微量)



无染色面料
无染色面料相比染色夹克
节约了49升用水



100%可再生面料
每件夹克的面料
由大约21个塑料
瓶回收制成



高效防雨透湿



可再生配件
洗标, 拉链, 拉绳, 孔眼, 均
来自可再生材料制成

高效防雨, 同时环保!

bluesign®
PRODUCT

www.bluesign.com

产品特性适用于Columbia男女款OutDry™ECO SHELL
Columbia高效轻盈防雨环保软壳

Columbia
TITANIUM

HASSELBLAD

CREATE TO INSPIRE



这是你的自由
这是我们的热情
这是X1D



石利洛

www.shiro.com.hk

总代理：

石利洛(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852 2524 5031

北京：+010 8580 1927

上海：+021 6418 9688

广州：+020 3868 2959

✉：marketing@shiro.com.hk